

托派第四国际资料

第一輯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供内部参考)

托派第四国际资料

第一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11017·208

1963年11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8} 2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09千字
印张 13 ^{8/16}	印数 1—1,000册
定价(10) 2.00元	

出版說明

——关于托派“第四国际”的一些情况

“第四国际”是在托洛茨基领导下成立的一个国际性反革命組織。1929年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驅逐出国以后，即在国外繼續从事反苏和反革命的活动，并糾合欧美一些国家的托洛茨基分子，筹备建立一个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相对抗的組織，也就是他們在1934年7月創刊的《新国际》月刊上提出的所謂“第四国际”。經過了几年的搜罗和拼凑，“第四国际”（又叫做“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在1938年9月3日在巴黎正式宣告成立。据称参加成立大会的有美、俄、英、法、德、意、波、比、荷、希等十个托派組織的正式代表和一个拉丁美洲的代表。成立大会通过了主要由托洛茨基本人起草的“过渡綱領”（全名为“資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这个綱領至今仍是各国托派組織的“基本綱領”。到1963年为止，“第四国际”先后已召开了七次所謂“世界代表大会”。

“第四国际”的領導机构是“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国际書記处”，它在拉丁美洲設有“拉丁美洲局”。目前“第四国际”的主要領導人有：密歇尔·巴布洛（希腊）、皮埃尔·弗朗克（法国）、列維奧·麦丹（意大利）、厄內斯特·盖尔曼（比利时）、沙尔·山登（荷兰）等。它的机关刊物名为《第四国际》（季刊）。

“第四国际”自称在三十多个国家設立了自己的“支部”，但是实际上这些所謂“支部”只是由一小撮托洛茨基分子組成，其中只有錫兰的“平等社会党”和印尼的“平民党”在議會中占有几个議

席，他們一般都沒有什麼群眾基礎，在本國政治上起不了什麼作用。而且，各國托派是齟齬不和的，有些國家如法國、英國、日本等，一國之內就存在着好幾個托派組織，有的托派組織並不屬於“第四國際”。即使“第四國際”本身，也是四分五裂的。例如，1953年，以格里·希利為首的英國“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就同“第四國際”的巴布洛派分裂，糾合了法國等幾個“支部”，另成立了“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1956年，以詹姆斯·坎農為首的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也同巴布洛派鬧翻；1962年，以波薩達斯為首的拉丁美洲托派（原“第四國際拉丁美洲局”）也同巴布洛派決裂，最近並且在歐洲的法、意、英等國建立與巴布洛派對立的支部，爭奪“第四國際”的領導權。1963年6月，“第四國際”曾經在意大利舉行所謂“統一代表大會”，企圖彌補裂痕，“重新統一世界托洛茨基運動”，但是除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表示與巴布洛派重新合作外，以英國托派為首的“國際委員會”派和拉丁美洲托派均拒絕參加。目前這三派還在自己的刊物上互相攻訐，爭吵不休。

儘管各國托派在組織上是不統一的，對當前重大國際問題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但他們都是繼承托洛茨基的衣鉢，宣傳托洛茨基主義的一套反革命理論，鼓吹“世界革命”，抽象地“反對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和世界帝國主義”，反對和仇視各國共產黨。特別是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來，他們利用蘇共領導所掀起的反斯大林運動大肆活躍起來，極力為托洛茨基翻案，惡毒詆毀斯大林和攻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近更企圖利用中蘇分歧進行反革命投機，無恥地歪曲中國共產黨的立場觀點來為托派觀點辯護，混淆是非，蠱惑群眾。而現代修正主義者為了替自己的背叛馬列主義立場辯解，却別有用心地搜撿托派的某些言論來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列主義政黨進行惡毒誹謗，誣蔑他們是“托洛茨基主義”。

因此，弄清楚托派的政治理論主張及其對當前重大國際問題的看法，對於我們辨別真馬克思主義和假馬克思主義，分清真革命和反革命，防止托派混水摸魚，以便更加有力地開展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和現代教條主義的鬥爭，是十分必要的。

為此，我們特將托派“第四國際”公开发表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当前国际問題的文件和言論，編印一套“托派第四國際資料”。这里先編选三輯。第一輯收集了“第四國際”成立以來到1961年历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并附录了巴布洛所写的一篇《第四國際簡介》及列維奧·麥丹所写的評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文章。

第二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第四國際”1963年6月召开的“統一代表大会”的全部文件；第二部分是拉丁美洲托派召开的“第四國際特別代表會議”的文件；第三部分是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1961年年会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长篇決議。这三部分大致上包括了“第四國際”目前三大派系对当前国际問題的最新观点。

第三輯收集了“第四國際”所发表的关于苏共二十大、二十一、二十二大和苏共綱領的文件和文章，并附录了厄內斯特·盖尔曼所写的一篇評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的文章。

因時間比較匆促，而且所选編的文件和文章是从好几种国家的文字翻譯出來的，未經一一仔細校核，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材料。

1963年11月

目 录

一、第四国际和苏联	3
——第四国际第一次筹备会议通过的提纲(1936年7月)	
二、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11
——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的过渡纲领(1938年9月3日)	
三、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告全世界被剥削群众书 (1948年5月11日)	56
四、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宣言 (1951年8月—9月)	102
五、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	118
——第四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1954年)	
六、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文件: (1957年10月)	170
1. 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	170
2. 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垮台(决议)	185
七、第四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文件(1961年1月):	229
1. 宣言	229
2. 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236
3. 世界经济的趋势和前景	259
4. 殖民地革命	304
5. 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斯大林主义危机	349
附录:	
一、密歇尔·巴布洛: 第四国际简介(1958年8月)	374
二、列维奥·麦丹: 对莫斯科会议的纲领的革命性的批判	396



一、第四国际和苏联

——第四国际第一次筹备会议通过的提綱

(1936年7月29、30、31日在日内瓦召开的
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会议通过的綱領)

1. 共产国际^①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說，社会主义已經在苏联“最后地和不可动摇地”胜利了——他們不顾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比較还处于低下水平的劳动生产率，也不管世界其他各地的发展道路——，这项决议是一个露骨的和危险的謊言。认为苏联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这一說法更不能决定这一問題，因为全人类只有8.5%的人口住在这个地区上。这仍然是一个两种不可調和的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間的斗争的問題。这一斗争在苏联領土内还未見分晓，而且也不可能見分晓。它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最后地和不可动摇地”决胜负。

2. 苏联工业的主要生产資料已經大大增长了，而且是掌握在国家手里；而在农业方面，主要生产資料則掌握在介于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之間的集体农庄手里。但是，甚至**国有财产**也还不算是**社会主义财产**，因为社会主义的前提是消灭作为财产保卫者的国家，减少不平等现象，并逐渐消除财产观念（甚而在社会中的道德和习俗上）。近年来，苏联的发展道路事实上恰恰相反。不平等现象在滋长；随之而来的，产生了国家压制。如果国内外的形势很好，那么，从目前国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可是，如果形势

① 1935年8月，最后的一次。

不好，倒退到資本主義去也有可能。

3. 每个工人国家，在初期，都将为了提高生产力而保留工資制，或者像馬克思所說的，保留“資產階級的分配标准”。不过，这問題要由全面的发展方向来决定。如果先进国家卷入革命，如果社会財富增长得快，那么，不平等现象就会消除得快，国家也就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保卫”了。如果苏联处于孤立状态和落后状态，那么，資產階級的分配标准就将带有一种粗俗的和低級的性質（工資悬殊、紅利、头衔、等級，以及更多的这类现象），并且产生后退傾向，而这种傾向具有危害国有制这一根本制度的危險。

4. 低生产力，加上大量投資、巨額軍事开支和无人管理的机器的巨大浪費，意味着人民大众最重要的日用品的不断的奇缺。經濟上的成果本是显著提高全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絕不可少的，现在却成了产生广大的特权阶层的溫床。社会的对立在第二个五年計劃过程中并没有緩和，而是大大加剧了。**不平等现象正以惊人的速度在滋长。**“幸福生活”的贊歌只是由上层人物来唱，而下层人物則繼續被迫地保持沉默。

5. **苏联的官僚主义**利用多方面的社会对立（城乡之間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間的，个体农业、集体农庄与集体农庄庄員的細小的个人务农之間的，斯达汉諾夫工作者与工人階級其他成員之間的），**实际上已經脱离了劳动者。**跟每个官僚主义一样，它为了强有力者、为了享受优惠的人、为了有特权的人的利益来調整各种对立。它跟每个官僚主义一样，最終将为了自己而征求大量的国民收入，从而变成整个特权阶层中最有特权的。

6. 苏維埃社会，就其个人生活状况而說，目前已經出现了一个**差別极大的等級**：从流浪儿、妓女、流氓无产階級到过着西欧大資本家生活的、拥有“万貫”的統治階級。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

大会的論調相反,社会主义还没有取得胜利;在苏联的客观的經濟状况(劳动生产力的标准)方面,沒有取得胜利,在劳动大众的觉悟方面(个人消費的标准)也沒有取得胜利。

7. 不过,苏联的全部社会关系,包括苏联寡头政治的特权在內,最后还是以国有财产和集体农庄财产为基础,这两种财产都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征用来的,与资本主义财产不同,它可以提供条件发展工业和农业,以上这种情况仍然是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十月革命所掘的历史鴻沟仍繼續隔离着**苏維埃計劃經濟与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意味着国家为了节省私人财产而进行干預,并且对专制的經濟体系进行“調整”,办法是**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和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把苏維埃經濟与法西斯(意大利、德国)經濟等同看待是无知或疏忽的一种結果,那是自由派經濟学家习以为常的看法。苏联的拿破崙式的官僚主义战胜无产阶级先鋒队絕不等于說资本主义反革命取得了胜利,虽然官僚主义在給资本主义反革命作指路标。

8. 认为(像无政府主义者和各式各样的极左派那样)苏联,在革命的无产阶级方面,应当承受像帝国主义国家承受的那种看法,就等于說,下列情况对工人阶级是一件无关重要的事:苏联国营工业和集体农业要保存下来并进一步发展呢,还是把經濟拖入瓦解状态,并通过內战办法把它交給法西斯资本主义。这种态度按理說是苏联的业已失望的唯心主义“朋友”所持的,也就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类型的外行和政治空談家所持的,絕不是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所持的,因为他们从沒有忘記**历史的基本因素:发展生产**。

9. 上边已經說过,苏联社会中的社会阶层主要是在分配方面有所发展,而在农业上,在生产上,則只是局部有所发展。但是,分

配与生产之間并不是隔着一道无法通过的墙壁。官僚主义有意地刺激个人和集体的欲望并使这种欲望发展到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借此来直接地消除对社会财产的观念。经济特权的泛滥在群众中产生一种合理的怀疑：**整个制度最后到底是为谁服务。**“资产阶级分配标准”已经远远超过所允许的程度，因而最后将破坏计划经济的社会纪律，从而也就摧毁国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

10. 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可能途径，在家庭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官僚主义是由国家低下的物质和文化水平造成的，也是由群众首创精神遭受到压制造成的，由于它没有完成社会保险和社会教育的任务，于是它便开始**重新建立和重新美化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其中包括家庭狭小的私有经济——抚养各种各样社会白痴的土壤。但是，家庭极其尖锐地提出了继承权的问题。官僚主义本身一心要把自己在政治上建立在保守的家庭基础上，因而感到自己的统治颇有成效，但还不完善，因为它不能把它的物质特权遗留给自己的后代。可是，**继承权**的问题引起了进一步扩大**私有财产**范围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渠道之一。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官僚主义都在危害着苏维埃制度中的每一种进步的事物。它不负担保卫“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角色，反而成了它的掘墓人。

11. 苏联新宪法的政治意义与官方的解释直接矛盾。“斯大林宪法”并没有，像官方权威厚着脸皮所说的，“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一步，恰恰相反，后退了一步，从无产阶级专政退到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在政治方面，应当表现在国家消亡上面。消亡的程度就是衡量社会主义发展成功与否的最为可靠的尺度。国家消亡的开始，应当是全部消灭站在社会之上的官僚主义。

但是，事实上，新宪法却恰恰把相反的发展过程制成了法律。不这样，也不成。特权的泛滥需要一个宪兵来监督。

12. 根据新宪法来看，**国家强制**并没有缓和，恰恰相反，它取得了一种高度集中的、公开的和嘲諷的性质。各级苏维埃被毁了。地方的和中央的，即建立在投票表决制度基础上的“市的”和“议会的”制度，与作为劳动群众战斗机构的苏维埃毫无共同之处。此外，这种制度已事先被剥夺了全部的真实意义。新宪法公开地把管理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权力都交给了斯大林的“党”，而这个党却是脱离人民、脱离自己党员的党，它代表着**统治阶级**的一个**政治机器**。

13. 此外，宪法在**法律上**取消了无产阶级在国家里的统治地位，而**事实上**，这个地位早已被剥夺了。接着，宪法声称，专政是“没有阶级的”，是“全民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是纯粹的胡说八道。“人民”对自己专政应当意味着国家已经解体为社会，也就是，国家已经死亡。实际上，**新宪法把苏联社会特权阶层的专政加在劳动群众头上了**，从而使国家和平消亡成为不可能，给官僚主义开辟了进行经济反革命的“合法”道路，也就是说利用“冷击”的办法恢复资本主义，而这个“冷击”乃是官僚主义利用“社会主义胜利”的骗术直接准备的一种可能。我们的任务是号召工人阶级起来用自己的力量反对官僚主义的压迫——保卫十月革命的伟大征服。

14. 新宪法与官方的谎言直接矛盾，不仅不发扬苏维埃“民主”，而且恰恰相反，肯定了它的彻底死亡。它在每一段落都宣称，目前形势的主人将不会自动地把地位让给人民。新宪法中的寡头和专制性质清楚地表现在公布宪法那天所宣布的新十字军上——“消灭人民公敌托洛茨基主义的妖魔鬼怪”的十字军（1936年6月

5日《真理报》)。官僚主义很清楚，致命的危险将从何方来威胁它，因此，它使用拿破崙式的恐怖手段，镇压无产阶级先锋队代表。

15. 苏联工人阶级已经被剥夺了合法改造国家的最后可能。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必然要变成一场革命性的斗争。第四国际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坚决反对个人恐怖，就像它反对其他一切政治冒险主义手段一样。官僚主义，只有采用群众在反对篡位者、寄生虫和压迫者时进行的那种目的明确的运动才能被消灭。如果一个社会反革命，即推翻生产资料和土地国有化以及重新建立私有制，是苏联回到资本主义所必要的，那么，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一场政治革命已变得不可避免了，也就是说用暴力推翻腐败堕落的官僚主义的政治统治，同时保存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所有制关系。苏联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依靠全国的劳动群众和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必须用武力打倒官僚主义，恢复苏维埃民主，消灭猖狂的特权，保证一个走向社会平等的真正进步。

16. 在战争问题上，像对其他一切问题一样，第四国际各政党，不许自己用形式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想法和同情来指导，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指导。例如，如果他们支持阿比西尼亚，不管那里还存在着奴隶制，也不管那里有野蛮的政权，这首先是因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代表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进步的历史阶段；其次，因为意大利的失败将意味着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的开始。

全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将在战争中支持苏联，虽然那里有寄生的官僚主义和克里姆林宫的无冕的尼各斯^①，因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尽管它丑陋不堪、腐败成风，与腐朽的资本主义比较起

^① 尼各斯(Negus)是阿比西尼的皇帝称号。——译者

来，則是象征着一个巨大的历史步伐。在新战争中，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敗北将不仅引起它的国家形式崩潰，而且还要引起資本主义基础动摇，最后国有制还将代替私有制。苏联的失敗不仅意味着苏联官僚主义的垮台，而且还意味着資本主义的混乱代替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政治路綫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世界无产阶级先鋒队在战争中坚决而勇敢地支持苏联，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将变成苏联的帝国主义的同盟。“一个与苏联結盟的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将充分而全部地保留它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无罪的敌对态度。**”（《**第四国际和战争**》，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者〕国际書記处綱領，第44款）“无产阶级无罪地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盟国，一方面必須在国内阶级政策方面展开；另一方面，还必须在下列几方面展开：揭露各有关政府的帝国主义野心、它的‘联盟’的背信本质、它梦想搞资产阶级暴动打击苏联的国家等等。因此，处于‘盟国’和敌国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必須以采取革命方式推翻资产阶级并夺取政权为目的。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能跟苏联結成真正的同盟，第一个工人国家才能免于遭受失敗。”（同上，第45款）

17. “极左派”害怕苏联的胜利将造成进一步巩固拿破崙式的官僚主义的地位，这种心理是由于对国际关系和苏联国内发展情况的錯誤了解造成的。各个陣营的帝国主义者，在沒有把生产資料的私有制恢复以前，是不会跟苏联妥协的。不管組成集团的国家在战争开始时态度如何，但帝国主义者在战争进行时会知道如何永远牺牲苏联而互相达成諒解并重新組成集团。苏联将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在战争中不吃敗仗，那就是，要看它是否能夠得到西方或东方的革命的援助。但是，国际革命，即拯救苏联的唯一办法，将同时意味着对苏联官僚主义的致命打击。

18. 苏联是一个工人的国家嗎？苏联是一个以十月革命所創造的所有制关系为基础并由一个代表新兴特权阶层利益的劳动官僚主义所管理的国家。苏联可以叫做一个接近名副其实的工人国家——虽然程度上还很不同——，在这个国家里，被机会主义者即资本家走狗所领导和出卖的工会，可以叫做一个工人組織。正如革命者保卫每个工会，哪怕是最彻底的改良主义的工会，使其不受阶级敌人破坏，同时坚决反对叛徒領袖；同样，第四国际各政党将保卫苏联，使其不受帝国主义的打击，但一刻也不能放弃反对反动的斯大林的机器的斗争。他們将在战时和平时捍卫批評苏联的統治阶级的充分自由，捍卫反对他們牺牲苏联和国际革命而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进行斗争的充分自由。

二、資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 第四国际的任务

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的过渡綱領
(1938年9月3日)

(編者按：这个綱領是目前各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基本綱領，在托派文件中一般称之为“过渡綱領”)

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

整个世界政治形势的主要特点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发生了历史性的危机。

总的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經濟先决条件已經成熟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人类的生产力已陷于停滞。新的发明和改进已經不能提高物质财富的水平。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发生社会危机的情况下，时机性的危机使广大群众日益貧困和痛苦。日益扩大的失业反过来加深了国家的財政危机，損害了本已不稳定的貨幣制度。民主政权和法西斯政权都同样跌跌撞撞地从一个破产走向另一个破产。

资产阶级本身一无出路。在已經被迫把最后的賭注押在法西斯主义这张王牌上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现在正閉着眼睛冲向一場經濟和軍事的灾难。在历史上享有特权的国家，也就是說在一定时期內资产阶级仍然經得起牺牲国民积累而推行民主政治的国家里，所有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处在几乎瀕于意志瘫痪的窘困状

态。“新政”尽管在初期貌似坚决，其实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治窘困，只有在一个资产阶级积累了无穷财富的国家里它才有可能出现。目前的危机虽然还远没有发展到最严重的阶段，却已经说明“新政”政治（如法国的人民阵线政治）并没有能开辟一条走出经济死胡同的新出路。

国际关系也同样不美妙。在资本主义分崩离析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一种无法解决的地步，到局势严重时个别的冲突和局部的血腥骚乱（如埃塞俄比亚、西班牙、远东和中欧发生的情况）势必就会汇合成为一场世界规模的燎原大火。资产阶级当然知道一场新战争会给它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但是，比起1914年的前夕来，这个阶级现在更没有办法避免战争了。

一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的说法，都是出于无知或有意識的欺騙。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已经开始有些腐烂了。尤其是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人类的整个文化就有遭到浩劫的危险。现在，危机轮到了无产阶级——主要是它的革命先锋队头上。人类的历史危机已经化为革命领导的危机。

无产阶级及其领导

革命前的社会状态所特有的社会危机完全摧残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国家和政治，以及它的国际关系。在把革命前的状态改变为革命状态的道路上，主要障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机会主义性质：它在大资产阶级面前表现的小资产阶级懦弱性，以及甚至在大资产阶级垂死呻吟时还同它有不忠实的联系。

在所有国家中，无产阶级都由于严重的动荡不安而遭到破坏。

亿万群众一再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每一次他们都受到了他们本身保守的官僚机器的阻挠。

1931年4月以后，西班牙的无产阶级曾经进行了一系列的英勇活动以图夺取政权和支配社会的命运。但是，它自己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斯大林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各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起了阻碍作用，从而为佛朗哥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在法国，特别是1936年6月静坐罢工的巨大浪潮说明无产阶级已经完全准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組織（社会党、斯大林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在人民阵线的招牌下至少暂时将革命的潮流引导到了便于控制的方向，并且挡住了这股潮流。

在美国，史无前例的静坐罢工的浪潮和产业工会主义（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惊人的迅速发展，最无可辩驳地表现了美国工人为了胜任历史交给他们的任务所作的本能的努力。但是，在美国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組織（包括新建立的产联在内）也千方百计阻挡群众的革命压力，并且使这种压力归于无效。

由于共产国际明确地倒向资产阶级秩序的一边，由于它在全世界，尤其是西班牙、法国、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扮演的无耻的反革命角色，为世界无产阶级造成了特别的新困难。“人民阵线”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推行的妥协政治活动注定无产阶级必然要无能为力，从而为法西斯主义廓清道路。

一方面是“人民阵线”——另一方面是法西斯主义；这是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最后的政治手段。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两个手段都只能权宜一时。在法国，在自由帽^①者的标志

^① 古罗马解放后奴隶所戴圆锥帽，共和政体的标志。——译者

下，正如在德國在卍字旗的標志下一樣，資本主義在繼續腐朽下去。唯有推翻資產階級才能找到出路。

群眾的前進方向首先決定於日趨腐朽的資本主義的客觀條件，其次決定於舊工人組織的背叛的政治活動。在這些因素中，第一個因素當然是決定性的，歷史發展規律比官僚機構要有力。不論社會主義的叛徒所用方法可能多麼不同——從布魯姆的“社會”立法到斯大林的審判陰謀——它們決不能摧毀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志。隨着時間的過去，他們為倒轉歷史車輪所作的絕望掙扎會更清楚地使群眾看到，只有第四國際才可能解決已成為人類文化危機的無產階級領導的危機。

最低綱領和過渡綱領

下一個階段——進行鼓動、宣傳和組織的革命前階段——的戰略任務是解決革命客觀條件的成熟與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不成熟（老一代混亂和失望，青年一代則缺乏經驗）之間的矛盾。有必要幫助群眾在日常鬥爭過程中找到溝通目前的要求和革命的社會主義綱領之間的橋梁。這座橋梁應該包括一整套**過渡要求**，這種要求是從今天的條件和工人階級廣大階層今天的覺悟情況產生的，它無可改變地導向一個最後結果：無產階級取得政權。

在一個進步的資本主義時代起作用的標準的社會民主主義把它的綱領分成兩個互不相關的部分：只限於在資產階級社會範圍內進行改革的**最低綱領**，和預定在無法確定的將來由社會主義來代替資本主義的**最高綱領**。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之間是不存在橋梁的。事實上，社會民主主義並不需要這樣一座橋梁，因為**社會主義**這個字眼只是被用來在節日發表堂皇的演說而已。在一個資本主義日趨腐朽的時代里，共產國際卻開始走上了社會民主主義的

道路：可是在这个时代，一般說来根本談不到进行系統的社会改革和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而无产阶级的每一項重大要求，甚至是小资产阶级的每一項重大要求势必都超出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

第四国际的战略任务不在于改革资本主义而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它的政治目的是无产阶级为沒收资产阶级的财产而夺取政权。但是，如果不最慎重地考虑所有問題，甚至是微小和局部性的战术問題，完成这一战略任务是不可想像的。革命运动应该吸收无阶级的所有阶层、行业和集团参加。目前的时代所以突出，不在于它使革命政党能够摆脱日常工作，而是因为它使得这项工作可以同实际的革命任务不可分离地同时进行。

只要旧的“最低”要求至少还有一部分生命力，第四国际并不抛弃这种綱領。它不倦地捍卫工人的民主权利和取得的社会成就。但是它是在正确的实际前景——也就是革命的前景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日常工作。在群众的旧的、局部的“最低”要求与腐朽的资本主义毁灭和墮落的趋势发生矛盾——在每一步驟都发生这一情况——的范围以内，第四国际提出了一整套**过渡要求**，其实质在于：这些要求将日益公开和决定性地针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基础。旧的“最低綱領”被**过渡綱領**代替了，这一綱領的任务在于有计划地动员群众参加无产阶级革命。

工資和工时的活的計算法

在资本主义日趋瓦解的情况下，群众仍然过着被压迫者的貧困生活，现在更面临着被投入貧穷深淵的空前危險。如果他們不能增加或改善糊口的面包，至少必須保住它。这里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机会——列举根据具体情况一再提出的那些个别的、局部的

要求——全国、地方和工会的要求。但是，有两种根本的經濟苦恼，即**失业和物价高昂**（它概括地反映了資本主义制度日益不合理）要求有統一的口号和斗争方式。

第四国际毫不妥协地对資本家的这样一种政治活动宣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种政治活动与他們的代理人——改良主义者的政治活动一样，目的在于把軍国主义、危机、货币制度的崩潰以及从資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中产生的所有其他灾禍的全部負担加在劳动者身上。第四国际要求让所有的人**就业和有一种过得去的生活条件**。

不論是通貨膨脹还是稳定都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口号，因为它们只不过是同一根棍棒子的两端。在随着战争的迫近，物价飞涨日益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只能在活的工資計算法的口号下战斗。这就是說，劳資双方的集体協議應該保証工資随着消費品价格的上涨而自动按比例增加。

无产阶级面临着本身要瓦解的威胁，所以不能容許把越来越多的工人变成长期失业的貧民，在一个摇摇欲墜的社会里，落到靠残湯剩飯生活的地步。在一个建立在剝削之上的社会里，**就业权**是工人仍然还有的唯一重要权利，可是今天这种权利正逐渐被剝夺。现在时机已經成熟，應該与要求兴办公共事业的口号一道，针对失业——“結構性”和“临时性”的失业，提出**活的工时計算法的口号**了。工会和其他群众組織應該使工人和失业者在共同的责任下团结一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按照对工作周长短的规定，把现有的工作分配給目前所有的工人。每一个工人的平均工資仍然同旧工作周的时候一样。在一种有严格保障的**最低限度**工資制度下，工資会随物价的改变而改变。处于目前的灾难时期，不可能接受任何其他**的綱領**。

有产者和他們的法学家会証明这些要求是“无法实现的”。此外，較小的資本家，特别是破产的資本家会提到他們的底帳。工人断然指責这种結論和借口。现在問題不是对立的物质利益之間的“正常”冲突，而是保护无产階級，使它不衰退、敗坏和灭亡。这是唯一有創造性的进步階級的生死存亡問題，因此也就是人类前途的問題。如果資本主义无法滿足它自己造成的灾难势必会产生的要求，它就只有毀灭。在这种已定情况下，“可以实现”还是“无法实现”是一个只能由斗争来决定的力量对比問題。通过这一斗争，不論其直接的实际成就如何，工人就会充分懂得消灭資本主义奴役制度的必要性。

过渡时期的工会

在为局部和过渡性要求进行的斗争中，工人现在空前需要群众組織，主要是工会。法国和美国的工会主义的强大发展最有力地駁倒了有些极左派的教条主义說教，駁倒了他們所宣揚的工会“已經沒有用了”的論点。

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者一貫站在各种斗争的最前列，即使这些斗争只是牵涉到工人階級非常有限的物质利益或民主权利。他积极地参加群众性的工会，以便加强它們并提高它們的战斗精神。他毫不妥协地反对想使工会从属于資产階級国家以及想用“强制仲裁”和各种各样的警察監視——不仅是法西斯的、还有“民主的”監視来束縛无产階級的任何企图。只有在工会內部进行的这种工作的基础上，才可能对改良主义者，包括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的改良主义者在内，进行胜利的斗争。建立或保存“革命性”小工会作为第二个党的宗派主义企图实际上意味着放弃爭取工人階級领导权的斗争。有必要确立这样一条坚定的規則：自动与群

众性工会作投降主义性质的隔离等于背叛革命，这和第四国际的成员身份是不相容的。

* * *

同时，第四国际坚决反对和谴责同样是工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所特有的工会偶像主义。

(一) 工会并不提出、而且根据它们的任务、组成和征收会员的方式也不能提出一个完全的革命纲领，因此，工会不能代替党。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作为第四国际的支部的全国性革命政党。

(二) 即使是最强大的工会，会员最多也只占工人阶级的20%到25%，而且其中主要还是比较熟练和工资较高的阶层。只是在劳工运动特别高涨的时期，更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大多数才偶而被吸收到斗争中。在这样的时候，就有必要建立包括全体战斗群众的特别组织：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会，最后则是苏维埃。

(三) 作为代表无产阶级上层的组织，从过去的所有历史经验（包括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工会的新经验）可以看出，工会发展了一种同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妥协的强烈趋势。在进行尖锐阶级斗争的时期，工会的领导机构想要成为群众运动的主宰，以便使这个运动不造成危害。在举行简单罢工的时期，特别是在动摇了资产阶级所有权原则的群众性静坐罢工中，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战争或革命时期，当资产阶级处境特别困难的时候，工会领袖常常成为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

因此，第四国际各支部应该经常效力于不仅是补充工会的上层领导，在危急时期勇敢而坚决地提拔新的有斗志的领袖来代替一般的职员和野心家，而且尽一切可能建立更能胜任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群众性斗争这个任务的独立的有斗志的组织，如果必要

的話，甚至在可能同工会的保守机构直接决裂的情况下也不退縮。如果說为了助长宗派主义的臆說而不去管群众組織是罪过的話，消极地听任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受公开反动或伪装的保守（即所謂“进步的”）官僚主义集团的控制也同样是罪过。工会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們只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的手段。

工厂委员会

在过渡时期，工人运动并不具有系統的和非常平衡的性质，而是狂热和爆炸性的。口号和組織形式应从属于运动所指的方向。领导應該像防范瘟疫一样，謹防对形势作老一套的处理，而應該敏感地对群众的主动性有所反应。

这种主动性的最近的表现——靜坐罢工，超出了“正常的”资本主义程序的范围。对工厂的暫时的占有（这与罢工、工人的要求无关）打击了被人奉为偶像的资本主义的财产。每一次靜坐罢工都实际提出了这样一个問題：誰是工厂的主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

如果說靜坐罢工只是偶然提出了这个問題，**工厂委员会**就是这个問題的有組織的体现。工厂委员会由全体工厂雇員选出，它立即形成了和工厂管理当局的意志相抗衡的力量。

改良主义者只批評像福特这类所謂“頑固的实业家”类型的老板，把他們和“善良的”“民主的”剝削者分开，对于这种批評，我們提出这样的口号作为对抗：以工厂委员会作为中心，来对第一种人和第二种人同时进行斗争。

工会的官僚主义分子总是会反对建立工厂委员会的，正如他們反对在动員群众的道路上采取的一切大胆步驟一样。

但是，运动的声势越是广泛，就越是容易压倒这种反抗。在

“和平”时期已經实行封鎖工厂制度的地方，委员会将正式相当于一般工会机构的地位，但是会补充新的工作人員和扩大它的职能。不过，委员会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成了工人阶级中工会通常沒有能力动員的那一些阶层的战斗性机构。革命的最有牺牲精神的队伍正要从这些更受压迫的阶层产生。

从委员会出现的时候起，在工厂里就建立了事实上的双重权力。从委员会的本质来看，它代表着过渡时期状态，因为委员会中包括两种不可調和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制度。工厂委员会的根本意义正是在于它們打开了虽然不是通向直接的革命，却是通向革命前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权之間的大門。在几个国家中广泛展开的靜坐罢工的浪潮充分証明，宣传建立工厂委员会的主张既不是为时过早的，也不是不自然的。在不久的将来，势必还会掀起这种新浪潮。有必要及时开展一个爭取建立工厂委员会的运动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

“营业秘密”和工人对工业的监督

以竞争和自由貿易为基础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已經完全成为过去。它的继承者垄断资本主义不仅沒有减少市場的无政府状态，反而使市場具有了波动特大的性质。今天，几乎是所有当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趋势——从法西斯分子到社会民主党人——都承认有必要“监督”經濟，有必要由国家对工业进行“指导”和“策划”。对法西斯分子說来，这主要是——为了軍事目的“有计划地”掠夺人民的问题。社会民主党人則准备用几調羹官僚主义“计划”来竭干无政府主义的汪洋大海。工程师和教授紛紛发表关于“技术統制”的文章。民主政府在“調节”方面进行的懦怯的試驗遭到了大資本的难以抵禦的破坏。

剝削者与民主的“监督人”之间的实际关系最突出地表现在这样的事实：文质彬彬的“改革者”仅止于毕恭毕敬地在托辣斯和他們的营业“秘密”的大門口发抖。在这里，“不干涉”企业的原則占支配地位。資本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帳目仍然是資本家的秘密：它們与社会无关。就如在自由資本主义时代那样，为保守营业“秘密”的原則提出的公开理由是为了自由“竞争”。实际上，托辣斯彼此之間是什么都公开的。当代的营业秘密是垄断資本主义危害社会利益的一貫阴谋的一部分，只要社会生产資料的私人所有者能够不让生产者和消費者知道剝削、搶劫和欺騙的个人奥秘，种种限制“頑固的实业家”的方案将仍然是可怜的滑稽戏。取消“营业秘密”是实际监督工业的第一步。

工人与資本家一样有权力知道工厂、托辣斯、全工业部門和整个国民經济的“秘密”。首先应该把銀行、重工业和集中的运输业放在观测鏡下。

工人监督的直接任务应该从各企业开始，弄清楚社会的借方和貸方从何而来；确定資本家个人和全体剝削者在国民收入中占去的比例；揭发銀行和托辣斯的幕后交易和騙局；最后向所有社会成員揭露由于資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赤裸裸地追求利潤而不合理地浪費的人力。

資产階級国家的公务人員，不論人們願意賦予他們多大权力，都沒有能力进行这项工作。全世界都看到罗斯福总统和布魯姆总理对他們本国的“六十”或“二百”家族是多么束手无策。为了压倒剝削者的反抗，无产階級必須施加集体的压力。只有工厂委员会才能建立对生产的真正管理——同时招請对人民特別忠誠的专门人材、會計員、統計員、工程师和科学家等等作为顧問而不是“技术統制者”。

*

*

*

如果要求广泛而大胆地組織**公共事业**就很难談得上进行消灭失业的斗争。但是只有使公共事业成为需要进行相当年代的总的计划的一部分,它对失业者本身說来,正如对社会說来一样才有持續的进步意义。在这个计划的范围内,工人将要求作为公用事业,恢复由于危机而倒閉的私人企业中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监督将被工人的直接管理所代替。

但是,如果没有工人的监督,也就是說,工人的眼睛如果不看透资本主义經濟的一切公开和隱秘的本源,从被剝削者,而不是剝削者的观点看来,就不可能制訂那怕是最基本的經濟计划。代表各企业的委员会应该举行會議来选举托辣斯,整个工业部門、經濟地区以及最后整个国家工业的相应的委员会。因此,工人的监督成了訓練掌握**计划經濟**的学校。根据在监督中取得的經驗,无产階級将准备在时机到来的时候直接管理国有化的經濟。

有些資本家——主要是中下层的資本家有时候自动表示願意向工人公开帳目——常常是为了說明有必要降低工資,对于这些資本家,工人回答說,他們对于个别破产者或半破产者的簿記不感兴趣,他們感兴趣的是所有剝削者的底帳。工人不能、也不願意調整他們的生活水平来适应資本家个人的危机,这些資本家本人就是他們的制度的牺牲者。任务是要在更有尊严和可行的基础上改組整个生产和分配制度。如果說取消营业秘密是工人监督的必要条件,那么监督就是走向社会主义領導經濟的第一步。

沒收个别資本家集团的財產

社会主义的沒收財產綱領,即在政治上推翻資產階級并取消它的經濟統治,在目前的过渡时期絕不應該妨碍我們在需要的时

候要求沒收一些对于国家生存至关紧要、或者是属于最有寄生性的資產階級集团的關鍵性工业部門。

因此，为了回答那些正人君子似的民主主义者发出的有关美国“六十家族”和法国“二百家族”专制統治的可悲哀叹，我們要求沒收这六十个或二百个封建性資本主义霸主的財產。

我們以完全同样的方式要求沒收垄断战争工业、铁路和最重要的原料来源等等的公司的財產。

这些要求与糊涂的改良主义者提出有“国有化”口号之間的差別在于以下几点：(1)我們反对賠償；(2)我們告誡群众注意人民陣綫的嘩众取宠，他們空談国有化，其实仍然是資本家的代理人；(3)我們号召群众依靠他們自己的革命力量；(4)我們把沒收財產問題与工农夺取政权問題联系起来。

我們有必要在日常**鼓动**的过程中局部提出沒收財產的口号，而不仅仅是在我們的宣传中比較全面地提出，这种必要性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不同的工业部門的发展水平不同，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不同地位并且經歷着不同的階級斗争阶段。只有无產階級革命的普遍高涨，才能把完全沒收資產階級財產這個問題列入日程。过渡要求的任务是要使无產階級准备好来解决這個問題。

沒收私人銀行和信貸体系国有化

帝国主义一詞意味着**金融資本**的統治。**銀行**与托辣斯和辛迪加一道（常常还凌駕于它們之上）实际上集中掌握了經濟控制权。銀行的結構以集中形式表现了现代資本的整个結構：銀行把**垄断**的趋势与**无政府状态**的趋势結合了起来。它們造成了工艺学的奇迹、組織了大企业和强有力的托辣斯；可是高昂的物价、危机和失业也是它們造成的。如果銀行的領導职位仍然由掠夺成性的資本

家掌握，在对垄断資本专制主义和資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它們的破坏性是相輔相成的——进行的斗争中便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步驟。为了按照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利益的合理計劃，建立起統一的投資和信貸体系，必須把所有銀行合并成为一个統一的全国性机构。只有沒收私人銀行和把整个信貸体系集中在国家手里，国家才有实际的、即物质的力量——而不仅是紙面上的和官僚政治的力量——来进行經濟规划。

沒收銀行絕不意味着沒收銀行存款。相反地，統一的**国家銀行**能为小存戶創造比私人銀行有利得多的条件。同样，只有国家銀行能为农民零售商和小商人創造有利的信貸、即低息信貸的条件。但是，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情况：由統一的財政机构领导的整个經濟——首先是大工业和运输业——符合工人和所有其他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但是，只有在国家权力本身完全从剝削者手中轉到劳动者手中的时候，**銀行的国家化**才会产生这些有利的結果。

糾察綫——警卫——工人民兵队——武装无产階級問題

靜坐罢工不仅是工人对資產階級、而且是对工人組織(包括第四国际在內)发出的严重警告。在1919—20年，意大利工人自动占領了工厂，从而向他們的“領袖們”通知了社会革命来到的消息。“領袖們”沒有理会这个信号。結果是法西斯主义取得了胜利。

靜坐罢工还不是意味着以意大利的方式占領工厂；但是靜坐罢工是向着占領工厂前进的一个决定性步驟。目前的危机能够使階級斗争极端尖銳化，使結局时刻更快到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形势会一下子就出現。实际上，它到来的标志是一系列不断

的波动。波动之一就是靜坐罢工浪潮。第四国际各支部的問題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鋒队理解我們时代的总的性质和发展速度，并且以越来越坚决和富有战斗性的組織措施及时使群众的斗争取得結果。

无产阶级斗争的尖銳化也意味着资本家反攻方式的日益厉害。新的靜坐罢工浪潮可能而且无疑将引起资产阶级的坚决的反措施。大托辣斯的心腹已經在做准备工作。如果这一次再毫无准备，革命組織和无产阶级就要吃苦头了！

無論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都不会以官方的警察和军队为滿足。在美国，甚至在“和平”时期，资产阶级也在工厂里豢养着武装的工賊队伍和私人武装起来的暴徒。除此以外，现在还必須加上各种美国納粹分子集团。法国资产阶级在危险剛发生的时候，就动員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法西斯分遣队，包括军队中的所有法西斯分子。英国工人的压力刚刚再一次变得比較强大，法西斯就两倍、三倍乃至十倍地增加，来对工人进行血腥的镇压。关于这样一个事实，资产阶级始終了解得十分正确：在目前这个时代，阶级斗争不可抗拒地倾向于变成內战。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例子給予大资本家和他們的仆从的教訓要比給予无产阶级的正式領袖的多得多。

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政客以及工会的官僚們有意識地閉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的私家軍，不然的話，他們就不可能同它那怕是保持二十四小时的联盟。改良主义者有計劃地灌輸給工人这样的概念：当资产阶级武装到牙齿而工人沒有武装的时候，民主制度的神圣性才最有保証。

第四国际的責任是一劳永逸地結束这种奴隶政治。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包括社会民主党人、斯大林主义者和无政府

主义者——在实际上越是厚颜无耻地向法西斯主义投降，就越是大声叫嚷要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只有感到背后有千百万劳动者支持的工人武装分遣队才能战胜法西斯。反法西斯斗争不是在自由主义的编辑部而是在工厂里开始的——并且在大街上告终。工厂里的工贼和私人雇佣的歹徒是法西斯军队的基本核心。罢工纠察队是无产阶级大军的基本核心。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一切罢工和街道示威来说，必须宣传有建立工人自卫队的必要。必须把这一口号写入工会革命派的纲领。在凡属可能的地方，必须从青年人开始，组成自卫队来训练和使他们熟悉武器的使用。

群众运动的新高涨的作用不仅应该是增加这种单位的数目，而且应该按照区、城市和地区把它们联合起来。必须有组织地表现工人对于工贼以及流氓和法西斯匪帮的正当憎恨。有必要提出建立工人民兵队的口号，作为工人组织、集会和报纸的不可侵犯性的重大保障。

只有在始终以群众自己的经验为基础的、这种有计划的、一贯的、不倦的、勇敢的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帮助下，才可能根除群众意识中的屈从和逆来顺受的传统；训练出能够为所有劳动者树立榜样的英勇战士的队伍，使反革命的武装暴徒遭到一系列的战术上的失败，提高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自信心，损害法西斯主义在小资产阶级眼中的威信并且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铺平道路。

恩格斯为国家下的定义是“武装的人”^①的集体。武装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的一个必然的附随物。当无产阶级有这种愿望的时候，它就会找到进行武装的道路和手段。在这方面，领导权自然也落在第四国际各支部身上。

① 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4页。
——译者

工农联盟

工人在农村中的战友和与他同等身分的人是农业工人。他们是同一个阶级的两个部分。他们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产业工人的过渡性要求纲领在进行一些修改后，就同样是农业无产阶级的纲领。

小农(农民)代表另一个阶级：他们是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由各阶层组成的——从半无产阶级到剥削者。根据这种情况，工业无产阶级的任务应该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农村去。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他的盟友和敌人分开。

每一个国家的民族发展特点最古怪地表现在农民的、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说来还有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艺者和小店主)的地位上。这些阶级不论人数是多么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以前生产形式的具有代表性的残余。第四国际各支部应该尽量具体地按照每一个国家的情况，制订出有关小农(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过渡性要求的纲领。先进的工人应该努力对他们未来的同盟军提出的问题作明确而具体的答复。

虽然农民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小生产者，他却需要低息信贷、农业机械和肥料(以他出得起的价钱购买)、有利的运输条件以及谨慎地为他的农产品组织市场。但是，银行、托辣斯和商人从四面八方掠夺农民。只有农民自己在工人的帮助下，才能制止这种掠夺行为。应该在全国成立由小农选举出来的委员会，会同工人委员会和银行雇员委员会控制与农业有关的运输、信贷和商业活动。

大资产阶级虚伪地举出工人的“过分”要求，从而巧妙地把商品价格问题变成离间工人和农民以及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工具。小农、手工艺者、小商人不像产业工人、职员和文职雇员，不可

能要求工資随物价上涨作相应增加。官方对管制高昂物价所作的斗争只不过是欺騙一下群众而已。但是农民、手工艺者和小商人以消費者身分，可以与工人一道并肩参加稳定物价的政治活动。对于資本家对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經營費用的抱怨，消費者的回答是，“把你們的帳本給我們看；我們要求监督对物价的稳定。”监督机构应该是管制**物价委员会**，由工厂、工会、合作社、农民組織、城市“小人物”、家庭妇女等等的代表組成。工人通过这一手段就能够向农民証明，物价高昂的真正原因不是工資高，而是資本家的过高利潤和資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間接开銷。

在制定**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綱領时，最根本的应该是排除沒收小农财产和强迫他們集体化的可能性。只要小农认为有可能或者有必要，他就仍然会是他那一块土地的主人。为了恢复社会主义綱領在农民眼中的威信，有必要毫不容情地揭发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化方法，这种方法不是根据农民或者工人的利益，而是根据官僚机构的利益决定的。

剝夺剝夺者同样并不意味着强制沒收手工艺者和小店主的财产。相反地，工人对銀行和托辣斯的监督——甚至还有这些机构的国有化，可能为城市小資产階級創造比在垄断資本暢所欲为的控制下要有利得多的信貸、购买和銷售条件。对私人資本的依靠将被对国家的依靠所代替。劳动者本身越是把国家牢牢地掌握在手里，国家就越是注意它的小同事和代理人的需要。

受剝削的农民实际参加对經濟各方面的监督以后，就可以自己决定把土地改变为集体耕作以后是否有利——并且决定在什么时候和以多大规模改变。产业工人应该认为自己有责任在农民走这条道路的时候，給予他們充分合作——通过工会、工厂委员会以及最重要的是通过工农政府。

无产阶级提出建立的反对所有剥削者（包括“中产阶级”剥削者）的联盟——不是向整个“中产阶级”提出而是向城乡小资产阶级中受剥削阶层提出的——不能以强制、而只能以自愿为基础，这个联盟应该以一个特别的“合同”巩固下来。这个“合同”就是双方自愿接受的过渡要求的纲领。

反帝和反战斗争

整个世界前途，因此也就是各国的内在政治生活都被世界战争的威胁笼罩着。迫在眉睫的浩劫已经使非常广泛的人们感到深切的忧虑。

第二国际更有把握地重复了它在 1914 年从事的那种不名誉的政治活动，因为今天在沙文主义方面领头的是共产国际。战争危险刚具有具体轮廓，斯大林主义者就大叫大嚷地要求加强所谓“国防”，在这方面，他们做得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还要过火得多。因此，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责任就完全落在了第四国际的肩上。

第四国际书记处的纲领（《战争和第四国际》，1934 年）制定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政策今天还保持着它原来的力量。在下一个阶段，革命政党要取得胜利将主要依靠它在战争问题上的政策。正确的政策包括两个因素：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采取的毫不妥协的态度以及将纲领建立在群众经验之上的能力。

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在战争问题上，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多地利用抽象概念、空泛的俗套语和拙劣的辞令来欺骗人民，比如：“中立”、“集体安全”、“为保卫和平而武装”、“国防”和“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等等。所有这种空谈最后都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战

爭問題，也就是人民的命運，是被帝國主義者、他們的統治人員、他們的外交家、他們的將軍掌握着，而這些人是對人民懷有種種陰謀的。

第四國際厭惡地反對所有在民主陣營和法西斯陣營起了同樣作用的抽象概念：“榮譽”、“鮮血”、“種族”。但是單單厭惡是不夠的，必須幫助群眾用鑑別真偽的標準、口號和要求來辨認這些欺騙性抽象概念的實際本質。

“解除武裝嗎？”——但是整個問題在於誰解除誰的武裝。唯一能夠避免或結束戰爭的解除武裝是工人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但是要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工人必須先武裝自己。

“中立嗎？”——在日本與中國的戰爭中，或者在德國與蘇聯的戰爭中，無產階級一點也不會中立。“那麼是不是指保衛中國和蘇聯呢？”當然！但是並不是由會扼殺中國和蘇聯的帝國主義者來保衛。

“保衛祖國嗎？”——但是資產階級提出這一抽象概念意思是保衛它的利潤和掠奪。如果我們先把我們自己的（資本家的）手脚綁起來，使他們不能進攻外國人的祖國；如果我們國家的工人和農民成為國家的真正主人，如果國家的財富由少數人的手里轉到人民的手里；如果軍隊成為被剝削者而不是剝削者的武器，我們就準備保衛祖國不受外國資本家侵略。

有必要按照事態發展和群眾思想的方向，把這些根本概念劃分成為更局部和具體的概念，來解釋它們。此外，有必要嚴格地區別外交家、教授、新聞記者與木匠、農業工人和女幫工的和平主義。前面的一種和平主義是帝國主義的煙幕；後面的一種和平主義是不信任帝國主義的混亂表示。當小農或工人談到保衛祖國的時候，他是指保衛他的故鄉、家庭和其他類似家庭不遭受侵略，

不受炸彈和毒氣的危險。資本家及其新聞記者所謂的保衛祖國是指占領殖民地和市場，掠奪性地增加在世界收入中所占的“民族”部分。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和愛國主義充滿了欺騙。在被壓迫者的和平主義、甚至是愛國主義中，有一些因素一方面反映了对毀滅性戰爭的憎恨，另一方面緊緊抓住他們認為是对自己有利的東西——为了得出必要的結論，我們必須知道如何利用這些因素。

第四國際利用這些考慮作為出發點，來支持一切要求（即使是不充分的要求），只要這種要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群眾參加積極的政治活動、喚起他們的批評并且加強他們對於資產階級陰謀的監督。

從這個觀點出發，比如說我們的美國支部就有批判地接受就宣戰問題進行公民投票的建議。人們都知道，任何民主改革本身都不能防止統治者在他們需要的时候挑起戰爭。有必要就此提出坦率的警告。但是尽管人民群眾對於打算進行的公民投票存在幻想，他們對公民投票的支持反映了工人和農民對於資產階級政府和國會的不信任。在不支持和不散佈幻想的情況下，必須以最大力量支持被剝削者對剝削者逐漸產生的不信任。要求舉行公民投票的運動越是廣泛，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離開這個運動就越快，給予共產國際的背叛者的損害就越徹底；對帝國主義的不信任就越深。

從這個觀點出發，有必要要求給予十八歲以上的男女以選舉權。那些奉召在明天為祖國犧牲的人應該在今天有投票權。反對戰爭的鬥爭必須首先以對**青年的革命動員**開始。

必須從各個角度，從群眾在一定時期將會碰到的那一方面來說明戰爭問題。

戰爭是一樁大買賣，對軍事工業說來尤其如此。因此，“六十

家族”是第一綫的爱国者和主要的战争煽动者。工人对军事工业的监督是对战争“制造商”进行的斗争的第一步。

对于改良主义者提出的口号：对战争利润征税，我们提出这样的反口号：没收战争利润和剥夺战争工业中的掮客。在把战争工业“收归国有”的地方，如法国，工人监督的口号保持着它的充分力量。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政府正如对于资本家个人一样没有信心。

不给资产阶级政府一个人，一分钱！

不要军备纲领，而要兴建有用的公共事业的纲领！

工人组织完全脱离宪兵的控制而独立！

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剥夺背着人民玩弄阴谋的贪得无厌和残酷无情的帝国主义集团支配人民命运的权力。

根据这一点，我们要求：

完全废除秘密外交；让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知道所有的条约和协定；

给予工人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直接管理的工人和农民以军事训练和武装；

成立训练由工人组织推选出来的劳动者指挥官的军事学校；

以与工厂、矿山、农场等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民兵队来代替常备军。

* * *

帝国主义战争是资产阶级掠夺性政治的延续和尖锐化。无产阶级的反战斗争是它的阶级斗争的延续和尖锐化。战争的开始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势并且部分改变了斗争的手段，但是并不能改变它的目标和基本路线。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统治着世界。因此，日益迫近的战争就其

基本性质說来将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因此，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的根本内容将是一场反帝和反战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基本原则是：“主要敌人在你自己的国内”，或者“打倒你本国的（帝国主义的）政府是较轻的危害”。

但是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恰恰相反，大多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一些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国家毫无疑问将设法利用战争来摆脱奴役的束缚。他们的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解放战争。国际无产阶级的责任是帮助被压迫国家来进行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对于帮助苏联或者是在战争以前或战争期间可能出现的任何其他的工人政府来说，也都有这样的责任。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在同工人国家或者一个殖民地国家的斗争中的失败是较轻的危害。

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不可能通过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来帮助一个反帝国家，不论在一定的时间内，这两个国家的外交和军事关系可能如何。如果政府之间有一个暂时的并且从问题的本质来看，必然也是不可靠的联盟，那么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将继续与它本国的政府形成阶级对立，并且用它自己的方法，支持非帝国主义的“盟友”，即用国际阶级斗争的方法（不仅进行反对它们的背信弃义的盟友的鼓动，而且进行赞成在殖民地国家建立工人国家的鼓动，有的时候进行抵制、罢工，有的时候拒绝抵制和罢工，等等）。

无产阶级在战争中支持殖民地国家或者苏联，丝毫不等于支持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或者是苏联的官僚机构。相反地，它对两者都保持着完全的政治独立。由于在一场正义而进步的战争中提供援助，革命的无产阶级得到了殖民地和苏联工人的同情，加强了第四国际在那里的威信和影响，并且加强了它的帮助

推翻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和苏联的反动官僚机构的能力。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第四国际各支部势必会觉得自已陷于孤立：每一场战争都使全国群众猝不及防，并且迫使他們站在政府机构一边。国际主义者不得不逆流而行。但是，新的战争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在头几个月就会远远超过1914—1918年的血腥恐怖）会迅速证明有使人头脑清新的作用。群众的不满和他們的反抗会迅速增加。人們会发现第四国际各支部领导着革命的潮流。过渡要求的綱領会具有迫切的现实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問題会完全显现出来。

在精疲力尽或使人类浸沉在血泊里以前，资本主义以民族和种族仇恨的毒气毒化了世界气氛。今天，反犹太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垂死呻吟中更恶性的痙攣之一。

毫不妥协地揭露种族歧视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偏见和沙文主义（特别是反犹太主义）的根源应该成为第四国际各支部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把它看作是反帝和反战斗爭的最重要部分。我們的基本口号仍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工 农 政 府

“工农政府”这个公式最初出现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鼓动中，在十月革命以后被明确接受。最初它只不过是已經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名称。这个名称的意义主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它强调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而苏维埃政权就是以这种联盟为基础的。

当后来的共产国际想要复活被“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历史埋葬掉的公式的时候，它給予“工农政府”这个公式以完全不同的、純民主的、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内容，与无产阶级专政相抗衡。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工农政府”的口号。他们在当时和现在都确认，当无产阶级政党拒绝走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时，它与农民的联盟便完全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支持，1917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1925—27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现在西班牙、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阵线”的情况就是这样。

从1917年4月到9月，布尔什维克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和自由资产阶级决裂而自己掌握政权。在这一条件下，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予作为工人和农民的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革命的援助以反对资产阶级，但是断然拒绝参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政府或者为它负政治责任。如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真正与立宪民主党(自由主义派)和外国帝国主义决裂，那么，他们所建立的工农政府就只能加速和有利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才用最大力量来反对建立它自己的政府。俄国的经验证明，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再一次证实，即使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斯大林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工农政府的，即不依靠资产阶级的政府。

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提出的要求“与资产阶级决裂，自己掌握政权！”对群众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在七月危机中很戏剧性地暴露出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顽固反对掌握政权，这肯定地在群众舆论面前注定了他们的命运，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第四国际的中心任务在于使无产阶级摆脱旧的领导，它的保守主义是同正在瓦解的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崩溃完全矛盾的，它是

历史进展的主要障碍。第四国际对无产阶级的传统组织提出的主要指责是它们不愿意同资产阶级的半政治僵尸脱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计划地向旧领导提出的要求“与资产阶级决裂，夺取政权！”成了揭发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各政党和组织的背叛性的极为重要的武器。因此，“工农政府”的口号只是在它于1917年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时所具有的意义上才可以为我们接受，即作为一种反资产阶级和反资本主义的口号，但是我们绝不接受后来一代人所赋予它的“民主”意义，——它把这个口号从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桥梁变成这条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我们要求所有依靠工农和代表他们说话的政党和组织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决裂，并且走上为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答应充分支持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同时，围绕着我们认为应该形成“工农政府”纲领的那些过渡要求，我们进行不倦的鼓动。

传统的工人组织可能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吗？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过去的经验说明，至少这也是非常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不能事先就断然否认这样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在非常特别的环境的影响下（如战争、战败、财政崩溃、群众性的革命压力等等），包括斯大林主义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在与资产阶级决裂的道路上可能走得比他们希望的更远。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无可怀疑的：即令在某时某地这种非常不可能实现的变化因素成了现实，而真正建立了上述意义的工农政府，那也只不过是无产阶级建立实际专政的道路上的一段短短的插曲。

但是，没有必要一味进行猜测。围绕工农政府的口号进行的鼓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巨大的教育意义。而且这不是偶然的。这个概括性的口号完全沿着我们时代的政治发展路线发展

(旧资产阶级政党的破产和瓦解，民主制度的垮台，法西斯主义的滋长，工人加速向更积极和进攻性的政治前进)。因此，每一个过渡要求都应该导致同样的政治结论：工人必须同资产阶级的所有传统政党决裂，以便与农民联合起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

不可能事先预见对群众革命动员的具体阶段。第四国际各支部应该在每一个新阶段有批判地确定自己的方向，提出口号来帮助工人争取独立政治，加深这种政治的阶级性质，消灭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幻想，加强先锋队与群众的联系，并且准备进行革命来夺取政权。

苏 维 埃

如已经指出的，工厂委员会是工厂内双重权力的因素。因此，只有在群众压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下，它们才可能存在。为进行反战斗争而建立的特别群众组织，物价管制委员会以及运动的所有其他新的中心，情况也同样是如此，这些事物的出现这件事本身就证明，阶级斗争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无产阶级组织的范围。

不过，这些新的机构和中心很快就会开始感到它们缺乏团结和力量不足。在保留资产阶级政权的情况下，没有一个过渡要求可以得到充分满足。同时，社会危机的加深不仅会增加群众的痛苦，而且会使他们更加无可容忍，更加不屈不挠和增加压力。越来越多的被压迫阶层将抬起头来提出他们的要求。改良主义者的领袖从来没有加以考虑的千百万劳苦的“小人物”将开始坚决地敲击工人组织的大门。失业者将加入运动。农业工人、破产和半破产的农民、城市的被压迫者、女工、家庭妇女和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的阶层——所有这些人都会寻求团结和领导。

即使只是在一个城市内，如何调和不同的要求和斗争形式呢？

历史已經回答了这个问题：通过**苏維埃**。苏維埃会把战斗組織的代表联合起来。还没有人为这个目的提出一个不同的組織形式；事实上也几乎不可能想出一个更好的組織形式来。苏維埃不仅限于一个既定的党的綱領。它們向所有被剝削者敞开大門。各阶层的代表通过这些大門投身到斗争的总潮流中。随着运动而扩大的組織在成长中一再得到补充。无产阶级的所有政治流派都可以在最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为担任苏維埃的领导而斗争。因此成立**苏維埃**的口号在过渡要求的綱領中最为重要。

只有在群众运动进入公开革命阶段的时候，苏維埃才能建立。苏維埃从一成立的时候起就是千百万劳动者对剝削者进行联合斗争的中心，因此它先成了地方当局，然后又成了中央政府的竞争者和敌手。如果说工厂委员会在工厂内建立了双重权力，那么苏維埃就是在国内开始了一个双重权力的时期。

双重权力則又是过渡时期的最高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种制度是不可調和地相对立的。它們之間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社会的命运取决于冲突的结果。如果革命失败了，随之而来的将是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独裁。如果胜利了，苏維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設社会主义社会）将建立起来。

落后国家和过渡要求的綱領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就其本质說来是落后国家。但是落后国家是帝国主义統治的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它們的发展具有綜合性质：最原始的經濟形式同最新的资本主义技术及文化結合了起来。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内容与此相同：争取实现最基本的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与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結合了起来。在这个斗争中，民主口号、过渡要求和社会

主义革命問題沒有分成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是彼此互为因果的。中国无产阶级刚开始組織工会就不得不动手組織苏維埃。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綱領完全适用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至少适用于无产阶级已經能够进行独立政治活动的国家。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即消灭封建残余）和**民族独立**（即摆脱帝国主义束縛）。这两項任务彼此密切相关。

单单是反对民主的綱領是不可能的；群众必須在斗争中摆脱它。对于像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国家，爭取成立国民（或制宪）議会的口号仍然还具有充分的力量。这个口号必須不可分割地同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問題結合起来。作为第一步，工人必須以这个民主綱領武装起来。只有他們能够号召和团結农民。根据革命性的民主綱領，有必要以工人来同民族资产阶级对抗。于是，在建立革命的民主政体的口号下动員群众的某一个阶段，苏維埃能够而且應該建立起来。在每一个特定时期，他們的历史作用，特别是他們同国民議会的关系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水平、他們同农民的联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政策的性质。苏維埃必然迟早会推翻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只有他們能够使民主革命結束，并且开辟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个别的民主和过渡要求在无阶级斗争中的相对重要性、它們的共同联系和提出要求的次序，决定于每一个国家的特点和具体条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它的落后程度。尽管如此，在所有落后国家中，革命发展的总趋势可以在俄国的三次革命（1905年、1917年5月和1917年10月）所明确闡明的意义上，由不断革命的公式来决定。

共产国际已經为落后国家提供了一个标准范例，說明如何有

可能断送一次强大的、有前途的革命。在 1925—27 年中国的暴风雨般的群众暴动中，共产国际沒有能够提出建立国民議会的口号，同时又禁止建立苏維埃。（按照斯大林的計劃，由資產階級政党国民党来代替国民議会和苏維埃。）在群众遭到国民党鎮压后，共产国际在广州成立了一个不成样子的苏維埃。在广州起义不可避免地失敗以后，共产国际走上了进行游击战和建立农民苏維埃的道路，而产业无产阶级則完全保持消极态度。共产国际像这样走进死胡同以后，就大笔一揮利用中日战争消灭了“中华苏維埃”，不仅使农民的“紅軍”而且使所謂“共产党”都从属于同一个国民党，即資產階級。

共产国际为了“民主的”奴隶主的友誼而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不能不同时背叛爭取殖民地人民解放的斗争，其无耻程度甚至超过它以前的第二国际。人民陣綫和“国防”政治的任务之一是把亿万殖民地人民变成“民主的”帝国主义的炮灰。上面大书为解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即人类的足足一半）而斗争的旗帜肯定已經落到第四国际手里。

在法西斯国家里的过渡要求綱領

同共产国际的战略家宣布希特勒的胜利只不过是向台尔曼的胜利前进的一步的时候比較起来，今天情况已經大不相同了。台尔曼被希特勒关进監獄到现在已經五年多了。墨索里尼使意大利处于法西斯束縛下已經有十六年以上。在这整个时期內，不仅是在进行群众运动方面，而且甚至是在認真建立一个非法組織（那怕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沙皇統治时期俄国各革命政党相比拟的組織）方面，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各政党都是无能为力的。

絲毫沒有理由根据法西斯思想体系的力量来解释这些失敗。

(从本质上說来,墨索里尼始終沒有提出任何思想体系。)希特勒的“思想体系”从来沒有对工人有任何重大吸引力。人民中有一个时期陶醉于法西斯主义的那些阶层(主要是中产阶级),经过这一段时期以后已經完全清醒过来。只有新教和天主教会集团的反对力量比較明显,这并不是由于一半是胡說八道、一半是騙人的“种族”和“血統”的理論具有威力,而是由于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思想体系可怕地崩潰了。

在对巴黎公社进行大屠杀以后,黑暗的反动势力統治了将近八年。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敗以后,在一个几乎同样长的时期內,劳动人民茫然若失。但是,这两次的现象都是由力量对比关系决定的外表的失敗。此外,在俄国,它所关系到的还是一个几乎是处子般的无产阶级。在那个时候布尔什維克派成立甚至还不到三年。在德国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那里,领导来自强大的政党,其中一个党已經成立了七十年,另一个党也成立了差不多十五年。这两个有千百万选民支持的政党在战争以前,精神就已經瘫痪,还没有经过战斗就投降了。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灾难。德国无产阶级并不是在战斗中被敌人击潰的。它敗于自己的政党的懦弱、卑鄙和不忠实。因此,难怪,它对于差不多九十年以来它一向相信的东西失去了信心。而希特勒的胜利又加强了墨索里尼。

西班牙或者德国的革命工作的长期失敗完全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国际的罪恶政治活动造成的后果。非法的工作不仅需要群众的同情,而且还需要它的先进阶层的自觉热情。但是可以指望在历史上已經破产的組織有热情嗎?以流亡領袖姿态出现的人大多数不是沮丧到了骨子里,就是克里姆林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代理人,要不然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前部长,他們梦想出现某种奇迹,

工人会使他們官复原职。有可能(那怕只是一分钟)想像这些先生們能成为“反法西斯”革命的未来領袖嗎？

世界舞台上的事件——奥地利工人被镇压下去、西班牙革命的失敗、苏維埃国家的墮落——不可能有助于意大利和德国的革命暴动。由于德国和意大利工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无线电广播获得政治新聞，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說，莫斯科电台成了使极权国家的工人士气沮丧最强有力的因素，莫斯科电台一方面散布热月党人式的謊話，又很愚蠢和傲慢。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斯大林完全成了戈培尔的助手。

同时，促成了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而且在法西斯主义下还繼續起作用的階級对立正在逐漸危害法西斯主义。群众感到空前不滿。成百成千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工人不顾一切，正繼續进行革命的一点点一滴的准备工作。沒有直接体验到旧的传统和巨大希望的粉碎的新一代活跃起来。在极权主义的沉重墓碑下，无产阶级革命正在不可抗拒地进行着一点点一滴的准备工作。但是，潜伏的势力要爆发成为公开的反叛就需要无产阶级寻求新的前途、新的綱領和新的、純洁无疵的旗帜。

主要的障碍就在这里。法西斯国家的工人要选择一个新的綱領是极为困难的。綱領需要得到經驗的証实。在极权主义的专制国家里所缺乏的正是群众运动的經驗。要推动法西斯国家領土上的革命运动，非常可能需要在一個“民主”国家中无产阶级取得真正的胜利。一次財政的或軍事的大灾难也可能产生类似的作用。目前，必須进行主要是宣传性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只有到将来才会产生巨大結果。但是即使就这一点而言，也可以确定不移地指出一点：法西斯国家中的革命浪潮一旦突破，将立即具有巨大声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停止于使某种魏瑪僵尸复活的实验。

第四国际与早就破产的旧政党正是从这一点上开始发生不可调和的分歧的。在一切可能建立的“人民阵线”中，流亡的“人民阵线”是最恶毒和最不忠实的。它基本上标志着无能为力地渴望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自由资产阶级联合。如果它成功了，也只不过为无产阶级准备了一系列西班牙类型的新失败。因此，无情地揭发“人民阵线”的理论和实践是进行反法西斯革命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第四国际反对以民主口号作为动员群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手段。相反地，在一定的時候，这种口号能够起重大作用。但是，对我们说来，民主的公式（出版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等等）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独立运动中的偶然的，或者插曲性的口号，而不是资产阶级代理人套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民主套索（像西班牙那样）——俟运动具有某种群众性，民主口号将与过渡性的口号交织起来；可以假定，在旧事务主义者从他们的办公室匆匆跑出来组织工会以前，就会出现工厂委员会，在新的制宪议会在魏玛开会以前，德国各地就会纷纷建立苏维埃，意大利以及其余的极权主义和半极权主义国家情形也一样。

法西斯主义使这些国家建立了野蛮的政治制度。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它们的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是掌握在金融资本手中，而不是封建地主手中的工具。革命纲领的基础应该是阶级斗争（法西斯国家也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的辩证法，而不是被吓坏了的破产者的心理。第四国际厌恶地驳斥政治假面具的种种状态，这种假面具迫使斯大林主义者——以前“第三时期”的英雄们，依次戴着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德国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种种面具出现，只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丑脸。第四国际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它自己的旗帜下出现的。它公开地向法西斯国家中的

无产階級提出自己的綱領。全世界的先进工人已經坚决地相信，只有在第四国际的领导下，才会推翻墨索里尼、希特勒以及他們的代理人和模仿者。

苏联和过渡时期問題

十月革命后建成了工人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生产資料的国有提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工人国家的机构在同时发生了彻底的退化：它从工人階級的武器变成了对工人階級采取官僚主义的暴力手段的武器，并且日益成为破坏国家經濟的武器。一个落后而孤立的国家的官僚主义化和官僚机构变成一个十分强大的特权階級制度的现象最令人信服地駁斥——不仅是在理論上，而且这一次是在实践上——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

因此，苏联是可怕的矛盾的体现。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退化的工人国家。对苏联的社会診斷就是这样。政治預測具有非此即彼的性质：要么是日益成为工人国家中世界資產階級机构的官僚階級推翻新的所有制形式而把国家拉回資本主义，要么是工人階級粉碎官僚階級而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第四国际各支部看来，莫斯科审讯不是意外，也不是克里姆林的独裁者个人疯狂的结果，而是热月政变的合法产物。审讯是从苏維埃官僚階級內部的无法忍耐的冲突产生的，而这种冲突又反映了官僚階級与人民之間的矛盾以及“人民”內部日益加深的对立。审讯的血腥的“异想天开的”性质說明了矛盾的激烈程度并且还預示结局的迫近。

拒絕回莫斯科的前克里姆林駐外代表的公开言論无可辯駁地以其独特方式証实官僚机构中間存在各式各样的政治思想：从真

正的布尔什維主义(如伊格納斯·里斯)到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如 F. 布登科)。在官僚机构內只占少数的革命者反映了(虽然是消极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利益。法西斯反革命分子人数不断增加,他们越来越一致地表现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这些未来的买办不无理由地认为,只有以吸收“西方文明”(即资本主义)的名义,反对国有化、集体化和垄断对外贸易,新的统治阶层才能保障他们的特权地位。在这两个极端之間,还有中間、趋向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各式各样的孟什維克——社会革命党——自由主义的流派。

即使在所謂“无阶级”社会的下层群众內部,无疑也存在着与官僚机构內部所存在的完全一样的集团,只是表现得不那么鮮明而且人数不多,自觉的资本主义趋势主要是集体农庄的繁荣部分的特色,突出代表的只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但是这个阶层为自己提供了发展积累个人财富而使人们普遍貧困的小资产阶级趋势的广泛基础,并且受到官僚机构的有意識的鼓励。

今天主要变成了斯大林的拿破崙主义集团的热月党人式寡头們依靠恐怖方法苟延残喘,他们居于这个对立日益加深的制度的頂端,越来越妨碍社会的平衡。最近的审判阴谋是为了打击左派。对于清扫右翼反对派的領袖說来,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从官僚机构的利益和趋势看来,老布尔什維克党的右翼集团是一种左的危險。拿破崙主义集团由于同样害怕它自己的布登科类型的右翼盟友,为了自我保存而被迫把老布尔什維克一代几乎全部处决,这个事实无可爭辯地証明革命传统在群众中間的活力以及群众的日益加深的不滿。

西方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昨天刚鉴定莫斯科审讯是道地的真貨色,今天就一再坚持說“苏联既沒有托洛茨基主义,也沒有

托洛茨基分子了”。但是，他們沒有解釋为什么所有清洗都是在恰好是同这种危险作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如果我们把“托洛茨基主义”当作一个完全的纲领(甚至更贴切一些,当作一个组织)来检验,那么毫无疑问,“托洛茨基主义”在苏联是极为羸弱的。但是,它的不可毁灭的力量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它不仅表现了俄国工人阶级革命传统,而且表现了今天俄国工人阶级的实际反抗力量。从克里姆林集团的观点看来,工人所蓄积的对官僚机构的社会仇恨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它完全有理由极为害怕工人的深刻而没有表示出来的愤怒与第四国际的组织之间的联系。

消灭旧布尔什维克一代以及中间一代和青年一代的革命代表起了破坏政治平衡的作用,使这种平衡更有利于资产阶级右翼、官僚机构和它在全国各地的盟友。我们可以预料他们,也就是右翼,在下一个阶段会作更坚决的努力来修正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使它更接近于法西斯形式的“西方文明”。

这种前景使“保卫苏联”问题具有了有推进作用的具体内容,如果明天资产阶级法西斯集团(比如布登科派)企图夺取政权,“里斯派”必然会在街垒对面排成阵势。虽然它会暂时成为斯大林的盟友,但是它保卫的不是拿破崙主义集团而是苏联的社会基础,即从资本家手中夺取来的财产变成国家的财产。如果事实证明“布登科派”是希特勒的盟友,那么“里斯派”就会在国内以及全世界保卫苏联不受军事干涉。任何其他做法都是背叛行为。

虽然因此不容许事先否认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与官僚机构的热月党人一派建立“统一战线”,来对付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公开进攻,苏联的主要政治任务仍然是推翻同样的热月党人官僚机构。它多统治一天,将有助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基础,并且增加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正是在这一方面,共产国际作为斯大林集

团的代理人和同謀者扼杀了西班牙革命和瓦解了国际无产阶级
的士气。

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官僚机构的主要力量不在它本身，而在于群众的失望，在于他们缺乏新的前途。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除了野蛮统治更无节制这一点以外，斯大林的政治机构与这种国家并没有两样），今天在苏联只可能进行准备性的宣传工作。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国外的事件可能成为推动苏联工人革命高潮的动力。全世界的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今天是反对斯大林独裁的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有许多迹象说明，共产国际由于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中没有直接的基础，将比拿破崙主义集团和整个热月党人的官僚机构先垮台。

* * *

毫无疑问，苏联在为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而斗争的旗帜下开始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打倒官僚机构的特权！打倒斯达哈諾夫运动！打倒苏维埃贵族和它的等级！对各种形式的劳动给以更为平等的工资！

在争取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斗争中，开展争取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自由，争取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斗争。

官僚机构以希特勒—戈培尔式的普选权的鬼话代替了作为阶级机构的苏维埃。必须使苏维埃不仅恢复它的自由民主形式，而且恢复它的阶级内容。就如一度不容许资产阶级和富农参加苏维埃一样，现在必须从苏维埃中把官僚和新贵族清除出去。在苏维埃中，只容纳工人、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农民和红军军人的代表。

没有各苏维埃政党的合法化，苏维埃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工人和农民将通过他们自己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们承认哪些党派

是苏維埃政党。

从头到尾修改經濟計劃以符合生产者和消費者的利益！必須恢复工厂委员会管理生产的权利。必須由一个按民主原則組織起来的消費合作社来控制产品的质量 and 价格。

改組集体农庄以符合农庄劳动者的意志和利益！

必須以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政策来代替官僚机构的反动的**国际政策**。公布克里姆林的全部外交文件。打倒**秘密外交**！

一切由热月党人的官僚机构进行的政治审判必須从全部公开、任人爭論和公平正直的角度来重加审查。只有被压迫群众的革命起义获得胜利才能恢复苏維埃政权，并且保証它向着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只有一个党能够领导苏联群众起来叛乱——那就是第四国际的党！

打倒該隱^①般的斯大林官僚集团！

苏維埃民主万岁！

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反对机会主义和无原則的修正主义

法国里昂·布魯姆的党的政治活动再一次証明，改良主义者甚至从最悲惨的历史教訓中，也吸收不到任何东西。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生搬硬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結果走向同一下場。在不过几十年內，第二国际就与資产階級民主政权糾纏到了一起，成了它的一部分，并且正在同它一起腐烂下去。

在資本主义危机肯定使无产階級革命列入日程的时候，第三

① 源出聖經旧約創世紀第四章，曾杀其弟亚伯。——譯者

国际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共产国际今天在西班牙和中国的政策——即奉承“民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证明，共产国际同样没有能力吸取任何进一步的教训或者是有所改革。在苏联成了一支反动力量的官僚机构不可能在世界上起革命作用。

一般说来，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在法国，里昂·石乌的工团主义官僚机构早就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资产阶级代理机构。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脱下了它的革命外衣，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战车上的第五个车轮。

以伦敦局为中心的介于中间的中派组织只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国际的一个“左翼”附属物。他们表现得完全没有能力弄清政治形势的来龙去脉，并且从中得出革命的结论。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它们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它在革命条件下证明完全没有能力走革命路线。

* * *

多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遭到的惨败注定官方组织要更为保守，同时驱使失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去追求“新方式”。在反动和衰退时期，总是四面八方出现各式各样的骗子，他们想要修正革命思想的整个路线。他们不从过去吸取教训，反而“抛弃”过去。有些人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相矛盾，有些人宣布布尔什维主义垮台。有些人要革命理论为背叛革命理论的人的错误和罪行负责；有些人怪药不好，因为药没有保证药到病除，立见奇效。更大胆的人说是一定能找到一种万灵药，而要人们在找到这种万灵药以前停止阶级斗争。许多“新道德”的预言家准备借助于伦理上的顺势疗法来复活劳工运动。这些宣传家大多数还没有到战场上就成了道德上的病人。因此，在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故纸堆中埋藏已久的旧药方在改头换面称作“新方式”后，向无产阶级提了出来。

第四国际宣布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阿姆斯特丹国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国际作毫不妥协的斗争；此外斗争的对象还有：它们的中間派的卫星，不改革的改良主义，与国家政治保卫局结成联盟的民主派，沒有和平的和平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对革命十分恐惧的革命者。所有这些組織都不是未来的保証，而是过去的衰敗的残余。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会把它们化为灰烬。

第四国际不追求、也不发明万灵药。它完全坚持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使人能够懂得现实，追究失敗原因和有意識地为胜利作准备的唯一的革命理論。第四国际继承着最初告訴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維主义的傳統。第四国际清除了各式各样的騙子和不請自来的宣揚道德的老夫子。在一个以剝削为基础的社会里，最高的道德是社会革命的道德。不論什么方法，只要能提高工人的阶级覺悟、加强对他們自己的力量信任并且使他們更加願意在斗争中作自我牺牲，都是好方法。不能容許的方法是：对被压迫者灌輸对压迫者恐惧和順从的情緒，破坏抗議和憤怒的精神，或者以領袖的意志来代替群众的意志，以强制来代替信仰以及以嘩众取宠和阴谋陷害来代替对现实的分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出卖馬克思主义以图利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維主义正好相反的东西——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道德的死敌。

應該正視现实；不應該寻求进行最小抵抗的路綫；实事求是；向群众說真話，不論情况可能多么糟糕；不要害怕障碍；对小事情就像对待大事情一样一絲不苟；以阶级斗争的邏輯作为綱領的基础，在行动的时刻到来时要勇敢——这些就是第四国际的章程。第四国际已經表明它可以逆流而行。临近的历史浪潮将把它推向高峰。

反对宗派主义

在无产阶级历史組織背叛的影响下，在第四国际周围产生或者重又产生了某种宗派主义的情緒和各种集团。它們的基本态度是拒絕为今天所存在的那种局部和过渡性要求(即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和需要)斗争。对宗派主义分子說来，准备革命就意味着使他們自己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們打算掉头不理“旧”工会，即千百万有組織的工人——仿佛群众能够設法生活在实际的阶级斗争条件以外似的；他們对于改良主义組織内部的內在斗争漠不关心——仿佛不过問群众的日常斗争就可以爭取到群众似的；他們不肯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区别开来——仿佛群众可以用不着分辨出各方面的差别似的；

宗派主义分子只能区别两种顏色：紅色和黑色。为了避免引誘，他們把现实簡化了。他們不肯把西班牙的两个战斗陣营区别开来，因为两个陣营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基于同样原因，他們认为有必要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他們否认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間有原則区别，由于苏联官僚机构的反动政策，他們反对保卫十月革命所創造的新的所有制形式不受帝国主义侵害。他們由于无法接近群众，因此就大事指責群众沒有能力接受革命思想。

这些沒有思想的政客一般不需要以过渡性要求作为桥梁，因为它们不打算經過这座桥梁达到彼岸。他們只是呆在某个地方混日子，满足于翻来复去作千篇一律的肤浅空想。对他們說来，政治事件是一个发表評論、而不是行动的机会。由于宗派主义者一般說来就如各种犯錯誤的人和盼望奇迹的人一样，每走一步都被现实所动摇，他們生活在一种永远恼怒的状态中，抱怨“政权”和“方法”，总是沉迷在瑣屑的計謀中。在他們自己的圈子里，他們一貫

推行独裁制度。宗派主义在政治上的衰弱像影子一样，和机会主义的衰弱是相輔而行的，它沒有显示革命的前景。在实际政治中，每一次在反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宗派主义者都是同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同中間派联合起来的。

大多数依靠第四国际的飯桌上偶而掉下的面包屑过日子的宗派主义团体和集团都以一种“独立的”組織形式存在，它們尽管抱負很大、成功的希望却十分渺茫。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听任这些团体自生自灭，不想为它們浪費時間。但是在我們自己队伍里也有宗派主义傾向，并且对于各支部的工作产生了极有危害的影响。此后哪怕是一天也不可能再同他們有任何妥协。奉行正确的工会政策是参加第四国际的基本条件。不去寻求和找到接近群众的道路的人不是战士而是对于党的沉重負担。制訂綱領不是为了編輯部或者討論俱乐部的領袖們，而是为了千百万人的革命行动。从第四国际的队伍中清除宗派主义和不可救药的宗派主义分子是革命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开辟通向女工的道路！

开辟通向青年的道路！

西班牙革命的“領袖們”策动的革命的失敗、法国人民陣綫的可耻的破产以及对莫斯科的审讯騙局的揭发——这三个事实共同給予了共产国际以无可弥补的打击，而且附帶給了它的盟友——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严重創伤。当然，这并不是說，这些組織的成員立即就会投向第四国际。老的一代在遭到慘敗以后会大批脱离运动。此外，第四国际肯定不会努力使自己变成一个革命伤兵、失望的官僚和野心家的避难所。相反地，为了防范目前在旧組織机构中居于統治地位的小资产阶级人物大批

參加我們的黨，必須採取嚴格的預防措施：對於并非工人的候補黨員、特別是前官僚分子的候補黨員，延長他的候補期；在頭三年不讓他們擔任任何負責工作等等。在第四國際中，現在和將來都不容以往各國際的爛瘡——野心存身。只有那些願意為運動生活而不是靠犧牲運動生活的人才能到我們這裡來。革命工人應該感到自己是主人。我們的組織是向他們敞開着大門的。

當然，甚至在一度站到最前列的工人中間，也有不少精疲力盡和感到失望的人。至少在下一階段，他們將仍然是旁觀者。當一個綱領或者一個組織衰竭，負責其工作的一代人也隨之衰竭。運動將被不對過去負責的青年復活起來。第四國際特別注意無產階級的青年一代。它的所有政策都是努力啟發青年對他們自己的力量和未來的信心。只有青年的新的熱情和進取精神能夠保證鬥爭取得初步勝利；只有取得勝利才能使老一代人中的最優秀的人回到革命的道路上來。過去是這樣，將來也將是這樣。

機會主義組織由於它們的根本性質主要集中注意工人階級的上層，因此忽視青年和女工。但是資本主義的衰退最嚴重地打擊了作為工資工作者和家庭主婦的婦女。第四國際各支部應該到工人階級中最受剝削的階層里（因此也就是到女工中間）去尋求支持的基礎。在這裡他們將發現無限的熱忱、無私和準備犧牲的精神。

打倒官僚機構和野心！ 开辟通向青年的道路！ 面向女工！ 這些口號是在第四國際的旗幟上大書特書的。**站到第四國際的旗幟下來！**

站到第四國際的旗幟下來！

懷疑派問道：但是，建立第四國際的時候已經到了嗎？他們說，不可能“人為地”建立一個國際，國際只能從大事件中產生云

云。所有这些异議只不过說明，怀疑派对于建立新国际是沒有用处的。他們簡直就什么也干不了。

第四国际已經从大事件中产生了，那就是无产階級在历史上的最大的失敗。失敗的原因在于旧領導的墮落和背信弃义。階級斗争是不容中断的。对革命說来，第三国际继第二国际之后已經死亡。第四国际万岁！

但是已經到了宣布第四国际成立的时候了嗎？……怀疑派的言論还没有平靜下来。我們回答說，第四国际沒有必要“宣布成立”。它实际存在着而且在斗争着。它很弱嗎？是的，它的队伍人数不多，因为它还很年輕。到现在为止，它們还主要是干部。但是这些干部是未来的保証。除了这些干部以外，在这个星球上不存在任何名副其实的革命潮流。如果說我們的国际人数还不多，它在理論、綱領、传统以及对它的干部的无可比拟的鍛炼方面是很强的。誰要是在今天还看不见这一点，让他站到一旁去。明天，情况就会更明显。

第四国际今天已經理所当然地遭到斯大林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資产階級自由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的憎恨。在任何人民陣綫中它都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存身的地方。它毫不妥协地与所有为資产階級所左右的政治集团战斗。它的任务——取消資本主义的統治。它的目标——社会主义。它的方法——无产階級革命。

沒有內部民主就沒有革命教育。沒有紀律就沒有革命行动。第四国际的內部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充分的討論自由和行动的完全一致为基础的。

人类文化目前的危机是无产階級領導的危机。在第四国际中团结起来的先进工人向他們指出了脱离危机的道路。他們提出了

一个以无产阶级斗争中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斗争中的国际经验为基础的纲领。他们打起了一面纯洁无瑕的旗帜。

各国的男女工人们，站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下面来。它是你们的就要来到的胜利的旗帜！

三、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 告全世界被剥削群众书

(1948年5月11日)

——反对华尔街和克里姆林宫！
拥护《共产党宣言》的纲领！
拥护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第四国际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时于巴黎召开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三十三支部的代表。本届大会认为有必要根据它的共产主义思想、目的和倾向，对革命先锋队 and 全人类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作出答案。

人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和在专政制度下的痛苦经验之后，现在又面临着新的经济灾难和新的世界战争的威胁。

目前的形势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个世纪以前，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无比明晰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他们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的趋势和按照它的想像来改造整个世界的需要。今天，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渗入到地球上最落后的国家。它解放了奇迹般的生产力。它不断革新技术，用内燃发动机和电力来代替蒸汽，并分解物质以供应人类对于能量的永远不能满足的需要。

资本主义是在经济危机之间的间隙时期依靠它自身的矛盾而

取得这些进展的。工业资产阶级先破坏了旧的生产方式，以后，随着它的进展，又不断破坏它自己的最无效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在完成了它整个的生存的周期之后，开始排斥伴随它一起诞生的那些原则。托辣斯和卡特尔的合并成为真正的工业和金融垄断组织，消灭了一个国家内、或甚至许多国家间在许多工业部门里的自由竞争。正当资本主义的疯狂发展看来毫无阻碍时，资本的扩张给生产加上了人为的限制。在已经达到走向建立世界市场的自然界限之后，资本主义的全部爆炸性力量就转向资产阶级本身了。于是资本主义制度就如《宣言》的两位作者所预言的那样开始衰落下来。

经济危机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接踵而至，使整个国家的生活陷于瘫痪，使社会各个阶层淪于完全破产。社会危机震撼了一切国家，损害各国政府并促进革命、反革命和内战。

巨大的技术成就不用于一般用途或竟完全用于破坏目的。在生产上仍然能够定期出现的突然的跃进不再能使人类大多数富有反而使他们贫穷。世界规模的劳动分工的日臻完善动摇了世界市场。历史的演进完全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资本主义不再把文明带给世界上落后的民族，而是在它自身的衰落中破坏了那些在比较先进的国家里标志着资本主义上升的政治成就。资产阶级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障碍，因而在各个领域内都成了一种反动势力。

战争代表着日趋衰落的资本主义的一切破坏性的和野蛮的特点，并支配着今天一切人类的活动。技术、科学、工业生产、政治和文学，都越来越完全为战争服务。

全面毀灭的危險

今天帝国主义战争的全球性是产生自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危机的世界性。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基本上仍然是一个欧洲战争。在谈到沒有蔓延到北美、中美、南美和非洲与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托洛茨基在1938年說，只有南极会被划在战争基地之外。具有深刻意义的是，目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准备指向一个不顾一切控制南极洲的斗争。在这样一种战争中，沒有一个民族或大陆能够幸免，沒有一个国家的首都能够安然无恙，沒有一块文明乐土能够被放过。漫无限制的破坏力量会在几年之內毁灭掉几百年的劳动成果，使全世界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人們甚至在签订和平条约正式結束上一次战争以前，就已經結成军事同盟准备作下一次的屠杀，人类对于这种結盟的迅速感到恐惧。这种恐惧特別集中在原子弹上。正如战争看来迴非人类所能控制，它不受有思想的人类的活动的約束，而总是按照它自己的罪恶的邏輯发展一样，原子弹的无限牽連也超出了专家和外交家們的計劃，推翻了將軍們和股票市場老手們的估計。人类从来沒有这样在自己的創造物面前吃惊过，工人从来沒有被如此一个可怕的东西支配过，活的劳动力从来沒有这样被死的劳动成果征服过。但是，原子能在把矛盾重重的资本主义引向人类文明全面毁灭的同时，也在一个工人阶级支配的社会里开辟了一个和平幸福的新时代的远景。

知識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学者們正力图以“世界政府”来緩和这种給人类带来恐怖时代的永久性威胁。某些人的这种提議不过是为华尔街的权力渴望找出一种理論上的根据。另一些人是在真誠

地寻求一种神奇的公式，以控制在衰落中的资本主义所不断放出的破坏力。他们谁也没有领会世界战争与资本主义衰落的真正关系。

今天，只有为战争而生产才能为在自己的世界市场上遭到抑制的资本找到新的出路。战争不过是衰落的资产阶级试图克服它本身矛盾的一种特别的手段。这种做法不但远不能成功，而且只能在力图消灭旧的矛盾的同时引起新的矛盾。垄断资本不但远不能消灭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尖锐化，这在垄断资本之间的斗争中和经纪人（他们正在为这个过程所毁灭）之间的竞争中都有同样的表现。四大国、三大国、两大国的时代不但远不能结束国际冲突，反而使处于支配地位的列强之间的冲突更为严重。

要把德国和日本排除于独立强国之外，美帝国主义就不能不容许俄国崛起，不能不容许以前被排除的国家（如法国和中国）复兴。要有效地和俄国斗争，就不能不在明天恢复德国和日本的独立。这并不是罗斯福犯了什么错误或者麦克阿瑟性喜权谋术数的问题，而只是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像美国这样一个据说可能独自残存下来的唯一的世界强国也只能使全世界淪于毁灭，成为在民族和殖民地冲突中的无穷变乱的牺牲品。伯恩罕（Burnham）今天提出的“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和威尔逊昨天所领导的战争一样，不会导向美洲的和平而只能导向普遍的混乱。

正如资本主义在它的全盛时期不能控制生产力一样，在它的极端衰落时期也同样不能控制破坏力。在这两个阶段的中期，它已自掘了坟墓并制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是要给社会指出一个自觉的方向，以反对那种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世界拖向世界战争的盲目力量。资本主义命运已定，它的丧钟已经响了。总之，它如果不化为原子灰尘，就必

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面前灭亡。

一百多年以来，资本主义表明了对于人类一切关系的最野蛮的否定。它的统治完全是通过它的生产法则的结构而扩展的。国家只是在尽量少干涉这些法则的自由作用的情形下才受到资本家的拥护。一切奴役和一切自由都分别强加于和体现在那个唯一的贸易自由——人类最大的束缚——上。

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法则的结构本身容许资产阶级在它的商品还起有革命作用的时候否定一切人类关系，但是，一旦这些法则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种结构就立刻迫使资产阶级拚命改变这些法则的运用。在“不干涉主义”口号下产生的资本主义现在却主张一种最富有寄生性的组织化了。资本主义在和专制主义的激烈斗争中兴起，可是今天它却在力求建立极权主义的国家了。

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性质

垄断资本家在破产和繁荣之间的危岩上度过了四十年，他们由于不断地受着被新的革命所推翻的威胁而提心吊胆，从他们的贷借对照表上感觉到他们的经济崩溃的反响，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把各方面的社会活动放在他们的严格控制之下。国家的逐渐消失在一世纪以前曾经得到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辩护人的赞颂，而现在这个国家却正在变成一个庞大的机器，既控制人于生前，又在死后把他们的尸体铸成金币。继自由主义的议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之后而来的是极权主义的专政时代。

通过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的不断扩大，垄断资本家把一切经济生活放在他们的严格控制之下。通过强制托辣斯化、国家分配原料、国家统制信贷和某些薄弱工业部门的国有化，他们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同样地加以专横的控制。通过使工会成为国家组

織，通过强迫仲裁、限制或者完全取消罢工权利、御用工会、賄买、奸細和恐怖主义，他們在不能彻底消灭工人运动的时候试图对它加以限制。通过控制教育制度并依靠着他們的亲密盟友——教会的帮助，他們试图阻止工人阶级儿女們的阶级觉悟的发展并为了他們自己卑鄙的利益对工人儿女进行教育。报刊、电影、无线电广播成了制造公共輿論的庞大組織，也就是說，成了为垄断資本家的利益来欺騙和敗坏公众的庞大組織。他們不以把医生、律师、詩人和科学家列为工資劳动者为滿足。而且还命令这些人接受他們自己的关于公共卫生、法律、文学和科学的概念，在他們的社会保守主义压力之下窒息文化生活。上升的資本主义把人的价值降低为交換价值。衰落的資本主义却在它的极权主义警察制度的高压下破坏了人的价值。

德国和中国的例子

今天，資本主义的极权主义性质在法西斯专政上表现了它的完备的形式。德国的垄断資本主义把絕望的和貧穷化了的中产阶级組織起来，利用一切鄙陋陈旧的偏见，建立起一个野蛮国家，在集中营里公然对七百万囚犯进行屠杀。但是，正如第四国际所預言的，“消灭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本身也导致了在其余的民主国家里采用极权主义的手段。英国的工党因为用可怜的改良方法不能解决社会危机，正在把成千上万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投入法西斯政治煽动家的怀抱。在艾德礼、貝文和摩里逊领导之下，曾經以国内自由主义非常自豪的英国政府竟解除了被怀疑为同情共产主义的科学家的职务。美国軍人进入政府担任主要职务，外交机关里的“六十家族”与“高級將領”的紧密的結合，反对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特务恐怖，甚至于教会在工会內部的反动进攻——所有这些现

象都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化在美国的发展。各国残存下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日益采取一种腐朽堕落的形式，勾结为大资本家服务的将军和冒险家，给民主政治以最后的打击。

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化最清楚地证明，今后的社会矛盾不容许资本家“正常地”取得他们的利益。它不但不表明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稳定阶段，而且最有力地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临终时的痛苦。

极端混乱的体制

在沉闷的表面现象掩盖之下，资本主义内部的一切分解的力量不断地起作用。社会问题的爆发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导向一场国际性的灾难。资本主义组织的“最高”阶段表现为一种血腥的混乱的组织，它把共产主义革命提到了日程上来。

如果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下去，人类在德国和中国这两面镜子里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命运。

今天的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实体。五个省既被割走，全国复分成为四个占领区。城市毁灭，土地荒废，千百万居民到处流浪以逃避饥饿和恐惧。经济组织崩溃，全国财富遭到破坏或被搬走；劳动力感到不足，商业陷于停顿。

大约二十年前，德国尽管在战争中遭到失败和接着受到革命的打击，然而它在欧洲大陆上仍然拥有最强大的工业、最合理化的农业、最有技术的工人和最发达的商业。德国的工人阶级曾经有三次显然要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它取得政权，它一定会使德国的技术和俄国的广大经济资源和平地结合起来。阻碍它把巨大的生产力量用在建设上的障碍一定会被粉碎。把这种力量主要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上，一定会在这块古老大陆上开辟

一个和平幸福的时代。但是，每一次都是由一个没有能力或者叛变的工人领导无益地消耗了德国劳动群众的巨大战斗力量。工人们经过十五年徒劳无益的努力被弄得精疲力尽，最后无抵抗地被交到纳粹独裁政权的魔掌里。于是资产阶级为了自己贪婪的目的组织起强有力的经济机器，并把它发展成为这样一种可怕的和爆炸性的力量，以至于最后把整个德国埋葬在废墟中，同时也搅乱了整个欧洲，使每个国家都遭到蹂躏破坏。

中国在一个失败的革命动乱中间挣扎了二十年。除了自然灾害的无数牺牲者之外还有千百万社会变乱的牺牲者。战争、内战、暴动和征讨不断地蹂躏这个广阔的国家。旧日的手工业日益没落而现代工业却并未得到发展。高利贷吞没了农业收成而资本却没有开辟出道路。通货膨胀破坏了城市，但是成千上万的无地的和饥饿的农民却继续涌进城市。政府的职位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人，而蒋介石大元帅却把国家经济当作一家的私产来经营。到处都可看到破产、停滞和腐朽。

在形成中国新社会的熔炉中，在帝国主义渗入的震动之下，诞生了一个迅速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年轻的工业无产阶级。依靠渴望解放的千百万贫苦农民的支持，工人有一个大好的机会来推翻中国社会的整个腐朽组织，同时使这个国家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统治。通过统一全国和合理地利用全国的广大资源，中国革命本来可以成为整个殖民地世界革命的信号，并且在各国敲响帝国主义的丧钟。这样人类本来可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它的悲惨后果。但是，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使非常有希望的中国革命遭到失败，因而使这个国家进入一个无穷变乱的时代，而国家的有生力量也遭到了破坏。

在德国和中国，我们看到衰落的资本主义发出来的破坏力所

造成的可怕的后果。它使最先进和最文明的国家堕入一种兽性的野蛮状态，同时也阻碍落后民族走向发展的道路。在资产阶级兴起时期，从先进国家可以看到落后国家的将来。今天，社会如果不从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德国和中国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命运。

如果说现代社会的一切衰落趋势似乎集中在德国，那么一切还没有使用的抵抗资本主义衰落的力量似乎就是集中在美国。在美国资产阶级从两次世界大战当中变为巨富的同时，旧欧洲大陆却由于战争而淪于贫困。欧洲国家的败落造成了美国工业、农业和金融的空前发展。今天美国掌握着全世界黄金和资本投资的三分之二。全世界的一半商业要经过美国的手。美国的金元统治着股票市场。美国的空军控制着天空，美国的海军支配着七大洋。从南京到巴黎，从雅典到里约热内卢，所有的政府都依靠美国的贷款来维持自己。美国的银行家分割了拉丁美洲，同时美国的石油公司也收买了阿拉伯的酋长。美国的军事顾问指挥着土耳其和格陵兰的军队，美国的商人分配着罗马和东京的口粮。教皇和英国的工党政府、佛朗哥的独裁政权和澳洲的民主政府都互相竞争以取得华尔街的宠爱和白宫的恩赐。美国的影片、跳舞、书刊和罐头决定着一切国家的生活方式。

美国革命的远景

但是，如果说美国的势力和财富是从其余资本主义世界的停滞和衰落中取得的，这种衰落不可避免地要反过来对美国发生作用。今天，处在一个穷困欲死的世界当中的美国资产阶级有被它自己的财富所窒息的危险。整个世界作为美国工业的市场仍不能满足其需要。世界每一部分的每一个震动都对华尔街有影响。使

人难以相信的是，不到十年以前，美国的资产阶级还在认真地讨论孤立主义。今天，意大利的选举、巴勒斯坦的纠纷和日本的罢工对于美帝国主义都成了切身利益的问题。正如垄断资本主义趋向于使一个国家的生活极权主义化一样，处于支配地位的美帝国主义积极努力使世界美国化。“或者一个世界或者没有世界”——一个政客的这种说法特别意味着世界危机最后将变成为美国危机。

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表现出一个行将到来的危机的一切迹象。公债的沉重负担吞没了这个国家的储备金。往往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到来以前出现的通货膨胀、投机和非生产性投资的狂潮支配着全国。利润的下降很快就会阻碍生产，它反过来又会遭到一种和以前的空前上升一样猛烈的下降。此外，两党制的危机、工人运动政治发展的迟缓、天主教会日益扩大的影响、充满了亲法西斯的紧张的气氛（极端的沙文主义、反共产主义、种族偏见），所有这一切都预示在未来十年内将彻底推翻众所公认的美国政治的传统观念。刚从地方主义挣脱出来的美帝国主义者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在五大洲上保护资本主义的艰巨任务。他们的巨大财富永远无补于他们政治经验的明显不足。英帝国主义者过去能够单靠经济力量统治世界。今天的美帝国主义者却不得不在每一个国家里边装备雇佣军。英国的资本家在他们的上升时期能够用从全世界得来的利润的一小部分破坏国内的工人阶级运动。但是，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衰落时期，如果不使国家彻底军国主义化和粉碎国内的无产阶级，就不能建立它的世界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美帝国主义对全世界的进攻，同时也就是对于美国无产阶级在世界政治上的一种教育。美国的危机所解放出来的力量将联合起来直接反对华尔街的帝国主义政策。美国的工人阶级将第一次看到自己面临着共产主义的必然到来。

美国资产阶级把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集中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之间，已经制造出一个数目非常庞大和具有高度技术的工人阶级。美国的无产阶级面对着一个使它的工人运动的传统的落后性得到克服的急剧的发展。在1929年的严重危机的鞭策之下，工人阶级向前跃进了一大步并且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工会觉悟的水平。随着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庄严的出现，美国的工会运动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强大的运动。在下一个经济危机的鞭策之下，美国工人的觉悟将有一个新的跃进并将提高政治觉悟。美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政治化将是俄国革命以来对资本主义的最具有爆炸性和威胁性的一种发展。从现在起，美国的资本主义就面临着这种发展。勇敢地准备担当起这一运动的领导工作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责任。美国不存在有力的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传统，对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个今天在它的内部集中全力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明天将给革命运动以最高的表现。美帝国主义势力的遍布于全世界一定会使美国革命成为明天世界革命的信号和动力。

苏联的作用

今天只有一个国家和美帝国主义相对抗。这个国家就是苏联。苏联的富源既不受美帝国主义的控制而苏联的公民也不受它的剥削。旧的腐朽的沙皇帝国已经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世界上第二个最强大的国家——苏联。

如果仍然需要证明十月革命在历史上的正确性，比较一下俄国和中国的命运就足够了！最后三十年的历史已经表明，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许多不可控制的离心力量相比，这个革命给苏联带来了特别牢固的新的社会关系。如托洛茨基所说的，计划经

济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鋼鐵、煤炭和混凝土的生产上,而且也在和集中起来的欧洲的整个資本主义势力相对抗的战场上得到了証明。

但是,同时历史也表明,在这些远比資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关系的内部,墮落和反动发展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苏联生活的各方面都受到了官僚制度的传染。

官僚制度的欺騙、寄生和侵吞(公款),給集体生产加上了越来越难以忍受的負担,不断地降低国家基本資金的积累。

随着这些官僚主义暴发戶們的貪欲的增长,社会的不平等和一小撮人霸持特权的现象越来越加重。革命时期軍事独裁政权用最野蛮的警察恐怖来对付日益增加的社会不安,把工人束縛在工厂里,用血腥的手段粉碎农民的反抗,并用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来清除一些官僚制度本身的建立者。

在群众的墮落和不幸当中,官僚制度恢复了已經被革命废除了的一切风尚。十月革命曾經带来一种严格的平等、一种革命的忠誠和为集体利益而牺牲的精神,而苏联的官僚制度却設置了官銜、軍服、金装綬帶和一种卑鄙貪婪的风气。

官僚制度用大俄国民族主义和神秘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丑恶的混合物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样,在俄国也同样看到了世界无产阶级失败的可怕后果。

資本主义的极权主义化和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专政并不是相同的东西。它們具有不同的物质基础和不同的阶级性质。但是它們都同样地表现了人类为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迟延所付出的代价。

斯大林受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論的残酷的报复。苏联官僚制度的小资产阶级保守主义首先导使它扼杀欧洲的革命以换取

一个和世界资产阶级訂立的轉瞬无效的暫定条約，接着官僚制度以一种不可調和的邏輯，把它的統治扩展到俄国的边界以外，目的是为它的經濟困难找到一种临时解决方案和为它的反对帝国主义包围找出一种同样轉瞬无效的保护办法。

官僚制度在它控制下的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能够說明它的矛盾性质。因为官僚制度不能把特权分給资产阶级，所以它排除了资本家对于政府和經濟的控制。在这些国家里边所采取的措施，如国有化、土地改革等，并不是出自对社会主义的热爱，而是出自官僚制度希望加强它对于緩冲国家的經濟和政治生活的絕對控制以取得它自己的特权。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它必然要反对群众，压制他們的活动和組織，并对他們实行专制的統治。

在抓到了緩冲国家的一部分重要工业和促成大企业国有化之后，克里姆林宫就要把每一个国家的最大一部分資源占为己用而不考虑群众的利益。在遇到民族资产阶级的頑强抵抗时，它就采取动員一部分群众的方法和大规模的警察行动来使他們就范。

因此，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就采取了一种軍事独裁的形式，一方面针对资产阶级軟弱无力的抵抗，給右翼以打击，一方面针对工人的迟疑不决的維持生活标准和保卫基本民主权利的努力，給左翼以打击。

某些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对无产阶级革命失去一切信仰的眼光短浅的小资产阶级“理論家”，看到了官僚制度的扩张的結果，就对“斯大林主义者的现实主义”的“成功”表示惊叹。他們說：“整个东欧不是都已經实行国有化了嗎？”

另外一些人，受到斯大林主义者的“日益强大的力量”的严重的恐吓，认为它是走向世界統治的一个新的可怕的剝削社会的代表。这两方面的歇斯底里都非常奇怪地与斯大林主义者的宣传相

符合，都是最鄙俗的印象主义的产物。

官僚制度的罪恶

斯大林的在东欧的“社会主义成就”实际上是在德黑兰、雅尔达和波茨坦让給它的。为了换取这些“成就”，斯大林出卖了在印度的一九四二年八月的起义，命令在希腊的游击队解除武装，把法国的群众运动交给了戴高乐，使一切西欧国家里边的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重新掌握了政权，并且帮助粉碎了德国的无产阶级。

由于他惯用丑恶的拆散、掠夺、放逐和恐怖的手段，斯大林甚至在世界工人运动内部引起了希特勒从来没有能够引起的对于苏联极端敌视的感情。这就是斯大林主义者“胜利”的一篇令人难忘的账目。

因此，斯大林政策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把苏联导向和 1939 年一样的绝路。苏联官僚机构因为不能依靠群众的革命斗争精神，所以采取了扩张主义和实力政策。因此，它只是使一般局势严重化，从而促成一场不可避免的和帝国主义的实力比赛；因此它只是帮助了帝国主义势力在华盛顿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

斯大林利用了他所得到的那个灵验的符咒来解释那些万恶的罪行。无论他进一步的成就如何，他正在奔向自我的毁灭。

只要斯大林的政策一直困处在必须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制度和美帝国主义二者当中选择其一的窘境里，只要它不能上升到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水平，整个世界所面临的前景将不是复兴和发展，相反地，是加速瓦解和衰落。

在过去四十年里，欧洲的历史一直是生产力反抗民族国家界限的历史。两次世界大战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组织”这种反抗使其对自己有利的一种拚命的努力而已。

法帝国主义在 1918 年不具备把这种組織掌握在自己手里所必需的工业力量和政治活力。通过凡尔赛体系，它用传统的外交政策来“組織”欧洲：訂立和約、締結軍事联盟和設置財政貸款。在第一次經濟恐慌之后，这一体系就完全瓦解了。

接着，建立在优越技术和高度生产能力的基礎之上的德国帝国主义，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目的是要把这个旧大陆組織起来，使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符合于自己的需要。尽管它在軍事上获得了压倒的胜利，然而这个“欧洲新秩序”甚至于比它以前的凡尔赛体系瓦解得还快。它的組織不过是一个掠夺性和破坏性的巨大企业，它榨取人民的一切經濟資源来填滿它的战争机器的永不滿足的需要。

今天的美帝国主义，受它的統治地位的不可調和的邏輯所驅使，力图用它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老問題。它所使用的政治和經濟手段(馬歇尔計劃和西方集团)似乎和前述两个国家的手段具有不同的性质。美帝国主义表面上不是要拿走一些东西而是要給一些东西。它不是要組織一群破产的卫星国而似乎是要由感恩图报的債務人結成一个团体。这就是为什么像丘吉尔那样狡猾的冒险家和像居伊·摩勒那样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在“美国制造”的“欧洲联邦”的口号之下聚集在一起，希望美国賜給的食粮能够使他們把对旧欧洲的記憶保持得更长久一些。

实际上，在華盛頓保护之下的欧洲組織所追求的目的与法德两个帝国主义所追求的目的基本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为了同样的理由，也不可避免地要失敗。的确，美帝国主义要取消壁壘，要使財政上軌道，要穩定币制。但这完全是为了“組織”它的顧客的購買力和它的債務人的償付能力。同时它不得不“組織”他們收縮市場和增加債務。沒有會議能够把它从这种政策的內在矛盾中挽

救出来。馬歇尔計劃下的欧洲和凡尔赛与希特勒的欧洲一样，只能是一个軟弱无力的和貧穷化了的欧洲。

在如果得不到貸款就要被困死的威胁之下，欧洲資產階級今天接受美国的一切条件，正如在 1940 年接受希特勒和国防軍的荒謬的命令一样。但是，一旦美国发生危机，美元来路断絕，每一个資產階級都将拚命地寻求自救之道，而那些“联合”将瓦解得比建立它們的时候还快。

正如现代国家的統一要通过一个胜利的革命階級的帮助来实现一样，欧洲的統一（由于高度的技术水平現在已經被提到日程上来）只能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革命胜利的結果来实现。正如必須肃清专制主义和一切半封建的残余才能使法国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国家一样，必須消灭資產階級国家和它的追求利潤制度才能建立一个統一的社会主义的欧洲。

建立欧洲社会主义联邦

现在的問題是怎样制定一个重建旧大陆的統一計劃，以便在合理的基础上把西里西亚的煤、洛林的鉄、卡特兰的錫和羅馬尼亚的石油聚集到一起。問題是怎样把魯尔的鋼鉄厂和捷克的建筑机械业以及瑞士的精密仪器工业联合起来，以共同努力对全欧洲提供最现代化的技术。必須使波兰的农村电气化，兴修南意大利的水利和使法国的农业合理化，以使維也納、柏林或馬德里不缺少面包。

这个計劃的制定必須以滿足群众需要为目的，而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战争机构。不仅必須取消資本家的利潤，而且还必須取消寄生的官僚机构和过于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沉重負擔。必須依靠群众的創造力而不是用飢餓的压力来强迫他們或者用机关枪来

恐吓他們。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唯一能够真正組織生产为大众謀福利和消灭貧困、掠夺与債務的欧洲計劃，是一个由群众自己(他們在整个欧洲成立了千百个工人委员会)制訂、实行和試驗过的計劃。这就是为什么沒有工人和貧农真正行使权力，欧洲的統一是不可想像的。

这样一个由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所統一起来的欧洲，将使各民族的文化得到最自由的发展。它将一举而解放所有殖民地人民，从而开辟一个各大陆自由合作的历史时代。它将促进原子能在建設方面的应用，并且将向苏联和美国的劳动群众指出一条代替軍备竞赛(这种軍备竞赛只能造成战争)的积极的道路。它将为了世界經濟的和諧发展而对这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提供一个具体的方案，并且单凭經驗就能摧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机构的势力。

这就是为什么第四国际今天坚决地提出**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綱領来对抗馬歇尔計劃和“保卫民族工业”以及一切騙人的补救方案，絕望的资产阶级、丧失斗志的小资产阶级和腐化了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机构想要用这些方案来医治欧洲經濟和政治的恶疫是徒劳无益的。

如果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崩潰鼓舞着殖民地解放运动的爆发，那么反过来，殖民地革命的发展也会加速建立在殖民地基础之上的帝国主义体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巨大变动，滿洲、印度和中东的加速工业化，无可挽回的“統治民族”的威望的下降，千百万苦力的痛苦和使人发狂的饥饿，所有这些都在粉碎着殖民地剝削的結構，四百年来这个結構依靠对四分之三的人类进行疯狂的掠夺来促成資本家的財富和欧洲的进步。

由于殖民地开始革命动摇了老牌帝国主义国内社会的基础，这些国家就倾向于改变它们的统治形式以保持它的基本内容，也就是保持它们的高度利润和战略控制。“托管制度”、“法兰西联盟或荷兰联盟范围内的平等”、自治领地位的批准，甚至于如伊拉克或缅甸的宣布独立，巴勒斯坦和印度的分治，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代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在殖民地连续撤退的防线。它继续用千百种经济和军事奴役的枷锁来统治殖民地人民。为了在行动上证明它们怎样在“自由的”形式之下继续起传统的教化作用，帝国主义剥削者进行野蛮的镇压(越南)或者卑鄙的挑拨(印度尼西亚的“警察行动”、犹太—阿拉伯的斗争等等)。殖民主义的新的手段是放弃直接的统治，但和原来的侵入手段一样，它的特点是暗杀、饥荒和流血的暴乱。

在这个殖民体系瓦解时期，生下来就带有这个腐朽制度的烙印的本国资产阶级力求和帝国主义作有利的合作。今天充当帝国主义主子代理人的这个资产阶级不断地和殖民地群众发生冲突，为维护它的切身利益而挣扎着。它一方面想要取得新的特权，一方面又担心失掉旧有的特权。这就使它的行动具有一种特别贪婪和卑鄙的性质。匍匐在腐朽的王党之前并按时把国家出卖给伦敦银行家的埃及资产阶级同时在梦想合并苏丹、利比亚，甚至厄立特里亚。卑鄙地向王公和穆斯林大地主投降的印度资产阶级同时在梦想霸占远东市场。

殖民地的动乱

在震动殖民帝国的动乱当中，只有美帝国主义能够在不冒风险的情形下获得利益。殖民地资产阶级和宗主国断绝关系，结果只是受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但是同时华盛顿当然担心，殖民帝国

的最后崩潰会在这些国家的内部造成不可避免的社会变动。美国资产阶级知道，它不能一方面按时更換殖民地机构的骨干，一方面又支持旧日的欧洲政府。

美帝国主义相继利用經濟榨取、軍事压力和联合国机构以努力促成它的資本滲入，同时也利用当地的资产阶级来粉碎人民群众的暴动，和支持帝国主义者維持旧帝国体制的企图。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和苏丹，美帝国主义有意識地起殖民主义保护人的作用。它比誰都更清楚地了解到，今天帝国主义对全世界的統治是不可分割的，任何局部地区的崩潰都有使整个制度开始走向崩潰的危险。

一切实利主义者以殖民地的独立会使它們屈服于美帝国主义或苏联的官僚制度作为借口，反对支持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他們的理由是完全不值一駁的。一切宗主国的无产阶级的神圣責任是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的一切革命运动。必須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公开地斥責“民主主义者”每天在起义国家里所犯的罪行，号召工人反对軍事討伐和侵略战争，在帝国主义的军队里进行与殖民地人民群众互相友爱的理智的宣传，并强迫资产阶级停止敌对行为和报复。

只有在宗主国和在殖民地同时展开革命斗争的結果，才能使帝国主义完全放弃它的一切殖民主义立場。第四国际可以这样說，它的許多支部(法国、荷兰、大不列顛)是今天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阶级的唯一組織。同时，第四国际已經表明，在宗主国家里边的革命者准备无保留地帮助殖民地国家的工人和进步学生在他們自己的国家里建立他們自己的布尔什維克組織。

在所謂“反法西斯战争”期間，斯大林主义者的政党埋葬了爭取殖民地独立的斗争。在现阶段，它們的倒退政策已經使它們在

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面前完全投降。第四國際的各個支部相反地一直在殖民地國家里進行反殖民主義壓迫的不妥協的鬥爭，同時在殖民地資產階級面前保持着殖民地無產階級的組織上的、政治上的和意識形態上的完全獨立。在印度、越南和埃及，托洛茨基主義者都是站在反帝國主義的人民大眾的前列。因此，他們是殖民地工人利益的唯一的一貫的擁護者。他們的政策受到了經過四十年革命鬥爭考驗的不斷革命論的鼓舞。

無產階級大膽地把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的要求當作自己的要求，它必須站在一切被剝削群眾的前頭，領導他們進行解決土地問題的鬥爭，趕走帝國主義者，沒收外國資本並取得革命的政治民主。只要它能夠消滅本“民族的”剝削者，沒收本國資本，並以工人階級政權實行社會主義計劃，它是能夠使這個鬥爭獲得成功的。

保衛殖民地革命

由無產階級取得革命政權是第四國際在殖民地國家和宗主國的战略目的。如果沒有取得這個成就或者不在國際規模上發展革命，奪取這個運動領導權並且正在試圖濫用群眾革命力量的各種黨派集團，如印度的資產階級政黨、印度尼西亞的小資產階級集團和越南的斯大林主義者，就只會把殖民地革命引向軟弱無力的游擊戰爭的絕路或者引向與帝國主義進行卑劣的妥協。

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幾乎只限於歐洲。列寧是第一個了解到殖民地國家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戰略上的極端重要性的人。但是，遠在第三國際能夠在殖民地完成建立革命政黨的任務之前，這些黨的斯大林主義領導的蛻化變質，使它們變成了官僚機構，變成了殖民地工人走向共產主義的嚴重障礙。

現在，在殖民地國家建立最初的真正革命的工人階級政黨的

任务已落在第四国际的身上。它依靠工人阶级运动过去的全部经验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它和《共产党宣言》为欧洲所规定的那个任务是相同的。它必须使殖民地无产阶级避免遭受欧洲工人过去所不能避免的悲惨失败。这就是为什么第四国际是第一个大胆地宣布殖民地国家在世界革命斗争中起着主要作用的组织。这就是为什么它是第一个真正拥有年轻的殖民地无产阶级当中最有资格的成员参加其领导机构的国际。这也就是为什么它的思想今天正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透过铁幕，越过丛林和海洋，从北非到日本，从朝鲜到埃及。今天第四国际在四分之三的人类——人类最受剥削的部分——当中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在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是工人阶级的失败的基础上，第四国际准备进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扫荡一切的革命。

华尔街在拉丁美洲

四个世纪以来，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一直是国际强盗所中意的榨取膏血的场所，它是他们的财富的最重要的来源。继西班牙征服者之后，自由贸易时代的英国在该地发现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市场和廉价食品与原料的产地，这无异于在该地发现了一个金矿。其次是美帝国主义，它的代理人、银行家、油矿勘探者、橡胶种植人潮涌般地来到这块大陆。在排除德国和日本的竞争者与迫使它的英国伙伴把自己限制在阿根廷之后，美帝国主义是今天统治拉丁美洲人民的绝对的主人。通过“善邻”和“保卫西半球”的会议，依靠统一军备和狡猾地分配贷款的手段，华尔街和美国国务院与半独裁者（如在巴西）或纯粹的“民主主义者”（如在智利）勾结了起来，因为这最符合于它们的利益。通过外交代表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贼，它们野蛮地干涉当地的工人运动，大批收买新闻记者、

議會代表和政客，組織對共產黨的政治迫害事件並對於工會進行有力的分裂活動。

可憐的和落后的拉丁美洲資產階級，由於局限在狹隘的民族界限之內，不能建立起國內市場，缺少適當的人口基礎，並且由於他們通過大規模的國外貿易和地主們有着聯繫，同時通過銀行和外國資本有着聯繫，所以他們不能解決任何問題。龐大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社會像許多落后的孤島一樣地點綴着整個大陸，資產階級沒有能夠把這些社會納入資本主義生產的軌道上來。他們不能使各個國家擺脫單一作物生產的束縛，因而使每一個國家的經濟容易受到來自世界經濟危機的嚴重打擊。它們不但沒有能夠認真地抵抗帝國主義，而且一個世紀以來通過當地的各種政治集團對帝國主義提供了無數的奴顏婢膝的代理人。它們沒有能夠把所有那些說同一種語言和在經濟上互相依存的國家統一成為一個單一的拉丁美洲國家。這些國家目前的分裂和互相爭吵只能使人民受到奴役和加強國際資本主義。

在每一個拉丁美洲國家里，無產階級的比重都遠遠超過本國資產階級的比重。這些工人，如礦工和農業工人常常是在最難忍受的條件下過着艱苦的生活。他們不斷從事於激烈的革命運動。資產階級受到了這些群眾運動的基本力量的威脅，發現它自己一再被迫於短期的民主政治（卡德納斯^①、美洲人民革命聯盟、貝坦科爾特^②）之後建立起獨裁的政權。在民主政治時期，當地的資產階級時常利用工人階級運動對外國帝國主義進行敲詐和施加壓力。拉丁美洲國家最常採取的是一種特殊類型的革命時期的軍事獨裁形式，它在以下兩方面力量之間隨風轉舵：一方面是軟弱的、

① 指三十年代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在墨西哥執政的拉薩羅·卡德納斯。——譯者

② 指委內瑞拉民主行動黨領袖羅慕洛·貝坦科爾特。——譯者

成分复杂的然而却貪得无饜的資产階級、外国帝国主义和小資产階級的广大阶层；另一方面是人数和自信心日益增长的年輕的无产階級。

解决資产階級所沒能解决的历史問題的任务就落在這個年輕的拉丁美洲无产階級的身上。

玻利維亞的革命、智利和巴西的大罷工、委內瑞拉的工人运动的高漲，最近在波哥大發生的群众武装大暴动，都証明，拉丁美洲的工人群众不願意再作資本主义商販的永久的牺牲者。拉丁美洲的无产階級通过提出竞选政府，将会取得每一个国家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領導权，并且——圍繞着它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綱領——将会把城市貧民和渴望从大地主統治下解放出来的农民联合在一起。每一个特定国家的无产階級革命先鋒队将在每一次社会危机中和每一次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的冲突中，学会大胆地提出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联邦的方案。美国无产階級的责任是用他們所有的力量来帮助拉丁美洲的弟兄。就在美帝国主义竭力想取得世界霸权的同时，它在拉丁美洲的势力的基础将会遭到粉碎。在美国工人階級在国内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决战之前，美帝国主义将会受到格兰德河以南的工人的最出乎意料的打击。

“第三种势力”

如果人类仍然为生产力的猛烈发展所带来的混乱和恐怖包围着，如果人类还没有解决它的困难問題，其过错不在于工人。他們已經一再对旧的生产制度进攻，已經很久就使人信服地証明了他們的忠誠的品质、牺牲的精神、克己的作风和創造的能力。这应由工人階級的背叛的領導負責，并且完全由他們負責。

社会民主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要負責的。社会民主党人于

1914年变节为资产阶级服务；1918年造成了德国革命的失败；从那以后，用列昂·布鲁姆的话来说，他们已经证明是资本主义的“忠实的代理人”。斯大林主义也是同样要负责的。在造成第三国际的各国党的解体之后，斯大林主义改变了整个一系列的策略来领导这些党采取阶级合作的方式，这些方式有时是较笨拙的有时是较高明的，但是不论什么时候，它总是和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合作方式同样地有害和背信弃义。

今天，这两种运动都在避免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必要的大牺牲”的借口下，各以它自己的方式采取了“第三种势力”和“新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者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只能把劳动群众引向新的灾难。

在世界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制度两方面的压迫之下，社会民主党的可怜的英雄们表现出被激怒了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切传统的愚蠢。简单说来，他们的愚蠢表现在试图和今天互相敌对的世界两大势力“划清界限”。

事实上，支持“第三种势力”的那些讲演和文章不过是掩护改良主义者的头子们实际参加两大敌对阵营之一的一种烟幕。莫克和范·艾克斯之流为大公司所有人的利益而破坏罢工；费林格和西伦凯维兹之流在压制工人仍然保有的权利方面是斯大林主义者的同谋者。这是“第三种势力”内部的根本矛盾，因此产生了社会党的“情报委员会”。今天，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有“它们自己的”社会党人，正如旧日的帝国常常有“它们自己的”耶稣会会员，每一个中世纪的君主都有“他自己的”弄臣，等等。

正因为今天的战争越来越采取一种总体战的形式，所以战争的准备过程也就越来越牵涉到对于工人运动建立绝对的控制。美帝国主义既依靠教皇也依靠社会民主党来达到它的目的。在它的

慷慨的卵翼之下，一切工人运动中的軟弱分子也把他們自己“重新組織”起来。他們联合在一起是因为对于斯大林有盲目的恐惧，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輕”，都接受了美国的統治。在华盛顿的思想战綫由于小資产阶级的恐惧而获得加强的同时，完全不加选择的专家们組織馬歇尔计划的宣传，使“赤化分子”被逐出工厂和公共机关，从而破坏工会的統一。

不过，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完成它的任务，只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大得多的罪恶不断地把新的工人阶层赶往社会民主党方面。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主义与腐化相比，这些改良主义的背叛者并不代表一种更多的“民主”。他們不过是非常紧密地糾合在他們各国資本家机构之内的一种官僚主义者而已。

像 1919 年一样，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今天试图用“經濟民主”的神話来牵制群众自发的革命高潮。这一次在斯大林主义者的头子們积极支持之下，他們向工人宣教說：只要工人能够占居像經濟事务部长那样的位置，只要使煤矿国有化——給以全部賠償——建立工人管理委员会并用合法手段进行其他改革，就沒有革命的必要。像希法亭想要拿德国的資产阶级政体和苏維埃相比一样，貝文和摩里逊之流正在欢呼在大英帝国体制之内的“社会主义”經濟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某些历史上有条件的国家里，資本主义仍然能够为工人們规定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时和其他社会立法以作为使他們离开革命道路的手段。今天，“經濟民主”的拥护者却着手于强迫工人接受可耻的超剝削，整个欧洲經濟复兴现在就建立在这种剝削上面。英国工党政府的政策最清楚地說明了工人官僚制度今天的使命，也就是让工人流汗来重新建立他們以前曾經用流血斗争破坏过的資本主义制度。

改良主义的領袖們的把他們自己完全糾合在复兴运动当中和幫助大資本家重新在物质上和在意識形态上武装起来的可耻的方針，只能在他們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階級群众方面，特别是在青年当中繼續引起不滿和反抗。

斯大林主义不能吸引那些今天正在寻求一个新的有吸引力的領導的工人階層。第四国际的各国党，坚定地以它們的綱領——唯一的对于年輕一代工人提供一条新道路的綱領——为基础，要接近这些正在脫离社会民主党的既沒有偏見也沒有宗派主义的进步力量。通过紧密地合作和耐心的同志式的教育，各国党将根据自己的經驗引导他們克服一切中間主义的矛盾，并拥护布尔什維主义——列宁主义的組織和政治原則。

“新民主”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在欧洲和亚洲同时爆发的强有力的革命浪潮使斯大林主义者的政党达到了权势的高峰。如在以前的一切革命运动中一样，广大群众潮涌一般地参加了政党。这些政党由于它們的傳統、它們过去的活动、它們的干部，在它們的本階級当中有牢固的基础并且在工人階級广大階層中間最符合于彻底改革的标准。斯大林主义者的組織在十五个国家內一举把这些政党变成了执政党。正如社会民主党对于 1918 年以后的革命运动的消灭應該負責一样，斯大林主义者的組織对于这个第一次战后革命浪潮的消灭應該負責。那时候的改良主义者的背叛是以“經濟民主”的名义进行的；1945 年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背叛用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名义。

旧路綫的改良主义者的直接的目的，名义上是在帝国主义民主体制內部保卫已經获得的“营垒”，实际上是保卫工人官僚机构

的特权，并以此名义放弃无产阶级的传统目标。斯大林主义的目的是，在名义上是保卫“俄国的营垒”，实际上是保卫苏联官僚机构的特权，并以此名义放弃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但是，经验一贯地证明：放弃最终目标的结果无可避免地是失掉被认为正在保护中的营垒。这并不是领导者那方面对于这些本身极为明显的历史教训缺乏“了解”，而是这些领导者要保护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正如改良主义的任务是把工人官僚制度的存在和现有的民族资产阶级调和起来一样，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制度的任务是把现有的苏联官僚制度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存在调和起来。

苏联的扩张措施使“新民主主义”理论看起来好像是克里姆林宫在它支配下的国家里所犯的一切罪行的一种正当的辩护。“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里的应用却只能使它完成它的基本任务：公开地放弃列宁主义者的夺取政权的战略，而代之以一种妥协和冒险的政策，以抓取“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杠杆”。所有这些都是公开地表示，在完全按照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机构的精神来运用苏联外交、苏联军队和苏联的警察—密探制度当中，要把世界无产阶级降低到一个小卒的地位。

斯大林主义者叛徒

根据这个总的方针，斯大林主义的政党更加不能采取一种始终一贯的政治路线。像过去一样，它们的策略是从最下乘的机会主义转变到另一极端的最可怕的冒险主义，常常是把这两个极端的特点结合在一起。昨天解散了共产国际；今天又重新建立起共产国际。昨天它们号召“生产第一”；今天号召抵制马歇尔计划。昨天它们斥责罢工为“托辣斯的工具”；今天它们又官僚主义地煽动罢工行动。所有这些使工人阶级失去方向和感到茫然的动摇和

轉變，都表明了斯大林主義的領袖們的同一個願望——和帝國主義達成一種有利的妥協。它們還表現極端輕視工人以及他們的感情、利益和他們的誠實。

斯大林主義在工人階級當中的權力，是它的機構的物質力量與在廣大群眾心目中仍然代表着的過去的革命傳統相結合的產物。如恩格斯在一世紀以前指出的，傳統代表着歷史上的一種最大的惰力。要奪走斯大林主義對於工人階級的領導，就有必要從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所沒有做的事情上做起。必須建立起強有力的工人組織，必須教育革命的工人干部的新一代，他們通過在鬥爭中的無數次的經驗，將在工人階級當中扎下根基，並獲得他們的尊敬和信任。必須建立一個真正的黨，通過越來越廣泛的活動，最後真正代替了已經破產的領導而出現在一切群眾運動中。堅決地依靠革命的綱領，以社會上最受剝削的階層為對象，對於無產階級的無限的革命戰鬥力量保持着完全的信任——這就是第四國際將怎樣在工人階級運動內部最後消滅斯大林主義這個障礙。

三十年來，人類以可怕的危機——戰爭、反革命、極權主義專政、國家滅亡、文明墮落——為共產主義革命的遲延付出了代價。但是，這一個整個悲劇時期，絲毫不能說明無產階級生來就不能對於它的歷史使命有任何認識。相反地，從俄國內戰到西班牙內戰，從廣州起義到雅典起義，千百萬工人都在行動上表明了一種歷史上所未曾有過的热情、戰鬥意志和革命的忠誠。

從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的特定任務上產生的一切品質——突然表現出巨大創造能力、對於自覺紀律的敏感、完全無私的精神（它最清楚地表明它對於歷史是十分關心的），所有這些都已經銘刻在二十世紀歷史的最感人的篇章上。《共產黨宣言》關於這個問題的分析和預言不僅已經得到了證明，而且已經被公認為

是我們时代的主要现实。

领导的危机

但是，无产阶级自发的革命高潮面对着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社会随着它的每一步衰落都表现出注定要消灭的阶级所特有的一种新的防御性反应。军队、警察、间谍、工贼、报纸、广播电台、学校和教会，在受到威胁的资本主义堡垒周围，构成了许多防御工事；面对着这些，无产阶级的自发而不协调的攻击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极大的失败。反革命力量集中的和科学地组织起来的领导，几十年来就指导着一切无论是什么政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这样的领导相对抗，除非无产阶级这方面选择一个甚至更称职的领导——本阶级的党的领导——它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今天，人类的危机就是革命领导的危机，因为和这个无产阶级的自发的革命运动一起存在的还有它的领导的公开反革命的性质。

年轻的欧洲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受过更多的教育和更好的训练，可是在它那个时代，经过两个世纪的摸索才完成了选择领导的工作。因此，只有那些对历史的估价失去一切比例感的人，才会对于无产阶级三十年来没有能够选择一个适当的世界领导感到惊讶。资产阶级花费了大量的财富和经验，才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更有效地使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成为这个时代的支配一切的意识形态和道德。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历届的工人阶级领导逐渐地为无产阶级赢得了一些微小的改革和为他们自己赢得一些真正的特权。但是，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超出了本阶级，并因此而成为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输送到工人运动中来的主要代理人。只是在资本主义的衰落在欧洲和亚洲促成第一次强有力的革命高潮时，才建立起选

选择一个不受統治階級意識形态影响的真正的革命領導的物质条件。但是,那些最早的斗争由于缺少适当的领导,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从那以后,革命领导的选择就是在那些失败的压力之下进行的。唯一领导工人取得了政权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本身由于缺少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国际而成为了第一个受害者。在衰落时期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立起这样一个組織——这就是第四国际的历史使命。

一个世界运动和一个国际领导

无产阶级的世界总参谋部必须领会共产主义革命的全部綱領。它必须用充分的革命經驗来丰富这一綱領以使自己能够应付一切形势的突然变化。它必须用一种和工人阶级有紧密联系的組織向广大的劳动群众进行关于这个綱領和經驗的教育。在第四国际誕生时期,这三項任务只是在克服最大困难之后才完成的。

只有在群众斗争中才能领会革命綱領。只有在一个整个历史时期的多种多样的活动中才能取得政治經驗。只有在工厂里和在工人的邻近地方进行不间断的工作才能建立起工人組織。但是下降的资本主义条件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残酷一次又一次地破坏着革命思想、革命后代和革命組織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选择一个真正的世界领导証明是这样一种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有意識地担当起这个工作并有意識地作出計劃和付諸实行。

历史的辯証法是这样的: 建立一个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政党感到非常困难的那些客观条件, 同样也是使它的建立成为可能的唯一的条件。第四国际幸好是建立在这样的时代, 所以它不具有改良主义者的幻想、議会的白痴病、宿命論、冒险主义、产生悲观失望的天真的信仰——总而言之, 不具有那些曾經形成和糟蹋了革

命前輩的許多思想感情。

第四国际已經克服了工人階級斗士的民族成分与无产階級运动的世界使命之間的矛盾；它是第一个开始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領導的組織。第四国际是第一个把彻底革命的綱領和过去革命运动所取得的經驗結合起来的无产階級的世界組織。这就是为什么从历史的尺度来看，过去无产階級的失敗是形成一种科学的革命技术的必要条件，正如传染病是发展一种科学的治疗技术的必要条件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們正在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悲剧时期，将随着時間的推移而証明它不过是为了鑄造解放人类的适当工具的一个历史停頓时期。

第四国际的干部只是通过不屈不挠地和有組織地参加一切群众斗争和一切群众运动——真正階級斗争的战略学校——来取得担任无产階級真正革命領導所必需的經驗。为了参加这些斗争和运动，第四国际用它的**过渡綱領**——过去一切工人斗争所取得的教訓的总和——来武装自己。

第四国际活动的第一个目标是清楚地和有意識地說明被剝削群众的深切然而混乱的願望。如果群众起来反对通货膨胀或失业的罪恶，如果群众认为战争或者国内压迫的負担难以忍受，如果群众要求和平、更多的面包或更多的自由，第四国际就站在他們一边，鼓励他們的批評精神，加深他們的不滿，使他們走上社会主义觉悟的道路，并教育、組織和指导被剝削者，使他們从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后果**的潜在的反抗过渡到对于造成灾难的**原因**——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公开的反抗。

面对着群众的每一种渴望和每一种要求，第四国际提出适当的口号来动員他們，目的是为了了解决那些使他們感到激动的問題。这就是为什么第四国际认为怀疑主义、宿命論和消极被动是提高

无产階級覺悟的最大障礙而全力与之展开斗争。这就是为什么它一再闡明，在工人階級面前提出的有关重大問題的一切决定，最終还是取决于階級力量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无产階級在工厂中和在街道上都会是胜利者。

資本主义除了依靠加重被压垮了的劳动群众的貧困負擔之外，已无法再生存下去。不論是通貨收縮或通貨膨脹，不論是物价政策或稅收政策，不論是鼓励出口或限制消费，不論是粮食不足或生产过剩——在一切国家里，尽管形式千变万化，都不外是对于群众购买力的一种同样的进攻。根据工人家属的消费需要，通过**按物价計算工資、薪金、失业补偿、养老金和社会保险的制度，保証最低生活工資**——这就是第四国际各支部为工人斗争提出来的当前目标。日本、朝鮮、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的例子清楚地証明，这个口号已为千百万工人所接受，他們曾經举行巨大的罢工以促其实现。

在四分之三的人类普遍消费不足当中，已經到处出现資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现象。这在今天只是一个次要的威胁，明天失业将成为压在无产階級身上的主要負擔。第四国际不断警告群众，这种危机正在不可避免地迫近，并号召工人为强迫已关闭的工厂重新开工并在工人管理之下恢复生产而斗争，为逐渐减少劳动時間而不减少实际工資而斗争，为防止解雇并由一切工人分担现有的工作并保証他們的最低生活工資而斗争。

爭取工人管理权

但是，物价、工資、利潤、營業量和就業量等問題都决定于国家的整个經濟生活。如果工人想要以有效的方式解决购买力和充分就業的問題，他們就不能把决定生活費指数或者就業与失业比率的工作交給那些老板或者他們的政府。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口号

如果不同工人管理联系起来就没有什么价值。第四国际各支部不忽视任何一个机会以唤醒工人不要相信资本家和他们的政府的信用和能力。工人必须会看账目，以便他们能活生生的观察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作用，并认清整个剥削机器、卑鄙的寄生主义和造成工人穷困的浪费，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为当前的经济目标而斗争才能实际上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员的桥梁。

广大工人群众在体验到巨大的经济危机、大批人失业和黑市之后，今天了解到，任何程度的经济保障都是与在生产手段上的私有财产的保全不相容的。一群数目有限的垄断资本家统治着一切国家的经济，现在已经成了人所共知的事实了。不过，面对着资产阶级国有化的试验，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国有化，我们有必要再度说明：**没收银行和重要工业**的革命要求与鄙陋的改良主义者对于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掩饰是根本不同的。要求在除了对小股东外不作任何补偿的条件下实现国有化；要求工人管理国有化企业；要求把一切没收了的工业纳入由工人委员会制定并执行的复兴计划的范围内；把为实现这种国有化的斗争和为建立一个工农政府的斗争联结起来——我们以这种方式提出共产主义的和革命的改造社会的纲领，以反对资产阶级想在改头换面的形式之下保全它的统治的顽固意图。

劳动群众的团结

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样也是**中等阶级**不断贫困化的时代。在仔细地划分城市和农村的资产阶级的剥削阶层和被剥削阶层之后，第四国际各支部提出适合于在行动上把劳动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大资本家的口号。和斯大林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的政党不同（这些政党主张与中等阶级“联盟”是一种没有价值的遁辞，目的

是放弃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綱領，以便与实际上出卖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领导人和政党结成联盟)。第四国际各支部在受到最严重打击的中等阶层(薪金使他們吃不飽的职员、沒有土地的农民、被捐稅压垮了的手工业者、破了产的小商人等等)的深刻不滿上寻求支持，以便把他們的願望引向一个沿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的社会革命。在意大利、日本或法国这样的国家，这是避免新的半法西斯組織依靠失望的中等阶级的支持来取得发展的一条最可靠的道路。

今天，一切經濟問題、工会問題和社会問題都是政治問題。无产阶级通过罢工能够强迫老板阶级交出来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由政府有计划地从无产阶级那里取去的。这个政府无论它是什么形式，都一直是統治阶级的真正的管理委员会。这就是为什么我們提出**工农政府**以与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相对抗，不論这个资产阶级政府是一个彻底的反动政府或者是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人与资产阶级政党組成的联合政府。

建立无产阶级国家

除了为这一口号进行不懈的宣传外，在政府发生剧烈变动或工人阶级展开普遍斗争时期，我們还对于那些自认为属于工人阶级并且仍然为群众所信任的政党提出明确的倡議。第四国际对这些政党发出这样的呼吁：“**和资本家决裂！把一切权力拿到手里！**”以便在已經动員起来的群众的支持和监督之下，实行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綱領。

但是，要使政府成为真正的工人政府，只有那些“工人”政党是不够的。此外还必须有一个真正反资本主义的綱領和对于充滿在资产阶级合法組織中的群众进行革命的动員。这里就提出了国家問題。英国、斯堪的納維亚和澳洲的工党部长的权力只是一种幻

影。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听命于全能的垄断资本家的官僚管理机构的手里。政府更换了，但是警察、将军、法官和高级官员，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整个官僚机构却原封不动。只有建立起群众的真正权力，组织工厂、区和村镇的委员会，才能打破这种障碍。

国家官僚机构的开支以及它的军事预算、浪费和舞弊行为，对于遭到极端剥削的国民经济日益成为沉重的负担，并且是造成吞没一般人民收入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第四国际仿效列宁进行鼓动的无可比拟的先例，不断地揭发资产阶级国家的压迫、剥削和寄生的性质。从上千个具体例子出发，我们不断提出一个和它相反的开支低的国家，一个官僚机构完全被粉碎和行政职权转移到全体劳动人民手里的国家：**无产阶级的国家，由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公社制和十月革命的国家。**

在1947年法国大罢工之后，1948年的意大利选举确实地证明了：在现阶段，围绕着工人阶级的两个传统领导中的一个再也不能建立起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斯大林主义的剧烈转变和冷酷的策略终于疏远了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先锋队。改良主义领袖们的破坏罢工和豢养工贼使这些领袖们今后再也不能对战斗的共产主义工人群众发生影响。

这两种工人官僚在无产阶级中间划定了一条和两个国际势力集团相一致的分界线。改良主义者的领袖们有意地忽视共产主义的工人群众，把斯大林主义政党的追随者看作是“极权主义专政”的代理人。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人反过来把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看作和“美国党”阵营中的法西斯分子是一伙。

正如明天没有工人的统一行动，任何工人的进攻都是不可能的一样，现在如果不重新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要想在防止资产阶级对工人的购买力和自由的进攻中获得胜利也是

不可能的。一世紀以前，《共产党宣言》宣称，共产党人沒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今天，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是号召工人在行动上重新建立起工人階級統一戰綫的唯一的力量。

工会官僚和国家

那些在工人运动中代表着和无产階級利益不同的利益的人們，今天首先要攻击的就是工会。“用統一的工会运动来对抗統一的老板階級”这个口号一直是第四国际的工会战术的檢驗标准。分裂工会今天无疑地是帮助老板們施展手腕和进行挑拨。但是，只是进行一貫的反对工会分裂的斗争根本是不够的。事实上，这种分裂在大多数情形下不过是一种更严重的和更可怕的现象——背弃工会运动——的特殊的表现。另一方面，工会的統一只有在它使我們更可能实现行动的統一时，对于无产階級才是有意义的。

但是工会官僚机构要对于工人运动建立一种越来越全面的控制，并且要加速把工会机构合并到資本主义国家机构中去。最后，这个官僚机构的背叛的政策正在瓦解士气并且构成背弃工会的最坏的因素，它力图完全窒息工会內部的民主并在实际上使最勇敢的战士沒有办法向工会会員提出他們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第四国际各支部进行一个同样的斗争，爭取在一个生气勃勃的綱領要求的基础上建立工会的統一，以扩大工会活动的范围，从而把广大的还没有組織起来的群众也包括在內；爭取工会的完全独立和不受国家的控制，并不断保卫工会民主。

但是，在整个資本主义世界里，限制和压迫工人自由的趋势现在是很明显的。麦克阿瑟在日本压制总罢工；舒曼和莫克在法国公布臭名昭彰的法律；而塔夫脫—哈特萊法案則把階級“公平”的

绳索套在美国工会的身上。各地残存的资本主义统治日益和维护民主自由(甚至于最起码的民主自由)不相容。

在这种形势下，第四国际号召工人围绕着一切符合于劳动人民真正需要的**民主要求**展开广泛的统一行动。为了给这些要求以最统一的形式，并为它们进行始终不懈的斗争，今天就意味着要动员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在**德国**和在其他被占领的国家里，为撤退一切占领军队而斗争，为国家统一和反对一切合并与赔偿、反对检查制度和欲盖弥彰的军事独裁而斗争，为真正的自由选举而斗争，为召集立宪会议而斗争，为根据人民的意志罢免当选人而斗争，为自由选择会议地点、设立印刷厂、广播电台等等而斗争，为一切工人组织而斗争——如果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进行这些斗争并且把这些斗争同宣传各国工人与士兵应该相互友爱及宣传**欧洲社会主义联邦**联系起来，这些斗争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的里程碑。

需要建立工人统一战线

最后，由于对法西斯专政记忆犹新，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工人日益不安地注视着法西斯活动(意大利)或半法西斯活动(法国)死灰复燃的迹象。第四国际不断地使工人记起他们在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在法西斯党徒手中失败的惨痛教训。它不断地宣传建立一切工人组织的**统一战线**以堵塞戴高乐、摩斯莱、阿尔米朗特之流和其他为大资本家担当刽子手角色的候补人的道路。组成下层统一战线委员会必须根据日常事件，在自认是无产阶级的组织中间不断宣传建立统一战线。必须经常提出在工厂、工会和区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一支**工人民兵队**以反对背叛的工会领导人的合法主义的白痴病。这些领导人卑屈地重复着他们前任者的错误，要求

資產階級國家解除法西斯匪徒武裝。但是，最重要的是密切注意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群眾的一切自發行動，這種行動，特別是在意大利，正在日益採取最大膽的形式。只有在革命先鋒隊學會採取這些自發行動並不斷予以擴大和加強，才能在工人自覺鬥爭和自發性運動高潮中間建立起一種真正的根本的統一，並且只有在這之後才能真正取得本階級的信任。

建立一個新的革命青年國際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社會主義青年國際的骨幹們效法它的偉大的國際領袖——卡爾·李卜克內西——的光輝榜樣，出來組織了歐洲年輕的共產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仍然是在幾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青年國際的幹部中間第一次和背叛的領導發生決裂並第一次尋求一個新的革命國際。青年是一切革命運動的動力，這完全不是一種簡單的經驗之談。腐朽的資本主義存在的條件極沉重地壓在從事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的年青一代工人身上。他們發現自己生下來前途就沒有希望。現在在舊的工人組織中，官僚主義的枯燥無味和權謀與偽善的窒悶空氣同樣也驅使最有才能的和最忠實於工人階級的青年作猛烈的反抗。第四國際原來產生自部分來自青年的一個反對派，現在它已是一個以各國的青年工人和學生占大多數的組織，這決不是偶然的。這同時也是它將來發展的最可靠的保證。

資產階級青年組織（天主教徒、半法西斯主義者）和那些自稱為工人階級的組織（改良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加緊努力以促使青年工人故意脫離政治。傳統組織的投降和妥協政策必然要引起的憎惡也幫着起同樣的作用。這就是為什麼第四國際有計劃地教育被剝削的青年從政治上認識他們的悲慘命運。教育革命青年干

部是保証无产階級青年的解放斗争不离开階級目的这个中心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第四国际完全反对每一种对于青年工人和他們的问题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它既不摆出保护人的架子也不販卖那些專門的术语。它开始实行自己不断宣布的那个原則：青年工人的解放和一般无产階級的解放一样，只能由青年工人自己来完成。这就是为什么第四国际完全承认革命青年有权成立他們自己的階級組織，它的活动应该首先以青年工人階級自己的问题为中心：争取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争取生活和休息的权利。青年的革命方針和拥护这些方針的組織在反对軍国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个斗争本身是我們时代的一个革命中心任务。

但是，在第四国际完全承认革命青年应该有它的特定組織、方針和綱領的这种权利的同时，它要求青年工人了解到：他們自己的问题是今天摆在人类面前的一般问题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工厂中和兵营里，在制造場上和大学里，和青年工人階級发生冲突的敌人也就是整个无产階級和劳动群众的敌人：垄断資本主义和它的日益极权主义化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青年的革命組織不能离开无产階級的革命組織单独行动，而必須与它密切合作。这就是为什么要建立的新的**革命青年国际**只能建立在第四国际的牢固的綱領之上。

推翻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制度

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

反对帝国主义

面对着难以置信的苏联的蜕化变质，一些幻想破灭了的革命家把斯大林主义者的专政和仍然残存的十月革命的成果看作是同

一的东西而拒绝保卫后者。另一方面，一切“同路人”，仅仅昨天，当问题是“把反法西斯的战争进行到底”的时候，还在歌颂“胜利的红军”，而现在，这些人，当它和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又突然感觉到斯大林主义的野蛮了。第四国际的斗士在工人运动中第一个揭露了斯大林主义政权的一切丑恶和反动。只有他们能在保卫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严格范围内对斯大林进行认真的斗争。

华盛顿准备对苏联作战，其目的完全不是为了在苏联实行政治民主或尊重苏联人的权利。相反地如果美国军队占领了苏联的领土，美帝国主义必将面对着苏联工人和农民的猛烈反抗，美帝国主义一定会在苏联建立起一种与希特勒政权相似的恐怖制度。

帝国主义战争不仅不能把工人从极权主义专政下解放出来，而且一定会阻止他们进一步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帝国主义一定会更把追求资本主义利润和官僚制度造成的浪费结合起来。帝国主义不但不能彻底刷新计划机构和消灭从这个机构获利的腐败堕落的根源，而且一定会用它的输出品和资本猛烈打击整个机构并使它垮台。

猛烈地排斥官僚制度是今天俄国工人阶级的一项迫切任务，不然，在这种寄生制度的压力之下，十月革命成果的残余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正是为了这一理由，所以俄国工人不能把这一任务委托给帝国主义，并且将极力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残余，反对帝国主义，一刻也不放松推翻斯大林主义军事独裁集团的革命斗争。

斯大林通过他在俄国军队占领的国家里所实行的反动政策，主要是保卫官僚机构的特权。正如官僚机构在苏联破坏了工人国家的基础一样，它在苏联国外所实行的反革命政策对于同样的革命成果构成了永久性的威胁。第四国际完全用革命的阶级斗争方

式来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残余。任何削弱苏联国内外的无产阶级的东西，任何毒化无产阶级思想或降低它的觉悟的东西，都是对于保卫苏联革命的直接打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就意味着要反对反动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反对它压迫、掠夺和占领“缓冲地带”国家，反对它背着人民搞秘密条约和妥协。第四国际所主张的保卫苏联的唯一形式是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进行反对它“本国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粉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的斗争，即使这些障碍包括俄国占领军在内。

在缺少一个动员群众的强有力的革命领导的情况下，战争、保卫苏维埃国家以及重建工作的迫切需要，确曾使进步的工人把官僚制度当作不可避免的、弊害较小的制度来接受。另一方面，党派斗争、军事胜利和与欧洲进步国家的接触也无疑地增加了苏联工人的批判精神，增加了他们对于那些对一切欺骗和偷盗负有责任的寄生者的憎恨，使他们想要把国家的领导权重新掌握到自己手中。由于官僚主义领导的结果，重建工作越向前进行，资金积累率越降低，经济困难将越来越严重，社会不平等将越来越加深。在苏联社会将要体验到的不断变动当中，年青一代的工人将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帮助之下，他们将找到推翻官僚制度的道路并将在俄国历史上开辟新的革命的一章。

推翻资本主义

第四国际并不给它自己提出弥缝资本主义制度或者为“过于激烈”的革命方案寻求代替办法的任务。它的纲领是动员群众推翻资本主义。这就是为什么过渡时期的要求并不带有“适应论者”或“进化论者”精神的痕迹。这些要求跳过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

陈旧对照，相反地，把日常工作和我們时代的最紧迫的問題——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联系起来。一切宣传，如果只是限于把这一运动的总目标当作一个固定的公式来重复，不提供办法让工人阶级通过自身的經驗認識这一总目标，就都是宗派主义的。一切宣传，如果只是給人——即使是暗中地——一种分阶段斗争的概念，“暂时”把自己限制在当前的要求上，把每一个过渡性的口号变成目的本身，并且认为工人太落后所以不能从一开始就对他們說明共产主义的革命綱領，就都是机会主义的。

面对着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对于共产主义的可怕的出卖和由此而产生的无数的歪曲和捏造，今天有必要重新申明共产主义革命的根本特征。

共产主义的綱領

它意味着沒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和资产阶级的消灭；它意味着由无产阶级接管生产資料和交換手段；它意味着消灭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作为統治阶级所組織的**、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工人委员会。

生产資料和交換手段的集体化，把一切信贷机构集中起来成立集体所有的单一的国家銀行；垄断对外貿易；建立計劃經濟，这一切都不是革命的目的；它們只不过是手段，用来逐步提高群众生活和文化水平，把工作時間减少到这样的程度，使广大工人能够管理經濟和公共事务，社会不再有阶级之分，国家将随之消亡。这就是为什么必須确立和扩大工人对于生产的管理权；由群众积极参加拟定、执行和确定生产計劃；人的因素将在一种越来越有决定性的程度上对各方面的經濟生活进行干預，生产定額将越来越服从于消費的需要。这些是在推翻資本主义以后在經濟方面的不可缺

少的因素；并且是表明社会真正朝着社会主义进展的标志。这就是为什么专职官员人数的剧减，立法和行政职权的融合为一，以及由人数日益增多的受过教育的工人轮流行使这些职权是坚决肃清反革命、稳定新社会和根本减少它的内部矛盾的最明显的标志。

共产主义革命的纲领是一切民族解放的纲领，是肯定给予一切民族以自决权——包括分离权在内——的纲领。用共同消除本国的剥削者的方法消除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一切剥削和压迫；让每个民族可以自由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这个革命将同时消灭沙文主义的根源，将追击民族主义的和种族主义的神秘主义到它的最后藏身之所，并且将消灭能够阻止全世界人民实现真正普遍联合的每一种障碍。

共产主义革命不仅要在经济方面解放群众的巨大生产能力，它还要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到处解放群众被封锁着的巨大创造潜力。教育科学和技术训练、艺术和文学活动、组织公共卫生、建设城市和发展人类德行，将第一次开放给千百万无产阶级和贫农，现在这些人所遭受的经济奴役正有计划地摧残着他们的无数才能。因此，这一切活动的本来性质也将经历一次根本的和不断的改变。最后，在人类成为自己的命运的主人的时候，将通过批评的思想和方法深入未知世界的最后存在的奥秘，而精神的培养和人类本性的改造将成为不断革命的最终目的。人类将从必然的王国进入自由的天地。

在一个冒着陷入野蛮境界的危险但仍充满着这一切辉煌的可能性的社会里，第四国际认为只有坚决把共产主义当作它的目标的纲领才是现实的。今天，把一个人的生命献给人类的革命解放事业是在痛苦的世界梦魇中保全人类尊严的唯一道路。悲叹文明的衰落而不对各国人民提供一条走向美好将来的途径，实际上是

把自己变成普遍的社会瓦解过程中的又一个因素。今天，只有共产主义革命的綱領值得为它的实现作出牺牲。只有这个綱領能够使第四国际今天有权呼吁一切国家工人团结在它的旗帜下。

二十年前，斯大林用他的国家机器对这个綱領施加沉重的打击。疯狂残忍的斯大林为了追击、监禁和暗杀忠于列宁主义的宝贵的革命干部而同各国的警察联合起来。一个空前的反动高潮淹沒了整个世界。今天，在无数牺牲之后和在新的打击之前，二十五个国家的第四国际的战士们可以骄傲地说，他们已经经得起这个历史黑暗时期的考验。拒绝向斯大林警察投降的内战中的英雄们的榜样，在西伯利亚孤寂的监牢中斗争到生命最后一息的俄国左翼反对派的战士们的榜样，在国家政治保卫局行刑队面前临死时高呼“托洛茨基万岁”的年轻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盟员）的榜样——所有这些都不是没有结果的。今天，布尔什维主义已在五大洲上复活，它的思想正在传播，它的组织正在加强。代替每一个死去的烈士的是十个站起来的新的战斗者。在战胜斯大林的恐怖和希特勒的狂暴之后，第四国际对于将来充满了信心，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和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切不可征服的解放意志都活在那里。从人生如朝露这个尺度看来，它的发展似乎是缓慢的。从历史的尺度看来，它的胜利是已经确定不移的了。

第四国际在同斯大林主义官僚篡夺者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骄傲地接受了十月革命的传统、思想和教训。斯大林的一切罪行都不能从各地工人的心中抹掉他们对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壮举的记忆。面对着资本主义和它越来越可恶的腐朽，第四国际在世界规模上提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中心思想：“一切权力归于工人和贫农”。面对着工人运动内部的阶级敌人的卑鄙代理人，第

四国际鑄造了决定无产阶级胜利的工具——世界布尔什维克党。面对着战争、破坏和蹂躏，第四国际坚决地履行它的历史使命——准备世界规模的十月革命。

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

今天，在庆祝科学共产主义第一个百年纪念的光荣的日子里，在这个一九四八年的五一劳动节，这个世界工人示威游行的日子里，第四国际在从世界各大洲集合到它的代表大会里的最优秀的战士当中，暂停下来悼念所有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一八四八年六月街垒中的战斗者、巴黎公社的士兵们、第一届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工人们、十月革命和俄国内战中的胜利者们、德国的斯巴达卡斯团的团员们和匈牙利、巴威利亚和广州的革命工人政府的斗士们、阿斯图里亚进行爆炸的革命党人们、巴塞罗纳的民兵们、维也纳防御同盟的战士们、希腊和法国的共产党游击队员们以及一切殖民地革命的数不清的士兵们——他们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作为被剥削阶级决心要把世界从剥削的深渊中挽救出来的证明。纪念所有这些战士和第四国际的无数先烈，第四国际把这个任务付托给年青一代的世界工人阶级。要想无愧于他们的榜样，今天就要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站好自己的岗位。

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号召各国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在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役、反对一切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今天全世界工人所进行的是同一个斗争——为共产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

巴黎旧日革命堡垒中的工人们和在反抗中的不可战胜的越南青年革命者联合起来！

乌拉尔的矿工们和美国的战友们联合起来！

德国的工人们，从你们的废墟中站出来，和英国的工人们联合起来！

中国、印度和一切殖民地的工人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的单一的战斗中同宗主国的工人们联合起来！

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这个旧日的战斗口号明天将成为共产主义胜利的最高标志！

四、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 大会宣言

(1951年8月—9月)

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以堵塞帝国主义战争 制造者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三十几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还不到十年，而帝国主义战争的不祥阴影又笼罩着全世界。重整军备支配着每一个国家的社会活动。国际会议未能达成任何协定，这预告将在战场上解决问题。在世界许多地方一再燃烧起来的“局部”战争的烽火将造成一场普遍性的战争灾难，预示着将来的恐怖和野蛮。

向第三次世界大战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两个“强国集团”为统治世界而进行的斗争，也不是一小撮军火制造商的“渴求利润”，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不可抗拒的逻辑。从人类总的利益的观点看来，这种战争趋势好像是一种集体疯狂的发作。政治家、将军、科学家，全都深信人类文明在这次冲突中冒着毁灭的危险，千百万生命将遭到牺牲，整个城市和国家将被消灭。假如他们仍然亲自帮助准备这次战争，那是因为战争并不决定于他们的了解或愿望。把人类拖入这一变乱的是拥有庞大生产系统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消灭这个社会，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张它的基地，就不能生存，也就是说，不能继续给统治阶级提供“合理的”利润。两个世纪以来，这种扩

张是在牺牲东欧、亚洲、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的“落后”人民的情况下实现的。我們整个地球被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了。从这个世界被瓜分完了时候起，资本主义要扩张就必然毁灭自己。

在为了重新分割世界而进行两次全球战争之后，均势的局面已經彻底被推翻。所有以前的主要强国本身都成了美帝国主义者扩张和集中的对象。这种新形势不但远不能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而且还进一步加深了这个矛盾。美帝国主义的巨大生产机器正在遭到残存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抑制。它需要整个世界作为市场，以稳定它的经济体系。但是世界已經不再向它开放。

日益縮小的世界市場

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东欧资本主义的崩潰，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和伟大的中国革命，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已經减少了八亿顾客。战后第一阶段的經濟复兴工作刚結束，美帝国主义就由于不再能扩展它的經濟領域而受到严重危机的威胁。它的唯一的出路是通过重整軍备以創造一个人为的市场，以使用这些武器使取得真正的新市场成为可能。

像它的一心想要統治世界的前人——德日帝国主义集团——一样，美帝国主义出場太晚，所以不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

正当美帝国主义开始准备下一次世界战争时，沿着亚洲大陆的周围，从远东到近东，爆发了新的革命运动。殖民地人民不再让帝国主义国家把他們仅仅当作是财产来看待。他們的主人對他們进行的战争和被迫在殖民地土地上建立的工厂使他們意識到了自己的力量。

千百万殖民地的奴隶正在站起来，摆脱白色暴君們加在他們身上的飢餓、强迫劳动和有組織的暴行的枷鎖。殖民地革命的发

展威胁着要进一步缩小仍然受帝国主义掠夺的那一部分世界。因此，帝国主义重整军备不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且也是出于想用军事干涉来粉碎群众起义运动——无论爆发在什么地方——的非常明显的政治目的。由于这个原因，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一个要消灭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而且是一个反对一切殖民地革命的战争，一个反对全世界革命工人运动的战争。它将是一个最名副其实的反革命战争。

次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之下结成了一条统一战线，以防止威胁着它们的致命的危险。但是，美国的生产力越是在一个压缩了的世界市场里遭到抑制，美帝国主义所垄断的那一部分市场就越大，而那些次要的国家在他们所能支配的狭窄的生存空间里就越感到窒息。

經常存在的社会危机

由于经济平衡基础的消失而在这些国家里引起的不断的社会危机使它们的资本家阶级的权力极端不稳固。它们被迫依靠它们美国大叔的恩赐来生活，而这个大叔同时也就是统治它们的工人的高级警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没有从美帝国主义得到不断的支持，一定早就在整个欧洲和亚洲绝迹。

那些次要的国家(德国、日本、意大利)完全没有自己的保护地，它们的复兴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经济的和战略的需要，所以它们最坚决地和毫无保留地支持华盛顿。对于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建立一条统一的帝国主义阵线就意味着它们的殖民地越来越受到华尔街的控制。不管它们是否愿意，都不得不采取这种解决办法，因为走任何其他道路就等于立刻自杀。

庞大的帝国主义軍备計劃已經推动了一个不可挽回的走向战争的趋势。即使这种重整軍备的速度緩慢下来，也会促使資本主义經濟陷入一种比重整軍备所要避开的危机还要严重的危机。战略原料的大批堆积一定会引起物价的迅速下降。今天，每一个“和平的威胁”都已經在股票市場上引起价格的立即跌落。

自然，帝国主义者伪称他們武装自己仅仅是为了恢复均势。但是，整个历史証明——人們的常識也証实——人們武装自己从来不是为了維持和平而是为了进行战争。資产阶级的战争准备越成熟，它就越要改变国际商談的途径而把它的軍备力量計算在內。

任何征集签名、任何“和平人士”的集会都不能絕對阻止帝国主义伸出杀人的手。帝国主义已經决定和世界反帝国主义力量决一死战。这个为工人、殖民地人民和革命者所痛恨的战争，如果要爆发的話，是避免不了和阻止不了的，除非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資本主义制度。只有从資本家手里夺取制造杀人机器的工厂，粉碎为資产阶级軍队动員士兵的国家，劳动人民才能制止絕望的帝国主义者把劳动人民的解放希望淹沒在血泊之中的企图。

最近半世紀以来，資本主义一直掙扎在不断的痛苦中。資本家阶级拚命地防止本身不可避免的灭亡，为了这个目的，使用了仍在它支配中的巨大的財力。大批的暗杀、大规模的白色恐怖、整个民族和大陆的軍国主义化、最残忍的法西斯和軍事独裁，不断地发动世界战争——所有这些，最后分析起来，都不过是一个感觉到历史已經注定了它的灭亡的阶级为了保全自己而进行的斗争的各个步骤。資产阶级离开这个世界时正如它进入这个世界时一样，“每个毛孔里都渗透了血污”。

如果人类消极地接受腐朽的資本主义所造成的巨大变乱，整个世界就会墮入野蛮时代。但是，现代社会中有一个能够决定世

界命运的階級，一个已經在行动上証明了它的英勇和忠誠并准备为一个新社会而进行斗争的階級——这就是工人階級。

无产階級爭取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革命斗争，以前有过两个二十五年时期的間断并且局限在一个单一的国家里或者甚至在一个单一的城市里（1848年、1871年、1905年）。紧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斗争扩展到了沙皇帝国和中欧，但是除在俄国外，到处都遭到了失敗。因此，也是最后一次，在国际資产階級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似乎是非常强大的。

革命的规模更大了

今天，为消灭帝国主义和把世界导向社会主义的工人斗争与起义比以前的规模大得多了。整个亚洲、整个欧洲、英国以及拉丁美洲的和甚至非洲的某些国家都正在这些乱紛紛的斗争的冲击之下发展着，不論这些斗争是自发的、自觉的或者是有組織的。这些斗争的产生，是由于帝国主义把难以忍受的負担强加在各国人民身上，由于它不能滿足群众的基本需要以及由于它无力挫敗劳动人民的战斗精神。

从这些斗争中，将出现一个能够消灭資本主义的革命力量。人們沒有理由因为帝国主义威胁着要給人类带来巨大的破坏，而为世界命运悲伤失望。相反地，必須为无产階級斗争尽快地取得社会主义胜利而努力，以縮小資本主义制度正在为人类准备着的严酷的考驗。

帝国主义者正在准备战争，希望用武力粉碎它的敌人的力量。但是，当各地人民的力量正在使資产階級陷于困境的时候，战争将以推翻資本主义国家极不穩固的均势开始。

在全面战争爆发时，每一个地方，反对重整軍备、通貨膨胀和

破坏工人权利的斗争将会继续扩大。每一个地方，无产者和被压迫者都将公开地向资本主义剥削者挑战。

中国人民、在解放道路上的殖民地人民、甚至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尽管他们憎恨可恶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将顽强地保卫他们的革命成果，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复辟企图。

在拉丁美洲和近东，群众将利用他们的帝国主义统治者的削弱，相继站立起来挣脱掉身上的枷锁。

美国无产阶级，面临着本国历史上的最大的危机，将在战争冲击之下起而采取政治行动，并参加决定性的斗争以促使资产阶级在它的最后堡垒中灭亡。

因此，下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它本身的逻辑，将会是一个全球性的内战。华尔街将对之发动战争的亚洲革命高潮在这个战争中将扩展到五大洲。帝国主义准备粉碎起义人民，但是它将收获到世界革命作为它的罪行的惩罚。

为击败帝国主义而战斗，并不意味着为人们所想像的“克里姆林宫的胜利”，或者为人们所想像的“斯大林主义的扩张”和它的警察制度以及对一切无产阶级民主的破坏而战斗。苏联的官僚制度是一九二三年以后反革命在世界各地（除了苏联以外）胜利的附带产物。世界革命的发展将带来苏联官僚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结束，正如它将带来帝国主义的结束一样。

人类的最大考验

一个在像南斯拉夫那样小的国家里，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也证明与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制度的控制是不相容的。人们能够相信，千百万无产者在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之后，会愿意听命于克里姆林宫么？世界重要国家的无产阶级越快站起来反对资本

家和摆脱它的剥削者，帝国主义者就越快地减少对于苏联的威胁，苏联的工人也就会越快地和那个寄生的官僚机构清算一切，这个机构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掠夺了他们的胜利果实和他们在建设工作中的巨大努力的果实。

人类面临着决定性的考验。工人的资本主义敌人正在疯狂地准备武器，以使用他们的铁蹄来粉碎渴求自由的人民。一种日益加重的贫困、强制组织化和低下的生活标准的重担正落在各国工人的身上。千百万青年被赶出来为资本家作炮灰。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些自认为替工人阶级说话的組織，对于正在站起来维护它的面包和自由的无产阶级提出了一些什么建议呢？

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者的工会官僚机构重建了国际中心：所谓的法兰克福国际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这两个組織卑劣而公开地把自己拴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它们号召人民接受重整军备的全部负担，只是请求在社会的各阶级中间对于这个负担作一种“平等”的分配。

它们极力宣传的不是反对斯大林的罪恶而是反对苏联本身，反对共产主义工人的每一次罢工，把它说成是“政治性的”，反对殖民地奴隶的每一次起义，把它说成是“俄国帝国主义的扩张”，反对朝鲜、中国和越南的人民大众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

社会民主党的法兰克福国际的声明列举资本主义的矛盾，只是为了得出资本主义必须改善和加以监督和限制的结论。英国工党的领导以在议会里占绝对的多数执政，但它并没有利用这个特别有利的机会把英国这个工业国家变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堡垒。相反地，它努力挽救资本主义，防止**英帝国**的崩溃；并且投降于帝国主义，它正在积极参加准备战争以反对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社会民主党无论在那里参加政府，它们正如在英国一样，对

劳动群众实行资产阶级的掠夺政策并指导屠杀起义的殖民地人民。

斯大林主义者的党，在斯大林卑鄙地解散第三国际之后，重新集合成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看来好像是站在反对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前列。它们忘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列举许多关于美帝国主义进步和民主的证明，现在却愤怒地谴责它是主要的战争煽动者。但是，它们提出来的解决办法却不是推翻这个帝国主义而是和它订立一个新的同盟条约！

它们在很多国家里拥护的“和平政府”并不是一个工农政府而是一个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派联合在一起的政府。这是因为这一运动的指导者克里姆林宫的目的不是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只是和帝国主义成立一个有利的暂时协定。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主义者的党一再重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可能”，即使这种“共处”意味着给几亿热烈盼望结束一切剥削的被剥削者带来奴役。

斯大林主义和战争

尽管如此，在许多国家里仍然保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党，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把它们的政治活动限制在恭顺地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命令上。面对着强大的群众反抗运动，像中国和南斯拉夫的情形那样，它们可能在群众的压力之下看到自己不能不筹划一个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样，它们一定会为将来不可避免地同苏联官僚机构决裂准备余地。

斯大林主义者的党在最严重的革命危机当中可能经历的转变，也许使列宁主义先锋队不得不重新调整它对于这些党的战略。但是，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除无产阶级建立新的革命领导的任务。

今天在日程上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单独的国家在特殊的情况下筹划夺取政权的斗争问题，而是在一切国家里尽快地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斯大林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是胜利完成这一任务的最大的障碍。

諾斯克和謝德曼之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重建资产阶级祖国的名义，在中欧背叛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之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欧作了同样的背叛。但是，这些背叛的客观可能性，是为各个国家里孤立的革命运动的局限性，以及为站起来的人民群众缺少真正的革命经验所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建立新的革命领导证明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现在正在发展中的革命斗争将不停地从一个大陆扩大到另一个大陆。参加这些斗争的群众将取得从来没有过的新的经验。特别是在先进国家里边，这将减少破了产的旧领导操纵和背叛的可能性，并且将为建立新的革命领导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不断革命的时代将是第四国际的全盛时代。

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以外的一切中间派的组织，已确实证明不能在工人运动中间形成一种国际的流派，甚至不能准备出类似纲领的东西，也不能建立干部和维持真正的组织。只有第四国际坚决遵循着依靠无产阶级和贫苦大众的阶级斗争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

利用每一个危机

第四国际号召工人利用他们本国资本家阶级不能不遭遇到的每一个重大危机，依靠工人阶级民主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树立起他们的直接政权。

它号召被压迫的人民完成他们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它号召革命斗士到处深入真正的群众运动，参加他們的日常斗争，分担他們的遭遇，并向他們証明自己是最勇敢的战斗者、最优秀的組織者、最有觉悟的指导者和最有耐心的革命教育家。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现实必須与之相符合的理想，而是克服垂死的資本主义的矛盾现实的真正运动。革命者除了本階級的真正运动的利益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利益。他們超出于一切集团的或民族的狹隘利益之上，代表着无产階級的普遍利益，和对于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明确認識。

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聚集了来自二十六个不同国家的七十几名代表，他們有着在各大洲进行各种工人斗争的几十年經驗。大会向为自己階級利益而战斗的全世界工人致敬。工人們尽管思想意識和觉悟不同，然而他們組成了一個单一的反帝統一陣綫，这个陣綫将推翻資本主义的統治和建立起社会主义共和国世界联邦。

代表們热烈地向被关在帝国主义和斯大林監獄里的革命斗士以及一切被鎮压的工人階級的受害者致敬。胜利的无产階級不久将打开他們的牢門并給他們的看守者以应有的懲罰。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中国的无产階級、貧农和正在朝鮮同帝国主义战斗的他們的勇敢的儿子們致敬。中国革命第一次震动世界的胜利是 1917 年 10 月以来世界历史上的最重要的事件。第四国际号召一切国家的工人，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保卫受到帝国主义干涉威胁的中国革命。它号召中国工人繼續斗争，直到資产階級势力完全消灭，以工人和貧农民主选举出来的委员会为基础的真正无产階級专政建立起来。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英勇的朝鮮无产者致敬。尽管帝国主义向他們傾注大量的炮火炸弹，然而他們並沒有丧失解放和統

一国家的頑强意志。第四国际号召一切国家的工人給朝鮮的无产者以最大限度的物质和政治援助，直到最后一个帝国主义兵士离开这个受难的国家。

撤退帝国主义军队

第四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向越南、緬甸、馬來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革命战士們致敬。他們今天正战斗在世界反帝斗争的前列。英国、法国、美国和荷兰的无产阶级的最大責任是帮助和支持这些阶级弟兄的斗争，这是一个給国内资产阶级統治以极沉重打击的斗争。

第四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向印度、日本和錫兰的工业和农业工人致敬。他們已經建立起强有力的工会和本阶级的政治組織，并且正在试图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他們国家的领导权。只有工农政府才能和帝国主义割断最后的联系，才能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才能沒收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财产，并在这些国家里为真正的經濟上升創造必要的条件。

代表大会特別向第四国际的錫兰支部，錫兰平等社会党致敬。这个党将领导本国的群众推翻腐朽的资产阶级。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伊朗的工人和貧农致敬。他們通过强有力的革命动員已經迫使本国的资产阶级采取某些走向反帝斗争的步驟。

无条件地支持伊朗、埃及、伊拉克、北非的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石油与矿产公司的斗争！拥护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在“法兰西联邦”以外完全独立！拥护苏丹的完全独立！給埃及以苏伊士运河的全部主权！撤退一切帝国主义军队！建立中东国家的社会主义联邦！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非洲的黑种工人和貧农致敬。他們在过去几年中已經有了反帝斗争的觉醒。第四国际号召他們在各地建立自己的工会和本阶级的党，对帝国主义想把非洲大陆变成未来战争基地的一切企图展开斗争。

打倒“有色人种的差别待遇”和一切种族歧视！非洲人民在他們争取政治民主和摆脱外国帝国主义掠夺的目标上大团结万岁！

推翻资本主义专制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玻利维亚的无产阶级和它的勇敢的先锋队(革命工人党)——第四国际的玻利维亚支部——致敬。玻利维亚矿工們多少年来就在努力推翻矿产公司在他們国家实行的血腥专制统治。由于和他們一起取得了伟大的反帝统一战线共同經驗，革命工人党将能使他們了解到，只有依靠貧农的支持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获得这种解放。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和一切貧苦大众致敬。他們不想作充当美帝国主义工具的资产阶级和军事集团的走卒。在一切国家里建立起它的阶级組織并同这些国家里正在发展的真正群众运动結成一体的拉丁美洲工人阶级先锋队，将会知道怎样在它的綱領里把反帝、反资本主义以及民主和民族的要求結合起来，并且将会高举起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联邦的旗帜。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致敬。由于它在大战期間的英勇的斗争和由于它对于克里姆林宫的大胆的反抗，它已站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进军的最前列。今天，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人正在向帝国主义压力投降，并且正在危及到南斯拉夫工人以很多牺牲为代价赢得来的一切。代表大会号召一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在他們的党内建立一个列宁主义的反对

派,更換現在的機會主義領導,同在全世界發展中的革命力量聯合起來,并把他們的反抗克里姆林和反抗華爾街的策略建立在同這些力量緊密結合的基礎上。這些力量將會保衛無產階級的南斯拉夫來反對它的一切敵人。

進行獨立的階級戰鬥

第四國際世界代表大會向西歐的工人致敬。他們面對着資產階級的進攻,保持住了他們的一切階級陣地,並且甚至已經開始轉入反攻。為反對降低生活標準、反對損害工人權利、反對備戰而鬥爭,必須由下而上建立起一切工人組織的統一戰綫,必須利用每一個為改善生活條件而鬥爭的高潮提出政權問題——建立工农政府問題。

代表大會特別向站在本階級的前列進行鬥爭的法國、意大利和希臘的共產主義工人致意,並對他們堅決抵抗資產階級的反共運動表示敬意。第四國際的鬥士將和他們并肩作戰,反對大西洋公約,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保衛蘇聯、“人民民主國家”和中國。這樣就可以揭露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對托洛茨基主義進行譴責的誹謗性質,而共產主義工人也將從自己的經驗中知道,只有第四國際的綱領才能對共同敵人進行有效的鬥爭。

第四國際世界代表大會向德國的工人致敬。他們正在克服1933年的失敗、納粹專政、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經濟的繼續衰退所加在他們身上的可怕的考驗的後果。今天,德國的無產階級已經重新組成為強有力的工會組織。如資產階級自己所承認的,這些組織能夠致波恩政府於死命,但是它們遭到了外國的占領和本國的分裂。德國的無產階級正在周密地考慮獨立的階級戰鬥所要採取的步驟。歐洲的整個將來可能決定於這些戰鬥行動的發展。

通过反对本国资产阶级重整军备，要求撤退一切占领军，要求由统一的、自由的和民主的工人委员会组成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斗争，德国工人能够对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建立作出有力的贡献。这是阻止旧大陆解体与衰落并保证它有一个新的复兴的唯一手段。

第四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向西班牙的工人致敬。他们用今春的伟大罢工高潮表明他们正在开始克服内战失败的后果。同西班牙无产阶级彻底团结起来！打倒刽子手佛朗哥！一切国家的工人，阻止你们的政府延长西班牙人民在佛朗哥独裁政权下的苦难！推翻佛朗哥，坚决走工农政府道路，走新的西班牙革命道路的工农联盟万岁！

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英国的工人致敬。他们今天正在他们的全欧洲最强大的阶级组织中，准备着进入一个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新阶段，为工人管理生产和反对帝国主义重整军备而斗争。英国的工人们，要认识到你们的巨大能力！站在使欧洲摆脱资本家控制的斗争的前列！把你们国家的强大工业潜力变成为同正在从帝国主义手里解放自己的殖民地人民结成自由同盟的堡垒。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证明，怎样可以建立起一个既没有官僚统治也没有特权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

第四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向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的工人致敬。他们正在他们的群众组织中猛烈地反抗资本家的压力，并且正在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共歇斯底里，维护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工会权利。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农

民和士兵致敬。代表大会保証，在未来的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复辟的斗争中，他们将得到全世界的革命运动的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支持。保卫集体财产、计划经济和保卫工人国家(即使已经变形和蜕化)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项紧急任务。

同时，第四国际坚决支持一切反对苏联官僚制度的警察专政的无产阶级运动，并为在这些国家里建立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党而斗争。这样的党将领导必要的政治革命以使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受官僚制度的束缚。反对帝国主义，保卫苏联和保卫“人民民主国家”万岁！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乌克兰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打倒斯大林主义专政！苏维埃民主万岁！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向美国的一千六百万有组织的工人——世界最大的和最有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先锋——致敬。向社会主义工人党致敬，这个党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堡垒中反对一切压迫，维持着列宁主义的纲领和组织。美帝国主义向统治世界进军所引起的世界性破坏行为，不久将会开始在它自己国内摧毁美帝国主义的统治。那将是美国革命到来的时刻，这个革命将解放出无限的创造力量并在这整个地球向社会主义转变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宣布它自己是世界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在本阶级的队伍中为它的革命纲领而战斗。在未来的动乱的年月里，它将取得这个运动的领导权，指导勤劳的人类努力建成一个没有阶级的、没有任何剥削或压迫的社会——一个实现普遍和平和实行以需要为

基础的經濟保證人人富裕的社会，一个使全人类都能享受到文明福利的社会。代表大会号召一切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为这个伟大目标而斗争。

打倒帝国主义和它正在准备的杀人战争！

共同努力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五、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

第四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

(1954年)

1917年以来苏联和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基本上决定于世界规模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作用。这个发展已经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1917—1923年的革命高潮、1923—1943年的世界革命的低潮和1943年以来的新的革命高潮。

十月革命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

——它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工人国家。

——它在理论方面推动了一部分工人运动并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建立而有利于这个运动的独立组织工作。

——它给予殖民地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初期斗争以巨大的推动力。

1917到1923年这一时期首先是一个为争取这个新国家的生存、为争取在全世界建立和巩固共产主义先锋队而斗争的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革命的失败在苏联造成的结果是苏维埃民主遭到了一种建立起独裁政权的官僚制度的破坏。苏联的经济和文化，在过去三十年中，就是在这个政权之下发展的。通过这个国家的活动和压力，苏联官僚制度对于全世界的群众运动，首先是对于那些由于受到俄国革命的推动而产生的组织和运动，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本来应该使它们的活动适合这个新阶

段，也就是說，本來應該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巩固自己，加強和群眾的聯繫并借此為將來的革命高潮作好準備。但是，第一個工人國家和它的墮落的官僚機構對於剛脫離社會民主黨而還沒有可靠幹部的各個組織的壓力，導致了這些組織的墮落。共產國際成了把克里姆林宮的命令傳達給各國共產黨的主要工具。因此，這些黨的政治的和理論的發展就越出了常軌，在選擇幹部和中央機構時，也採取了官僚主義的方式。這些黨利用群眾和群眾運動，不是為了促進世界革命而是為了官僚機構的利益。

這種利用各國共產黨為克里姆林宮的外交服務的做法，有助於造成工人運動一系列慘重的失敗，最後促成納粹主義在德國的勝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內部的少數派。斯大林主義、即使世界無產階級利益從屬於蘇維埃官僚制度利益的運動，是通過一個比較簡單的體系起作用的：

——一個實行警察專政的工人國家；

——在本身受到嚴密控制的共產國際指導下的軟弱的工人組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和戰後幾年里，一些十分重要的事件產生了一種情況，那就是在現在的斯大林主義軌道以內集合了以下這樣一個複雜的集體：

1. **蘇聯。**這個國家依靠十月革命建立起來的生產關係的力量和群眾對於這些關係的愛護，於戰爭期間進行了特別出色的抵抗。其後，它又繼續取得了經濟發展，因而事實上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個工業強國；

2. **東歐的新的工人國家。**這些國家基本上是靠官僚主

义行动建立起来的,克里姆林宮事前并没有计划;

3. **中国**。在那里,中国共产党在势如燎原的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取得了政权;

4. 在斯大林主义者或亲斯大林主义者领导下的一系列的殖民地运动;

5. **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西欧的这些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时,由于“抵抗运动”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在以后几年里,共产党又失去了它们在一系列国家里已经赢得的地盘;但是在重要的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党具有左右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力量,并且尽管局势有某些变动,以后仍然一直保有这种力量;

6. 1948年6月以前的**南斯拉夫**也可以列入此类。南斯拉夫共产党依靠它曾经领导的英勇的群众斗争取得了政权。使苏联官僚机构和它对于各国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得到发展的根本条件,即革命的低潮、苏联的孤立和它的经济的落后状态——这些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保证这种控制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在同一时期以它自己的方式反映了全世界相对的平衡——已经遭到了破坏。

斯大林主义的“扩张”不但远不能构成一个巩固的因素,而且其中还含有造成本身解体的趋势;这些趋势从下列事实得到了证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脱离;“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员中的多次清洗;承认与中国共产党对于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共同领导;实际上几乎等于消灭的某些共产党的削弱;苏联国内政治不复稳定和在周围防垒中开始发生革命骚动。

这种新形势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克里姆林宮不能重建一

个能以任何方式維持下去的国际中心,以代替 1943 年解散的共产国际。

最后,尽管有群众性的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苏联作为一个强国的吸引力的增加,群众在此战后期間仍然形成了大批向斯大林主义势力范围以外的左派(比万主义、亚洲社会党……)发展的趋势。

但是,各种因素仍在发生作用,使克里姆林宫仍有支配世界工人运动和非資本主义国家的能力。这些因素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苏維埃国家对于实力較弱的伙伴的控制;群众利用他們所掌握的組織来解决革命形势所提出的問題,因而首先集合在现有领导周围这一事实。最后还有,在斯大林主义兴起期間所获得的概念和方法由于惰性和传统而继续发生作用,尤其是因为这些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以及它們与苏联的关系一直存在下来,所以更是如此。

除南斯拉夫外,在共产党拥有群众基础的任何地方都沒有产生群众与克里姆林宫决裂的现象;同样地,在这些党的内部也沒有任何群众性分裂的现象。斯大林主义的解体最初采取的形式是一种与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的利益对立的想入渗透到这些組織中去,以及以前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等級关系逐渐发生了改变。斯大林主义的解体在整个时期內将首先并特別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具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組織将继续存在,但是在这些組織形式的内部,无论关于它們所表达的思想或者关于代表苏联官僚机构紧密控制的现存的組織关系,都将有向新内容发展的趋势。

在共产党构成工人运动中一个人数不多的少数派的国家里,革命高潮由于沿着其他組織的道路发展而使这些共产党更加陷于孤立,从而引起它們内部的深刻危机。

斯大林逝世以后在苏联出现的事件一方面使苏联发生政治革命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开始成熟。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也使人们以最保守、甚至最反动的方式对某些组织施加的压制得到了缓和。这些组织今天即使在共产党最没有力量的许多国家里也仍然在把大多数的革命战士团结在一起。结果，这就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共产党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从而在上述的意义上加速斯大林主义的解体。

第四国际是为保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组织的继续以便为无产阶级建立一个新的革命领导而创建的。它负有任务插手于这个解体工作，把到现在为止为斯大林主义所影响的健全的共产主义力量团结在它的旗帜之下。

I 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兴起和衰落

1. 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革命浪潮只是动摇了最没有力量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并没有波及到那些殖民帝国，因而容许那些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靠着对群众作重要的让步（八小时工作制、普选权等等），把革命运动高潮在它刚掀起的时候就加以扑灭。在这个革命浪潮发生时，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急剧经济发展的美国还没有经历过一次深刻的社会危机，足以使美国的不断地从移民群得到补充的工业无产阶级群众具有工会的或政治的觉悟。因此，革命浪潮起作用的范围就只限于中欧和东欧，基本上只限于世界大国中间的俄国、德国和意大利。但是，俄国是一个经济上和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它的工业无产阶级不但人数很少，而且技术和文化的水平也比较低，所以这个国家总是被几千万不识字的农民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俄国的革命和德国与意大利的革命融合为一，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一种足以保证苏维埃民主的物

质的和社会的广阔基础。1922年意大利革命的失败和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标志着革命浪潮的结束，使革命被孤立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这种孤立使俄国无产阶级遭受到重大的物质牺牲，导致它的战斗潜力和战斗热情的逐渐消竭而使它越来越抛弃政治活动和政治兴趣。这样就为它的受到苏维埃官僚制度的政治掠夺创造了客观条件。

2. 尽管如此，1917—1923年的革命浪潮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广的长期的失败。世界无产阶级中在1918—1923年革命高潮期间一直比较平静的那些部分，开始在以后几十年里相继活动起来：英国在1925—1926年；中国在1925—1927年；西班牙在1931—1938年；法国在1936—1938年；美国在1934—1937年。在德国本身，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为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果最后，尽管有这许多机会而革命仍日趋衰落，其原因并不在于群众运动所固有的动力，而在于工人的领导人所起的有害作用。在许多场合下，特别是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招致了这些运动的失败。如果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和兴起归根到底决定于世界革命衰落的加甚，那么这种发展就既不是致命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和全世界革命力量（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为扭转这种趋势和靠着工业化和在世界规模上取得的胜利（即使是部分的胜利）以加强苏联无产阶级力量的努力，随着这些事件的成为过去，都已经被证明是完全现实的。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合在这整个时期一直是可能的。如果这种联合没有实现，那首先就是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所起的作用。斯大林主义是1923—1943年这一整个时期的革命低潮的结果，同样也是它的原因。

3. 革命孤立在一个落后国家中，农民占压倒优势的比重，无

产阶级人数不多和文化水平低，以及它缺少民主传统——所有这些因素使苏联的无产阶级民主软弱无力，群众日益消极，政权越来越完全为党和国家的官吏所掌握。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间，这样一群官吏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在人数上和重要性上应该减少，使社会和社会主义革命后的经济得到巩固，使阶级、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矛盾归于消灭。这种消灭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的消亡是一致的。在这种消亡实现以前，应该由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当权的工人阶级对这些官吏实行严格的监督以尽量限制他们滥用职权。在苏联发生的情况是完全与此不同的。在普遍匮乏和贫困的情形下，管理和分配全国财富的政权很快地成了分配的节制者，把重要的消费特权霸为己有。官僚主义分子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特殊的和保守的官僚阶层，与剥削分子或小资产阶级分子(富农、新经济政策下的商人等等)联合起来，维护与无产阶级利益相反的物质利益。以后，他们又组织成为一个意识到自己享有特殊社会利益并决心在任何其他社会阶层面前维护这些利益的官僚阶级。这个官僚阶级的建立和巩固主要反映在政治领域内，反映在使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国家唯一的进行政治斗争的场所——分裂的派系斗争中。斯大林主义派在这个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因为它得到了官僚机构的支持。这个胜利终于破坏了党内民主——苏联无产阶级民主的最后堡垒，完全推翻了这个国家除了所有权关系以外的社会上层建筑，并且建立了基本上以苏联官僚机构的利益和从根本上对这些利益的维护为基础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拿破崙式独裁政权。

4. 革命高潮最明显地表现在十月革命的胜利上。革命低潮基本表现在苏联的苏维埃官僚制度的胜利上。但是这种低潮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极端衰落的体制之内发生的。资本主义制

度已經十分衰落，在这个衰落基础之上的帝国主义者的对立十分尖锐，世界规模的工人运动仍然十分强大，以前俄国有产阶级的微不足道的残余或者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核心在苏联本国还十分脆弱，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低潮还不能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反革命活动大体上仅限于上层建筑的范围。以生产资料国有化为特点的生产方式、对外贸易垄断、全面的经济计划——由十月革命产生的使苏联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离并与之相对立的这一基础，在苏联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了维护、加强和巩固。按照列宁的公式被认为是过渡时期特点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在苏联国内从生产领域——这里实际上消灭了一切资本主义形式——进入了分配领域。因此，苏维埃官僚制度的拿破崙式独裁是**政治反革命**的产物；要推翻它就必須进行一次**政治革命**。但是，苏维埃国家是十月**社会革命**的产物，它在继续保卫（虽然是以一种特殊的和常常不恰当的方式）这个革命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成果。除非由**社会的反革命**重新建立起（即使仅仅是逐步地）资本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统治，这个国家是推翻不了的。我們說苏联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这个說法包括现代苏联社会现实的两个根本因素：一方面是从十月革命产生的社会基础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是建立在同样基础之上的一种政治反革命的胜利。我們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方针与这种矛盾的苏联现实是相符合的：通过推翻官僚独裁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苏联的**发展**；防止苏联的**失败**，以免它的社会基础被推翻和重新建立起资本主义。

5. 在这同一的苏联现实的体制的内部出现了一种矛盾的性质，即**苏联官僚机构的两重性**：

(1) 一方面，这是一个从苏联的特殊社会结构取得其特权的寄生阶级。因此，为了存在下去，它就不能不以自己的方式保卫这

一结构,反对企图破坏这一结构并重新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国内和国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力量。

(2) 另一方面,这个寄生阶级除非剥夺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依靠无产阶级政治上的消极态度和它的缺乏革命远见,否则就不能扩张它的特权和使它们暂时保持稳定。因此,官僚机构就不能不违背无产阶级的意愿,力图维持那种足以防止苏联无产阶级的新革命高潮和新革命活动的国内和国际形势。

苏联官僚机构的矛盾性质同样反映在下面的事实上:只要它能保卫苏联及其社会基础以抵抗帝国主义和各种复辟势力的进攻,它就明确地帮助苏维埃民主在国内的复活;相反地,只要它能暂时遏制苏联无产阶级或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潮,它就明确地破坏或瓦解它自己的特权所由产生的社会基础。

6. 1923 年以来,苏联官僚机构的这种两重的和矛盾的性质一直反映在它的整个国内的和世界的方针上。但是,这种两重性表现自己的**具体方式**基本上决定于苏联官僚机构所不能控制的情况:全世界的和苏联国内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这一点来看可以分成两个主要阶段:

(1) 从 1923 到 1943 年: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危机和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严重化有关的革命和工人运动在国际范围内的撤退,容许苏联官僚机构在国际革命运动和帝国主义之间、在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苏联国内各阶级之间**保持平衡**,以巩固它的权势。苏联的拿破崙式独裁就是这些平衡的产物。苏联官僚机构的方针所追求的目的是维持现状,保持平衡。在这种意义上,苏联官僚机构的国际方针的一篇全球的总账是改良主义的,因为这个官僚机构的目的是不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只是在保持现状的框框里维持苏联。

(2) 从 1943 年开始,与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加剧和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确立了它的压倒优势有关的新的革命高潮,破坏了国际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平衡。这些因素迫使这些国家——无论它们是否愿意——参加一个世界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来同革命和反资本主义力量相对抗,并且使每一种骑墙的和维持现状的方针越来越成为不现实的。斯大林主义者军事独裁的平衡基础的崩溃,也破坏了苏联官僚独裁的基础本身。同时,苏联生产力的高涨、无产阶级在人数上和文化上的增强以及国际革命浪潮在这个国家内的反响,也破坏了这个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平衡(以它们的政治上的软弱性为基础),并且正在为无产阶级重新争取苏维埃民主的斗争预作准备。

7. 从 1923 到 1943 年期间,苏联官僚机构的两重的和矛盾的性质在国内外表现在一些突然的转变上:

(1) 1924—1927 年: 苏联官僚机构与富农和新经济政策下的商人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国际上,采取右倾路线,与蒋介石、英国工会官僚、巴尔干各农民党等实行无原则的联合。

(2) 1928—1934 年: 消灭富农和商人;实行强迫的农业集体化和冒进的工业化。同时,摧残工人残存的从十月革命得来的权利,给每一个企业的经理以无限的权限,加速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平等现象的发展。国际上,在帝国主义由于经济危机而遭到削弱和陷于瘫痪时,采取极端左倾的路线。

(3) 1935—1939 年: 在苏联国内采取右倾路线,恢复农民的一部分牲畜和小块土地的私有权;废除旧苏联宪法;消灭整个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反动势力在道德、文化等领域内取得胜利并一般地鼓励了新兴资产阶级倾向。同时,国际上也采取右倾的路线:和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联合,承认这些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的国

防；实行人民陣綫政策；压制西班牙和法国的革命。

(4) 1939—1941年：在苏联作战争准备，包括停止大规模清洗在內，并巩固个人在官僚机构中的地位。在国际上，由于对外联合的突然改变方向，斯大林主义者领导的各国共产党采取了极端左傾的路綫。

(5) 1941—1943年：战争期間采取右傾路綫。在國內：以“伟大卫国战争”相号召，优待农民，准許大批集体农庄土地为私人占用，解散共产国际，恢复教会作为宣传国家政策的工具，进行大斯拉夫主义的宣传，等等。在国外：和帝国主义紧密联合，采取民族陣綫的方針，反对殖民地要求解放的起义，反对保卫盟国工人的經濟利益，等等。

8. 从1943到1947年期間，苏联官僚机构的权势似乎达到了頂点。这一期間看来是世界革命低潮和新的低潮中間的过渡时期。为了同一理由，它也是斯大林主义兴起时期和衰落时期中間的过渡阶段。世界革命高潮的力量还不足以战胜斯大林主义；一般說来，它还被限制在官僚机构及其代理人能够通过若干传统的方法对它加以控制的范围以內(法国、意大利、印度支那、馬來亚，以及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一部分)；唯一的例外是南斯拉夫。但是，这个革命浪潮却足以威胁帝国主义，使它力求和苏联官僚机构訂立一个临时协定。后者着手阻止或試图压制革命以換取領土上的和經濟上的让步。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协定，德国的被肢解和欧洲的被分成为两个势力范围，同一时期的西欧共产党和远东殖民地国家的采取反革命方針，在东欧对资产阶級残余的維持，美国將軍馬歇尔和斯大林使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共同努力——所有这些事項的用意就在于此。促成这同一趋势的是：苏联的國內形势，战争的可怕破坏，消費品的极端缺乏，1945到1947

年在恢复战前生活时遭到的經濟危机，官僚机构为了在某种程度上緩和这种形势对于緩冲国家的掠夺。

9. 但是，国际革命浪潮、尤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破坏了苏联官僚机构与帝国主义达成全面妥协的可能性。帝国主义被窒息在过于狹窄因而不能滿足其需要的生活空間以內，遭到了一个可怕的經濟震动的威胁。它以前企图依靠在西欧恢复資本主义經濟而轉入攻势，借以減輕苏联对于緩冲地带的紧密控制(馬歇尔計劃)。在此以后，帝国主义受到了殖民地革命的包围，轉而采取了武力行动(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馬來亚和朝鮮等地的战争)，并开始准备和一切反資本主义力量作最后的清算(大西洋公約、共同安全条約、巴尔干公約、中东公約、太平洋公約、重新武装日本和德国等等……)。苏联官僚机构因处在帝国主义威胁和中国革命之間，看到自己不能不与从这次革命中出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意味着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承认中苏两国共同领导亚洲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这就标志着苏联官僚机构所处的世界形势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种形势的特点是国际間阶级矛盾加剧和阶级力量的对比以越来越有利于革命的方式向前发展。这种新形势日益限制苏联官僚机构玩弄反革命花招的可能性。苏联官僚机构不再能利用整个殖民地革命作为找付的零錢以換取和帝国主义达成全面的協議。它将繼續努力利用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正如它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印度、阿根廷、印度尼西亚)阻止群众反資本主义的斗争，企图在这些国家动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內的一切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从而繼續努力取得这些国家某些资产阶级的支持一样。这个官僚机构还将繼續努力和帝国主义达成暫时的和局部的协定，并繼續努力起一种阻碍殖民地革命发展的作用(在朝鮮战争期

間援助不力)。但是，这些努力的**实际效果**将随着一方面群众（尽管想对他们加以压制）革命高潮另一方面是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走向战争的程度的加深而越来越有限和不能持久。

10. 同时在苏联国内也引起了一种同样的发展。

从 1945 到 1947 年的经济复原的危机（这一危机已为马林科夫对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所确认）以来，苏联经济的重大成就已经大大改变了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地位。如果说在主要产品的生产方面按人口计算仍然落后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却已经超过了如法国和意大利这样一些生产陷于停滞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另一方面，总生产量大大地超过了美国以外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并且在一些主要产品方面甚至于超过了两个或三个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德国、日本的**加在一起的**产量。苏联已经成了世界上的第二个工业强国，第二个拥有最多机器的国家，并且正在以除了美国以外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快的速度提高它的生产率。如果说苏联的农业还没有能够以同样的速度发展并且还落后很多，它的进步依然足以消灭任何饥荒或长期营养不足的现象。对于大工业中心的人口，工业消费品的供应虽然还很充分，但已经正常化并且超过了以前苏联任何时期的供应情况。

11. 由于这些经济发展，正在发生一种重要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这个国家的主要社会阶层的组成和力量的改变上。

(1) **无产阶级**在人数上和技术上已大为增强，产业工人的数目以每一个五年计划几百万人的比率在增加着。它已经从 1917 和 1927 年的苏联社会上的少数变成为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文盲已经从它的队伍中绝迹。过去七年来的苏联经济的惊人的机械化，使熟练工人的人数和作用有了很大的发展。粗工不再是苏联

工人的典型，而是逐漸變成例外。因為這一點，無產階級中間的收入差別雖然比過去為大，但不致再把大多數工人階級壓到飢餓的水平。

(2) 最受到打擊的是**農民**。每年都從它的隊伍中抽調工業的補充勞動力。這個階層的人數和社會重要性不斷地趨向於減低。它的上層繼續被調走並被轉化為集體農莊的官僚和貴族(經理、會計、農學家、拖拉機手)。農民沒有能夠恢復他們在戰爭期間和戰後不久取得的比較有利的地位。勞動生產隊制度的採用和集體農莊的擴大標誌着沿農業逐步工業化的路線前進的重要步驟，但是它們遇到了農民的消極抵抗，沒有能做到真正提高農業生產。農村生活水平的提高遠不如城市，農業和工業之間的不平衡逐漸在增加。

(3) **官僚**在人數上和重要性上也有所增加，但不如無產階級增加得快。在官僚上層集團的構成上發生了兩種重要的變化。首先是關於社會出身，以前的資本家或資產階級專家和商人的數目，以及 1917 年以前革命團體的老革命戰士(熱月黨人^①)的人數，已經越來越減少，大批的官僚是從革命以後成長的享有特權的那些人當中得到補充的。其次，在他們的心理狀態方面：官僚機構的上層人物大多數不再是一個年輕的貪婪的社會階層，想要在普遍的貧困當中在消費的領域內**取得特權**；他們大多數屬於達到成熟年齡或者進入老年的人所構成的那個階層，想要**保持**盡量高的生活水平。

12. 雖然蘇聯拿破崙式獨裁的興起和鞏固是**政治反革命**的產物，然而官僚機構已經在蘇聯社會各方面的社會生活上蓋上了它

^① 原指法國共和二年(1794年)熱月推翻雅各賓專政的反革命的大資產階級代表，這裡系借用。——譯者

的特殊烙印。

(1) **經濟**: 过渡时期整个經濟的特点是非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残存的資產階級分配标准之間的矛盾。但是苏联官僚机构由于大大发展了它的特权和社会的不平等而加深了这个矛盾。官僚机构在計劃方面实行中央集权,取消工人对生产的一切监督,工厂官僚享有无限权力,作事专断,渴望获得特权——所有这些在生产領域內引起了新的矛盾和新的不平衡。这些矛盾和不平衡随着經濟取得重要发展的程度而日益加甚。

(2) **政治**: 苏維埃民主的最后痕迹的消灭和党内民主的絕迹,事实上造成了一个独裁的政权。在这个政权下,大部分官僚本身,包括上层集团在內,也无法行使他們的政治权利。軍事独裁基本上建立在鎮压机构和按时清洗的恐怖手段之上,而且另外还控制着一种公民投票的“选举”制度。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盛行一时,对于肯定自己历史和自己权利的少数民族則斥之为“資產階級民族主义”。

(3) **軍隊**: 曾經宣誓效忠于苏維埃宪法和共产国际的旧日紅軍已經为独裁政权严密控制的“爱国的”苏联軍隊所代替,而在这个軍隊中也看到了在整个社会上盛行的同样巨大的不平等、专断和官僚机构的无限权力。

(4) **意識形态**: 馬克思主义学說已經变成一种实用主义的理論,以符合官僚机构政策的实际要求。对党、国际和国家的历史不断地作有計劃的修正、改写和歪曲。科学研究和自由的学术討論在一切社会科学領域內都遭到压制,甚至在某些自然科学領域內也正在开始“决定方向”。由于这种压制,就有必要产生一个永无錯誤的无所不知的教主,在每次改变政策时提出符合于官僚机构当时利益的教义。

(5) **道德**：在十月革命占优势的年代里曾經实行的妇女解放和青年解放已被推翻。妇女平等成了使用从工人身上榨取来的超人体力劳动的平等，而不是一种自由安排她們自己生活的权利。离婚法规定得越来越严格，堕胎权已被取消。青年組織的章程特別郑重其事地规定青年不得参加政治。

13. 但是，苏联群众在战争期間吸取了巨大的經驗（他們同时看到了官僚机构能把他們压制到什么程度和西方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如何）。苏联群众、尤其是先进的工人階級青年，开始越来越認識到苏联社会和拿破崙式独裁制度中所包含的矛盾。他們特別注意到經濟矛盾，因為他們在这方面投入了他們的一切力量和創造性劳动而更是如此。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开会以前、开会期間和开会以后所进行的討論，揭露了下列事实：

(1) 大多数苏联人民认为：苏联取得的巨大經濟力量与仍然很低的群众消費水平越来越有更大的矛盾。房荒的危机尤其是这些群众感到无法解释的，这个問題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期間受到了普遍的批評。

(2) 工人階級的先进阶层——党和工会工作者的下层——认为苏联官僚机构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障碍。官僚机构上层集团在为他們自己取得了高級消費特权以后，就不大对生产的最大发展感到兴趣。企业經理人的貪利欲望曾經被认为是积累資金的主要动力，而现在則变成了限制和妨碍这种积累的因素。指标完成的情况主要决定于这些官僚阶层的兴趣，只要这种情形繼續存在，这些阶层将給計劃加上另外一种破坏的力量（牺牲生产計劃来优先完成財政計劃）。官僚机构在制定計劃上的集权与日益复杂的經濟发生冲突。

14. 在意識形态領域內，**官僚独裁的矛盾**終於成为严重的理

論上的危机,这不仅反映在政治經濟学的討論上,而且也反映在圍繞着“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其他一些意識形态問題的討論上。

(1) 克里姆林宮的統治阶层已經被迫同时既承认階級在苏联的消灭,又承认階級斗争的存在和甚至于尖銳化。

(2) 他們被迫強調,随着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程度,社会矛盾不是消灭而是加深。

(3) 他們被迫同时既坚持国家不但远不能消亡,而且随着向共产主义过渡会“更为加强”,又主张随着“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主要国家里取得胜利”,国家将以消亡而告結束。

(4) 他們被迫同时既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法則”是滿足人民的需要,又承认繼續支配这个社会的經濟的是“生产資料的生产优先于消費資料的生产”。

(5) 他們不得不同同时既把个人致富的傾向說成是苏联社会中主要的“資產階級思想的残余”,又保持这个同样的傾向作为实现計劃的主要手段。

15. 这样,苏联拿破崙式独裁在历史上的不穩固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随着国际规模的階級力量对比的变化,随着同时发生的苏联国内力量对比的变化,独裁政权的客观基础正在迅速消失的过程中。从傳統上看,苏联拿破崙式独裁的历史上的过渡和暫时的性质在下述意义上得到了正确的分析,即这个独裁政权能够把社会发展引向两条相反的道路:或者是在农民和官僚机构内部重新加强复辟主义派系,这样它們就会靠着帝国主义的帮助,用內战方式在苏联恢复資本主义;或者是靠着世界革命的发展以及世界无产階級給与苏联无产階級和官僚机构左派的帮助(这个左派将和无产階級联合起来保卫苏联的社会基础),推翻拿破崙式独裁,重新建立苏維埃民主。但是这二者必居其一的不同变化显然意味着

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力量的特殊变动。第一种变化的出现是世界革命撤退的最后结果，第二种变化的出现是革命在国际范围内胜利的结果。现在的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力量的变动很清楚地指出哪一种变化更有可能发生。苏联整个国内形势的发展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苏联，面对着生产力的高涨，曾经存在和不断复活的小规模的小商品生产单位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将只是占极小的比重。社会矛盾的加深、帝国主义压力的加大和无产阶级觉醒的迹象，可能在官僚机构的极为有限的阶层中引起逃往和投降资产阶级阵营的反映；但这不过是这种发展的附带结果而不是它的主要特点。因此结果是：因为在苏联本国力量对比的变化趋向于对工人阶级有利，而同时在世界规模上也发生一种类似的变化，所以未来的决战将不是发动进攻以恢复私有制的复辟力量和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力量之间的决战。相反地，它将是保护官僚特权和官僚机构的力量对于从事斗争以求在更高标准上恢复苏维埃民主的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进攻实行反抗的作战。

16. 斯大林的死亡加深了上述一切趋势，并且给了这些趋势以直接的和引人注目的表现。这可以从斯大林在苏联所起的特殊作用上来说明。斯大林是各阶级之间的调停人，是各阶级与官僚机构之间的调停人，是官僚机构各阶层之间的调停人。他本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基础和它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之间的桥梁。他是经济官僚和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保证，保证他们一定能够继续享有特权；同时他也是官僚机构下层（党和工会的次要人员、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后起的青年干部）的一个主要保证，保证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不遭到破坏。他的突然死亡使这个政权失掉了一个主要的稳定因素，尤其是因为社会力量的平衡在此以前已经逐渐发生了动摇。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即拿破崙式独裁的上层人物感到

疑虑和不安。这些人习惯于遵循“领袖”规定的路线，在群众中没有个人威信，不能预测出斯大林的死亡对于苏联社会各阶层的态度会发生什么影响。这种上层集团的疑虑和甚至于恐惧无疑地加深了正在向独裁政权的专制主义挑战的趋势。

17. 苏联官僚机构并不是一个性质单纯的社会阶层。它包括来自工人阶级(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和农民(集体农庄职员)的几百万人；这些人从政府和经济机构(检查员)的次要职员上升为上层专家和工程师、有名的艺术家和作家、高级军官和警官，一路升迁为经济机构(大工厂和托辣斯的经理)、军队(将军和元帅)、国家和党(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和苏联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各共和国和苏联的部长、国家和党的中央行政机关的成员)的头面人物。最保守同时也是最享有特权的集团无疑地是工厂和中央经济机关的领导人阶层，此外，计划部门的总工程师和重要专家以及军队里的将军和元帅也属于此类。

18. 和官僚机构最享有特权的头面人物成为对照的，是**官僚机构的实行拿破崙式独裁的极峰人物**。这些人已经掌握政权二十多年，成为军事独裁政权的化身并代表着党和国家上层之间的私人联系。这一阶层受斯大林死亡的打击最甚，在全体人民不满的声势之前起了恐慌，主动采取戏剧性的措施使这个政权“自由化”(实行大赦、宣布修改刑法、释放医生、攻击警察专横和民族种族歧视，清洗国家政治保卫局并对之进行攻击，把对领袖的崇拜推向不重要的地位，苏联报刊采取一种新的论调，修改五年计划以增加消费资料生产的比重)。

这些措施所追求的目的如下：

(1) 向广大的官僚机构的各部分保证反对专断的清洗，使它们更直接地参加行使权力，借此**在一个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起独**

裁政权。

(2) 采取全体人民欢迎的措施，答应恢复比较安逸的和不太痛苦的生活条件，暗中推翻斯大林时代的最残忍的恐怖局面，在人民不满的三个主要问题上——低下的消费水平、警察制度和民族压迫——表示让步，借此**在一个更得民心的基础上**建立起独裁政权。

从历史上看，馬林科夫政权这样就预示着**拿破崙式独裁的开始衰落**。这个政权的“自由化”和它的加紧控制只不过是官僚机构交替使用的两种自卫手段。这个官僚机构认识到它的权力和特权遭到威胁，将无论如何试图使用它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在苏联群众的反对高潮面前保卫自己。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注定灭亡的独夫无论用两种手段的任何一种或者是两种并用都不能挽救自己。苏联的拿破崙式独裁的灭亡已为历史所注定。群众将用他们的政治革命粉碎这个政权并消灭官僚机构的权力和特权。

19. 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最初的迹象表明无产阶级能够在斯大林死亡所造成的新情况下进而采取有组织的行动（沃尔庫塔罢工）。这是不足为奇的。二十多年以来，警察恐怖已经在政治上粉碎了无产阶级和消灭了它的先进骨干。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革命的发展应该在苏联的工人中间重新唤起旧日的希望，但是直到斯大林死去为止的顽固的独裁不准许他们直接表示这样的意见。最多也只能在党、工会和青年组织的下层小职员中间看到他们的心事、要求和希望的一些间接的表示。馬林科夫宣布这个政权“自由化”，也不能产生有利于工人采取政治行动的直接效果。**但是从现在起，苏联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子力量将开始发挥作用**。在工厂和工会里，现在正给予他们的力量以考验的机会，这些考验无疑地将从技术问题的讨论开始，工人阶级可以借此加

强对自己力量的認識和信任而不必和拿破崙式独裁直接发生冲突。为了应付这种威胁，已經削弱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新政权就不能不更多地依靠大概帮助过清除貝利亚的军队。同时，在党内，特别是在青年中，正在发展起一种批評精神，对于斯大林时代的理論“遺產”发生怀疑，大胆地对政治問題提出意見，在与斯大林时代最頑固的代表进行思想斗争方面取得最初的鼓舞。这样就宣布了苏联无产阶级客观的和主观的力量的重新結集。

20. 在这种危机的恐慌之下，指导核心——拿破崙式独裁的上层——的最初的自卫反映并不专限于这个政权的“自由化”。它的最初的反映中也有它本身的改組和极端的集中化。官僚机构的实行拿破崙式独裁的头面人物暂时試图重新团結在新領袖——馬林科夫、貝利亚、莫洛托夫、赫魯晓夫——的周围而不要有重大的冲突和分裂，因为他們全都感到共同受到了威胁。但是这种团結和集合的局面只能是瞬息即逝的。在这个独裁政权中出現的为“自由”制度所加强了离心力量正在开始压倒統治集团本身的一尊主义。貝利亚的倒台和国家政治保卫机关遭到了政府和军队机构的削弱就都含有这种意义。“自由主义”被认为能使人民的各个阶层都感到滿意：群众滿意是因为他們受警察专政之害最大；官僚机构上层滿意是因为他們感到从一个新的任意清洗的浪潮的恐怖中解放了出来；官僚机构的下层滿意是因为他們希望更密切地与掌握政权发生关系。但是，如果說官僚机构认为这些措施能够更好地巩固自己的基础以保护自己的特权，无产阶级却在利用这些措施向那些特权挑战。在一个期待、希望和高兴的最初阶段之后，这相反的两派已經开始发生冲突。官僚机构的头面人物被迫随着群众压力增加的程度而越来越多地要求有合法的保障。这些要求和不安正通过貝利亚的被消灭和給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重大打击

而表现在指导核心中間。同时，已經为这个政权的“自由化”所加强了日益增长的群众压力也将表现在这个政权的上层中間（即使是間接的和变相的）。**这种党内和它的上层集团中間的分化过程**受到了緩冲地带开始发生革命高潮的影响。它还将受到国际形势发展的更深刻的影响。战争的加速爆发能够在初期推迟这种分化。国际革命的新胜利以及外国共产党内部的尖銳分歧，一定会加速这种分化。

另一方面，如果說新的领导集团想要用对帝国主义作形式上的和口气上的让步在国际范围内爭取时间，它也可能不像以前那样作出能够和华尔街达成真正妥协的重大让步（扑灭殖民地革命，把“人民民主国家”开放給美国的貨物和資本等等）。在这种情形下，軍备竞赛和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将基本上与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議报告中所提出来的情形相同。

21. 斯大林死后在苏联发生的事件大大地改变了世界形势。这些事件表明苏联軍事独裁政权的相对稳定性的結束。因此，世界上一个主要的社会保守主义力量发现自己遭到了反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和第四国际为了有意識地领导这个革命而进行的斗争将获得很大的便利。由此将产生一系列有利于我們思想和組織发展的条件，我們必須借助于一种适当的策略来充分利用这些条件。

在苏联本身，为我們的运动提出了最迫切的任务。拿破崙式独裁的最初裂痕把爭取在苏联复活社会主义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过渡綱領》中提出来的与此有关的行动綱領曾經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得到重申和具体化，这个綱領现在是非常切合时机的^①。

① “毫無疑問，苏联在为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而斗争的旗帜之下，开始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打倒官僚机构的特权。打倒斯达哈諾夫运动！打倒苏維埃貴族和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复活的意义已经有了变化。今天的苏联，由于它的工业和它的工人阶级，已经成了世界上支持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根据地。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复活，几乎和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样，一定会决定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独裁政权的新的统治集团的踌躇、怀疑和撤退有助于为社会主义复活而斗争这一事实，把我们的国际运动置于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我们必须对这些历史条件有深刻的认识。现今正在为在苏联重新建立和复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党创造条件^①。马林科夫在沉默十五年

它的等级！对各种形式的劳动给以更为平等的工资！

“在争取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斗争中，开展争取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自由，争取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斗争。

“官僚机构以希特勒—戈培尔式的普选权的鬼话代替了作为阶级机构的苏维埃。必须使苏维埃不仅恢复它的自由民主形式，而且恢复它的阶级内容。就如一度不容许资产阶级和富农参加苏维埃一样，现在必须从苏维埃中把官僚和新贵族清除出去。在苏维埃中只容纳工人、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农民和红军军人的代表。

“没有各苏维埃政党的合法化，苏维埃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工人和农民将通过他们自己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们承认哪些党派是苏维埃政党。

“从头到尾修改经济计划以符合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必须恢复工厂委员会管理生产的权利。必须由一个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消费合作社来控制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改组集体农庄以符合农庄劳动者的意志和利益！

“必须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来代替官僚机构的反动的国际政策。公布克里姆林宫的全部外交文件。打倒秘密外交！

“一切由热月党人的官僚机构进行的政治审判必须从全部公开、任人争论和公平正直的角度来重加审查。阴谋陷害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

“不推翻靠着暴力和伪造来维持自己的官僚机构就不能实现这个纲领。”（摘自《过渡纲领》。）

他们将为一切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要求实行包括脱离权在内的民族自决的民主权利，为独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斗争。

① 这也就是《过渡纲领》中所说的意思：只有被压迫群众的胜利的革命起义才能够复兴苏维埃制度并保证它进一步向社会主义发展。只有一个党能够领导苏联群众起义——第四国际的党！

（摘自《过渡纲领》。）

之后，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提到了苏联共产党内“异端分子的、反列宁主义的”集团（政治革命的胜利就靠着这些集团）的活动，这并不是偶然的。馬林科夫的大赦特别把政治犯除外，这并不是偶然的！第四国际必须找出办法，帮助我们的苏联弟兄从有利于他们重新团结的条件中获得利益；这将是我们的运动的世界高潮中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同时，我们的各支部应该坚决地和任何为苏联现在政治制度辩解或辩护的倾向作斗争。这种倾向将表现在想要与馬林科夫政权取得和解的小资产阶级集团中间。拿破崙式独裁虽然使自己“自由化”，但仍然是一个独裁政权。无产阶级在苏联仍然遭到政治掠夺。正如到现在为止一直靠着专横的警察来保护官僚特权一样，将来将靠着那部新刑法——真正的人身保护状——来保护这些特权。粉碎这个官僚机构的独裁和特权的任务，**在苏联发动一次新的政治革命**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最近整个发展表明，准备和促成这样一次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

22. 未来的战争将不是和国际革命的低潮而是和它的一个新的跃进同时发生。所以这个战争只能基本上使苏联拿破崙式独裁的解体现象和苏联无产阶级复活与发生革命高潮的现象更为严重。革命向其工人具有高度文化水平、专门技术和民主传统的西欧国家扩展；苏联军队与惯于享受相对地高于苏联劳动者生活水平的人民之间的接触；对帝国主义的胜利；各种各样的困难以及官僚机构在战争中的一般态度——所有这些因素都将导向这个方向。这些因素将加强苏联群众对于自己力量的确信，更加降低任何压迫机构的威信，坚定群众获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社会主义理想更为相近的生活条件的意志，削弱和瓦解官僚机构对群众抵抗和反抗的能力，加重官僚队伍内部的意见分歧和离心的趋势。

革命高潮的公开的、外部的表现是不是甚至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就将加重和加速，或者这些表现是不是开始时在帝国主义的威胁面前退让，其目的只是为了在战争的后一阶段，当这种威胁看来已经不存在时，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力地重新出现——这将决定于革命发展的速度，决定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在他们自己领导之下实现这个革命的能力，决定于苏联国内政治条件的成熟程度，决定于一个新的革命领导的存在。在任何情形下，在与帝国主义作最后清算的过程中，苏联无产阶级靠着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将学会也和苏联官僚机构进行清算并推翻它的独裁政权。从 1943 年到第三次大战结束这一整个期间，正是一个包含一连串的局部战争和临时武装停战的时期，在这期间，列夫·托洛茨基的预言——官僚制度将经不起和帝国主义与世界革命进行决战的考验——将得到证实。

23. 苏联的官僚机构今后将处于和这个机构的兴起和发展时期的情况根本不同的衰落和最后灭亡的新情况之下。了解到这一点并不在任何方面意味着改变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这个机构在苏联和全世界所起的客观和主观作用的一贯的估价。苏联生产力的高涨并不是官僚机构活动的结果而是与它丝毫无关。这个官僚机构在最初五年间阻碍了工业化的实行；接着就在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下投入工业化，在农业和群众消费方面造成了需要用二十年时间加以克服的可怕的危机。直到今天，它还在阻碍靠着计划力量在这个国家建成的庞大生产机构的彻底的和合理的利用。同样地，世界革命高潮在任何方面也不是由于苏联官僚机构的领导而出现的，而是在不顾它对世界工人运动进行干涉的情况下发生的。官僚机构起初造成无产阶级从 1923 到 1943 年历史上惨重的失败。其后，它推迟了和部分地遏止了 1943 到 1947 年的革命

浪潮。直到今天，它还在五大洲阻碍群众巨大革命潜力的彻底的和合理的利用。如果帝国主义的统治在半个地球上继续存在，那是由于这个官僚机构和它的代理机构所起的作用；今天这样说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正确。在一个主要国家——中国——这种统治已经被消灭，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使自己摆脱克里姆林宫命令的束缚。这种形势其中的一个新因素是：我们已经达到了《过渡纲领》所预料的那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历史法则”表现得“比官僚机构更有力量”。决定群众方向的两个因素——在世界规模上解放出巨大革命力量的资本主义的临终痛苦以及对于群众起阻碍作用的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的政策——当中，越来越重要的是第一个因素。苏联官僚机构不再能压制和遏止的革命高潮，甚至正在从这个机构用来自卫的某些手段上得到助力，正在为苏联无产阶级推翻这个机构准备着条件。

II 斯大林主义在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 里的兴起和衰落

24. 自 1943 年的革命浪潮爆发以来，在欧洲和亚洲出现了新的非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可以分成两类：

(1) 由于在这些国家中的革命胜利而产生的国家，例如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2) 由于苏联官僚机构的扩张主义而产生的国家。它占领这些国家并用拿破崙式官僚的手段使这些国家的机构和苏联同化，在某些情形下也动员一部分群众作为支持。例如欧洲缓冲地带的国家和北朝鲜人民共和国（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动员群众的规模要大一些）。

在这些国家之外，还必须加上：1) 越南这个民主国家，这个国

家是从与中国相似的一个革命浪潮中产生的，但它仍在继续进行反帝国主义战争和內战，以便控制全国領土；2)阿尔巴尼亚，这里也有过一个强有力的群众革命运动。

这些国家的出现代表世界形势的一个根本变化，在地理方面，把地球上脱离资本主义統治的地区从六分之一扩大到三分之一，在世界人口方面从十二分之一扩大到三分之一。

25. 南斯拉夫和中国革命的胜利——1917年以来第一批的革命胜利——給苏联官僚机构对这两个国家共产党的直接控制以一个致命的打击，并且給斯大林主义带来了世界的危机。这样，列夫·托洛茨基的預言就得到了証实：“不能从国家政治保卫局得到直接支持的共产国际（也就是使各国共产党服从于克里姆林宫的机构）的解体，将先于拿破崙式独裁集团和整个热月党人官僚机构的灭亡。”南斯拉夫和中国革命胜利給与斯大林主义的打击——虽然这些革命是由共产国际派生出来的共产党领导的——本身說明了这个胜利是从它們对克里姆林宮“破坏紀律”的行动中产生的。受到为群众革命浪潮压倒的威胁，面对着除了在政治上和物质上为反抗所粉碎以外別无其他办法的处境，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就越出了克里姆林宮的命令范围，向夺取政权的目标迈进。从这方面它們取得了与苏联官僚机构关系上的真正的实际独立地位，而这就为政治上的和意識形态上的分歧建立了客观基础。共产党对克里姆林宮的政治指示必須絕對服从的制度，对每一次发表的关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的斯大林修正主义的意見必須卑順地自动加以重复的制度，就这样遭到了破坏。

26. 但是，無論在南斯拉夫的情形下或在中国的情形下，胜利的共产党都沒有主动地决定和斯大林主义方針作公开的政治上的决裂。对于这一問題的解釋是：

(1) 这些国家的领导和它们的大多数骨干具有斯大林主义的出身和传统。这些骨干大部分企图在它们的狭窄的圈子内原谅莫斯科的“错误”，并把这些错误在自己的党员和群众面前隐瞒起来。

(2) 这些党在革命胜利以后，通过和苏联进行外交、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联合，在帝国主义封锁的事实面前得到了客观的支持；虽然这种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被认为是不充分的和带来很多麻烦的，但在这些党看来比放弃一切援助更有价值。

(3) 这些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认为除了克里姆林宫和帝国主义外没有吸引他们的目标，他们低估或者无视世界革命高潮和国际工人运动。

27. 南斯拉夫的情形是克里姆林宫采取主动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决裂。它感到这个党对于官僚机构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为这个党是插入它的党的系统中的一个具有独立基础的共产党，不仅能在国家关系上(南斯拉夫的关于和各种不同国家交往的政策、巴尔干联盟、与意大利的关系等等)而且能就其他共产党的政策(南斯拉夫共产党对于希腊游击队活动的态度、对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在“解放”期间采取的政策的态度等等)表示独立的反应。克里姆林宫宁可把南斯拉夫推入帝国主义怀抱并因此在它的巴尔干防御战线上造成一个可怕的缺口，也不愿意冒险让南斯拉夫这样一个榜样来破坏它对周围防垒和共产国际的整个控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使用了它的每一种力量：断绝外交关系，实行突然的经济封锁以破坏南斯拉夫的经济，挑起边境事件，企图在南斯拉夫国内组织恐怖活动，通过报刊、广播长期进行恐吓等等。但是，它所以能最初采取这种反革命态度，首先是因为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还仅仅是在初步阶段，其次更重要的是因为南斯拉夫是一个小国，基本上不能改变世界的经济 and 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国革命

的情形就与此不同了。克里姆林宮不能容許代表它的軍事防衛系統的基石和在實際上突破了帝國主義對蘇聯包圍的那個聯合的破裂。因此，在中國共產黨的情形下，雖然克里姆林宮抱有和對南斯拉夫共產黨相似的憂慮，它仍然不得不接受在平等基礎上和甚至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領導整個亞洲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礎上的合作。

28. 南斯拉夫國家和中國國家都是從消滅了資產階級政權及其國家的革命勝利中產生的。它們都很快地趨向於對同一的資產階級進行全部的經濟剝奪。在最初的遲疑和妥協之後，隨着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的程度，這兩個國家的結構也按照新的社會基礎得到了調整，它們的非資本主義的和工人階級的性質也很清楚地得到了表現。雖然南斯拉夫國家和中國國家是從一次勝利了的革命中產生的，但它們仍帶有機會主義和官僚主義工人領導的烙印。在南斯拉夫的情形下，這些特點特別表現在1945到1948年對於蘇聯的作風、手段和制度的奴性的模仿上，也表現在對於國內的和黨內的一切工人民主的壓制上。在1948到1950年一度做過使這個政權真正民主化的努力之後，從這個國家的結構上又看到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機會主義性質的表現；這表現在最近對於憲法和黨章作了修改，這些修改不但遠不能保證工人的民主而且是企圖消滅無產階級先進階層在處理公共事務方面的影響。這就是解散南斯拉夫共產黨和利用人民陣綫作為唯一的掌握政權工具的意思。在中國的情形下，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性質同樣在憲法上和在新中國這個國家的發展上留有印記。它希望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重要部分合作，因而一開始就在城市里破壞和阻礙無產階級的革命動員，連帶着在華北破壞和阻礙農民的革命起義。其後，這個同樣的希望引導它把舊國民黨的全部

国家机关接收过来，并把这些机关并入新建立的国家机构之内。在中国干涉朝鲜以后，在向资产阶级展开进攻并对贫苦大众进行某种动员时（在南方动员农民群众以完成土地改革；在“五反”运动和“三反”运动中动员工人）^①，中国共产党尽一切可能限制这种动员，阻止和妨碍这个动员，以免在城市中产生工人阶级群众的自治机关；它甚至利用同一机会对先进的革命分子使用恐怖手段。中国的情形像南斯拉夫的情形一样，新的工人国家并不是建立在自治机关（苏维埃、委员会）的基础上的，就是有这种机关正式存在，它们也因为缺少政治自由和替各派工人说话的自由而并不具备革命内容。因此，就这两个国家来说，这是**工人国家被官僚机构改变了形态**的问题。

29. 在这样的事实中并没有矛盾，即一方面，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能够不受克里姆林宫的支配，把一次革命导向胜利，并在这种情形下不再是名实相符的斯大林主义的党，而另一方面，这两个党却一直遵循着并将继续遵循使革命成果受到限制、遭到破坏和处于危险境地的机会主义路线——基本上来自这两个党的领导部门的斯大林主义历史的一种机会主义路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根本没有表示过，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领导，革命就永远不能胜利。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克里姆林宫的保护，但是它们这样做是从实利出发，是在事实的压迫下，是在威胁着要把它们压倒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下。这里有它们的优点，但也有它们的缺点。我们这个时代所要求的不是一个机会主义领导，可以容许自己随波逐流，以便好像莫名其妙地完成革命，而对于革命的全面任务和完成革命的

^① 反盗窃、反贪污、反官僚主义等等的运动。

手段却沒有一种明确的看法。我們这个时代所要求的革命领导必須充分認識自己的使命，必須認識汹涌的国际革命浪潮中所固有的巨大可能性，能够协调国际革命力量并尽快地把它們导向胜利。在这种意义上，我們可以說，革命越是发展和越是接触到先进的工业国家，就越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以取得胜利。在同样的意义上，我們可以說，南斯拉夫和中国的經驗并不說明第四国际是不必要的，相反地却証明不仅在全世界而且就是在这两个国家里也需要有第四国际。

30. 由于中国革命給中国本身和全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的新的非资本主义国家中就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殖民地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力，是国际革命高潮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帝国主义具有特殊的关系；在现阶段，美国集中它的主要火力来进行攻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正是朝鮮战争的意义，也正是亚洲事务今后在美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和軍事战略上占首要地位的意义。因此，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來說，只要革命还没有在其他先进工业国家中取得胜利，确知自己能够得到苏联的援助并与之結成同盟就成为一个与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在现阶段和未来的整个阶段，并不是克里姆林宮把同盟“强加”在中国身上，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保証把这个同盟維持下去。殖民地革命越向其他亚洲国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克里姆林宮所能施加的压力就越为强大。但是，中苏軍事同盟的維持和巩固本身与克里姆林宮对于中国共产党影响的程度无关，也就是說，与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衰落的程度无关。斯大林主义的衰落是中国共产党和克里姆林宮之間的力量对比的作用，基本上是殖民地革命发展的作用，是中国經濟建設的作用，是

无产階級在包括苏联本身在內的世界其余各地获得发展的作用。

31. 从这方面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和克里姆林宮的关系到现在为止所經歷的几个实际阶段:

(1) 从毛澤东的胜利到美国以鴨綠江为目标的进攻: 中国共产党肯定它事实上的独立, 包括意識形态領域里的独立在內。強調两个盟邦的平等和毛澤东对于一切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指导作用。

(2) 从美国以鴨綠江为目标的进攻到斯大林的死去: 中国共产党肯定它和克里姆林宮結成同盟的重要性, 肯定它在軍事、經濟、技术、文化和其他方面从苏联取得的和必須取得的决定性的援助。強調苏联的伟大榜样和經驗, 強調斯大林作为包括中国无产階級在內的世界无产階級的指导作用。

(3) 从斯大林死去到现在: 毛澤东的威信在整个非資本主义世界和在所有共产党中已經大为提高。国内的經濟困难迫使中国在朝鮮停战。再度強調两个盟邦的平等。苏联的經濟援助在宣传中占首要地位。

这一整个发展过程的不可避免的部分是世界客观形势当中所固有的, 另一部分則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路綫, 来自它的領導缺乏革命胆量和它对亚洲革命动力缺少信任。

32. 毛澤东的胜利只是表明了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开始。这次革命的任务不过是正在开始完成。在这个国家統一之后, 建立了一个全国統一的粮食和工业消費品市場; 取得国家独立的工作大体上已經完成; 土地改革已經扩展到中国全部地区并已获得成功。多年的社会关系(农民与地主和高利貸商人之間的关系、男女之間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間的关系)在地方上已經被推翻, 这代表着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于首先被在华北压倒它的农民群众推向革命行动之后，看到自己不能不在南方动员农民群众以完成土地改革。这导使它第一次对资产阶级的地位和所有权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但是，资产阶级到现在为止还保持着百分之二十的重工业、百分之六十的轻工业和大部分的零售商业；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剥夺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尤其是商业部分，因为这一部分是依靠千百万小规模的小规模个体农民的经营来维持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然把重要的经济部门——重工业和运输系统的主要部分、银行、对外贸易和批发商业——掌握在手里，就能够而且必须甚至在完成对资产阶级的剥夺以前开始国家工业有计划的发展。由于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并明确地指出将来的发展动向，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性质。在苏联，左派反对派也曾要求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而不必取消一切新经济政策措施。不过，只要形势继续像现在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将像过去两年那样能够限制它对于群众的号召和动员。这种对工人阶级的号召虽然没有在城市中造成工人运动的巨大高潮，但也使政府不得不修改它对工人的政策，用新的社会保险制度、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形式和提高生活标准等办法来改善工人的地位，因此就为工人运动的新的新高潮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气候条件。与战争的爆发、阶级矛盾的严重化、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必须对资产阶级进行剥夺的任务相关联，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高潮，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

33. 第四国际在南斯拉夫和中国的任务决定于这两个国家和南斯拉夫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质。因为牵涉到工人国家，我们当然赞成保护它们，反对要推翻它们和要改变南斯拉夫和中国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基础的任何企图。因为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是、而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官僚主义的中間派政党，

可是它們都仍然能够看到自己是处在本国革命的压力之下，所以我們并不号召这两个国家的无产階級組織新的革命政党或者在这两个国家內准备一次政治革命。我們正努力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內部和在中国共产党內部建立一个左派，这个左派一定会随着世界革命高潮的发展，把这两个国家的革命导向一个新阶段。在中国我們將把力量特別放在提高无产階級觉悟和組織的水平上，并利用政府政策所提供的每一个机会使工业无产階級做好准备和尽速地参加革命。在南斯拉夫，我們将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克里姆林宮以无条件地保卫包括 1948—1950 年期间的成果在內的革命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建立一个目的在于代替现在的党领导的反对派，借此打破南斯拉夫与帝国主义集团之間的把革命导向失败的軍事和外交上的联合，正式改組南斯拉夫共产党，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使工人階級的一切派別都能自由地发表他們的各种政见，并在理論上和政治上把这种政见导向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和国际革命运动。无疑地，斯大林死后苏联形势的发展、这个国家的革命高潮的迫近以及它开始在緩冲地带国家里的爆发，将大大有利于这样的方針。

34. 中国、南斯拉夫和越南这些新国家里的群众革命高潮的声势超出了克里姆林宮的政策和組織控制的范围以外，迫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顾莫斯科的命令并违反这些命令而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东欧緩冲地带的非資本主义国家和这些新国家不同，它們不是这种群众革命高潮的产物。相反地，它們是苏联扩张主义的产物，是苏联严密控制的产物。克里姆林宮之所以能够維持它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群众的控制，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时在这些国家里沒有发生革命高潮，或者发生了革命高潮而范围极为有限。这些国家的資产階級被战争削弱了，这使苏联官僚机

构得以在組織上同化这些国家，而不必大规模地动員群众，也不必受到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威胁。在資产階級仍然很强大因而不能以这种冷靜的方式来加以消灭的地方，如在芬兰和奥地利，在組織上同化的企图就遭到了失敗，而这些国家就回到了資本主义軌道上去。从緩冲地带的非資本主义国家的起源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的起源之間的这种根本差別上，产生了关于这些共产党与克里姆林宮之間的相互关系和关于这些共产党与群众之間的相互关系的重要差別。

35. 苏联官僚在緩冲国家中采取的态度和追求的目的經歷过三个阶段：

(1) 从 1944 到 1947 年：根本目的是对緩冲地带进行直接的經濟掠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苏联官僚机构以訂立賠償条約、沒收前德国财产、建立苏联股份公司和建立混合公司等等方式，利用了现存的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經濟改造一直以土地改革和基本工业的国有化为限。一般是維持和資产階級与小資产階級政党共同組成的联合政府，但是，共产党在这些政府里一定要掌握大权(軍隊、警察、司法等等)。

(2) 从 1948 到 1950 年：面对馬歇尔計劃的开始实行和帝国主义的企图瓦解緩冲地带的經濟，苏联官僚机构的答复是：把資产階級政党排除于政权之外，普遍实行国有化，通过两年和三年的复兴計劃为全面的經濟計劃打下基础，开始发展农民合作社并改变国家組織。

(3) 从 1951 年到现在：五年和六年計劃发展了緩冲地带的工业并且越来越把它和苏联的工业紧密地結合和束縛在一起；农业集体化进行的速度各国不同。軍备計劃使經濟和工人遭到很大的牺牲。苏联对于这些国家的直接控制和各个共产党的“俄国化”的

更为加甚，說明社会的和經濟的矛盾将要在这些党的内部得到反映。加强对于这些党的控制已經成为苏联官僚在緩冲国家里的最重要的和最困难的工作。

36. 各国工人运动和群众情緒在緩冲地带的发展有所不同。判断这种发展的主要标准，一方面是 1948 年以后的工业化实际上把以前存在的經濟、文化和技术的落后状况改变到了什么程度，另一方面是各个国家里的共产党能够取得和保持无产阶级重要阶层的信任到什么程度。

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匈牙利的一部分來說，工业化的速度相对地比苏联本国还快一些；并且在这些国家里正在引起的社会变化方面，趋向于产生和苏联正在产生的相类似的效果。虽然在企图复辟的那些农民阶层方面遇到的困难、带进到这些国家生活中来的民族压迫和恐怖因素以及群众的仍然低下的生活水平正在这些国家中阻碍一个新的工人运动，但这个运动作为同样原因的产物最后是会在这些国家中发生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本来能够在推动这个革命高潮方面起主要的作用；今天，它的投降主义路綫所起的却是一种阻碍作用。

就东德、波兰、西部捷克斯洛伐克和一部分匈牙利來說，工业化——虽然在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基本上沒有改变已經达到较高水平的工人阶级的重要性、技术和文化程度。在这些国家中，在第一阶段，工人对于生活标准的相对的或绝对的降低的抵抗、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斯大林官僚机构的独裁和专断的抵抗并沒有停止加剧，而是越来越成为苏联官僚机构实现它的計劃一个更大的障碍。在匈牙利和一部分在波兰，这种抵抗之所以能受到限制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相对稳定性。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这种抵抗和领导机构内部的激烈震动结合起来，正在产生一种非常严重的长期

危机，标志着革命高潮的开始（1953年5月到6月的罢工和工人示威）。在这些国家中，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像在苏联一样，或者甚至在更迅速地成熟中。

37. 要预测革命高潮在每一个缓冲地带国家中将要采取的确定的组织形式，仍然为时过早。可能有两种不同形式：

(1) 自发的群众活动扩大到当地的共产党中去，在那里发展起能够领导革命高潮的左派。这种形式对于那些保有广大工人基础和具有长期传统的共产党最有可能：匈牙利、保加利亚，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一部分。

(2) 独立的群众运动，通过新的政治派别的出现或者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复兴，发展到现存的合法组织以外去寻求协作关系。这种形式对于其共产党只有短期的传统或薄弱的群众基础的国家来说，最有可能实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波兰，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一部分。

这里也不能把两种组织形式的结合除外。我们必须对于未来革命高潮的两种可能的组织形式都有所准备，以便在群众运动爆发时永远站在真正的群众运动中。自然，我们必须仔细地分清什么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反抗运动——不论这些运动最初可能采取什么混乱的形式——和什么是为以前的有产阶级残余分子与帝国主义所煽动起来的并由它们来领导的复辟运动；我们必须对这种复辟运动进行斗争。此外，革命高潮的爆发越迟延，除共产党外不知道有其他政治组织形式的青年一代越是奋起参加政治生活，共产党就将越成为当然的政治论坛，在那里将产生出新的革命高潮的领导。由于这种原因，我们的队伍将力求完成和我们在苏联担负的任务大致相似的任务。这些任务的完成要求通过对各国共产党采取参加进去的策略建立起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党，一方

面始終准备迅速参加任何其他可能在革命高潮开始时出现的群众組織。我們在緩冲地帶中的基本任务是对这个革命高潮保証一种布尔什維克的領導,防止它落在改良主义的、半复辟主义的势力支配之下。这个革命高潮必須导向真正独立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亚、保加利亚和类似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它們可以随意在它們自己中間自願地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巴尔干—多瑙河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38. 斯大林主义在緩冲地帶国家中衰落的一般动向可以明确地概述如下:

(1)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除了把大部分政治和經濟权力交給当地共产党外,組織上的同化并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实现。因此,即使在这种权力由于缺乏群众的支持而非常不稳固和必須靠克里姆林宮来支持的情形下,这些党也获得了一种比較独立的基础。

(2)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本国的共产党領導曾企图——先是违背克里姆林宮的意旨,斯大林死后也許一部分得到克里姆林宮的鼓励——避免重复斯大林政策在苏联造成的那种十分不幸的局面,特别是强迫集体化。

(3)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人階級在一个撤退、消极和混乱的过渡时期以后,似乎比以前更有力地和更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

(4)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在 1944 年阻碍革命高潮和使它受到克里姆林宮严密控制的客观因素(战争的破坏、低水平的生产力等等)和主观因素(工人組織的不存在、过去法西斯或軍事独裁的复杂历史、革命远景的缺乏、民族感情的加深等等)正在开始消失,并且只是部分地被专政造成的精神沮丧、民族压迫以及在过去整个时期中生活水平的相对降低等等因素所补偿。

39. 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发生的变化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有相当大的反响。这也同时影响了这些党的内部制度、它们与克里姆林宫的和群众的关系。

特殊的经济情况——捷克斯洛伐克的币制改革、东德的发行定额的增加——引起了群众对于官僚独裁的反对，终于在這些国家里造成无产阶级公开的反抗。这种反抗无非就是群众将用来推翻斯大林主义独裁的政治革命的开始。它给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活动的预测带来了最有力的证明。它也证明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由于群众革命起义的压力，在1953年6月17日从上到下陷于分裂，并且其中一部分打算向工人投降，就是一个例子——官僚机构的多种多样的性质以及这种群众行动在官僚机构中造成的解体的效果。

这种反抗无疑地阻碍了“新方针”在政治方面的实施，并且在某些情形下，例如在东德，已经为一种政治上的倒退政策所代替。但是，即使在這些情形下，“新方针”在经济方面一般还是得到了实行，并且由于苏联官僚机构在6月17日以后所作的让步（放弃赔偿、把国营股份公司移交給德国的斯大林主义当局）而进一步得到加强。

匈牙利政府的改变方向是代表这种“新方针”的最好的例子。这种新方针包括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特点：

(1) 改善各阶层人民的经济情况；降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降低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增加对人民的工业品的供应；缓和关于“破坏劳动纪律”的高压的法律等等。

(2) 在群众组织中缓和极端紧张的气氛；减少严厉的措词，减少“事前制造的”讨论，給下层干部以更多的发表他们意见的可能性等等。

这种新方针很可能是出于克里姆林宫的命令，用意在于把它当作加强斯大林主义的党对于缓冲国家的控制的一种手段，所使用的方法是使这种控制不是那么严厉而是更有伸缩性。但是，通过这种新方针将要解放出来的社会和政治力量，通过它将要帮助在共产党和青年组织内产生的分化，它甚至会比在苏联更有助于促使无产阶级起来从事政治革命。

无待赘言，革命高潮的强大及其扩展到西欧和苏联，在战争以前或在战争期间，对于缓冲地带的无产阶级从拘禁它的官僚机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一点，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40. 在所有缓冲国家里提到日程上来的政治革命的纲领包括下列值得注意的各点：

- (1) 释放工人囚犯。
- (2) 废除高压的反劳工立法。
- (3) 工人政党和组织的民主化。
- (4) 一切工人政党和组织的合法化。
- (5) 选举群众委员会并赋予民主职权。
- (6) 确定工会同政府关系上的独立地位。
- (7) 由群众民主地制定为群众设想的经济计划。
- (8) 切实给予各民族以自决权。

III 斯大林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中的 兴起和衰落

41. 各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十月革命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产生的动力之下，其次是由十月革命在1914年以前的工人运动的其他组织内部产生的动力之下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官僚制度在苏联的胜利使它能够在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中间利用十月革命的威信。这

就是斯大林主义在各国共产党中間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这些党的內在弱点有利于这一过程。1914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內部缺少一个在明确的綱領上組織起来的左翼，因而在共产国际的初期造成了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上的和理論上的軟弱。这一方面使布尔什維克党在共产国际中占压倒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使其他党的领导人对于認真应付1923年开始爭論的那些問題缺少准备。既然布尔什維克党被官僚主义化，斯大林派在把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移植到共产国际中去这件事情上就很少遇到有組織的重大反抗。从1923.到1943年(斯大林着手解散共产国际那一年)期間的工人运动的衰落，加速了各国共产党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

42.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变成了保卫苏联官僚机构的克里姆林宮的外交工具。它們放弃了爭取世界革命的斗争，力求对各民族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迫使它們采取一种符合于克里姆林宮观点的外交方針。这些共产党目标的改变引起了从冒险主义向机会主义的轉变，导使某些共产党在某些时期(特别是在西班牙的人民陣綫时期)直接采取反革命的行动。

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給工人阶级带来了包括德国納粹党胜利(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双方面的政策所造成的結果)在內的許多次失敗。每一次这种失敗都加速了世界革命的衰落，加强了苏維埃官僚制度对于苏联和对于始終忠实于俄国革命的先鋒队的控制。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內部的官僚制度降低了共产党的理論水平。共产国际越来越不成其为制定国际政治方針的中心。共产党的领导是按照它們通过一切多种多样的轉变和搖摆不定来服从克里姆林宮命令的才能，从上边来加以选择和更換的。各国共产党是在經驗主义、一尊主义和歪曲历史的保护之下起作用的。因

此就实现了一种与正常领导相反的选择，排除了最独立自主的和政治上最有能力的分子。事实上，这种制度消灭了各国领导在政治上合作的任何可能性，而相反地是把它們变成了仅仅是克里姆林宮命令的传送带。

43. 各国共产党最初建立的目的，是成为一个世界革命政党的各該国的支部，可是在斯大林主义者领导之下，它們竟变成了堕落的工人党。这些党的官僚主义的领导依存于克里姆林宮，特别是因为它們的政治生命依存于利用十月革命和苏联在群众中間的威信。但是，各斯大林主义党的领导和苏联的共产党不同，并不代表一个掌握巨大物质资源的特殊社会阶层的利益。由于这一事实，这些党的两重性和苏联官僚机构的两重性是不同的。就它們的党员队伍（这个队伍和社会民主党截然不同，一般是由最受剝削的和战斗意志最坚强的工人阶级部分組成的）說来，它們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是不充分地——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就它們的领导說来，它們却受着克里姆林宮的严格控制，而克里姆林宮的企图就是牺牲其他国家的革命。“在一个单一国家里”維持革命现状。

由于这些共产党受苏联外交政策的束縛，它們就在各个时期采取一种在效果上和社会民主党的路綫很相近的机会主义路綫。即使是在这种时期，这些共产党也决不能超出范围和社会党联合在一起，因为这些共产党不是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具而是克里姆林宮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的考驗驅散了对这一問題的一切怀疑：占压倒多数的共产党（领导以及它們的党员队伍）一直忠实于克里姆林宮官僚机构的方針，特别是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期間。

44. 在战前时期，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共产党经历了不同的发

展过程：如法国共产党这样一些党，看到了它們对群众影响的扩大；其他的党如英国共产党，則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真正的革命高潮。但是在这一期間，一切动摇各国共产党的許多危机都为斯大林主义以加强对这些党的控制的方式所克服。

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个革命低潮期間，每一次巨大的群众斗争都以失敗告終，而脱离那些共产党的不是一个人数很少的遵循托洛茨基主义綱領的革命先鋒队，就是放弃革命斗争的派系。另一方面，那些仍旧拥有战斗的工人干部的共产党則完全忠实于苏联，不問其为苏联国家还是它的领导。

这些工人斗士把每一次政策的改变都看作仅仅是为了不惜以任何代价保卫第一个工人国家而必須运用的策略。但是，应该看到的是，斯大林主义在西班牙內战中所起的作用——公开的反革命作用——虽然沒有使那些在国际纵队中从事战斗的共产党战士反对斯大林主义，但是也在他們中間第一次引起了如后来——和南斯拉夫决裂以后——所表现的怀疑。

結果，几乎在任何地方，斯大林主义的党和社会民主党相比，都一直是表面上革命的和人数上最强大的組織，而在每一次新的革命高潮期間，新参加政治活动的斗士們就都投向斯大林主义的党。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更是如此。在这一期間，那些共产党由于它們在抵抗运动中的活动和苏联胜利的威望而得到了加强。

但是，也是在同一个人战争期間，一个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党——破天荒第一次不再按照克里姆林宮方針的严格要求行事。在战争期間，由于反对占领軍斗争的尖銳化和南斯拉夫社会內部的紧张情形妨碍共产党以民族陣綫的名义实行阶级合作政策，共产党不得不建立了新的軍隊——群众性的权力机关——并领导起

义群众取得了政权。在几年中間，南斯拉夫领导曾經试图調整这种局面以符合克里姆林宮的要求，但是终于在 1948 年爆发了冲突，說明在苏联官僚机构这一革命低潮的产物和强大的革命运动之間，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同样地，在战争結束以后，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一个强大的起义，这个起义向它提出的问题是或者领导这个起义或者退出政治舞台，因此它和蒋介石展开了殊死战，通过由巨大的农民起义支持的中国紅軍的斗争取得了政权。

在战争期間，克里姆林宮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松弛了下来。共产国际的领导也与許多共产党隔离开来。斯大林选择这个时机解散了共产国际。在这同一时期，在开始发生革命高潮（法国、希腊……）的压力之下，具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领导的内部开始表现出分歧。另外一些共产党领导越出了机会主义所要求的界限，受到了莫斯科的警告（美国、荷兰……）。战后形势的发展不再允許克里姆林宮恢复战前存在过的对于各国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主要是为了把南斯拉夫和緩冲地带牢固地掌握在手里而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45. 随着中国革命的战胜国民党政权，在 1943 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复灭时开始的革命高潮时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基本表现在对革命有利并越来越在世界规模上向有利方面发展的国际力量的对比方面。革命浪潮正在从一个国家扩展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大陆扩展到另一个大陆。它最近已經扩展到苏联本身和緩冲地带。

結果，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看到自己已处在和战前时期完全不同的情况下。

在那些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当中的少数党的国家里，革命高潮

一般是通过群众大批加入多数党来表现的，这样就更进一步地孤立了共产党，同时像比万主义派这样的左派也正在这些多数党的内部开始出现。

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群众性政党的国家里，像拉丁美洲国家那样，共产党通常在工人阶级现有的政治运动中代表最有力的一派。这些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的堕落，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和在战争刚结束时的背叛行为，在这些党里引起了一种永久性的危机。这种危机正在随着拉丁美洲群众运动的兴起和这些党的不能给群众运动带来革命成果而日益加深。这些党的这种危机能够促使大部分的共产党干部接近第四国际，甚至加入它的队伍。实现的条件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組織必须完成它们的领导群众革命的任务，并在行动上寻求一种有利于这些共产主义战士向托洛茨基主义转变的共同基础，借此他们采取一种主动的和变通的态度。

至于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它们和莫斯科的关系正在受着与过去迥然不同的情况的支配：它们本国的向革命斗争方向发展的群众运动日益表现出它们本身的力量。它们和莫斯科的关系松弛了下来（在战争期间甚至在某种情形下有长期的破裂）。最后，这里要附带说明的是，由于苏联最近的发展，各国共产党领导方面已经对于克里姆林宫的方針有了怀疑，并且在党员群众方面，也有可能对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制度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

这种国际形势和它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影响，给斯大林主义在它所控制的工人运动中的衰落开辟了两个途径：

在共产党是工人运动中的少数党的国家里，群众所要拥护的那些派别（不论它是一个革命的党像在玻利维亚那样，或者是中间派像在英国和日本那样），假如它们有一个正确的革命领导和革命

方針，就越来越有机会肯定消灭斯大林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的影响。这些派别实际上是吸引一切健康的工人力量的目标，能造成斯大林主义势力的崩潰，然后促使共产党在孤立的压力之下内部发生危机甚至于分裂。但是，中間派领导的錯誤方針或背叛行为，即使在这些国家里也能在以后一个阶段重新給予共产党以机会。

在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的多数党的国家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有产阶级事前已經瓦解)，和在非常强有力的群众革命起义的压力之下，这些共产党可能制定一个和克里姆林宮的指示相反的革命方針，而不必放弃那些从斯大林主义继承下来的政治上和理論上的遗产。它們尤其会这样做，是因为群众——这些群众像他們会在未来的一个整个时期內繼續做的那样，仍在力求利用这些共产党来满足他們的希望——对于他們的领导采取了一种比过去更为批判的态度，不再准备服从这些党的無論什么样的轉变。在这种情况下之下，不應該把斯大林主义的解体理解为在即将到来的下一阶段这些党的組織上的解体或者与克里姆林宮的公开的决裂，而是要理解为由于它們中間的政治分化而逐漸发生的內部轉变。甚至可能的是，在某些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里，这种斯大林主义解体的过程可以带来某种程度的巩固或者組織上的强化，以致在环境的压力之下，它們改变政策以求更符合于群众的利益。这种前景——不是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的組織上的解体，而是这些党內的斯大林主义思想在整个时期內四分五裂的解体和从克里姆林宮直到这些党的党员为止的官僚主义关系的解体——对于决定我們如何活动来干預这个过程使它向有利于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是重要的。

46. 克里姆林宮与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领导之間的以及这些

党与群众之间的未来关系的发展,决定于下列几个因素:

首先决定于世界革命高潮发生的范围和速度,特别是在西欧的工业化国家里。

决定于苏联本国的无产阶级群众的重新觉醒和它对于苏联社会制度的影响。

决定于战争在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阵营之间如何发展。

决定于革命领导所表现的干预能力,以便领导群众的倾向,特别是领导在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内部或在有群众基础的社会党内部出现的那些倾向。

要准确地预见到这些基本因素的作用和相互作用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能够指出:革命高潮的范围越广,它对于先进工业国家的冲击越是频繁,克里姆林宫就会越失去政治上的主动,同时中间派的趋势也就会在受到这种高潮影响的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内得到加强。同样地,革命高潮越是在一个坚强的革命领导下发生,它的趋势越是在苏联国内有直接的反响,这个领导就越能给斯大林主义以致命的打击,甚至在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共产主义战士摆脱克里姆林宫的控制和影响以前就能给它以这种打击。

这一整个动力既不是不变的也不是始终如一的。它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辩证过程,其中具有很多矛盾和局部的向后摇摆。它并不排除而是相反地包含着:(1)只要群众的压力还没有达到最高点,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实行临时向右转的策略;(2)人数有限的党员和干部集团有可能被开除出党或脱党;(3)在战争期间,克里姆林宫有可能对群众运动、特别是对仍将被孤立的群众运动采取公开的反革命行动。

但是，重要的是了解这种发展的**总的方向**，在这个总的方向中，这些变化将越来越不占重要地位，群众革命运动——不论最初采取什么形式或有什么样的领导——将越来越能够不受克里姆林宫的控制。

这种斯大林主义解体的过程，对于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来说，并不意味着这些组织将逐渐转变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第四国际旗帜之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从这种解体中出现，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种种危机和重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将标志着斯大林主义完全结束的变化，将作为现在就逐步开始的一个过程的高峰出现，在这一过程中，被迫和群众加强联系的共产党开始以往往是几乎看不出来的方式摆脱斯大林主义者必须服从的严格束缚。

IV 第四国际的任务和前途

47. 第四国际是由苏联共产党的左派反对派和第三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产生的。它起源于反对斯大林修正主义，保卫列宁的纲领、保卫列宁的战略和战术、维护十月的主要教训和防止革命在欧洲和亚洲的失败。第四国际以及在它之前的苏联左派反对派和国际左派反对派，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反对“四个阶级联合”的理论、反对在“爬行的速度上”或“大踏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概念、反对与改良主义官僚、农民党和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无原则的联合的机会主义路线以及反对“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极端左倾的路线的斗争。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这种坚持原则的根源代表着它的巨大力量。一个国际组织完全建立在它的干部对于明确的纲领、战略和战术的意见一致的基础之上，这在工人运动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这个力量当

中同时也存在着一种由于脱离工人运动而产生巨大缺点的真正危险：托洛茨基主义的組織成了討論会，成了对斯大林方針进行馬克思主义批判的空論团体。第四国际的創立者，特别是列夫·托洛茨基，深刻地認識到这种危险，因而他們早在 1933 年就集中全力在群众运动中扎下托洛茨基主义者核心的根基，在和群众运动断了联系的时候重新建立起联系，并挑选出新一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工人干部。在有些国家，如美国，这一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經有了巨大的发展。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里，斯大林主义者的恐怖、帝国主义者和法西斯的迫害、我們的领导和主要干部的缺乏連續性，尤其是全世界工人运动的衰落，給了我們的运动以打击，阻碍了这一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在战争期間的完成。只是在从 1943 年开始的新革命高潮当中，国际运动才充分認識到托洛茨基主义組織不能不进入的这一新阶段——具体实施《过渡綱領》的阶段。从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和第十次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會議开始，多数的托洛茨基主义組織才获得了关于它們必須怎样在本国的群众运动内部扎下根基和在那里取得领导地位的具体概念。

48. 第四国际起源于第三国际内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进行的派系斗争，这种起源在托洛茨基运动中間引起了偏差，因而把对斯大林主义的过失和罪恶进行斗争看作主要任务。事实上，第四国际的任务过去是并且一直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在托洛茨基运动刚开始时，我們就有了保卫不断革命論（这种理論对于我們这个时代的社会动力是一种最清醒的說明）的斗争，这并不是偶然的。第四国际反对其他一切只是代表特殊的、自私的、官僚主义或民族主义狭隘利益的工人领导，不論它們是改良主义者、中間派、斯大林主义者或任何其他派別。第四国际反对把

工人的活动限制在维护已经取得的地位上，不论这些地位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属于苏维埃国家的还是属于南斯拉夫国家的。第四国际代表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它的历史使命——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其他每一种革命不同的是，它要求实现这个革命的阶级的先锋队具有高度的自觉，所以不建立起一个领会了第四国际纲领的工人领导就不一定能完成这种使命。第四国际并不想通过把自己和群众的实际运动对立起来的办法来争取工人先锋队和群众赞同自己的纲领和组织，而是要参加群众运动，和群众运动融合在一起，并通过政治的和实际的活动来帮助群众运动的发展和在它的队伍中选出新的领导干部。

49. 产生第四国际的具体情况——与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革命高潮期间而是产生于工人阶级运动低潮期间——归根到底决定了它的组织的发展速度的缓慢和这些组织在1943年革命高潮开始时的极度软弱。由于这一事实，同时也由于这个革命高潮还具有局限性（特别是在西欧国家里），第四国际不能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里成为这个革命高潮的领导力量。这就有利于苏联的控制、阻碍和阻止这个革命高潮。但也就是在同一期间，在许多重要国家中选择出了更为可靠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和干部。因此，第四国际以远超过1939年的紧密团结精神进入革命高潮的下一阶段，并且将特别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些过程中它有多得多的真正具体的机会来表现自己并在许多国家里围绕着自己的纲领建立起真正的群众革命领导。

50. 斯大林主义的兴起是通过对苏联的左派反对派和国际的左派反对派作凶恶的斗争开始的，因为这些党派体现了与苏联官僚的保守利益相反的真正国际的和苏联无产阶级的利益。尽管世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企图粉碎这些派别，但在这一时期形成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少数有觉悟的革命者不仅存在了下来，而且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里把与克里姆林宫的伪造相反的全部列宁主义的遗教原封不动地传给了青年一代。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在不同程度上给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高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革命高潮直接促成斯大林主义衰落的一切国家里，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和托洛茨基主义纲领正在得到人们明确的承认。我们的组织是否能充分利用这种承认，归根到底决定于这些组织的战略体制上的适应性。在苏联本国和缓冲地带的国家里，现在正是革命高潮的准备或开始阶段，这个阶段表明它是一个分化、怀疑和急剧转变的过程，甚至表明在斯大林主义领导者中间存在恐惧心理。这一阶段对于我们的思想和组织在工人阶级运动中重新出现是非常有利的。这种重新出现究竟是将以一种自觉的和有组织的形式发生，还是将以采取更为混乱和更为复杂的形式开始，则决定于第四国际利用国家机器的每一个微小的裂痕来灌输它的思想的能力。至于说到将在下一阶段、在战争刚开始的前夕或在战争中间被卷入革命高潮中去的那些国家，第四国际已经特别准备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提供的机会来扩大我们的组织的影响和保证这些组织的出现。在斯大林主义者领导集团中间盛行着的从它们所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上和从苏联最近的变化上产生的混乱状态，将在这一工作上对我们大有帮助。我们插手于正在动摇斯大林主义的世界危机的重大意义可以列举如下：重新尽可能地夺回在共产党队伍中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的干部和忠诚的革命斗士，斯大林主义危机正在使这些共产党发生动摇并且将使这种动摇越来越厉害；保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领导；保证在维护已有的革命成果和革命时代的延续和变动方面使无产阶级以最

小的牺牲获得胜利。如果我們在参加真正的群众运动方面学会怎样把不妥协的有原則的坚定性和极端讲究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我們就一定會在斯大林主义衰落和灭亡的同时取得第四国际和世界革命的胜利。

六、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 大会文件

(1957年10月11日)

1. 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

同志們：

过去四十年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上的危机正在达到它的最后阶段。资本主义遭到了本身经济矛盾的破坏，又为不屈不挠继续向前进军的殖民地革命所逼迫，加以面对着工人国家的日益强大的力量，它已经失去了重新征服世界的一切希望。不过，它凭借着在北美和西欧占据的最后坚固阵地，还没有打算不经过斗争就让位给高涨的革命力量。相反地，它从来没有停止过进行一次最后决战的准备，利用美国的巨大的技术和军事潜力来贯彻它的要求。因此就产生了仍然威胁着人类的危险——发生世界核战争的危险。这个战争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即将到来的黄金时代

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地表现出它在世界上的根本反动作用。它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证明一切人类的进步都迫切要求它的灭亡。

十年以来，人类的科学和技术一直在大踏步前进。自动化，多种多样的工业技术，核能之用于生产，乃至明天把太阳能用于生产，一定会使人类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实现多年来梦想的丰衣足食的美好境界。一旦在物质上永无忧虑，人类将着手征服空间和生

命的最后奥秘，将消灭恶劣的天气和疾病，使沙漠变为良田，并保证全世界人民终于能够过一种无愧于人类的伟大的生活。

在科学家们看来，已不再有任何阻碍我们达到这些美好目标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已不再缺少物质手段和技术。所缺少的是必须消灭社会集团之间冲突的合理的社会组织。所缺少的是已为人类所掌握的资源的合理分配，分配的目的是为了谋求幸福和进步而不是为了破坏和浪费。

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在于：在巨大的财富正在被用来生产人类自杀武器的同时，在同样巨大的财富正在被用来征服空间的同时，十五亿人类却食不充饥，衣不蔽体，住在非人所住的住处，并受疾病、贫穷和愚昧的折磨。在人类正在准备成为宇宙主人的同时，成千上万的人，甚至于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却还没有解决合适的住房问题。

为了使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可以为全人类服务，必须取消那种荒谬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使生产服从于利润，使广大群众的消费服从于托辣斯和垄断组织的老板们所高兴赏给他们的收入。必须废除人对人的剥削以及建立在市场关系基础之上的国际贸易制度。必须把生产资料交给社会，保证由生产者管理工厂，查清二十五亿消费者的真正需要，并拟定一个**全世界经济发展和繁荣的计划**。这个计划在提高先进国家工人生活标准的同时，将在最短时期内尽量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终于能够过二十世纪水平的生活。

制定这种全世界的经济计划是人类今天最迫切的任务，不然，以后几十年的发展将加重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可怕趋势。这个计划并不是空想的，它并不要求西方国家的工人作重大的牺牲。相反地，如果我们仅仅是从每年浪费在军备目的上的，也就是说浪

費在破坏目的上的財富來計算，我們就可以達到全年一千億美元的驚人數目。這筆錢能夠完全用於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而絲毫也不需要先進工業國家的工人們降低他們現在的生活標準。

就是這樣的假設，也只是以僅僅維持資本主義國家現在生產的財富為根據的。但是實際上，蘇聯的例子年復一年地證明，即使稍微合理地組織一下，至少也能使先進工業國家的經濟發展的速度增加一倍，這樣一方面有助於西方國家生活標準有新的實質上的提高，另一方面還能騰出新的資源，使直到現在仍被帝國主義束縛在幾乎是中世紀經濟水平的那些國家的經濟和文化得到高漲。

現在人類已有能力進入普遍富裕與和平的時代。只有一個嚴重的障礙，那就是殘存的資本主義。從世界上徹底鏟除資本主義已經成了保障人類公共安全的工作。如果不解決這一問題，資本主義就威脅着要動員科學和技術的無限力量用於可怕的毀滅。

必須迅速解除資本主義的武裝！

美帝國主義感覺到力量的對比的確於己不利，所以已經投入了軍備競賽。除非全世界和美國工人能夠及時地通過奪取政權來解除華爾街和五角大樓的老板的武裝，這種競賽的結果就只能是戰爭。

蘇聯所取得的經濟上的和技術上的成就不但遠未能減低美帝國主義的戰爭狂熱，反而把它推向爆發的頂點。在資本主義處於垂死呻吟的有決定性意義的現階段，帝國主義事實上只能在不戰則降或者作最後掙扎以苟延殘喘的兩條道路中選擇一條。按照帝國主義戰爭政策的謀士和領導人福斯特·杜勒斯的說法，革命的

每一个新的决定性发展，威胁着帝国主义本身的每一个重大经济危机，苏联在技术上的每一个惊人成就，都驱使帝国主义走向深渊的边缘。

几年以来，帝国主义走向战争的趋势好像是有些缓慢下来。经济情况是有利于获得利润的。殖民地革命有一个时期受到了倾向于与华盛顿达成妥协的领导的控制。克里姆林宫遭到了苏联社会内部反对势力的揭露。因此，我们看到了日内瓦会议和伦敦的裁军小组委员会的无休止的谈判。

但是，只要中东的殖民地革命有一个新的进展，苏联的技术和军备有一个惊人的跃进，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休战”的虚伪性质。当然，就军备竞赛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达成局部协议仍然是可能的。但是，真正的裁减军备将意味着帝国主义签署它自己的死亡证书。

第四国际不愿以过分乐观的预测来哄骗全世界人民，它严肃地警告他们注意威胁着人类的危险。如果国际无产阶级不及时解除帝国主义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帝国主义将宁愿把人类投入核战争也决不会向革命力量不战而降。

有些人为了骗人的“和平共处”政策辩护说，因为世界核战争威胁着要毁灭整个文明，因为任何新的革命发展威胁着要驱使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所以最好是使革命的发展缓慢下来。这样，他们就原谅了克里姆林宫和共产党对于革命运动——如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背叛行为。但是实际上，这些“消极抵抗”的支持者并没有使他们的想法变成结论。最近的事实证明，不仅革命的发展，就是苏联的经济、技术或科学的跃进也能“触怒”帝国主义。因此，向原子讹诈投降的逻辑，不仅要求停止殖民地革命，甚至要求停止苏联经济的发展。

但是，今天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阻止我們時代的上述這兩種根本趨勢中的任何一種趨勢。人類的任務不是向華盛頓的原子訛詐投降，而是儘快解除核戰爭製造者的武裝。現在在英國、挪威、冰島和其他各地正在圍繞着這一問題發展的運動表明，國際無產階級經過短時期麻痺之後，對這個人類面臨的生死問題的認識已越來越清楚了。

第四國際號召全世界工人和各族人民一致行動起來反對瘋狂的核武器競賽。召集一切工人組織——政治組織、工會、合作社——的代表舉行世界會議，起草一個一致行動反對原子彈和氫彈的方案！在全世界宣布五一勞動節為共同進行反對核武器鬥爭的日子！讓國際無產階級的聲音在成千上萬的群眾大會、示威和罷工中，強有力地響遍全世界。

立即停止核試驗！

在工人組織的監督之下，立即禁止核武器并銷毀儲存的核武器！

不要再沿着導使當權的狂人走向核戰爭深淵的道路前進！

同時，第四國際警告一切國家的工人和人民，肯定只有一種解除帝國主義武裝的有效手段，那就是奪取它的財富和政權，推翻它的政府并在世界各大國建立工人政府。

爭取殖民地革命的勝利！

改變世界階級力量對比的主要力量是中國革命和全世界殖民地革命的巨浪。由於受到了從幾百年沉睡中覺醒過來的群眾對於自由和人類尊嚴的自然渴望的激勵，加以他們的苦不堪言的窮困生活同帝國主義國家向本國一部分人所保證的舒適奢侈的生活成

了鮮明对比，在帝国主义在中国、朝鮮、越南遭到接二連三的失敗的鼓舞之下，今天，殖民地革命正在从巴基斯坦到加薩布兰卡的所有阿拉伯国家燃起遍地烽火，正在拉丁美洲的許多国家（玻利維亞、阿根廷、哥伦比亚、古巴……）掀起强大的群众运动的高潮，正在摧毀印度的尼赫魯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諾的表面穩固的資產階級政权，并正在开始通过千百个裂縫滲入帝国主义在中非洲的大厦。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結構、无产阶级在人数上的极端不足、大的宗主国的工人政党对于殖民地革命的背叛，克里姆林宮无保留地給殖民地資產階級以支持并要求共产党对殖民地資產階級卑躬屈膝的机会主义路綫——所有这些现象都有助于在革命第一阶段保持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领导的支配地位。这些领导在群众和帝国主义之間玩弄花招，不加区别地从华盛頓或克里姆林宮方面寻求外交上的支持。

美帝国主义認識到，即使殖民地資產階級和克里姆林宮之間成立一种世界規模的稍具持久性的联盟，也会給它的政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答应給这些資產階級以經濟援助，并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它們反对欧洲帝国主义以換取它們的同情。美帝国主义者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間和殖民地資產階級与工人国家集团共同反对巴黎和伦敦，这种态度标志着这一策略的高度运用。

但是，这一策略遇到了一系列的客观障碍。在群众起来反对的帝国主义恰好是美帝国主义本身的情况下，这种策略就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运用（例如现在在玻利維亞給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右翼的支持）。美帝国主义由于本身的社会性质，尽管它的經濟后备力量比苏联远为雄厚，仍不能鼓励殖民地国家的真正工业化。它自己的財富使它成为农业和工业产品的輸出国家，因而使它不

能促进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市場生产的发展（例如埃及的棉花生产）。最后，殖民地革命的规律本身将使这个革命超越由动摇的或背叛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的现阶段。群众运动越开展，无产阶级干部（即使不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干部也是具有工人思想的干部）就越会为控制殖民地革命而和旧的领导进行斗争。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建立从民族主义运动或工会运动中产生出来的独立的工人政党已经被提到日程上来了。这将迅速排除美帝国主义的操纵。

自奠边府战役以来，在最近这几年发生的一切殖民地革命事件当中，现在对于世界帝国主义构成最直接的威胁的就是阿尔及利亚人民英勇的革命起义。阿尔及利亚革命越来越使法帝国主义与摩洛哥和突尼斯资产阶级所达成的不稳固的妥协成为问题，使法国本国的经济、财政和政府动荡不定，使革命在中非洲的侧翼得到新的发展，并且正在粉碎着法帝国主义在生产石油的沙哈拉沙漠建立“权势”的最后希望。阿尔及利亚革命应该受到全世界工人的尊敬和赞颂，因为参加革命的群众具有牺牲的精神和无与伦比的克己美德，因为它的战士具有旁若无人的气概和走向胜利的不可动摇的意志。面对着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爆发在法国引起的深刻不安，面对着法国军队中的年轻新兵的拒绝服从命令和第一次兵变，法国工人运动是能够给阿尔及利亚革命以认真的帮助并利用这个大好机会给自己的第一号敌人——法国大资本家——以决定性的打击的。然而法国工人运动的群众组织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由于怯懦、伪善和对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消极——即使不是公开的背叛——而给自己蒙上了羞耻。

居伊·摩勒的改良主义领导把它竞选时的诺言抛在脑后，在殖民主义者在阿尔及尔发动的暴乱面前投降，而以在阿尔及利亚

組織了反革命鎮壓而夸耀。它违背良心进行的屠杀达到了种族灭绝的地步，实行的恐怖和折磨可以与希特勒相比，建立集中营制度已經根据所謂“特別权力”法案而被搬运到法国。至于共产党，不久以前还准备动员它的战士反对“美国”將軍李奇微，或者反对“德国”將軍斯派达尔，但是，它还没有看到有一种办法可以組織一次階級行动、一次罢工、一次任何规模的示威以迫使法国軍隊和帝国主义撤出阿尔及利亚。它沒有理由指責在全法国掀起的沙文主义高潮，因为它曾經和社会党同謀助长——即使不是发动——这个高潮。它也不能指責工人的消极态度，因为它自己过去的罪行对此負有責任。可是，一九二五年力量还很薄弱的法国共产党，却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开展了一个具有不同动力的反对摩洛哥战争的运动。

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有責任作为这个国家唯一的工人組織，驕傲地举起列宁的旗帜，举起法国工人和阿尔及利亚人民为击败法帝国主义而共同斗争的旗帜。这样，它就在波旁王宮的凡尔賽主人进行犯罪的大屠杀面前保全住工人階級的荣誉。

在拉丁美洲，玻利維亞的革命已經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西萊斯的反动政府沒有任何穩固的社会基础。它在美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和左翼官方領導——雷欽之流和其他前任“工人”閣員——的怯懦的鼓舞下，正准备从群众手中拿走一九五二年四月革命的一切成果，并建立一种残暴的軍事独裁。

但是英勇的玻利維亞群众、加达維和西格罗等地的矿工、农民，他們的組織和他們的民兵，这些人的战斗精神和过去一样高涨。在“革命工人党”(第四国际的玻利維亞支部)領導之下，他們不久将着手于强迫玻利維亞議會召开特別代表大会并在这个会上决定成立真正的工农政府，把全国群众从他們现在所受的經濟压

迫和从专制独裁的威胁中解放出来。

在玻利維亞的任何胜利都将在整个拉丁美洲得到反响，而面对着軟弱的資產階級政府的非常不稳定和它們所处的經濟混乱状态，一个革命的热潮将再度席卷整个拉丁美洲。从阿根廷到哥伦比亚，甚至到古巴，拉丁美洲群众将向玻利維亞革命的成功致敬，并且一定能够沿着同样胜利的道路奋起前进！

殖民地革命胜利万岁！

給各国人民以充分和完全的独立！

从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撤出帝国主义的占領軍隊。

光荣属于英勇的阿尔及利亚革命！

法帝国主义是法国无产阶级、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法兰西联邦的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打敗法帝国主义！

向資本主义的西方堡垒作新的进攻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时，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在它們把篡夺来的权力握在手里的时候，号召工人重建已經破爛了的資本主义經濟和国家。由于这些领导的背叛，資本主义在西欧的大部分国家里边經歷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誠然，沒有一个結構上的問題得到解决。南意大利沒有工业化；西班牙仍处在低到不能維持生活的工資和半封建的土地所有权的压迫之下；英国經濟的衰敗越来越明显；法国並沒有在它的工业现代化或在实现財政平衡方面获得成功；德国也沒有恢复統一。尽管如此，在最后这几年期間，資本主义工业还是毫無疑問地經歷了一次显著的繁荣，在多数国家里实际工資有了一定的增长。

但是，因为这种繁荣是在資本主义制度之下取得的，所以它照

例具有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一起产生的一切现象的特点。生产能力的發展远远超过广大群众的消費能力。有人由于投机和黑市买卖而暴发橫財，另一方面，千百万工資劳动者，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虽然劳动强度大大增加，而所得工資却不够維持最低的生活。到处都有豪华的建筑，但是千百万家庭却遭到了房荒的危机，它是道德墮落和个人不幸的根源。在普遍追求利潤的競争中，局面日益严重，通貨膨胀现象开始出现，欧洲再次发生美元不足，国际貿易的不平衡日益加剧。这样就聚集了已經在一些国家里开始了的新經濟衰退的一切因素。

在美国，它的繁荣基本上是靠巨大的軍事开支来維持的。在这个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里，区域性的物价波动已造成了可悲的社会状况和更为严重的經濟不平衡。紡織工业多少年来一直在衰落中。汽車工业的衰退已經繼續了两年，造成了在工业最发达的地方有大批群众失业。除了这些失业者以外，还有由于修改軍备計劃而被飞机工厂解雇的工人。南方的工业化不但远不能以和諧的方式解决种族問題，而且使黑人群众与白人优越論者的“核心”之間的紧张关系更为加剧。黑人越来越坚持他們爭取解放和真正平等的权利，而那些白人优越論者則为了保持他們的特权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对于美国資产階級政府的稳定产生了一种特別严重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不过是世界规模的殖民地革命所取得的发展在美国国内的反映。

这就是說，虽然有西欧和美国的繁荣，工人运动仍然处于給它的階級敌人以非常沉重(即使不是决定性的)打击的地位。这就是說，仍然有許多发生激烈变动的机会可以供工人运动利用来大胆地向全世界人民提出**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改組社会的解决方案**，以解决資本主义的混乱和剝削所造成的浪費。如果沒有利用这些

机会,其过錯就不在于“客观条件”,而在于传统的“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的軟弱与怯懦,这些领导对于必須在某一点上跨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体制之外的想法,比以前抱有更大的恐惧。

一个新的經濟衰退达到什么程度,最后还是决定于新的軍事开支的重要性(它将进一步破坏币制的稳定)。今天,在这种經濟衰退即将到来的时刻,第四国际号召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給社会主义带来的机会。

不准雇主关闭依靠你們的辛勤劳动建立起来的工厂。不准到处发生失业现象。銀行和一切基本工业国有化,其经营管理应受工人监督!一切由业主关闭的企业应由政府沒收!在工会监督之下制定并确立經濟发展的全面计划!反对托辣斯化的“欧洲”,拥护成立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由这个联邦拟定一项共同經濟计划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与“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一体化!目前实行每周劳动四十八小时或四十四小时的国家应一律减少为四十小时,目前实行每周劳动四十小时的国家应减少为三十五小时,工資一律不得照减!在工人监督之下采用各种自动化技术,并在全面經濟计划的范围内保証充分就业!

在苏联重新建立起苏維埃民主

在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进入决定性阶段时,苏联开始有了官僚制度。动摇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同样的力量,也在粉碎着克里姆林宫的独夫专政。殖民地革命的兴起和苏联技术与經濟的惊人发展正在破坏着这种专政的客观和主观的基础——无产阶级的相对軟弱和它害怕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苏联工人阶级现在确信社会

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对于将来抱有信心,并为他们在工业上取得的无比成就而自豪,他们正在重新抬起头来,谴责警察镇压、日益发展的社会不平等、官僚主义者过分的特权和与国家经济的巨大发展显然不相称的平凡的日常生活。

在斯大林逝世之前,人们已经感觉到了这种越来越大的群众压力。斯大林的逝世加强了这种趋势。面对着群众不满情绪的日益增长,斯大林的继任者恐慌起来,他们为了安定人心,不断地对群众作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让步,抛弃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承认了(虽然是转弯抹角地)那个可恨的独裁者的大部分罪行并应诺回到列宁的道路上来。克里姆林宫的让步和苏联社会所取得的新的成就,不但远不能平息怨恨的声音,反而已经激起并且还要进一步激起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在“人民民主”国家里,为什么群众对于当政的官僚主义领导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除了上述这些原因之外,群众还感觉到他们是民族压迫的受害者和看到他们的国家遭到了克里姆林宫的掠夺。这些感觉的力量和工人的难以忍受的经济地位,引起了东柏林和波兹南工人的巨大反抗。它们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反对官僚独裁的一股政治反抗潮流结合起来,终于导致了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

在波兰,群众运动由于同官僚机构的自由派结成联盟而战胜了斯大林主义者的抵抗。这个运动在胜利的中途暂时停了下来。在匈牙利,面对着动员苏联军队前来援助的斯大林官僚机构的凶猛的抵抗,革命迅速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几乎全体人民都起来反对官僚独裁的可恨的工具。革命刚一发动,匈牙利的无产阶级,按照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的传统,建立了他们的苏维埃,他们的工人委员会,要求掌握国家的一切权力。面对着这种威胁着要烧毁它的

整个“防堤”和甚至苏联本身的情况，苏联官僚机构作了无情的回击。但是，它不能粉碎工人阶级的英勇抵抗，因为各国的工人，包括共产党工人在内，都是和这个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的。在中国和甚至于在南斯拉夫，人们也已经都感觉到了在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和在苏联发生的政治革命的影响。

反对在苏联国内和在“人民民主国家”里的苏维埃官僚制度的政治革命，尽管有它的高潮和低潮，有时受到阻遏有时甚至是暂时的退却，但它已经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推动力量。它受到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先锋队（国际革命运动应尽力协助这项工作）的鼓舞，将在与世界革命互相密切影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勇敢地站在群众前列的苏联和东欧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能避免过渡的混乱阶段并把政治革命的不必要的牺牲以及反革命分子可能在各处从政治革命中得到的暂时利益减少到最低限度。

匈牙利革命万岁！它必将再度爆发，并且是不可战胜的，直到政权归于劳动人民的民主委员会！

打倒克里姆林宫在匈牙利进行的血腥的反革命干涉！

将以战胜哥穆尔卡中间派的一切犹疑、后退和背叛告终的波兰十月革命万岁！

苏联的政治革命万岁！它必将在苏联重新建立苏维埃民主，改组计划经济，排除官僚主义的控制，鼓舞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创造热情，使苏联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不可战胜的堡垒！

苏维埃政权万岁！使工人国家的再生成为可能的工人和贫农委员会的政权万岁！

同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相比，标志着全人类一大

进步的苏維埃民主万岁！

所有工人国家在平等基础上的联盟万岁！

工人同志，共产党員同志！

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紀念前夕召开的。第四国际向你們讲话，是把你們看作十月革命思想的合法的继承人，看作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維克党的思想的合法继承人，看作早期共产国际思想的合法继承人。今天，当克里姆林宮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們就是默认：苏联的老布尔什維克、俄国的和国际的左翼反对派，以及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在最近这三十年里，国际工人运动所以遭到一切失敗和挫折，其隱因必須从官僚主义的堕落和工人国家上层存在着强大的特权阶层这方面去寻找。如果說今天各国共产党正处在危机中，在許多西方国家里，共产党即使不是解体也是在全面撤退中，这并不是由于資本主义的强大，因为資本主义垂死的痛苦是每一个人都能完全看得到的，而是由于克里姆林宮所强加給各国共产党的錯誤的、罪恶的和背信弃义的政策。这一政策无助于保卫苏联。相反地，却引起今天本来可能成为工人国家的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联。

当克里姆林宮的领导人說他們要回到列宁的道路上时，必須要他們实现这个諾言：要求对最近这些年来的斯大林主义政策作出全面的和相反的修正。要求在共产党內部恢复討論的自由和成立派别的自由。要求重新組織一个共产国际，在这个国际里，全体共产党要在严格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制定

一个能够引导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共同路线

由于提出这些要求，你们一定会再一次遇到你们的官僚主义领导人的抵抗和阻挠，如果不是压制的话。你们不久将会看到，虽然他们想安定人心，但仍准备为他们的地位和特权作一番苦斗。

为了纠正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在全国的和国际的规模上组织一个反对他们的左翼反对派。研究列宁、老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和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著作：你们将会在这些著作里看到关于斯大林的罪恶和关于你们党的错误的唯一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说明。同第四国际的支部保持接触。它们正在耐心地和不屈不挠地准备建立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新的领导，你们在这个新的领导里将占有重要的位置。

使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的，明天也会使全世界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这就是：必然要进行到底的革命；由工人和贫农委员会掌握的政权；用社会科学和革命的全部理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党。

这次代表大会反映了我们的运动正在大大加强了，聚集在这次世界代表大会里的有来自将近三十个国家的革命组织的一百名代表和观察员，他们代表着一支已经行动起来先锋队的先鋒队，他们各自在他们的本国并且共同在全世界范围内起着教育者、协调者、统一者和真正的群众运动的推进力量的作用，他们在群众运动中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最有觉悟的无产者将和他们一起并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建立起世界性的布尔什维克党，以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十月革命的胜利。

为人类开辟胜利的共产主义时代的不朽的十月革命万岁！

国际无产阶级的光辉指针，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纲领万岁！

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机构用泥浆和鲜血污染了工人的宝贵旗帜，把一部分卓越的国际无产阶级导入了歧途，打倒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机构！

第四国际过去保全了共产主义的荣誉，明天将重新集合一切忠实的共产主义者作最后的战斗，以击败资本主义，取得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四国际万岁！

2 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 垮台(决议)

序 言

第四国际曾经在它的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重新估计了世界形势，从而得出了一般的结论；它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提纲——《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把这些结论应用到对苏联社会动力的分析上。

苏联的官僚机构专政、对于苏联无产阶级的政治掠夺和原子化，是全世界革命力量在反动势力面前退却的结果，也是苏联内部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关系对于无产阶级非常不利的结果。

国际形势和苏联国内形势的根本变化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在1943年以来、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以来全世界革命力量的高涨上，另一方面表现在使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的计划化的惊人成就上。这种根本变化破坏了苏联官僚机构取得支配一切的力量客观基础。

国际力量相互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苏联国内力量相互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官僚机

构。这两种发展是并行的。后一种发展不断地增加群众对于官僚独裁政权的压力，使它不得不对群众作出重要的让步，首先只是在经济方面，其后也逐渐推而及于政治方面。

因此，我们认为克里姆林宫的“新方针”不是官僚机构的自我改造运动，而是它的自卫运动。只要这种“新方针”的客观结果，特别是它所造成的官僚机构各阶层的从上到下的分裂，促成和甚至加速群众运动的觉醒，我们就认为“新方针”不但不能替代群众反对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而且相反地是这种政治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在苏联本国、“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中相继发生的越来越多的戏剧性事件，已经证明了这种分析的正确性。这种分析使我们的运动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唯一能够预见并正确解释斯大林主义世界危机的发展的力量。

铁托的恢复名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惊人的决议，赫鲁晓夫报告中的轰动一时的揭露，几个“人民民主国家”中“加速民主化运动”的爆发，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共产党的“危险的”发展，波兹南起义，波兰和匈牙利的政治革命——这些都是斯大林主义不断衰落的许多阶段和它的垮台的开始，是《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那篇提纲曾经详细分析过的过程中的很多跃进。

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面对着在昨天还为苏联官僚机构所统治的整个区域内显然已经开始的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特别有必要说明造成斯大林主义垮台的具体条件，即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崩溃的独裁政权的废墟上发动革命高潮和取得胜利的条件。

因此，现在的提纲既不再作《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那篇

提綱中的历史性的叙述，也不作它的结构上的分析与说明。现在的提綱不是那篇提綱的代替品或者修正物，而是它的一种当然的继续，因此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I. 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衰落和垮台

1. 1953 年以来，苏联工业发展的速度远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速度。在许多方面(燃料、一部分石油、机器制造、自动装置、核能的工业用途)，苏联已经克服了斯大林时代末期的落后和不平衡状态，并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53 年实行的有利于某些耐用消费品(钟表、自行车、电视机、缝纫机、洗衣机等等)生产的第一次重工业的部分改造，使以前被忽视的这一方面，也能在几年之内超过除了美国以外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可观地提高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

但是，苏联经济仍然受着在斯大林时代所造成的两种不平衡的遗害：一方面是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是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不平衡。这两种不平衡是下面这一事实的主要原因：尽管在过去几年内，毫无疑问地在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上获得了成效，可是和在比例上具有与苏联差不多的工业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来，消费量仍然低得很多。在高级食品(肉类、奶制品、进口水果)、耐用消费品(家具、小型摩托车、收音机、汽车等)和半耐用消费品(衣服和鞋)的质量方面，尤其是如此。房荒问题仍然存在，而且更加使劳动人民普遍感到不满。

和经济的一般繁荣相较，农业是落后的，这是现在苏联官僚机构领导人的主要苦恼。他们试图用越过集体农庄农民而另寻出路的办法(所谓“处女地”政策)，或者用刺激农民私人利益的办法(例如提高马铃薯的价格)，或者以消灭私人剥削的最后痕迹来恫吓农

民(要取消以銷售为目的的果菜园和牲畜)的方式来消灭这种落后状态。但是,由于缺少正确的前后一贯的全面政策,这些不同努力的零零碎碎的和常常互相矛盾的效果,并没有使真正的农业危机得到解决。

虽然在工业方面最初采取了一些缓和的管理分权化的措施,但过分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恶政仍然折磨着苏联的经济。官方承认的生产工人在苏联全部人力中所占的百分比,概括地说明了这些恶政。这个百分比不超过 35%。

所有这些矛盾和不平衡对于苏联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巨大的障碍。用民主的工人管理代替官僚主义的管理,在群众监督之下拟定、通过和执行计划,一定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开支和浪费,并保证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有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不必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

2. 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在 1953 年和 1954 年特别显著),不同的社会阶层不但远没有减少经济和社会的要求,而且以一种越来越明确和越公开的方式提出这些要求。这些阶层不但提出当前的要求——更好的食品供应;更好的工业产品;更好的工人住宅;更高的国家收购价格;更多的贸易自由;给农民以更便宜的工业产品——而且进一步提出能够表现苏联社会是由各阶级或各阶层组成的这一社会理论的那些要求。因此,那种在群众压力下实行让步的政策,虽然在马林科夫倒台后暂时受到阻碍,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开会和会后期间又重新得到了推行。

两种根本上互相反对的派别在苏联社会中出现了,并且得到了平行的发展;它们正开始提出它们的要求:

(a) 一派是工人阶级中最积极和最有觉悟的部分,他们越来越趋向于提出**工厂管理**的问题。这些工人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

取得了重要的让步(提高工薪,恤金平等化等)。工人们巧妙地利用“反对个人迷信”来攻击工厂内部的“一长制”(也就是厂长有无限专断权力)的原则。他们也在原则上得到了应该修改劳工法——世界上最严厉的劳工法——的承认。有些改革工薪制度的企图,借口反对过分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和等级奖金制度,实际上是降低最有技术的工人的总报酬;工人们在反对这种企图上也得到了成功。无产阶级这一派将从波兰和匈牙利工会的例子中得到鼓舞,要求工会回到它们的真正历史使命上去:保卫工人的特殊利益——在必要的时候反对行政部门和堕落了官僚主义国家。

(b) 一派是官僚机构中最有特权的阶层的最有自知之明的代表(托辣斯和工厂的经理、总工程师、将军等),他们正在为他们的特权寻求进一步的法律保障,因为这些特权由于群众的压力和他們开始采取行动而越来越不稳固。这一派特别于1955年在莫斯科工业会议上得到了好处(替经理們要求并且取得了模范地位;增加工厂中监督人员的特权),但是,目的在于修改劳工法的工人压力要消灭一部分这样的优越地位。官僚机构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要求把奖金制度推广到管理人员身上,并且获得了成功。它现在正要求在经济问题上放宽刑法,并且正在特别为每一个工业企业争取出售某些产品的权利,这将扩大这些货物的半黑市并使之合法化,给经济计划带来一个解体的因素。

至于农民,他们简直没有机会明确地提出任何范围广泛的社会要求。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总是想死守在一小块私有的土地上,在那上边集中他们的大部分劳动力,并从之得到大得不成比例的收入。赫鲁晓夫给予农民自由出售这些小块土地产品的权利,是对他们作出的一个重要的让步,将诱使他们提高蔬菜和饲料的生产。

因此，“新方針”的繼續，乃是为无产階級和官僚机构的更有特权的阶层之間的最后摊牌做着无情的准备工作，这一摊牌是以工厂管理問題为其主要賭注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一切关于經濟和关于工人国家的結構和管理問題。

3. 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准备时期起，人們已經清楚地听到在苏联知識分子工作者陣綫上正迴蕩着一种反抗的声音。电影、戏剧、文学、艺术、建筑、科学和哲学作品相继受到恶毒而有道理的批評；这既表明了日丹諾夫主义的可悲的失敗，也表明了新一代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要把自己从不懂和不符合于他們的工作的真正要求的那些“指示”中解放出来的热烈願望。苏联知識青年要求批評自由、思想自由和創作自由，而且要求得如此强烈，以致不能不对他們作某些认真的让步。

但是，給艺术家和科学家以公民特别是工人所享受不到的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批評自由，必然使艺术創作和科学研究成为社会批評的工具。这种范围广泛的批評，即使来自身为官僚机构忠实部下的那些艺术家(爱伦堡！)，也会使官僚机构的上层感到吃惊和忧虑——因此他們努力阻止这种趋势，甚至使这种趋势倒退，退向更为“忠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們只能容忍那些“尊重党的正确总路綫”的批評家。苏联历史撰述的一再改变方向——直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前夕都墨守斯大林主义的大部分傳說，此后好像是脱离了这个方向，实际不过是在官僚統治的鞭策之下更后退了，不論实行这种統治的是一个莫洛托夫或者是心胸更为狹隘的官僚——清楚地說明了一个面对着知識分子要求批評自由的官僚机构的搖摆不定。

但是，尽管这个官僚机构拚命反抗，尽管有后退，有迟延，甚至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表现出反动，苏联国内为思想自由而进行

的斗争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它的影响是不能抹杀的。通过今后动摇的独裁政权所显露出来的一切裂痕与罅隙，批判精神和反抗精神将渗透到政治领域中去，并且将爆发出政治革命的火花。

4.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标志着斯大林死后一直动摇着苏联官僚机构中上层拿破仑主义者的危机的高潮。这个危机本身是无产阶级与官僚机构之间在力量对比方面的根本变化的反映。苏联官僚机构的领导核心，在群众的和开始具有政治面貌的一种不满情绪的压力之下，分裂成为几个派别：一派赞成对群众作重大的让步（马林科夫—米高扬？）；一派主张加强专政（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一派是“中间派”（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自由派”对死去的独裁者的权威作第一次公开的攻击，公开企图把群众对斯大林的怨恨当作资本。赫鲁晓夫面对着这种情况，力图在他的秘密报告中，由他自己对斯大林进行更为猛烈的攻击，以使这种阴谋归于无效。这样，官僚机构在试图使贝利亚担负过去的集体罪行的责任而没能成功之后，就把它自己的领袖当作了替罪的羔羊，因而在不得不对付政治反抗以前，取得一时的苟安。

这一真正具有历史规模的巨大阴谋，从一开始产生时就显露出仓促和甚至恐慌的迹象。官僚机构的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控制，或甚至不能预见到他们这样解放出来的力量。虽然他们也许能在苏联共产党内部暂时不让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出现，也许在某些知识分子集团和官僚机构的下层中间暂时赢回某些同情，但他们却推动了一个真正滚雪球的运动，直到把他们压碎了为止。

由于以如此彻底地破坏了斯大林的威信——一切官僚专政的化身——他们无疑地在各方面破坏了官僚统治的威信和精神。由

于冷酷地暴露了他們曾經參預过的斯大林的重大罪行，他們也破壞了共產主義戰士對於他們的領袖的盲目的服從，同時也損壞了他們自己的名譽。他們用一種本末倒置的“個人迷信”來解釋這些暴露了的恐怖行為，不能使任何人滿意，並將引起人們對蘇聯社會和它的官僚主義墮落作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分析。

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就這樣使斯大林主義的危機在幾個國家里，特別是在群眾即將進行反抗的“人民民主國家”里達到了高潮。由於發動了一個加速政治革命爆發的運動，這次大會把無產階級和官僚機構之間的鬥爭重心暫時轉移到了蘇聯國境以外。這種得到解放的革命力量之強大使蘇聯官僚機構大為吃驚，因而試圖採取倒退步驟來阻止“肅清斯大林主義影響”（1956年夏），但是無效。這種倒退步驟的結果是更激怒了群眾，特別是在波蘭和匈牙利。最後，克里姆林宮不得不在這些國家里使用武力以鎮壓群眾的革命運動。通過和這個強大的革命運動發生接觸的蘇聯士兵，政治革命的浪潮將由這個“堡前斜坡”向蘇聯本國泛濫，從而為陷於絕境的官僚機構簽定死刑判決書。

而且，波蘭和匈牙利革命的头一个反响是克里姆林宮領導中心的派系鬥爭的加劇。赫魯曉夫受到了由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兩派組成的反對他的臨時集團的威脅，在中央政治局（主席團）沒有得到多數票。他是靠越過中央政治局直接向中央委員會申訴並把他的政敵排除於“集體領導”之外才得繼續當政的。由於使用典型的斯大林主義的手段（毀謗、羅織、偽造歷史）來達到這一目的，他在官僚機構下層和無產階級的越來越有意見的人們中間更進一步地降低了他的威信。通過使黨的一部分幹部更直接地參加解決這一爭論，他以身作則地幫助群眾關心政治，並為下一階段做了準備，因為在這一階段中，反對他的人很可能向代表大會

和一般黨員提出反对他的控訴。

5. 因此，革命的客观和主观的先决条件在苏联迅速地成熟起来。克里姆林宮頭頂上失去了全知的光輪之后，现在又失去了全能的光輪。官僚机构在脫去了独裁的袈裟之后，现在又正在失去开明的自由主义的假面具。历史正在以前所未聞的速度迫使斯大林的继承者放下所有的計謀，来赤手空拳地面对着群众的攻击。

群众的压力越加大，上层的分歧就会越加扩大。新斯大林主义派将认为已經作出的让步是引起群众运动的原因，并且将试图停止“自由主义化”，甚至对 1953 年以来所作的让步都发生怀疑。“自由派”相反地将认为，如果独裁政权不至少部分地承认人民的渴望，来自下边的运动将继续扩大；这一派将准备一次“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新高潮，也許甚至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那次高潮更为惊人。但是，这两派都不过是企图保持和維護整个官僚机构的特权。两派都将越来越要依靠軍隊——在拆散了特务組織之后唯一存在的有效的鎮压工具——来裁断它們的紛爭。

暫時排除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不但远未能結束派系斗争，反而使这个斗争更为激烈。目前的情况是，力量的对比正在向不利于苏联官僚机构的方向发展，社会上互相敌对的派別有在领导集团本身内部間接地反映出来的傾向。在这种情况下，官僚机构的軍事独裁上层不可能再度接受一个高高在上的公断人的鉄的統治。当领导人員繼續互相傾軋，并由于一再地和迅速地改变方向而在群众眼前失去威信时，公断人的任务就越来越轉移到軍事領袖的手中。同时在党的中下层干部，在工会，特別在青年中間，将引起以重建苏維埃民主为目的的半无产階級派別的最初的形成。只有在群众直接采取行动时，巨大的社会力量才能在互相对立的政治集团中間表现出它們的政治态度。

群众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官僚机构内部各派别之间的和红军士兵的苦恼与指定给他们的镇压任务（匈牙利）之间的这种日益紧张的关系——所有这些都越来越接近于爆发。假使官僚主义领导内部的一个集团被导向于诉诸群众；假使群众上街来解决他们所最关心的经济、社会或政治问题；假使青年、工人阶级或者甚至军队中的先进分子开始自发地提出一个政治要求的纲领，或者假使这些不同因素互相发生影响或者联合起来——被提到日程上来的，将是要保持独裁的根本制度（一党专政的官僚组织；为政府服务的工会；厂长的无限权力；形式主义的代表机关；收入的巨大差别）的力量和要对国家与经济实行民主管理的群众之间的公开冲突。群众压力转化成为群众的**直接行动**，将以这种方式宣告政治革命在苏联的开始。

II. 斯大林主义在“人民民主国家”里的衰落和垮台

6. 近年以来，“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和苏联是不同的。苏联的生产、生产率、实际工资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过去八年中不断地虽然是不平衡地在提高着，可是作为苏联的“堡前斜堤”的那些国家里的经济发展则矛盾甚大。这主要是由于苏联官僚机构对于这些国家进行了特殊形式的掠夺（赔偿、苏联公司、混合公司、规定片面特惠关税的商务条约等等）；这种掠夺对于“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是一种极大的负担，并且部分地抵消了它们在工业化方面的毫无疑问的进展。虽然在1953年6月17日柏林暴动之后，这种掠夺中最粗暴的形式受到抑制，但是这种掠夺政策的后果一直延续到今天，特别是在商业政策问题方面。

企图把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计划（重工业的绝对优先加上自给自足）应用于每一个所谓“人民民主国家”，造成了最不幸的后

果，特別是在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這樣的國家里。這些國家以前和世界市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直到朝鮮戰爭和帝國主義進行“封鎖”的時候，這種情況也還存在着。把“堡前斜堤”國家的經濟統一為一個整體的努力，甚或是一個共同計劃的發展，是遲延不決和顧慮多端的，而且表現了一種“完成”比較自給自足的國民經濟的思想，而不是一種為了“堡前斜堤”國家的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制定共同計劃的精神。

工人們，特別是德國人、捷克人和一部分波蘭人與匈牙利人所習慣了的較高的生活水平；有着古老傳統的農民對於小塊田產的更為強烈的依戀；比俄國人數更多並具有更為牢固的政治和社會傳統的城市中等階級的存在；最後，實際上在所有這些國家里成為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反對“民主”制度的主要集合點的天主教會的勢力——所有這些因素從一開始就使“人民民主國家”的社會比蘇聯社會有一種更大的不穩定性。

在這些國家里，反對黨派被消滅剛剛七八年；工人們一直保持着一種工會傳統，他們常常用消极抵抗、怠工、甚至直接罷工來反對工作定額的過分提高；農民田產和私人企業在“堡前斜堤”國家的農業中一直占有優勢。如果把這些事實加到前述那些情況之上，那麼，官僚計劃必須面對着比在蘇聯遠為危險的緊張局勢，並且甚至在遇到一部分由它自己造成的困難時也會遭到失敗，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因此，工業生產是以癱瘓性的節奏發展的，有幾年在某些部分表現出停滯或者甚至倒退現象。工人的實際收入在某些時期（1951到1952年在波蘭、1952到1953年在匈牙利和東德、1953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甚至下降了，而在許多情形下是停滯不動的。波蘭和匈牙利1955年的生活水平不見得高於1949年，並且至少

对于工人来说，无疑是低于 1938 年的。在最近几年内，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水平已经有所提高，但并没有超过 1947 年和 1936 年。东德自 1949 年以来，也有很大提高，但仍低于 1936 年的水平，特别是低于西德的水平。如果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大大超过了战前水平，那一部分是以食粮供应困难为代价换来的；这种困难是所有这些曾经是欧洲谷仓的国家所共有的，这就说明了斯大林主义农业政策的完全破产。

7. 由于客观条件和苏联有很大的不同，劳动群众与当权的斯大林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及群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苏联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差别和矛盾的。因此，虽然苏联共产党不能再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被看作是工人的党（第十九次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公布的统计数字证实，这个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官僚们组成的），但“堡前斜堤”国家中的共产党却不是这种情形。在这些共产党中，大多数先进工人仍然是积极的（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1956 年以前的波兰和匈牙利也是如此，虽然程度差一些）。这些国家的工会仍然具有一种矛盾的性质，官僚机构把工会看作是它们自己的胳臂的伸展，工人却常常抱有能够再次利用工会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希望——这证明是正确的，特别是 1953 年 6 月 17 日在东德，在波兹南和在匈牙利。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在这些共产党里边发动派系斗争就比在苏联共产党里边更为容易，尤其是这些斗争能够在一般党员和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中间引起远为广泛的反应。由于他们的客观生活条件远不如苏联工人阶级，这些派系斗争就变成了群众行动的准备阶段。这些全盘的客观条件，以及国家和党的官僚机构相对来说远为软弱的情况，大大地缩短了从这些派系斗争——在一切社会矛盾的压力之下——的爆发到群众政治革命开始之间的时间

距离。

此外，官僚机构离开整个社会而孤立的情况，在“人民民主国家”里比在苏联远为严重。在国外势力扶植下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发现自己所面对着的是仍然活跃着的自主的阶级的力量；它还没有能够在自己周围集结起一个广泛的工人贵族阶层；它所能支配的物质资料还非常有限；它由于1948年到1953年的一系列清洗而失去了活动能力。所以这样的机构，在由于担心群众反对而感到威胁时，除了采取公开镇压手段以外，就再没有真正的自卫办法，并且死守着“与苏联友好”（也就是屈从克里姆林宫）及“一党制的原则”，不容许有丝毫的裂痕，否则就有失去政权的危险。

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矛盾的事实：“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最初动力来自苏联，那里官僚机构的地位是比较稳固的，可是这种“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却在“人民民主国家”里产生了**最革命的影响**，在那里它成了直接政治革命的出发点。

最后，必须注意到，**民族问题**在这些“堡前斜坡”国家里所表现出来的更大的严重性。这些国家里的斯大林主义政党领导人一般都被看作是为外国力量所扶植起来的傀儡。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就利用民族感情作为资本。因此，在这些国家里，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而斗争就具有非常进步和革命的意义，它和西方国家里共产党的这种斗争完全不同，因为在那里，这种斗争一般是为转向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掩护的。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纳吉、也许明天还有东德的赫尔恩斯台特或者艾克曼，由于在群众看来是民族解放斗争的象征，正在为共产党的恢复声誉（通过党的民族倾向）创造着有利条件，并且容许在共产党反对派领导之下的政治革命动员民族感情来作为它的支持。这已经特别以一种标准的形式发生在波兰了。

8. 1948 年南斯拉夫共产党对于克里姆林宫的反抗是斯大林主义国际危机的第一阶段，也是“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远因。这种反抗一直影响着“堡前斜堤”国家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不同国家的内部发展。但是，在最近这个时期，这种影响也表现出它的极端矛盾的性质，它本身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矛盾性质的表现——一个停止在斯大林主义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中间的机会主义和实利主义路线上的中间派政党。

在苏联官僚机构发动“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以作为在群众压力之下的一种自卫行动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领导迟早必须重新提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问题。轰动一时的赫鲁晓夫到贝尔格莱德去的旅行；使人惊奇的铁托的恢复名誉；荒谬地以“叛徒贝利亚的阴谋”作为产生苏南危机的原因——这些是官僚机构的新领导不能不给予斯大林威信的第一次重大的打击，可是倒过来也给它自己的威信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任何官僚机构的威信以重大打击。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自己坚决认为：破裂的真正责任不在贝利亚身上，而在斯大林身上和斯大林时代苏联实行的整个政治制度上。在准备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整个严酷期间内，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又一次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了非常进步的作用。

与此同时，“叛徒铁托”的恢复名誉——突然比契尔文科夫、拉科西、贝鲁特、乌布利希之流受到了更大的重视——甚至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前，就给斯大林时代所设想和建立起来的各共产党与各工人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危机。一切共产党和一切工人国家根本平等的思想、关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起领导作用”的那种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观点必须火速加以修正的思想、其他工人国家决不应重犯苏联官僚机构在苏联国内

曾經犯过的暴行和錯誤的思想——所有这些思想很快地滲入“堡前斜堤”国家里，帮助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迅速发展。赫魯晓夫报告的影响和鉄托恢复名誉的影响結合在一起——而且这两种轉变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的——这些倾向在各国共产党内部就起了一种非常进步和甚至在客观上是革命的作用。

但是，当上层的这些分歧越来越在党员中間引起激烈的行动，而群众本身又开始参預政治斗争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本身立刻就对群众的反应规模感到恐惧，从“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发动者一变而为阻止者，力图使它只限于由一群领导人員代替另一群领导人員（保加利亚），或者甚至只由当权的领导简单地承认一下“所犯的錯誤”（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堡前斜堤”国家的政治革命准备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有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說是在鉄托第一次和第二次訪問苏联之間发生的。

南斯拉夫共产党不仅在主观上而且也在客观上成了东欧革命力量充分发展道路上的一种障碍。虽然南斯拉夫的由工人管理工厂的試驗，在一切維持着严密官僚制度的情形下，仍不失为一个进步的鼓舞力量，但是南斯拉夫国家和共产党的缺乏充分的政治民主，使正在寻求工人运动全部民主化的“堡前斜堤”国家的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感到很大失望，在波兰共产党中尤其如此。毫无疑问，由于还没有胜利的民主工人国家的榜样，革命的成熟期被推迟了；特别是在匈牙利，这使 10 月 23 日群众起义所造成的危机不能得到迅速的革命的解决。匈牙利革命的范围和大胆也使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感到畏惧，并且使它在布达佩斯的关键性的日子里采取迟疑不决的态度。

相反地，当苏联官僚机构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发动一个巨大的挽回“肃清斯大林主义影响”的运动时，当它努力譴責一切东欧共

产党的或多或少的独立趋势时，南斯拉夫共产党认为这是针对着它自己(这是很有根据的)，因而感到必须再度表明和强调反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官僚机构的立场。它猛烈攻击在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家重新出现的警察恐怖；它始而吞吞吐吐地(铁托在普拉的演说)，继而更为明确和更为大胆地(卡德尔在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上的演说)反对苏联干涉匈牙利革命；它给予波兰革命以无条件的支持；它为匈牙利提出(虽然是在事后)“一切权力属于工人委员会”的口号——所有这些在这一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并且使南斯拉夫共产党所采取的立场在各国共产党内部的分化上再一次起推动思想的作用。

南斯拉夫共产党反抗斯大林主义谰旨所起的进步作用，决不因为上述分析而又成为问题。这一作用已经载在史册。但是历史也用南斯拉夫的例子证明：一种在每天的基础上把一些暂时的“成功”凑拢在一起而制订出来的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政策，在群众革命高潮要求作出另外一种大胆的和合乎原则的决定时，会突然变成一种历史上的消极因素。这在朝鲜战争时得到了第一次的证明，在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严酷日子里得到了第二次的证明。

9. 波兰政治革命的根源不仅在于官僚独裁的全部客观条件和克里姆林宫加于这个国家的民族压迫，而且也在于半世纪以来不断表现出来的波兰工人运动的严肃的革命传统。由于迅速地打破了斯大林主义思想和教条(这些从来没有为波兰共产党所吸收过，因此这个党在1938年为斯大林所解散)的铁锁，波兰的政治革命再一次把自己和这种只有布尔什维主义才能与之相比的传统联系了起来。因此老一代和新一代波兰工人都有特别高的觉悟水平，这种觉悟水平使政治革命从最初阶段就凌驾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最好的理论和行动之上，其程度正如后者凌驾于真正的斯大

林主义之上一样。

共产主义觉悟曾經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得到最初的鼓舞，并且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間发生的一次领导的危机(貝魯特的死去)中得到了助力。当权的斯大林主义者所犯的特別严重的經濟上的錯誤也助长了这种觉悟，因而迅速发生了爭取党的领导地位的派系斗争，与此同时还展开恢复哥穆尔卡领导地位的斗争。

这时，思想自由和批評自由猛烈地爆发在工人組織的内部，鼓励着工人公开地表明他們的不滿情緒。如果群众压力是“民主化”的原因，“民主化”就为群众把压力轉变成为直接行动提供了根据。因此就发生了波茲南的罢工，这是无产阶级对于破坏工人切身利益的一种愚蠢的經濟和社会政策的答复。

波茲南罢工直接提出了关于爭取党的领导地位的斗争的問題。对于罢工者采取的镇压手段尤其是毀謗手段，引起了一次群众反对的风潮。斯大林主义派把罢工看作是有限度的“民主化”所造成的，并试图靠着克里姆林宮的帮助来限制工人阶级内部“过分”的政治自由。这时出现了一个左派反对派，他們决定在一切社会生活民主化的运动中坚决負起领导責任，借此和工人阶级重新接近并团结起来。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會議(1956年8月)在这个反对派的压力之下通过了重要改革方案，但是克里姆林宮的压力却足以給波兰共产党加上一个同等的领导，它在实际上破坏了第七次全体會議的方針的实施。

从1956年8月到10月，从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會議到第八次全体會議，在一切工人組織中都展开了斗争，并且越来越采取激动而猛烈的形式，轉化成为一种派系斗争，每一派在这个斗争中都试图动员无产阶级来支持自己。斯大林主义的右派求助于最卑

劣的反犹太人的和沙文主义的冲动，并且提出純屬政治煽动性的要求；自由主义的左派求助于工人的阶级觉悟和解放的愿望。这一派开始动员工人来反对官僚制度。

此后，群众运动达到了一个长期沒有看到过的新高潮。工厂工人开始自发地要求工人管理工厂。工人和青年学生站在政治民主化和回到列宁理論上去的的最前列。当哥穆尔卡在10月初参加了左派时，它的胜利看来是必然的了。作为最后的手段，斯大林主义派向克里姆林宫求援；斯大林主义者代表团在第八次全体會議上的蛮橫干涉，激起了无产阶级的总动员，他們占领了工厂，武装起自己并建立起委员会。在四天的革命热狂之后，反对派取得了党的领导地位。波兰的政治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初步胜利。

左派和哥穆尔卡的中間派联合起来推翻了波兰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这个左派經過六个月的激烈政治斗争，在无产阶级的中間扎下了深根并和它发生了千絲万縷的关系；它对于斯大林主义作了十分近似于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透彻的批評；它的綱領是动员工人取得經濟方面的领导地位。根据这些，我們可以把它——特别是它的先进部分，青年們——看作是波兰无产阶级现在正在形成中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领导的核心。这一派和哥穆尔卡的联合一直是不稳固的，因为中間派受到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力量影响，一方面是群众的压力每一次都把它推得更向左，另一方面是波兰官僚机构和苏联官僚机构的压力不断地把它拉回去。社会力量的对比，特别是左派的大胆和正确的策略无疑地将决定这种发展。左派是否有能力来彻底完成波兰工人阶级的列宁主义领导的任务，将决定于它是否忠实于它的綱領、是否实施这个綱領和是否与无产阶级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10. 与波兰革命得以获得初步胜利的那些条件相比，匈牙利的政治革命是在远为不利的条件下爆发的。这些不利的条件中有下列各项：

(1) 工人运动中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共产主义运动一贯存在着弱点和内部分裂。

(2) 斯大林主义独裁政权的警察横行的恶劣性质十分严重(拉伊克审判)。

(3) 由于在全党和工人运动内部缺少一个广泛组织起来的派系而缺少一个可以替换的领导。

这一事实使一群不完全是共产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裴多菲俱乐部”——在民主化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纳吉—拉科西(格罗)派的斗争不能在党的领导机构里得到反映。

(4) 1953年一度当权的“自由主义”分子在马林科夫失败之后被赶下台，因而使许多左派分子被清洗出党，并且使斯大林主义分子地位更为巩固。

(5) 缺少波兹南那样的警告信号，因而推迟了一个广大的纳吉派的建立，使斯大林主义分子直到最后一刻还拒绝对群众作任何实际的让步(拉科西辞职的推迟、对于裴多菲俱乐部的干涉等等)。

(6) 斯大林主义者当面对着虽然十分强大，但仍是和平的，并且没有越出“人民民主”范围的群众运动时，他们进行了使他们犯罪的真正罪恶性的挑衅：格罗的10月22日的演说，10月23日的开枪射击，要求苏联军队干涉。

这些不同的因素说明了为什么群众运动的高潮——这一高潮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拉科西下台，甚至到波兰革命第一阶段的胜利，一直是和波兰群众运动高潮平行发展着的——

突然变得更为激烈，并且从 1956 年 10 月 23 日起泛滥成为一种反对官僚独裁的起义性的总罢工。

匈牙利政治革命的这种更为自发的性质，使它的斗争手段和组织具有一种典型的无产阶级的形式：街头游行示威和占领工厂；军队走向人民的一边；工人普遍武装起来；在全国建立工人、士兵和学生委员会。

这样就为一个能够把全世界革命运动提到更高水平的迅速而光辉的革命胜利，集合了一切客观因素。促使克里姆林宫——在几经迟疑和一再改变政策之后——对于威胁着要扩大到所有“堡前斜堤”国家和苏联本国的匈牙利革命采取军事干涉的，主要就是这种革命胜利的危险，而不是反革命的危险。

但是，10 月 23 日的起义基本上是自发的，并且缺少一个能够迅速地把无产阶级力量统一起来、并能够领导它们迅速在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的独立共和国的革命领导。这就使人民中间的一切派别得以自由表现，使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得以重新出现，甚至使反革命分子也得以开始活动，从而使克里姆林宫的干涉行为有了好像是理直气壮的理由和凭空而来的借口。

站起来从官僚主义者手中夺取工厂和政权的武装革命人民，永远不会容忍自己被重新交到旧日的资本家和地主的手里。人民的强大足以阻止任何反革命的胜利。但是，他们越是缺少一个可以为他们支配的能够胜任的革命领导，过渡的混乱时期就会越延长，在这期间反动派就能够组织起来从事活动。苏联官僚机构从匈牙利撤退军队越慢，对匈牙利革命的直接干涉越积极，民族感情就会越激动和越在群众心里占首要地位。纳吉和他的伙伴渴望把这个运动的领导权重新抓到手内，就只能使他们自己适应这种群众感情的发展，并与苏联官僚机构的甚至最“开明”的派系发生公

开的冲突。

苏联对于匈牙利革命进行军事干涉的罪行，对于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这种干涉对于匈牙利共产党本身是一个严重的挫折，这个党现在已经完全和它本国的无产阶级断绝了关系。可是，这种干涉却不能破坏匈牙利工人的坚强的战斗意志。他们仅仅是在政治革命的第一回合中失败了。这种政治革命会从克里姆林宫造成的流血中再起，并且是不可战胜的。卡达尔政权已经被迫维持一部分 10 月 23 日的革命成果。在猛烈的消极抵抗和再接再厉的群众压力的鼓舞之下，政治革命将再度向前进军，并将以充分而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重新在匈牙利建立起共产主义的荣誉。

11.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报告和波兰与匈牙利的政治革命，对于所有工人国家的共产党都有深远的影响——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中国在“非斯大林化”方面表现了某种迟延，这特别可以从这个国家的落后状态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必须面对的巨大的客观经济困难上得到解释。但是，“非斯大林化”一派的压力强大得足以硬要使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作出一些重要决定，特别是赞同组织派系的权利、少数人即使在多数作出决议以后仍在共产党内部有维护他们的意见的权利和甚至赞同在一个工人国家里有必要容许几个“民主”党派存在的决定。这些意见，即使在中国没有见诸实行，但在许多共产党内部，特别在亚洲共产党内部，将引起骚动。

其后，国际规模的和甚至是中国内部的革命的与保守的两种互相矛盾的社会压力，似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部引起了严重的分歧。这个领导的一派似乎一方面对于匈牙利革命的镇压给以公开的支持，一方面也对于官僚主义现象，沿着“非斯大林化”

的道路，作了比克里姆林宮任何一派到現在為止所作的都更為深刻的分析（毛澤東關於“整風”運動和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口頭報告）；另一派似乎主張對於鎮壓給以堅定的支持，並獲得了暫時的勝利（毛澤東的口頭報告和公開印行的文件之間有差別、鎮壓浪潮等等）。中國本身所遇到的社會困難、罷工浪潮、農民反對農業集體化和學生的反抗，無疑地使這個官僚機構的大多數領導人認識到，任何“哥穆爾卡主義”的路綫都一定會在短期內引起群眾的起義。

即使在官僚獨裁沒有直接遭遇到群眾運動的國家里，也出現了騷動（東德的哈利希集團、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運動、保加利亞的清洗運動等等）。官僚機構的領導人不得不同樣地對群眾作出让步，特別是經濟方面的讓步，並不得不同樣地答應進行民主的政治改革。雖然匈牙利事件由於迫使群眾運動更順從整個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的意旨而不可避免地將在這些國家里推遲群眾運動的爆發，但是這些事件的長遠影響將使必然要爆發的對官僚機構的運動更為猛烈。

匈牙利革命的一個最引人注意的結果，是蘇聯 10 月 30 日的聲明。這個聲明說是要在新的基礎上建立起“人民民主國家”和蘇聯的關係，因此就默認了克里姆林宮曾經帶到各工人國家相互關係里去的民族壓迫的成分。

雖然克里姆林宮對於匈牙利革命的野蠻的干涉行為，和蘇聯官僚機構的善意的聲明是完全相反的，但是，每當“人民民主國家”想要有效地擺脫克里姆林宮的保護時，都要引用 10 月 30 日的聲明來反對克里姆林宮。因此，這個聲明將成為（這是蘇聯官僚機構所沒有想到的）一顆新的定時炸彈，會徹底破壞共產黨和工人國家之間的從屬關係。

匈牙利革命的直接反响，可能促使暂时在克里姆林宫占优势的派别重新对“堡前斜堤”国家采取“严厉”的态度。但是，这些国家里的群众压力一定会继续增加。民族独立和各国共产党脱离苏联共产党而自主的激昂情绪一定会“驱散”一大部分青年和共产主义斗士。把各工人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的关系改变成为平等和兄弟般的合作关系的过程是不可扭转的。苏联官僚机构越认识到这个过程的重要性，就越不能不用给“堡前斜堤”国家以有效的经济援助的政策来代替旧的掠夺政策，以力图至少和这些国家的官僚领导集团联合起来，不论这种联合多么不稳固。任何要回到对“堡前斜堤”国家进行罪恶压迫和经济掠夺的旧关系上去的企图，都冒有在短期内引起反抗的危险——这是克里姆林宫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的。

12. 《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那篇提纲，曾经把斯大林死后和苏联官僚机构发生严重危机的时期，描写为有利于重建第四国际苏联支部的条件迅速成熟的时期。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經驗完全证实了这种预测。这两个国家的左派共产党人的核心，根据自己的經驗，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真正的列宁主义传统重新联系起来，自发地在纲领上采取了和第四国际相近似的立场。如果说这样的核心在苏联还没有出现，将来也是必然要形成的。通过帮助这些核心彻底澄清它们对于官僚独裁的分析和它们的政治革命的纲领，向它们指出怎样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和怎样与在克里姆林宫统治下的一切国家里存在的或正在形成的多少属于中间派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的广大派别统合在一起，第四国际将试图于最短时期内在这些国家里建立起真正的支部，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組織。这将最好地保证可以在革命的烈火中锻炼出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并保证可以把产生混乱的危险和反革命力量

在群众起义的过程中暂时取得控制权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III. 第四国际的政治革命綱領

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发展、苏联本国政治革命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的迅速成熟、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斯大林主义政党中反对派的出现以及由官僚独裁的目前危机所引起的整个国际間的爭論，使第四国际有迫切的必要提出一个更为詳尽而明确的政治革命綱領。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可能引起反对官僚独裁的最初群众行动的当前的或者过渡时期的要求的问题。这样的要求一般要遵循《过渡綱領》中为苏联所规定的要求的路綫，必須由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些国家现有的具体条件来加以拟定。下边草拟出来的綱領，是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革命爆发的前夕、爆发期間和爆发的次日，向已經觉醒了的和在政治上积极的群众提出来的一个綱領。这是一个在政治方面和在經濟方面建立苏維埃民主的綱領，而建立这种民主正是政治革命中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如波兰和匈牙利的例子所証明的，先进工人曾經圍繞着这一问题进行过集中的討論。

这样的綱領不能再仅仅以十月革命以后最初几年的民主工人国家的經驗总结为根据。它必須同时以后来的工人阶级运动所积累的許多經驗为根据：苏联官僚国家堕落的經驗；第三国际和共产党的經驗；西班牙革命的經驗；南斯拉夫、中国、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不論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經驗；所謂“人民民主国家”的經驗；以及为建立一个真正的苏維埃政权而和官僚独裁政权展开斗争的无产阶级先鋒队和革命青年所提出来的那些要求（特别是 1953 年 6 月 16 日到 18 日在东柏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国提出来的要求；1953 年 5 月末在捷克斯洛伐克提出来的要求；1953 年下半年以后

苏联沃尔庫塔和其他强迫劳动集中营的起义提出来的要求；1956年6月波茲南罢工提出来的要求等等）。

13. 必須依据关于这个问题的經典的列宁主义理論，也就是依据苏維埃民主的原理，来检查工人国家組織。这一理論被认为是，和全体劳动群众甚至在最民主的資产階級国家里所能享受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比起来，要扩大而不是要限制他們可能分享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无产階級专政和苏維埃民主之所以是同义語；就在于：在給劳动群众以无限的政治自由的同时，能够而且必須限制或者甚至完全取消一切敌对階級的代表政治自由，以及所有那些目的在于推翻以取消主要生产手段私有制为基础的工人国家的人們的政治自由。

实际說来，要真正由苏維埃，即城乡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自由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既是立法机构也是行政机构，因此是民主組織的高級形式——来行使权力，那只有在有下列保障的情形下才有可能：

(1) 在苏維埃法律范围之内和工人国家的宪法范围之内有组织政党的自由。

(2) 有真正的出版和集会自由，也就是，每一个有法定的最低数目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支持着的或者由苏維埃的決議案认可的党派，都有权得到會議場所、广播和电视的放送時間，和与当时的供应情况相适应的紙张和印刷場所。

(3) 用秘密投票和提出代表各苏維埃党派的多數候选人或候选名单的方式，选举和分期重选中央立法机关的委員，和中央的、各省和地方的主要官吏；选民并能罢免那些他們願意罢免的当选人。

(4) 一切行政人員的薪俸，特别是国家行政人員的薪俸不得

超过一个技术工人的薪俸。

(5) 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和分期改选法官，借以保障他们对于国家行政机关的完全独立。实行充分听取发言的公开审判，法律明文规定保证每一件案子的当事人都有辩护的权利。

(6) 解散一切常设的秘密保安机关，而代之以公开的工人义勇队，必要时依靠经常在苏维埃公开监督之下的辅助机关来行使职权。

(7) 工人普遍武装起来，并在工厂和工人居住区建立自动武器的军械库。

第四国际所坚持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即使在无产阶级与它的阶级敌人之间的关系上有必要使用暴力，这种暴力也必须从工人阶级内部引起各派系在工人运动中发生冲突的那些关系中排除出去，必须从革命政党的各流派、各派别和各派系的关系中排除出去。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是按照敌人的抵抗程度对阶级敌人使用暴力。苏维埃民主的意思是在工人运动内部拒绝使用暴力，革命的党在它同工人阶级和社会其他劳动阶层的关系上，只能利用说服的办法和依靠经验。

因为实际上在工人阶级和他们的敌人之间并没有划出鲜明的界限，并因为各种客观条件能够使阶级敌人在工人阶级内部最保守的派系中寻求支持，所以革命先锋队有时就必须做一种痛苦的选择：或者在工人国家里接受一种危险局势的发展，或者为了克服这种危险而使用可能严重破坏工人对于这个先锋队和国家的信任的手段。第四国际并不想发表绝对真理或者定论，但它想说明，根据过去的经验，极为明显的是：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确保在全世界的胜利，一个工人国家就必须永远面对着**两种危险**：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复辟和官僚主义堕落的发展。国家越软弱，敌人所施加的压

力越强大,大多数工人就会越缺乏信任和政治主动性,而对于各部分工人阶级使用任何高压手段就会越使他们对国家失去信心并开辟通向官僚主义堕落的方便之门。因此,革命政党的任务是服从苏维埃的民主决定,即使它们犯了严重的错误;工人群众靠着经验迟早也会认识到这些错误并予以纠正。**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的原则,作为组织工人国家的基础,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获得它的充分意义。

第四国际在拟定政治革命纲领以在工人国家里重建工人民主的同时,毫不动摇地坚持保卫一切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它将和帝国主义为了自己反革命的利益来利用政治革命的一切努力做斗争。随着政治革命的向前发展,帝国主义会加紧这样做。这就使我们经常向群众和共产党员干部说明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14. 苏联官僚主义的堕落证明:官僚机构的权力的根源在于它对于国家生产机器的或多或少的独断独行。因此,国家机构、指导经济的机构和革命的党之间的关系,在保证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加强上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关系必须受下列各原则的支配:

(1) 工人国家和革命的党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一个完全不同于并且决不从属于那一个。这特别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国家机关不能——尤其是一个保安机关更不能——干涉党内各派系的讨论或斗争。这也意味着,任何由群众(或者苏维埃)选举出来的国家机关决不能由于党的决定而改变它的组成。

(2) 由党员选举党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民主的监督,严格遵守一切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定期举行代表大会和党的会议;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地方的、区域的和全国的领导人;有权组织派系

和甚至印刷內部派系公報；在中央機關解決重要分歧問題以前，應儘可能讓一般黨員徹底了解情況和參加討論；不得黨員所屬基層組織的同意不能對於黨員施加任何處分；等等。

(3) 對於分別組織在地方蘇維埃和工廠委員會中的國家機構和經濟機構進行民主監督。由這些機構的組織選舉並撤回這些機構的主要成員。各不同的政治派系積極參加選擇領導人和作為替換的行動綱領。

(4) 對於擔任領導活動的人不給以任何物質特權，除了非黨員的技術專家外，不能有任何例外；這些非黨員技術專家也必須受到蘇維埃基層組織的嚴格監督。

(5) 關於在黨、國家組織或經濟組織內部發生爭論的一切問題，應採取儘量提供情況和儘量公開的原則。如果無產階級想要有效地指導國家和在最短時期內取得必要的經驗以用最大的效率來治理國家，這就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15. 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社會主義經濟組織工作是一個試金石，從此可以看出社會主義民主在工人國家里是否在擴大——直到作為國家最後形式的民主制度本身消亡時為止——或者是這個國家趨向於各種官僚主義變形和出現一些能夠導致驚人的官僚主義墮落的新的社會不平等。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知道：國家的官僚主義蛻化只能是世界社會主義鬥爭史中的一個過渡階段，這一階段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一個工人國家（或者一些工人國家）缺少充分的物質基礎以及它的（或它們的）孤立。但是，在承認這一蛻化的基本原因的同時，馬克思主義者決不接受機械的無意識的宿命論，也就是說，不認為蘇聯的那種極度的蛻化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承認，工人國家的物質基礎越薄弱，蘇聯的那種官僚主義變形的危險

就越大，这种变形使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遭到**本来可以避免的**屠杀、失败和牺牲。马克思主义者了解到，革命的先鋒队必須在可能的范围内，作为主观的因素来反对自发的客观力量的作用，这些力量是貧困、周围不利环境的压力、缺少文化和技术等等条件所决定的。

在这方面，必須了解**把經濟职权和政治权力分开的必要性**，这样才能严格限制官僚主义的专断，同时能够最好地保証生产力的最协调的发展。

这种权力的分配应该按照下列方案有计划地予以确定：

(1) 就国民产品分配的主要方針(投資政策，发展速度、物价和工資政策)而言，在对于各个方案进行了民主討論之后，由中央做出决定(在苏維埃或工人委员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第四国际駁斥企业完全自主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神話，认为它是反民主的和反共产主义的。这种企业完全自主的結果，只能是为取得一个有几分自由的或有几分垄断的市場而展开竞争，这种竞争将带来的一切不公平(比較现代化的工厂工人将占有比較落后的企业的工人所制造出来的一部分产品，等等)，带来计划經濟解体的危险。

(2) 由全体无产阶级选举出来的代表制定一个总的计划，在这个计划的体制之内，由工人委员会管理企业。这些委员会在执行这个计划期間应该控制并在必要的时候修改这个计划；委员会应该**维护生产者**的特定利益(工作和工資定額的具体实施、解雇和雇用、工作的安排等)。委员会应该选举厂长，并同时成为学习管理工厂的**大学校**，在那里将有越来越多的工人輪流学会怎样行使管理工厂的职权。

(3) 工会的监督作用主要应该是在工人委员会(主要代表生产观点)和中央计划机关面前，保卫作为具有一定文化要求的**消費**

者和公民的工人的利益。工会应该討論一般的工作和工資定額，和怎样在集体的定期合同范围之内把这些定額应用到工业和工厂的各部門；工会应该監督各种形式的工人社会保险而不必担負管理的責任(这是属于国家的，也就是属于地方自治組織的責任)；工会应该力求减少劳动時間，增加假日照領工資的可能性和让工人参加各方面的文化生活，等等。工会应该和党一样，建立在严格的自願加入原則的基础之上；它們和工人委员会与苏維埃不同，在这些組織里，每一个企业的或当地的工資劳动者都当然有投票权。

对于罢工权利的有效保証，不仅是这一部分經濟权力的正式的而且同时也是它的有效保証。

第四国际由于坚决主张把經濟权力分开是重要的，还认为：无论一个組織机构如何理想，只要**工人階級的政治民主**和由越来越多的工人切实参加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沒有得到广泛推行，这个机构就只能是一个沒有內容的空架子。在計劃經濟中，关于怎样以較大的比例来分配国民收入的決定，是給一切管理机关規定一个比較严格的范围的主要因素，如果这些机关超出这个范围，整个計劃系統就会遭到破坏。只要工人階級的大多数沒有直接或間接(通过他們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参加作出这个決定，只要沒有由他們自己——在充分認識到这些事实的情况下——确定他們願意为发展生产力而牺牲的限度，就不可能具体談到一种真正的和充分发展了的苏維埃民主。只要不准許各派工人提出一般的或部分的其他可取的方案以供工人自己选择，这种参加就是虛假的而不是真实的。

16. 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富裕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組織形式。当无产階級在任何特定国家里——包括最发达的国家在內——取得政权时，现有的生产力是不足以对所有的公民，更不足以对全世

界人民保證这种富裕的。因此，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过渡时期無論如何只会是这样一个时期，在其中，无产階級不以这块土地上的**已有財富**的一种新的和更为公平的分配为滿足。无产階級必須保證**大大增加財富**的日常生产和在社会支配之下的生产手段的积累，以实现它的目标：組織一个保證充分和彻底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社会，而不是按照每一个人所貢獻出来的劳动来考虑給他以多大滿足。

有的工人国家还几乎沒有开始工业化；有的工人国家是在資本主义已經保證了现代工业重要发展的地方建立起来的。依据这个提綱，人們可能认为：在对于这两类国家提出来的生产問題之間，只存在着一种数量上的差別。可是，情形并不是这样，就发展社会化工业所提出来的問題而言，这两类国家之間还有性质上的差別：

(1) 从社会观点来看，在第一类国家里，工业化——即使在能得到国际社会主义經濟援助的情形之下——是在**不利**的环境中发展着的(大多数人口是小农业生产者)。在第二类国家里，工人国家可以指望**大多数**(即使不是三分之二)**人民来支持**它的經濟政策。

(2) 从經濟观点来看，第一类国家的工业化必須符合于双重目的：符合于工人的特殊利益(提高他們的生活和文化水平等等)，和符合于分化农民的需要(必須划能够无拘束地并入社会主义經濟的貧农阶层和能够在反对富农原始积累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中农阶层与农民脫离)。在第二类国家里，經濟发展可以基本上致力于滿足生产者群众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同时在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內保留相当一部分国民产品以帮助工业化較差的工人国家。

第四国际不仅承认这样的原則，即工人国家不能强迫工人作

超过他們自願接受的最大限度的牺牲；而且还认为，在一个长时期內，一貫地增加积累比例的任何企图都对于劳动生产率和对于生产者的自觉遵守紀律有消极的影响，从而造成巨大的損失和浪費，以至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可以从这种积累中获得的利益。只有在各經濟部門——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和各工业部門本身的发展之間建立起协调的比例的計劃，才能获得最后成功。这样一种制度的基础必須是在提高生产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同样提高生产者的生活水平。生产者越容易估量到这种平行的进展，他們就会越积极和越热心地参加这一协调的发展。这样一种一切經濟部門协调发展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排斥任何强迫农业集体化的政策，这种政策即使不是农业生产衰落的原因，也是农业生产停滞和城市食粮供应遭到严重破坏的原因。

另一方面，这些要求是与在农民的各阶层中間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相符合的；只要这些合作社給农民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他們不論在社会方面和在經濟方面都将准备接受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一个孤立在某一个大陆上的工人国家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建設社会主义經濟，这种情况是有的并且在将来也可能发生。但是，一切經驗証明，国际劳动分工和工人国家之間在平等基础之上的互相援助是促成和刺激經濟高涨的一个因素。这一因素在任何情况下，对于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生产水平都是不可缺少的。这是社会主义經濟最后战胜資本主义經濟的唯一根据。在一个国家里边或者在少数国家里边完成一种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經濟建設，这种想法必須被当作一种反动的神話来反对。

17. 苏維埃民主是蜕化了的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和資本主

义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的目标。沒有艺术創作、科学工作和一切人类文化活动的自由发展，这一目标是不可想像的。这样一种发展越来越証明是充分和全面利用革命交給新社会支配的技术力量和生产創造力量的巨大潜力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样一种自由发展并不意味着党和革命的先鋒队不表示它們自己对于可能在理論方面发生的許多爭論的意见。它的意思是：

(1) 革命的党通过有利于馬克思主义和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綱領的宣传与說服来从事战斗行动；它要求有最广泛的可能来进行关于这些綱領的教育，而不必由国家强迫教师团体或者青年团体采納或专门提出这些綱領。

(2) 对于任何不是革命先鋒队所认为进步的或最进步的科学、艺术或者文化流派，都不能进行鎮压或予以行政制裁，也不能妨碍它們的生产和創作活动。

(3) 国家不能以物质利益的形式，或者用分配特权地位的方法，对于科学、艺术或文化活动領域内的任何流派給以正式的贊許——这些領域对于完全应用自我管理的原则是最成熟的。

(4) 党在选定优先的社会、經濟或文化目标(例如住房問題的解决优先于城市审美者的需要)，和必須从理論方面(在制定长远計劃方面) 維持属于这些目标的正确原则——即使不能立刻实行这些原则——之間，必須划出明显的界綫。

如不彻底消除今天妨碍多数公民享受物质和精神的文明之賜的一切障碍，苏維埃民主同样是不可想像的。苏維埃民主必須完全保証人民免費受到各級教育，严格依据个人的能力来录用人員；必須沒有社会歧視地保証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受到免費医疗；必須保証青年充分地和自主地参加政治生活。苏維埃民主必須完全实行“同工同酬”的原则，极力鼓励妇女从几千年的压迫中解放出

来,同时允許她們按照生理上的特点来选择职业;必須按照十月革命的精神修改婚姻法,规定离婚和自願生育的权利(自由使用避孕方法和有堕胎的权利)、儿童的权利、学校的自治,在所有这些方面必須絕對实现男女平等,彻底消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压迫。

18. 苏联官僚机构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篡夺了政权;反对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将在以所有国家完全平等为基础的真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之下获得胜利。官僚机构以它的野蛮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狹隘的小资产阶级偏见伤害了各工人国家之間的关系,同样也伤害了苏联内部各民族之間的关系。

斯大林主义者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服从于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标准;第四国际譴責这种想法。第四国际也反对中間派的反列宁主义的綱領,根据这个綱領,要对一个强大的压迫国家的沙文主义和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作同样的譴責。第四国际一方面到处高举国际团結的旗帜,一方面在非常反动的大俄罗斯(和大汉族)沙文主义和受到苏联官僚机构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之間划出明显的界綫。这种民族主义常常不过是群众反对他們所受的民族压迫的一种正当反抗的变形,决不会改变他們为解放而斗争的客观进步性质。

因此,第四国际提出独立自主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乔治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同时主张所有这些工人国家在严格平等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或几个工人国家的民主联邦。

一个民主的工人国家将以彻底尊重一切民族文化特点的精神来教育工人和青年,并保証这些民族得到充分发展。它将坚持不懈地和任何沙文主义的表现、民族的或种族的仇恨、反犹太主义等

等作斗争，将在可能的情形下努力增强各工人国家工人的团结，并使他们关心和自觉地参加全世界每一国家的斗争。

任何使国际革命的利益服从于保卫一个工人国家的民族主义倾向——尽管这个国家是重要的和进步的——都永远是官僚主义变形的明显标志。

19. 第四国际以看待一个革命的党的同样的精神来看待工人国际的问题。一个包括一个或几个在工人国家里掌握政权的党的国际，不能把政策“强加给”这些国家的人民或政府，正如一个革命的党不能把政策“强加给”组织在苏维埃里的工人一样。一个革命的党只能加强它提交给工人决定的那些论点的说服力和威信——即使这样做，也只能是在这样的范围内，即经验已经向工人证明，这个党一贯地维护无产阶级的集体利益，使这些利益不受特殊的或民族主义的损害。

一个抱有这种精神的革命国际，不但远不能因为无产阶级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里取得政权而成为过时的或失去其重要性，而且将始终是解决建设世界共产主义所提出来的任务的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工具。这些任务是：

(1) 除去一个或几个工人国家必须运用的不可缺少的外交策略以外，这个国际要协调一切革命政党——包括已经取得政权的党在内——的斗争，以便在最短时期内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

(2) 在革命胜利之后，这个国际将尽一切力量调整和鼓励最妥善的国际经济计划，借以增进工人国家结成联邦或邦联的实际可能性。

(3) 直到世界共产主义实现为止，这个国际将是在不断革命过程中协调和鼓励工人国家革命先锋队一切活动的一个工具。这一点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在这方面必须有全面的理论总结，而

这不是根据片断的国家經驗所能完成的。

即使許多共产主义战士从共产国际和以后从斯大林主义时代的共产党情报局那里得到了痛苦的經驗，因而他們对于一个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之上的国际的想法感到厌倦，这种厌倦也是完全沒有根据的；对这种倾向让步，就是放弃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共产主义的世界危机并不是由于共产国际的蜕化而开始的。官僚机构首先是在一个党，俄国的党里破坏了民主，因而离开列宁主义的道路。国际越有力量，越是不受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特別占优势的支部的影响，就越容易对一个党或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化进行斗争，把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健康部分的全部压力轉移到最受威胁的国家里去。

因此，我們必須反对“多中心”的国际組織的想法和各共产党之間具有純粹“双边”关系的想法。这种机会主义理論的目的完全不是保証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而是保护本国官僚机构以免它受到国际革命的影响。

IV. 斯大林主义在資本主义国家里的衰落和垮台

20. 共产党危机起源于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願望和苏联官僚机构所要强加給他們的作为苏联外交政策工具的任务之間的矛盾。这种危机由于两个原因已經在过去几年之內加深。一方面，全世界革命高潮的发展已經使几个共产党面临着革命前的（或者革命的）形势，并且已經引起党内战士对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綫表示不滿。在某些情形下，如在阿尔及利亚，工人或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已經如此强大，以至迫使斯大林主义的领导离开原来站在反革命方面的立場，做了一个重要的向左轉。

另一方面，在苏联本国和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官僚机构危机

的爆发，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危机都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这种危机在斯大林死后立刻爆发，由于铁托的引人注意的恢复名誉而更为加剧。它随着苏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达到第一次爆发点，这不过是为了很快地随着波兰和匈牙利革命而达到第二次爆发点和一个真正的决裂。说今天的共产党已经分成为两派并不算是夸张；有些共产党（波兰、南斯拉夫、挪威和美国共产党，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典共产党的一部分，以及英国、澳大利亚和巴西共产党党内有强烈的反对派，等等）谴责第一次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并对于第二次干涉（即使不是谴责）表示遗憾，宣布它们和波兰革命是一致的。另外一些共产党（苏联、捷克、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法国共产党）则卑顺地宣布和克里姆林宫的方针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大多数亚洲共产党跟随着它）似乎在这两派当中占一个中间地位。它逐渐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仲裁人的地位发展，同时和克里姆林宫共同努力，以图限制“非斯大林主义化”对于国际斯大林主义运动的分裂作用。

这种惊人发展的起因是明显的：在波兰和匈牙利革命当中，现在促成斯大林主义危机的两个派别——客观的革命派和主观的“非斯大林主义化”派——聚合到了一起。此外，在匈牙利，苏联官僚机构自西班牙内战以来第一次被迫担任一个公开反革命的角色——也就是说，它自己对群众革命高潮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1953年在德国的规模要小得多）。虽然在世界的某些部分，匈牙利事件与不利于群众革命高潮的客观形势相符合，但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情形却并不是如此，对于这些国家，匈牙利事件可以作为它们自己斗争中的一个直接教训和鼓舞。因此，“正统派”的斯大林主义者的立场在这些国家里边就变得更站不住脚了。

21. 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这些共

产党内危机的一般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 斯大林死去以后，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揭露以后，斯大林主义思想的根本基础——也就是相信领袖，相信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永远不会犯错误——已经受到了一种致命的打击。所有共产主义的根本问题都再一次被提出来讨论。自此之后，每当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苏联政府的行动似乎与一部分或整个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战士就会公开地对于这些行动的正确性发生疑问。

(2) 信任乃是服从的基础，丧失信任就要引起一种真正的反抗，反对官僚主义共产党领导的严厉制度，反对没有言论自由，反对官僚机构的专制和它用以在共产党上层维持统治的反民主方式。有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在党的公开组织里进行真正的讨论；定期召开代表大会；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领导人；有权在党内组织派系，或者至少——如中国共产党的新党章已经规定的——少数人即使在大会上失败之后仍有权保留他们的意见。

(3) 因为除了少数情形外，斯大林主义领导者不肯对于一般党员的民主压力作出让步，或者只肯作出部分的让步（为了保持他们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所以一般党员的先锋队都按照他们自己的党的官僚主义气氛的多少，建立或多或少的公开的或秘密的派系，以便根据一定的纲领强迫实现政治活动的民主化和改正过去的情况。现在正随着公开或秘密讨论在党内的发展，对于这些纲领作多方面的研究和比较。

(4) 这些派系和反对集团不可避免地要根据赫鲁晓夫报告所揭发的那些经验来修正它们和苏联的关系，并分析苏联社会与苏联国家（或者如南斯拉夫和波兰共产党那样，更普遍地分析从资本

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所提出来的一切問題)。“俄国問題”(如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曾經在一整个时期內討論过的)现在正在共产党的整个一个派別中爆发出来。

(5) 这些起来反对得到滿足的保守主义和当权的官僚机构的愚昧的反对派系,不久就发现它們的綱領不仅要包括苏联問題,而且要包括一切共产主义理論問題: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对于现代資本主义的分析,对于殖民地革命的态度,工人委员会問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問題,“国际”問題等等。

22. 經驗証明:在共产党內部形成的反对派系,根据它們对于这些具有直接重要意义的和关于理論的各种問題所采取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类:右翼反对派和左翼反对派。

右翼反对派是許多重要共产党长时期以来(甚至最近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右傾机会主义的必然結果,但是这种机会主义在它和資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上失去了主要制动器——斯大林主义的党必須无条件服从苏联官僚机构所造成的制动器。这些派別(法国的埃尔維、意大利的吉奧里蒂、美国共产党的盖茨派等)把赫魯晓夫的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用和平和議會方式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包括最强大的資本主义国家在內)取得政权、与社会民主党人保持紧密接触等等說法当作眞話。它們正在迅速地向“社会民主党化”发展,并且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从“和平”的观点,或者甚至更鄙俗地从他們偶然生在那个地方的“国家”(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家!)的观点,来怀疑殖民地革命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左翼反对派起来反对赫魯晓夫关于斯大林主义現象的許多矛盾解释和他們自己的党的根本是机会主义(时常和幼稚的宗派主义結合在一起)的政策。这一派責备共产党领导沒能

利用許多有利机会来鼓励群众运动,或把它导向胜利,沒能真正在本国的工人运动中扎下根基。这一派不是要和这个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平共处”,而是要和它做更激烈的和更有效的斗争。法国共产党的“馬尔提”派、奥地利和巴西共产党的反对集团、意大利共产党的各反对集团都是这一派的代表。

只要这些派别在共产党内部表示它们的意见,或者为有权公开表示意见而斗争,那末,在共产党内实行一种特有的参加进去的政策,第四国际各支部,以及这些支部所领导或者与这些支部合作的同情者,将主张共产党内部的一切派别在领导机构内有发言权和民主的代表权。在受几十年官僚主义箝制之后,下层共产主义战士的濒于危殆的心理状态,在它能够重新获得能力以在政治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以前,需要对于各种意见作长时期的思索、讨论和争论。左派对于各派系的互相自由争论是没有什么顾虑的,因为这将有助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先锋队在这些国家里的形成。而且,既已把组织派系的权利当作一个主要要求提出来,就不能再否认抱有不同政见的派系也具有这种权利。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托洛茨基主义者将站在斗争的前列,为一切党员(无例外地)争取共产党内部的民主,同时号召最先进的分子组成一个左翼反对派。

23. 在西欧国家(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员众多的共产党里边,正在讨论中的“非斯大林主义化”问题,由于这些党的官僚主义领导显然不能利用各种有利于党的发展的革命前的和革命的形势而更为严重。但是,与此同时,在这些国家现有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更大的破产(在法国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对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冒险,在意大利是和天主教民主党合作)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仍能控制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尤其是斗志最旺盛的部分。不过,在意大利,南尼的社会党的比较靠左的路线对共产党进行了激烈的竞

爭。为此，最健全的和最左的派系将留在共产党内部；趋向于“右翼共产主义”的被逐出的集团将迅速堕落为右翼中间派或者甚至左派社会民主党。匈牙利与波兰革命的发展，和波兰与南斯拉夫共产党所作的在思想上影响其他共产党的努力，也有同样的效果。这并不是说，我们第四国际的各支部，作为原则问题，应该不屑于去在这些组织里进行工作，特别是当它们在工人阶级的各部分中拥有多数人和发生影响的时候；但是这一工作要继续服从为我们所特有的参加进去的总策略，这一策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证明是在这些国家里建立真正革命政党唯一有效的策略。

对于西欧較小的斯大林主义党(德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家的共产党)却不能一概而论。在这些国家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不仅是由“非斯大林主义化”和波兰与匈牙利革命的一般反响所促成的，而且也是由共产党对于群众影响的可悲的降低、几乎完全孤立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之外和不能——尽管时时交替地采取宗派主义的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策略——“和社会民主党員和解”等等原因所促成的。这些共产党的右翼共产主义派特别喜欢投降，并且甚至常常提出等于完全解散共产党的建议。左翼共产主义派，在它们还没有因为对群众运动采取彻底的宗派主义而失去作用时，不久会采取与我们的行动很相近的策略。我们一方面建议这些分子继续在共产党内部为列宁主义路线的胜利而斗争，另一方面，作为右倾政策的代替，我们必须向它们提出，在第四国际各支部的统辖下，根据一个革命的纲领，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会内部进行工作的方向。这一工作的目标并不是要它们适应改良主义领导人的机会主义，而是要在最短时期内减少这些领导人对于最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人阶级的影响，并帮助以后建立一些新的群众的革命政党。根据这样一种纲

領（各支部在這項工作中所得到的積極結果使這個綱領受到了重視），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行動把共產黨反對派分子爭取過來。

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的共產黨里边，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所強加給這些黨的領導人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更特別助長了斯大林主義的危機。這一路線就是直接地和卑屈地服從于和蘇聯官僚機構聯合起來的或為官僚機構所“中立化”了的殖民地資產階級的利益。在普遍的“非斯大林主義化”的氣氛中，這一路線可能造成強有力的左派在這些黨內的发展。但是群眾革命運動的壓力實際上也能使這些黨的領導，或者其中的一部分，擬定一個轉向革命的方針，並在一個獨立自主的左派誕生以前就壓制住它在黨內的发展。

不論資本主義國家里各共產黨內部的斯大林主義危機在下一階段採取什麼形式，正在“人民民主國家”和蘇聯發展着的革命運動已經預示出它的最後結局：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思想流派的斯大林主義的消失，現在的一部分幹部和共產黨戰士回到社會民主黨（或者類似的中間派或右翼組織）里边去，和大多數具有信念的共產主義戰士的最健全的部分將在危機中出現的新的革命政黨中重新聚合起來。

V. 作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一個階段的蘇聯 和“人民民主國家”的政治革命

24. 蘇聯和所謂“人民民主國家”的政治革命的本身是不斷革命的一個過程。這個政治革命的爆發是由于勞動群眾對於官僚機構懷有積怨，它將按照本身的邏輯，從一個全國各階層參加的民眾革命向越來越快的社會分化發展，其結果只能是最無產階級化的和最有覺悟的一派獲得勝利。這一派由于主張和完成把一切權力

集中在民主选举出来的工人和貧农委员会手里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可是，不断革命的性质并不停止在工人委员会的取得政权上。相反地，取得政权将为一个特别丰富的革命时期开辟道路。在这一时期里，由于大胆精神和創造力量在革命的刺激之下达到了最高的表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将受到无情的批判和修正，以便到处产生与社会的物质结构相适应的直接民主、平等和团结的最高形式。这个社会物质结构，由于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最后将从官僚机构的保护下解放出来)的巨大发展和革命向着国际間扩张，将迅速地扩大，而这种扩大本身将成为不断革命的目的。不断革命的这一阶段将越来越有意識地企图达到下列的伟大目标：苏維埃民主在代表人类的三分之一和地球的四分之一以上的一切工人国家里的胜利。

25. 但是，在官僚主义蜕化的或变了形的工人国家里的政治革命，不仅是以本身动力为依据的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而且也是不断革命的世界动力的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政治革命在几个现有的工人国家里边的胜利不能回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本形式上去，这在事实上是不能想像的。这些国家不但远没有什么需要维护的特殊利益使它們不得不继续努力把国际工人运动置于保护性的控制之下，而且它們还会尽可能帮助和鼓励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

而且，無論是在客观上或者在主观上，国际工人阶级运动还将从苏維埃民主在苏联的重建上得到一种只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与之相比的鼓舞。完全以官僚机构的罪恶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宣传和它的社会民主党僕从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影响一定会消灭。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里的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将很快地成为可能）一定会增加这些国家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人民的吸引力。最

后的资本主义强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久就会在一个到处是它的敌人的世界上被孤立起来，而全世界的大多数工人不久一定会站到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这一边来。其中大部分国家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重新加强，无疑地会把在短时期内夺取政权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革命在全世界的具体发展，使中国和殖民地的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主要动力。这一革命高潮在到达苏联和为苏联官僚机构所统治着的国家里时，使反对这个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第二个强大的动力。在这些国家里，革命将发现自己面对着的是千百万有能力的和有高度教养的工人，他们今天能够以德国或法国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同样觉悟，来解决人类的社会主义改造所提出来的问题。政治革命在苏联胜利的具体前景是，无产阶级在世界上第二个最强大的工业国家里直接掌握政权。而这只不过是世界革命最后胜利的一个序曲。

七、第四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 大会文件

(1961年1月)

1. 宣言

全世界的劳动群众:

殖民地革命的广度和深度,工人国家朝气蓬勃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本身不断发生的矛盾,正在加深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并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开辟空前广阔的前途。

科学的发明,应用原子能方面的巨大进展,以及探索空间方面的惊人成就,证明人类拥有使自己摆脱匮乏和贫穷的难以估计的可能性。同样地,千百万男女动员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制度的斗争,以及群众建设新经济的创造性精神的发扬,证明人类可以依靠这种巨大的主观可能性来利用一切创造性力量,剥夺掉帝国主义的破坏能力,建设一个迄今无人怀疑的能够继续发展成长的和谐的社会。

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的表面化,其规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广阔,动员起来的力量没有像现在这么大。从阿尔及利亚到南非,从古巴到阿根廷,从土耳其到印尼和日本,各个地方的群众都卷入这场斗争里,甚至迄今被认为是最落后的、最少受时局影响的人也不例外。在短短几年甚至几个月内,这些群众克服了分散状态,历史上的落后状态和社会与政治组织的落后形式,并由于他们闯入世界舞台而提出了人类争取发展的最先进和最适时的任务。

帝国主义的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则为苏联官

僚机构的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工具——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面前正在逐渐失去它的支配力和主动性。威胁着爆发世界冲突的危险点在于以古巴的农民或刚果的半部落制居民或者是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的最受压迫剥削的群众为基础的暴动。

工人国家动员起来的庞大人力和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巨大发展,在另一方面也碰到这样的事实,即帝国主义现在还保持着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几年来社会也比较安定。正是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所动员起来的这些巨大的力量和帝国主义为保卫它的制度而集中起来的旧的力量之间所表现的矛盾冲突,它的规模和潜力,同时它所具有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是人类前所未见的。

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力量的结合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已压倒了老斯大林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者,他们必须不断使自己适应为他们所不能控制的新形势或调整他们的策略。中苏的矛盾;“民族主义”领导者所受到的深刻的歪曲;以及他们中间所发生的质的变化(如古巴的情形);共产党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危机的新发展;——所有这一切表明这些老的领导者已落在这个革命的新生力量的后面。

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之间日益发展的联盟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在推动着这历史的进程,它要求有新的领导。根据欧洲无产阶级(如比利时罢工所表现出来的)投入这场斗争,并在帝国主义的心脏打击帝国主义势力所能达到的程度,形势的动力因素将会使世界革命向前跃进并且取得更加深刻得多的发展。

革命已进入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整个说来是不可改变的,帝国主义或官僚主义领导机构用尽它的一切力量也不能加以改变,相反地,官僚主义领导机构在国内的地位已经动摇并且日

趋崩溃。

在帝国主义的虎口下取得胜利的古巴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一个新型的和具有特别根源的工人国家，它显示了革命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革命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动力，这种力量已克服了对于它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的一切限制，克服了斯大林主义的反抗，战胜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领导的一切旧的倾向和观念。与旧的领导不同，正是今天这个革命向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其他大陆的人民指出了群众革命行动的道路和可能性。

阿尔及利亚群众的伟大示威运动打击了法国帝国主义的一切计划，它同时给予阿尔及利亚革命新的动力和新的范围，为新的思想发展与政治发展开辟了道路。

刚果的危机在经过几个月之后所表明的事实，虽然有着极不相同的情况和形式，然而可以同玻利维亚几年来的革命所表明的事实比较起来看：它们都缺乏一股具有足够的明确性和力量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来解决局势的潮流，同时，帝国主义也没有能力在这些国家重新建立起帝国主义的统治。

比利时的罢工，和英国工党左翼过去取得的进展与政治成就一样，表明了欧洲无产阶级尽管遭到挫折和局部的失败，仍然保持着革命的精力，同时也表明了帝国主义政权所享有的稳定性缺乏巩固的基础。

整个形势以及工人阶级国家本身所取得的成就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压力，正使工人阶级国家和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机构陷于窘境。

- 官僚主义行政机构和一党独揽的方法与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越来越明显地同发展中的经济和社会发生冲突，这个社会拥有从事深入的创造性工作的无产阶级、农民群众、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員。

中国人和苏联官僚主义机构在观点上的分歧，表现了在殖民地革命发展和国内发展的新阶段的压力之下分化的因素。八十一党会议企图在一个新的水平上稳定共产党的思想，在保持与资本主义和解的观点的同时，也保持在殖民地革命压力之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思想，这个企图只不过是一种妥协，是不能持久的。它也表明了斯大林主义在现阶段没有能力使自己适应世界领导的新的要求。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讨论和法共及其他共产党内部的危机是一种迹象。赫鲁晓夫通过中级领导干部对全党发生的直接呼吁，同时坦白承认官僚机器不是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的需要，这个新的企图也间接地表现了群众关心并逐渐过问经济管理问题。

工人阶级国家并没有分成哪些是比较有朝气的，哪些是比较保守的，但是越来越同官僚主义上层建筑发生抵触，这种官僚主义上层建筑在苏联更加强固，但是它们正以更有朝气和充满革命可能性的方式继续在各地发展。

在革命发展中的这条新道路危害着旧的领导并加速它的危机，而继续为发展新的领导提供客观因素。

新的革命形势继续勇往直前，一般说来，是按照其发动和采取的形式，伴随着一般与旧的方针和领导无关的青年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而来的，他们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之下，倾向于向前推进。

古巴的革命已逐渐克服了对它的领导的阶级限制和克服了旧的领导的反抗，并把它任务发展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土耳其和南朝鲜的暴动；阿尔及利亚大城市群众的骚动；南非群众的行动；比利时群众的斗争，为争取改变制度的成熟局势开辟了道路；拉丁美洲群众几年来脱离了他们的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所坚持的行动——所有这一切为建立新的领导打下了客观和主观

的基础。

第四国际坚持和发展了现阶段的革命綱領，即全世界人民群众爭取社会主义的革命动員的綱領，它必須越来越发挥作用以建立这种新的领导来领导这新阶段的革命。

这条革命的道路正在发展着难以計数的力量，除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預言和綱領之外，它客观地超乎任何預见和綱領。参加第四国际各党虽然小，但是它們能够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领导或参加领导革命运动。要建立这种新的革命领导，要求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先鋒队采取比过去更大胆和积极的行动，因为旧的领导正在施加各种压力以維持他們的統治，他們并且力图引导、轉移和阻止新的发展和加入斗争的新阶层。

殖民地革命和工人阶级国家建立联盟的問題(正如古巴革命所表明的，它开辟了很大的和生气勃勃的可能性)，殖民地革命中的工农联盟問題，游击战争在发展和集中革命力量方面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些都要求采用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以外的方法，为革命馬克思主义的創造精神和主动性打开道路。群众在几个月內就获得了成熟的經驗，——在其他时期，这也許需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根据革命发展的新道路，在今后几十年內必須加以解决的任务是：发展、指导和集中最庞大和最生气勃勃的力量来推动人类建設社会主义社会并建立能够担負这个任务的领导。

全世界的青年們！

在殖民地革命中，在工人阶级国家里，在帝国主义国家里，这种革命的发展，是同能够摆脱旧的领导的传统、能够以最大的勇气和最快的速度学习和行动的新阶层投入这场斗争相联系的。在青年人投入斗争的地方，他們就以他們的干預行动和开展消灭殖民主义、爭取社会主义和打破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控制的斗争，

为群众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们！

在这唤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大革命中，千百万妇女正在激烈斗争中争取实现完全解放的权利。从南非到阿尔及利亚、从拉丁美洲到亚洲，她们正在粉碎着社会套在她们身上的锁链，这个社会不仅是建立在人剥削人的基础上，而且基本上是建立在对妇女进行绝对压迫的基础上，把妇女置于完全下贱的地位。在中国，妇女参加革命是建设新社会的重要基础之一。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参加无产阶级斗争（如比利时大罢工）或参加反对殖民战争的斗争（如法国）的妇女人数正在不断增长。

在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中，妇女必须在工人运动和反帝运动的领导机构和在为世界革命的发展所需要的建立新的革命领导机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者们！

资本主义阻碍了发展的可能性和提高人类生活条件的可能性。赶走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正如在古巴一样，必须改造革命，执行社会主义任务，剥夺资本家的财产，把一切经济资源和人力都用来为有计划的经济发展和更大的幸福服务。

古巴的劳动者们！

拉丁美洲的群众，其他工人国家的群众，殖民地国家的群众，以及各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先锋队都尽他们的一切力量在保卫着你们的工人国家，你们的国家是在你们的革命的特殊条件下诞生的，它正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你们的革命被认为是其他国家应当遵循的道路。有信心地发展你们的斗争。发扬工人阶级的民主，通过工人和农民的权力机关由工人和农民直接执政，这个步骤加上其他已经采取的步骤，将给予古巴革命的胜利以力量来推行为

全体群众服务的綱領。

北美洲的工人們！

人类是否将为一場毁灭性的战争所吞噬，其他国家人民所采取的前进步驟是否将遭到北美帝国主义武装行动的阻拦，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依靠你們。支持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胜利，支持他們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权利，保卫古巴的革命，反对任何反革命干涉的企图！为了你們自己的前途，阻止你們的政府准备战争机器，反对原子战争！

苏联、人民中国和其他工人国家的劳动者們！

你們的成功榜样已为人类的新的地区打开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官僚主义警察政权限制了你們的发展，也限制了注視着你們的榜样的其他国家人民的发展，只有粉碎官僚阶层和警察机器的压迫，重新打开走向苏維埃民主的道路，才能使建設社会主义的斗争取得胜利！

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們！

你們的斗争对于消灭殖民主义、消除阿尔及利亚的残酷战争、消除非洲、亚洲和其他大陆广大地区的压迫，将有决定性的作用。学习日本和比利时群众的榜样：为打倒你們本国的资本主义政权而斗争、处在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的发展形势中，你們的普遍斗争能够基本上削弱帝国主义，而給予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以极大的鼓舞。

世界革命万岁！

第四国际万岁！

2. 世界形势和我們的任务

在殖民地革命的高潮和工人国家经济与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压力之下，世界力量的对比继续发生不利于世界帝国主义的迅速恶化。1960年标志着这个恶化过程的新阶段的开始，其重要意义只有1950年的情况可以与之相比，当时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和中国革命力量的手中遭到了第一次军事上的失败。

苏联在导弹方面所赢得的军事优势；在美国老家的边界上的古巴革命的非凡进展以及它与工人国家日益紧密的联盟；南朝鲜和土耳其的暴动；美国帝国主义在日本的丢脸，殖民地革命在非洲的扩展；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日益增长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它已在接受工人国家的援助，并且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1960年12月的示威中，阿尔及利亚城市群众已走上街头投入革命的斗争；古巴革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迅速扩大，它加强了群众的不断增长的战斗性和工人与贫苦农民的革命愿望；——这一切就是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最近世界形势恶化的显著特点。在最近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帝国主义集团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在若干问题上第一次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只不过是象征地反映了这种总的趋势。

自从“最高级会议”失败以来，在我们面前已打开了一个扩大世界革命的新阶段。在东南亚，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力量正在波浪壮阔地发展着。

应当预计到所有这些地区会有新的进展，这些进展将会进一步改变力量的对比，有利于革命力量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后者从来还没有经受过日益增长的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之间事实上的

統一戰綫的压力。

在下面的短決議中，对于这个趋势的规模和范围，以及对于帝国主义、苏联官僚机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和宗主国的人民的反应，都作了估計，并且从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得出关于經濟、政治和社会的近景的看法。在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革命、关于經濟前景、关于欧洲和关于自苏共二十一大以来的斯大林主义的危机等文件中，对今日世界的根本趋势另外作了更深刻的分析，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一、殖民地革命的新阶段

最近的时局在双重的意义上标志了殖民地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的地理范围扩大了，社会主义深刻化了。随着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的直接統治的結束，帝国主义在黑非洲的脊骨已經被打断了，这个大陆第一次被逐漸地吸收到殖民地革命的过程中来了。古巴革命朝着几乎完全消灭資本主义私有制的方向迅速发展。这个革命是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第一次导致了一个工人国家在拉丁美洲的誕生，同时也是自从1917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不是斯大林主义势力也不是多少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势力所領導的工人和农民建立起了一个工人国家。这个决定性的轉变，其长期效果将是巨大的。

古巴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殖民地革命的領導权轉入无产階級或半无产階級力量的手中的时期。它超过中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日益增长的影响，超过几内亚的日益增长的反資本主义的演变，也超过阿尔及利亚反对資本主义的革命可能性。群众将会越来越明确地認識到摆在他們面前的两条道路：或者是让反帝运动的領導权仍然掌握在不能够同資本主义断絕关系的資产階級或

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手中，其结果是不能实现殖民地革命的基本目标；或者是像古巴那样，同资本主义坚决一刀两断，而使历史性的迅速进展成为可能。

在非洲、阿拉伯世界和拉丁美洲可以感受到上述这些进步发展所产生的最强烈的影响。阿尔及利亚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盟（即使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内部的某部分力量的意图不过是作为一种要挟美帝国主义的手段），将加强阿尔及利亚群众中左的倾向，而使任何想用“布尔吉巴主义的”妥协来解决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办法几乎成为不可能，在一旦法帝国主义在阿尔及利亚或其大部分地区遭到政治上的失败和实行军事上的撤退的时候，它将会为把革命扩展到摩洛哥和突尼斯开辟很大的可能性。从12月11日开始在阿尔及利亚的城市爆发的激烈的群众示威，回教选民中的弃权派在戴高乐玩弄的公民投票的诡计中的胜利，以及在这以后这种不平常的战争气氛的继续——这些都是革命力量强大和帝国主义将从阿尔及利亚退却的迹象。它进一步削弱了企图达成虚假的“妥协”的打算，并使北非洲的一切“温和”派势力（实际上是亲资产阶级的势力）有所恐惧。阿尔及利亚群众的革命运动经常超出法帝国主义政治计划之外。今天它威胁着从后方来削弱帝国主义联盟在地中海的整个军事计划。

世界帝国主义没有能力重新控制刚果，以及它在当地的同盟者的日趋分裂和惊慌失措，而拥护卢蒙巴（他得到加纳、埃及和其他非洲领导者的支持）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控制和影响正逐渐扩及全国，这对于瓦解中非联盟和加速南非火药桶的爆炸是一个鼓舞力量。正如马里的例子已经表明的，来自北方和南方的这些革命势力已使法国——非洲共同体的假“独立”的国家不可能得到稳定，相反的，它们却是促使非洲走向统一的客观的推动力量。

在拉丁美洲，特別是加勒比海地区直接感受到古巴革命的影响，其中尤其是在委內瑞拉已經鼓起了群众斗争的新高潮，并且促进了“官方”的“左”派和同古巴革命站在一起的新的中間派与左中派之間的分化。

在拉丁美洲各地，古巴革命的影响是同令人不能容忍的客观形势(通货膨胀、为了消灭支付差額的赤字而实行的“精簡”、失业等等)的影响連結在一起的，它們掀起了罢工的浪潮、农民的暴动，促进了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对立以及普遍的政治动荡局面。在这种形势之下，群众寻求自由政治集中化的倾向将继续体现在若干拉丁美洲国家内群众工会組織的政治作用和萌芽时期的双重权力，或体现在大陆的其他地方建立游击基地或爆发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将成为更加普遍的斗争形式，这不仅是因为古巴的例子的影响，而且因为游击战争是拉丁美洲多数国家的革命所必须采取的农民战争的根本特征。从中美洲到哥伦比亚、秘魯和巴拉圭，各个地方早就普遍有了这种倾向或甚至采取了这种方式。游击战争将越来越表现为目前正在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燃烧着的内战的更普遍的特色。我們的任务之一就是在理論上和实践上为自己和为工农先鋒队做好进行游击战争的准备(包括研究、学习經驗、建立特別干部学校等等)。

同北非洲、中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形势比較起来，亚洲最近的演变对于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倾向是有些不利的。由于当地的斯大林主义政党执行灾难性的政策(这种政策有时接近于实际上的出卖)的結果，在伊拉克和印尼都失去了很好的革命时机，从而让资产阶级取得了和发展了走向軍事独裁的某些倾向。

在南朝鮮和土耳其，资本主义和亲帝国主义力量已暂时成功

地緩和了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滿，这种不滿已表现在推翻了被人痛恨的李承晚政权和曼德列斯政权。尤其重要的是，印度資產階級的統治暫時还比較穩固，虽然下层的不滿和分裂的巨大力量正在逐步建立起来，然而最近在老撾发生的事件，表明东南亚这些亲帝国主义的資產階級政权基本上仍然是不穩固的。对于在1960年内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的統治被瓦解的过程，帝国主义几乎仍然是无能为力的，它现在可能首先在一些它认为其地理位置、經濟潜力和客观力量具有战略上决定意义的国家里有所反应。这种反应可能采取双重形式，现叙述如下：

(甲) 給印度、巴西、伊朗、委內瑞拉也許还有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以重大的經濟援助，然而由于革命范围的广泛，如果它想延緩(即使是稍为延緩)革命走向建立无产階級的領導，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投資，而这种援助的规模势必越来越赶不上这种需要。

(乙) 采取措施以防止古巴革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蔓延”和防止阿尔及利亚革命在阿拉伯世界的“蔓延”。

但是从帝国主义可能有所反应的观点来看，最薄弱的地方显然是北非洲，戴高乐沒有能够在那里制止阿尔及利亚战争，可能会在欧洲的大門口产生另一个新的古巴。因此，美帝国主义要求第五共和几乎要不惜一切代价使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不会一开头就成为工人国家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压倒一切。

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遭受到重大打击以及由于力量对比突然发生了有利于世界革命的新的轉变，才阻止了帝国主义对古巴进行軍事干涉。远比苏联的导弹威胁——虽然是重要的，这是事实，但它受到苏联官僚主义机构更全面的利益的限制——更大的威胁从而阻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魔掌伸向古巴革命的是拉丁美洲群众的革命反响。

二、資本主义經濟新衰退的前夕

从經濟观点来看，1960年也是資本主义战后历史的轉折点。尽管美国資本主义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馬尔薩斯主义”在鋼鉄大罢工中的作用，但是罢工的結果并没有給生产能力带来任何新的高涨。相反的，美国的經濟在年初仍然停留在“平稳状态”上，而自夏季以来則开始走下坡路。鋼的生产仍然只接近于生产能力的50%；耐用消費商品部門(汽車、电用具等等)多数的生产能力有很大一部分沒有使用。在这之上的，是房屋建筑的猛烈下降和証券市場的直綫下降。失业人数从来沒有低于全部劳动力的5%，因此可以正确地說，美国的經濟是从1957—58年的衰退又轉入1961年的新衰退，中間沒有插进一次真正的繁荣。

在西欧資本主义国家和日本，发生了不同的情况。这些国家特别是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几乎都成功地避开了1957—58年的一次严重衰退。与在美国发生的情况相反，它們在1959年和1960年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真正繁荣。今天它們所遭受的仍然是过分发展的现象(人力的严重缺乏、支付差額赤字的不断增加、为了避免全面通貨膨胀而日益加强信貸限制等等)，而不是衰退的开始。

但是，与1957—58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在美国經濟中出现的衰退已經开始影响到欧洲資本主义的經濟状况。对美国的輸出(特别是汽車輸出)已惨跌。結果欧洲的汽車工业已受到衰退的打击。美国在世界市場上的竞争(包括削价的竞争)越来越厉害。自从1945年以来美国帝国主义第一次取消了对欧洲資本主义的任何形式的經濟援助，甚至取消了給当地重整軍备的款項。由于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輸出或者陷于停滞状态或者增加的速度

大大低于生产发展的速度，因此发展的生产越来越多地需要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即内部市场之间互相交换。这种发展势必突破资本主义对群众购买力所强加的限制，并在西欧带来新的衰退，这不过是时间问题。

或者是采取重要的通货膨胀的措施以刺激一个新的繁荣，从而增加国际对美元的不信任而使美国黄金储备减少；或者是采取重要的通货收缩的措施来保卫美元，从而扼杀了在孕育中的繁荣，处在进退两难之中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实际上是选择了第二个解决办法，但即使如此，它仍然未能防止美国支付差额赤字的增长。新当选的肯尼迪政府无疑地将会断然改变这个政策。它将会增加军备和行政部门（公路、学校、卫生计划等）的公共开支，虽然它将会削减或完全停止对资本主义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援助，但它将会大力增加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经济援助。

这些措施也许可能阻止一次比 1957—58 年的衰退更厉害的衰退（它在整个 1961 年内对于资本主义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但是决不能在经济复元以前抵销一切导致经济温和地走下坡路的力量。

同时，这些财政和经济措施加上竞争的加剧，也可能引起大多数西欧国家发生温和的衰退，更重要的是，将会在 1961 年的衰退之后限制新的繁荣的出现。虽然还不能确切预言这些发展的力量在西欧和日本将如何消耗，但是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现在已明显地出现了对这些力量的限制，特别是在汽车、耐用消费商品和建筑部门方面。

殖民地革命任何一个新的全面胜利（例如北非洲的胜利），将会促使一个重要的国家突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而沉重地打击了目前保持着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相对“繁荣”的不稳定的平衡，并

会立即增加帝国主义采取軍事反击的危險。

三、工人国家在經濟、技术和軍事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但是官僚机构出现了新的矛盾

工人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60 年爭取得了經濟、技术和軍事的进展,这种情况同美国經濟的差不多是停滯不动,以及世界帝国主义在技术、政治和軍事方面所反映出来的混乱、失敗和局部瘫痪,是鮮明的对照。苏联在諸如导弹技术、空間探索和自动化技术方面已取得优势甚至在不断加强这种优势。苏联經濟繼續不断的高速度发展,使它的七年計劃的目标在工业方面有一点实现的可能。同时,农业生产繼續有很大波动,特别是谷类生产仍然低于赫魯晓夫对于开发“处女地”的期望。

在中国,自从它由于过分的发展速度而导致“調整生产数字”的挫折,因而把速度放慢之后,即使它越来越把重点放在农业上面,人民生活水平依然低,尤其是人口增长的压力很大,但是中国的經濟发展速度还是惊人的。

欧洲各工人国家經濟也在慢慢地加强互相合作和結合,通过更合理的国际分工来开辟发展經濟的新源泉。

这种傾向正在以实验的方式表现出来,苏联官僚机构方面和許多国家的民族資产階級則持很大的保留态度,但是由于客观需要的巨大压力,它的力量将会逐渐强大起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之下,苏联的赫魯晓夫官僚领导机构基本上坚持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宣布的双重路綫:在內政方面的赫魯晓夫式“改良主义”,在国际方面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这意味着:对群众实行經濟的让步和在苏联官僚机构内部扩大专政的基础:力图与帝国主义达成全面的妥协,以便“冻结”目前世界的“势力范

围”，同时支持殖民地资产阶级拿群众的革命愿望去交换资本主义世界更多的利润的努力。

即使在官僚机构的这种让步政策之下，在苏联国内仍然酝酿着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对提高生产特别是提高农业生产的要求，客观地提出了群众要求有更多的权利参与管理和监督经济的问题。苏联在世界中的作用；新的一代已经成年了，在他们懂事的时候斯大林统治时期已经过去；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这一切事实客观地要求工人国家必须有新的领导。直到目前为止，官僚机构是采取党内斗争和清洗的办法来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但是苏联的继续发展以及不平常的世界革命形势，已创造了条件使这个形势在苏联国内得到贯穿和反映。在劳动者们坚持地和直接地就关于他们参加管理工厂的整个问题提出国家和经济民主化的关键性問題之前，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还需要生活水平有新的提高。

但是苏联国内以及其他工人国家的社会与政治危机的問題，在政治方面得到完全和有意识的体现之前，将客观地在许多方面（经济、艺术等等）的纲领或纲领性的解决办法中得到体现（即使是经验主义的、变了形的和零碎的）。但是苏联的整个过去和现在正在创造条件，使这种危机很快地就会在相当高的水平上表现出来。我们的运动不仅在纲领上而且在组织上参加干预的可能性正在增长并且是现实的，即使它在最初阶段是采取间接的形式。苏联国内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道路，正如世界革命的道路一样，在客观上是属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性质，它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同时为了它的革命的结果，要求托洛茨基主义作为纲领和组织进行干预。

但是在国际方面，“和平共处”的政策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已导致失望有时甚至是灾难。尽管苏联官僚机构目前在导弹方面占

居优势，它仍然沒有能够通过“最高級談判”从帝国主义取得任何重要的让步。1960年春季巴黎會議的失敗，只不过是这个基本事实中的一个为时已晚的反映。同时，赫魯晓夫把共产党的战略“限制”在永远从属于殖民地資產階級的企图，已断送了埃及和伊拉克的共产党，破坏了印度尼西亚的极好的革命形势，阻碍了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可能取得的进展，导致了馬格里布和古巴爆发了共产党在其中未能起任何重要作用的革命。

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局势产生了以下几种情况的发展。首先，好些共产党全党(如摩洛哥共产党)或部分(如巴西共产党等)发生了反对这种自杀路綫的傾向；其次，**在关于与世界帝国主义和与殖民地資產階級的关系問題上，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已明显地成为“和平共处”路綫的“左傾反对派”**；最后，苏联官僚机构本身被迫对自己的路綫作了某些調整。它的关于要在刚果和古巴实行軍事干涉的威吓并不真确地反映了“和平共处”的政策，而八十一个共产党的“莫斯科声明”則包含了对殖民地資產階級的最激烈的批評。

以上这三种傾向在最近的将来将会繼續表现出来，即克里姆林宮将坚持其“和平共处”的路綫而把它調整得更为“左傾”一些，以免使自己在殖民地革命的先进力量中完全陷于孤立；这个路綫也可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中繼續搗乱，因而使反对的傾向增强起来；最后，中国共产党將繼續在国际上表示共产党队伍对“和平共处”的不安，它将会在大多数共产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势力中扩大它的影响。

同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两个国家发生公开分裂是极不可能的，因为在帝国主义的威胁面前，他們的联盟对于两国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問題，而且因为中国在經濟上还要依靠苏联很

大的帮助。中苏联盟的保持，远远不会停止而是成为加深意识形态的讨论和冲突的一个因素，在一方面是殖民地革命另一方面是苏联官僚机构对“和平共处”的反响的压力之下，必然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促进这种意识形态的讨论和冲突。

在这种讨论和官僚机构内部斗争中，现在的问题不是关于谁应当主张或反对战争，而是关于我们时代革命政策的基本问题：帝国主义的本质；世界阶级力量的对比；对待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态度；不断革命的问题；争取殖民地革命胜利的条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国际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等等。

官僚机构内赫鲁晓夫的势力和中国的势力之间目前的讨论（虽然它当然是有点变了样的），再一次提出、引起人们的注意并证明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思想的有效性。因为根据国际形势的逻辑和动力所达到的程度，官僚机构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当然，随他们的便）。

于是，自从斯大林主义巩固以来，在空前未有的世界性革命形势之下，第一次开辟了国际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危机的新的决定性阶段，它比南斯拉夫“分裂”时期更广泛和更深刻。

且不用说这个危机不可避免地会时起时伏，并且有可能在表面上掩盖下来，但可以认为，可以恰当地称为机会主义者或右派的官僚机构的势力同“中间主义”倾向的势力之间的分裂将是深刻的和持久的，还可以预见到，在后者的压力之下，前者在对待群众的行动上，不得不考虑到后者，甚至在对待帝国主义的行动上，也不得不部分地考虑到后者。

四、帝国主义的反动和战争危险

帝国主义在 1960 年面临着世界力量对比于自己不利的新的

严重恶化，而表现近于麻痹状态，但这应当解释为由于例外的和特殊的环境而不是由于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使世界形势发生了质变。如果认为 1960 年的时局已证明帝国主义已变成“纸老虎”，即认为它已失去必要的力量和资源来反对全世界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前进，那将是轻率的和不負責任的。

自从中国革命胜利以来，我們曾經根据下列两个因素正确地分析了战争危险的存在：世界力量对比日益不利于帝国主义；以美国居首位的世界帝国主义仍保有巨大的经济资源和军事力量，使它们能够进行垂死的挣扎，对革命的每一个进展实行以牙还牙。只有当我们估计到帝国主义已不再拥有足够的资源或力量来保卫自己，亦即只有当我们估计到帝国主义将会消极地屈服于前进中的世界革命的时候，才能够改变这个结论。

今天没有任何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或军事因素可以证明存在着这种乐观主义的假设，只要帝国主义在美国还保持着主要的力量，这种假设就不会存在。

必须认识到，帝国主义对于它在 1960 年受到的打击没有相应的反应，相反地是由于一些例外的因素联合造成的。无疑地，说明这种暂时的麻痹状态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殖民地革命意外的成熟，殖民地革命的领导（至少在某些国家里）正在转入与帝国主义决裂的力量的手中。在这总的形势之下，还存在着其他因素，例如苏联在导弹方面的成就；由于目前艾森豪威尔外交的破产所造成的政治上的混乱以及美国的大选运动；由于美国领导地位的暂时垮台，另一方面又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参阅关于经济前景的文件），世界帝国主义联盟内部已陷于混乱和缺乏中心领导；最后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因素，即帝国主义完全没有预见到古巴和刚果形势的发展，它受到了殖民地革命的突然蔓延和

殖民地革命与工人国家结成联盟的打击。

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受到打击以后，华尔街的国际战略首先被在大力重整军备之后“压倒共产主义”的思想占上风，其后又被“从实力地位出发的谈判”的思想占上风。

但是这个战略在杜勒斯死去之前就已经失灵了。军事力量的对比不是越来越有利于帝国主义，而是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共产主义没有被压倒，倒是帝国主义自己被压倒了。殖民地革命的新浪潮和工人国家在军事方面的领先地位所造成的世界形势，使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人重新估价他们的战略。这个情况在1960年春季和夏季就已经明显了。在大选前夕，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大本营都在酝酿一个新的世界战略。

这整个过渡时期使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停止主动。在资产阶级中间，即使到了今天，反对这种重新估价的保守势力依然强大。在尼克松竞选运动中高唱“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的主调之后，肯尼迪只获得微弱多数的胜利，证明了这种反对力量，另一方面，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之间的对立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1961年可能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世界反资本主义力量不断取得的进展将开始有激烈的反应。即使苏联在火箭和核武器方面保持领先地位，帝国主义仍然可以通过增加军费和集中更大的力量来发展火箭和原子潜艇，建立一支强大的攻击力量，使它有可能发动全面战争或在开头的时候发动局部战争，它并且将会在这方面与苏联进行竞赛，集中全力来防止苏联从目前的领先地位变为完全决定性的。

殖民地革命的辉煌发展和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至少在某些国家是这样），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日益困难和欧洲资本主义竞争的日益加剧，将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寻求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

資產階級建立更密切的聯盟。后者为了其有限的經濟發展前途，将会把对帝国主义的敲詐同对帝国主义的亲善二者更加紧密地結合起来。美国对西欧帝国主义的壓力将会越来越大，以支持各地的資產階級和半資產階級的力量，并使西欧帝国主义在援助殖民地資產階級和重整軍备方面更广泛地参加經濟負擔。

当資產階級对殖民地群众运动的控制已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显著地削弱，当工人国家对群众的吸引力以及它們同殖民地革命事实上的聯盟使它們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間的威望日益增长而帝国主义的威望日益下降的时候，这种聯盟(指帝国主义与資產階級和半資產階級力量的聯盟——譯者)正在加紧进行中。

在最近的将来，工人国家能够給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使用的代替資源——虽然增长很快，而且从平等的条件來說，也証明比帝国主义的“援助”更加有效得多——仍然不能够完全清除这种“援助”对于殖民地資產階級的吸引力，尤其是后者同它需要保持政权和保持一般資產階級政权有密切的关系。

即使这种帝国主义的“援助”能够帮助某些国家緩和經濟形势的恶化(至少是暂时地)，然而在殖民地革命的主要国家里，这种援助对于生活水平和群众革命动員所能产生的影响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帝国主义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它甚至力图帮助使一些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和經濟結構“返老还童”。它支持巴基斯坦、苏丹和南越的軍事政变，并且懂得如何利用土耳其的軍事暴动及南朝鮮的学生革命，以图把政权移交給比旧的統治集团的腐敗程度少一些和更能够贊成工业化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义集团。

但是，即使華盛頓克服了反对这种工业化的美国資產階級(正如在馬歇尔計劃时期它在西欧毫不犹豫地表现的那樣)，它仍然不

能够摧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封建资本主义结构，而它同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联盟为了这个基本理由到头来还是不能制止殖民地的革命。

最后，帝国主义者第三种反应的形式将是加紧它们之间的军事联盟。由于英国不再成为世界强国，它在防御问题上将会越来越依赖于美国帝国主义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核强国（即德国和法国军队拥有核武器装备）的出现，将会导致帝国主义联盟成立美国帝国主义和西欧的“共同领导”，而德国资产阶级将在其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三种反应的结合将会在最近的将来使世界形势产生一个新的极端危险的转折点，那个时候帝国主义将拥有与苏联最新的发展相匹敌的攻击力量，它将加紧它在西欧的联盟和它同一些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联盟。从现在起一直到那个危险时刻，战争的威胁始终笼罩在我们的头上，还不是因为五角大楼会发动一个自杀性的“反攻”，而在于：（甲）核基地分布在世界各地，大大增加了由于错误或惊慌而爆发战争的危险；（乙）对于革命的每一个重大进展（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企图采取军事行动的压倒趋势——这种趋势将越来越占上风，并且将会转变为一场全面的反革命战争和一场国际间的内战。

五、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群众的反应

1958年5月以来西欧局势的发展证明了关于欧洲前途的文件中所作的分析的正确性，这个文件曾经预言，拿破崙式政权在法国的建立，在最近的将来将会是一个例外而不是一个规律，各地的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将会保卫自己，反对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

治上的攻勢。

局势同样地証實了：(甲)这种攻勢首先在竞争加剧的压力之下，将继续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在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乙)劳动群众的反抗程度主要将依靠主观的因素，即依靠劳工运动的团结和相对的战斗性。

资产阶级的攻勢特别表现在美国、日本、西德和若干欧洲小国日益增多的反对工会、收买工会或反对罢工的法律。它表现在：企图同意大利的极右势力（天主教党和新法西斯党）建立联合政府；准备在西德和日本通过反民主法案；第一次试图在比利时建立超议会的政府；以及右派或极右势力在奥地利和日本的重新出现。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实行了或准备实行对工人购买力的经济进攻，即使在多数情况下（法国是例外），这些进攻被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实际工资的提高抵销了。

工人阶级反对这种资本主义攻勢的强烈反应以及在日本（学生示威、矿工罢工等）、意大利（塔姆布朗尼政府在工人群众强大示威之下倒台）、英国（海员的不时罢工和工党内部左派的压力）特别是比利时（改良主义政党和工会向左转；1959年初和1960年底的罢工）已逐渐倾向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工人阶级政党（特别是左派政党）在瑞典、芬兰、丹麦大选中的胜利以及在意大利大选中的部分胜利，应当归于同一范围。在荷兰，在一系列罢工中也体现了工人阶级战斗性的微小加强（特别是由于繁荣的结果）。

在加拿大，失业的压力已把工会推向建立工党的道路。在西德（它同法国是今日西方劳工运动中最弱的部分），由于改良主义领导机构的叛徒们的譏諷式的出卖，反抗中心仍然是在青年和工会中，特别是在五金工人联合会中。最后，在法国，戴高乐政权未能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已在经济领域中和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战

爭(特別是在青年中間)的斗爭中掀起了新的斗爭高潮。

各个地方反对核武器和爭取普遍裁軍的斗爭已成为促使反对資產階級攻势的斗爭浪潮政治化的强大推动力量。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日本和英国),它已赋予或正赋予这种斗爭以反攻的形式。

1960—61年爆发的比利时大罢工(它将由工人运动内部的广大先鋒队逐渐达到的成熟程度来特别加以說明)是对初步进攻劳动群众购买力的一个答复。它的异乎寻常的范围和時間的持久性,以及同过去最大胆的經驗有連系的組織形式和斗爭形式,彻底地动搖了資產階級政权事实上并已轉变为爭取实现过渡性要求的斗爭,这些要求只有在推翻了反动政府而代之以工人政府之后才能实现。这表明在整个欧洲工人階級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战斗后备力量,它迫切需要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力量在群众运动中取得陣地和影响,同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爭取領導权,以便挽救这新的浪潮,免致再招受一次新的挫折如果不是新的失敗的話。

由于殖民地革命的繼續发展,帝国主义資產階級正在被削弱并在殖民地群众面前遭到失敗或退却,同时殖民地群众的斗爭也树立了榜样,推动資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去克服背叛的領導者的反抗并越出他們的改良主义方法;由于帝国主义之間竞争的加剧及其对于工人生活水平所产生的有害后果往往越来越明显;由于欧洲的許多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失业的范围正在扩大;由于雇主們越来越不願意对工人作出新的让步;由于一些国家是用損害工人生活水平的办法来实行稳定經濟的計劃(以法国为例)——由于以上这些事情的发生以及它們相互作用,工人階級斗爭的次数可能会增加,范围可能会扩大,它們将有助于加强左傾力量特别是加强那些以工会为基础的左傾力量。

在英国,盖茨克尔一派所表现的对于斯加波拉大会(即1960

年英国工党年会——譯者)決議的公开蔑視将会发生同样的作用。在西德,1961年大选的失望将是左派在社会民主党內和工会內重新施加压力的起点。在法国,随着帝国主义在阿尔及利亚的必然失敗而来的将是戴高乐加强其政权的拿破仑主义色彩的企图。

但是,从现在到失敗的这段期間,如果群众的斗争性加强了,在阿尔及利亚革命胜利之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削弱,必然会产生一次新的社会危机。加拿大劳工党的进展,以及殖民地革命对住在美国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的影响和古巴革命的吸引力,将使这个国家的左派力量克服最近几年来的极大弱点。

但是如果认为这两种接近于平衡的力量——逐渐走向“强有力的国家”的压力和工人的防御性的斗争——可以維持一个长时期,那将是錯誤的。充分就业的終止(它在下一次衰退时几乎在各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的危險);资产階級和保守的小资产階級势力在世界力量对比恶化的情况下日益惊惶不安;工人階級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如果不能导致决定性的政治变化或产生实实在在的重要物质效果,其士气有瓦解的危險;——所有这一切对目前的过渡阶段按下了时间的界限,至少对于西欧和日本是如此。

工人运动必須通过争取决定性的过渡目的的斗争,表现它轉入攻势和組織夺取政权的斗争的能力。

上述这些斗争的条件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傾向势力的发展道路,它至少必須在群众运动中的关键部門扎下根,發揮它的领导和組織能力。比利时罢工証明工人階級有采取攻势行动的巨大可能性,但是它同时也証明,如果工人階級不能成功地冲破改良主义领导(即使是最左的领导)所强加于他們的限制,不能超过对资产階級政府施加压力而不把問題公开提出来的阶段,它就不能够尽其全力突破障碍和阻止资产階級攻势

的基本措施。

相反地，如果工人运动在这个斗争时期中不能提高它的眼力，右派势力终于会在经济和政治发展形势的压力之下突破障碍——这将会打破困难的平衡局面，而有在其他国家里重新出现法国类型(政权)的严重危险。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通过大胆的干涉行动，并利用目前大大有利于工人阶级开展广泛斗争的主客观形势)的任务是使欧洲无产阶级克服改良主义领导甚至是左倾的改良主义领导的阻挠行动，并采取能够使提出政权问题的条件成熟的方法和提出过渡性要求来组织斗争。

在这新的世界形势中，我们的运动大有可为。我们的整个过去就是为了这个局面，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道路而准备的，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比工人运动的其他一切潮流无比的先进。

我们在群众运动内部，以我们的大胆的和有方法的辛勤努力，已经在各个地方取得了重要的阵地和丰富的经验。在这新的有利的世界形势之下，我们在扩大我们的行动方法的同时，必须坚持这条道路。

殖民地工作仍然是主要的工作。

六、我们的任务

(甲)殖民地革命在下一个阶段将继续成为第四国际的主要活动中心，也将是我们的运动可能取得最迅速的成就和发展的地方，这是因为现有的条件以及因为第四国际在一系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已经取得了发展。在殖民地革命中，巨大的力量正在发展和扩大，它们已摆脱了不管是斯大林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传统领导。在殖民地革命的新阶

段，爭取无产階級領導權的斗争在一系列国家里将是一个当前的任务。在轉入无产階級革命的阶段中，正如古巴所表明的，第四国际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是唯一能够为作为革命新領導的基础的这些力量更融洽地发展开辟道路的組織。

在一切国家中，我們的組織必須作为推动这个新的领导出现和組織的中心，通过现有群众組織或采取这些国家的群众所要采取的形式（如游击战等等）来参加、领导和准备組織和领导群众的动员工作。

我們的組織应当提出使革命的发展无产階級化的綱領，提出过渡性的口号和任务，但是同时应当作为取得这个发展的組織者（即使开始的时候只在一些有限的部門）和領導者（即使现在事实上还不是）。

在下一时期中，在殖民地革命正在开展的一些国家里，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存在着第四国际領導革命或参与領導革命的真正可能性。从现在开始，至少必須在群众运动或群众組織的一些主要部門中爭得領導權，从这里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行动使全国的群众运动感受到我們的綱領和組織的力量，同时在它的面前，在行动中来考驗我們的綱領。

正是通过殖民地革命使第四国际的发展有着最迫切的机会，以便在建立世界性的新的革命領導的条件已經开始成熟的过程中，在斯大林主义危机的过程中，在工人国家取得发展的过程中，使第四国际不仅从思想和綱領的观点上，而且在組織上对于整个世界革命能够發揮真正的力量。第四国际的努力和行动特別應該集中在这广大的前途上面。

在实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們还应当对那些不依賴于传统的政党而出现在群众革命暴动的最前头的新的革命力量（如阿尔及

利亚、古巴、日本、委内瑞拉、南非洲和黑非洲等等)表现最宽宏的友爱精神。对于他们一般的经验主义的革命方法我们毫不掩盖我们的保留态度和提出政治上的批评，我们在表示了我们的批评权利之后，始终应当参加和大力支持这些暴动。这些运动的中下级干部在考虑一切战略问题或策略问题时都很虚心坦率，没有斯大林主义或中间主义的偏见。这就为我们在纲领上和行动上的渗入创造了无限的机会。

关于在殖民地革命的不同地区的专门任务详见关于殖民地革命的提纲(即第四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另一个论“殖民地革命”的文件——译注)。

第四国际还必须继续动员它的力量并号召世界工人运动起来保卫殖民地革命——在今日特别是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革命；明天新的烈火将会燃烧起来。第四国际必须继续加紧协调已经开展了的对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世界性的重要援助。它必须极端重视采取各种形式来援助古巴的革命，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组织或联合成立保卫委员会的工作，号召或组织劳动队、民兵队、劳工代表团，动员工人和学生保卫革命，等等；动员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在一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争取领导权，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以便给予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乙)只要帝国主义拥有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世界性核战争的危险就依然存在并且是现实的，这个战争不仅威胁着人类文明而且威胁着人类本身的生存。用宣传“裁军谈判”、请愿等等或用“经济竞赛”(即一般地仍然停留在“和平共处”的范围内)的方法来反对核战争的危险，是一种反动的空想。**反对全球性核战争危险的唯一有效的斗争，就是在具备可能条件的地方争取推翻帝国主**

义和資本主义的斗争，和在其他一切資本主义国家里开展争取帝国主义裁軍(单方面裁軍，特别是单方面解除核武装)的斗争。不論在什么地方，我們都应当站在这个斗争的最前綫，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成为这个斗争的組織者和协调者，并把这个斗争同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和推翻資本主义的一般运动联结起来。

(丙)在美国，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迫切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保卫今天越来越受到威胁的工会的陣地；保卫古巴革命和殖民地革命；反对种族隔离；宣传加拿大的榜样同时立即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这些是发展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工党的主要武器。

(丁)在工人国家里，特别是东欧的工人国家和苏联，我們重新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核心組織必須制訂一个提出过渡性要求的綱領，在一方面是“改良主义”的幻想另一方面是思想的日益解放和不一致的目前气候中，要求允許成立工人阶级的新的先鋒队。在中苏矛盾中，我們給予中国共产党有批判的支持，并努力提倡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圍繞着爭执中的問題开展国际性的討論。

(戊)在西欧，一般的任务仍然是关于欧洲前途的文件中所提出的任务，主要是通过中間主义的媒介，在群众組織和劳工运动内部建立强大的左派，它必須能够为先鋒队或群众中的各种不同的左派积极分子起集合各种不同論点和团结中心的作用，并为这些积极分子指出主要的政治前途，并提出一个以各国具体的过渡性要求为基础的当前行动綱領。特別应当重視英国的局势，那里今天正在发展着西欧最强大的左的傾向，使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可以在极端有利的条件下决然地参加进去，此外，还必须尽很大的努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联系和組織，那里正在集合力量准备掀起一个劳工运动的新高潮。

1960—61 年比利时罢工的实例已把下面的工作提到議程上来：更坚决地开展支持建立欧洲工人統一战綫的活动和把所有工会力量集結在一个联合会里，以便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普遍实现四十小时工作周），并且在某一个国家发生先进的斗争性，采取积极一致的行动以便組織真正国际性的同情罢工。

总之，我們在所有国家里是一支最明确地、最积极地和最自觉地体现我們时代的巨大革命可能性的力量。在这个阶段，当許多地区的革命运动和世界革命建立新的革命领导的条件已更具体地成熟的时候，当各个地方的力量已經起来并朝着这个摆脱工人阶级一切传统組織的控制的新领导前进的时候，第四国际应通过它的綱領和通过参加世界革命的过程，成为最自觉地促进这个新领导的出现和組織起来的中心。

我們正在进入世界革命发展的新阶段。第四国际在这新阶段中应当起自觉的、生气勃勃的、有組織的、积极的革命馬克思主义力量的作用，它从已經取得或正在取得的一系列主要的陣地出发，以其对革命发展过程的理解和掌握，充当这个过程的指导，促使这个新领导的成熟和出现。为此，第四国际特别要在那些在现阶段是最重要的和容易接近的地区、在那些今日最直接地反映了我們时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特性的地区扎下根（今后将更牢固地扎下根），这些地区是：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一般的殖民地革命，以及工人国家。

同时，第四国际将通过它在大的群众組織中的地位，成为能够促进和彻底利用目前已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重新开展起来的极为广泛的革命可能性的力量，以促使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在下一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汇合起来，并且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可能性和这种活动同殖民地国家和工人国家的群众已經开展的可能性

和活动结合起来。

为了实现这个任务，第四国际正在建设和将继续建设适应这个时期的干部，建设适应这个过程的组织，总而言之，就是建设适合担当领导群众运动或参加领导群众运动的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和组织，它们仍然是争取社会主义的世界性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武器。

3. 世界经济的趋势和前景

一、引言

最近十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一直为下列三种因素所支配：

(1) 工人国家——首先是苏联以及后来日胜一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苏联的工业不仅已跃居世界第二位，而且，它将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超过美国工业力量的可能性已经第一次具体化，并且受到了美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认真考虑。从现在起，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在无法挽回地日益缩减。

(2) 虽然不如工人国家发展得那样快，西欧帝国主义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持久性仍然超出了一般的预料——尤其是如果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期相比较的话。特别是参加欧洲共同市场的各国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奥地利和挪威，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显著。和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作的一切预言相反，从1938年以来也就是说有二十多年之久，美国和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发生过一次非常严重的危机。1949、1953和1957年的三次战后衰退都没有妨碍相当迅速的复元和十

二至十八个月以后的新的繁荣。

(3)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經久存在的危机——而在资本主义世界，这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繁荣的另一面。它是由下列两者之間的矛盾引起的：一方面是通过投资和貿易(如果不是通过殖民主义的直接干涉的話)进行的帝国主义剝削，另一方面是爭取政治独立、驅逐帝国主义、推翻旧寡头政权、实行土改和工业化的深刻而广泛的群众运动。帝国主义制度的这种矛盾表现为：甲，随着世界上的大片地区获得政治独立，殖民帝国和列强瓜分世界的局面逐漸消失；乙，最近十年中殖民地革命所采取的沒收帝国主义企业的經濟措施：英伊石油公司、玻利維亞錫矿、苏伊士运河以及在埃及的帝国主义企业的被沒收；印度尼西亚对荷兰企业的沒收；古巴的經濟国有化；玻利維亞和古巴的土改等等——同时，除去以上列举的各种措施以外，还有帝国主义統治的危机和投資的不安全；丙，作为殖民地革命风起云涌的結果，世界各地封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帝国主义統治賴以为基础的政权的崩潰。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鮮战争繁荣时期”的有利条件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已經有所进展，但是，它們的经济发展不仅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說工人国家了)的发展不成比例，而且很难跟上其人口增长的节奏；它甚至都不能抵銷交易条件的不利发展。**其結果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程度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在今天比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前都更为显著。**

某些特殊情况——例如日本，它正在經歷一种特殊迅速的工业扩展——并没有被我們談到，但以上的簡短分析仍然总结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輪廓和基本趋势。本文件将詳細說明这些趋势将在今后十年中維持和改变到何种程度，由此将造成那些主要的

經濟、政治和社会后果。

不过，我們必需提醒一句。为了研究一般的以及长期的經濟趋势，我們不得不把社会的和政治的变化、革命暴力的爆发等等从經濟領域中排开。第四国际比以前更深信这些爆发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它深信未来的十年和刚刚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一样，不会是維持现状的年代。在这种意义上說来，任何以“两大集团之間进行經濟竞赛”思想为中心的共产党的政策，都是既不现实又瓦解人心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不應該是保証这种和平竞赛，而應該是爭取推翻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而且，本決議的結論也提供了証明这一論点的主客观理由。

尽管如此，作为馬克思主义者，我們在研究資本主义和由于官僚主义而蜕化或成为畸形的工人国家的发展趋向时，必須假設这些政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內将继续存在。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够了解作为一切政治发展之基础的各种客观力量。沒有这种假設和不进行这种研究，就不可能对现实有全面的了解，也就不可能制訂出一套有效的革命策略——特别是当我們要使如此表明的某些客观力量失去作用，或者是利用某些力量做基础的話。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际經濟和政治前景的提綱已經指出，大会希望。

“根据两种类型經濟的当前形势和动态所能得出的推論以及在这一时期內将不会发生任何重大冲突的純理論假設，判明資本主义經濟和工人国家經濟在未来若干年中的一般趋势……”

提綱还特別指明，“如果我們打算判断一般的趋势和前景，只能采用这种外推法，也就是以当前的形势和动态为出发点，而不考虑会发生重大动乱的可能性。”

通过利用同一种方法并且通过大体证明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各项结论，我们强调这样一种需要，即必须科学地了解从长远说来将最后决定世界发展的各种客观力量——没有这种了解，关于革命行动前景的任何判断都有染上主观主义色彩的危险。

与此同时，我们也完全了解——关于这一问题，正如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纲领所阐明的那样——实际发展将不是这些长期经济趋势的简单反映，而将是这些趋势和人们有意识的干涉（即包括反资本主义力量的革命行动，也包括有产阶级及其它害怕革命的社会力量的保守行动）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种相互作用能够深刻地变更，有时候甚至能完全扭转以这种外推法表明的客观趋势。在这些超经济因素中，群众的革命行动正在起并且在今后将日益起一种决定性作用。

（一）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

二、工人国家的经济正在比资本主义国家 更为迅速地发展

在最近十年中，工人国家的发展速度一直非常迅速，即使说这一国与那一国此一时期和彼一时期以及经济部门和经济部门之间并不一样。它的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经济快一倍以上。和发展最快的资本主义国家（西德、法国、意大利、日本）相比，工人国家的得意程度要稍有减少，但它仍然显示了发展节奏——特别是就长远说来——的鲜明差别。

从 1950 到 1959 年，工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

苏联	11.8%
波兰	13.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0.8%
捷克斯洛伐克	10.7%
中华人民共和国	24.8%

对:

日本	14.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0.0%
意大利	8.5%
法国	5.8%

以及:

美国	2.8%
英国	2.5%

(资料来源: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所作《1956年欧洲经济形势研究》以及1960年国际清算银行的《第三十届年度报告》)

从1955到1959年,工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如下所示:

南斯拉夫	13.5%
苏联	10.8%
捷克斯洛伐克	10.4%
波兰	10.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8.2%

对:

日本	11.8%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8.2%
意大利	8.0%
法国	6.7%

以及:

美国	2.3%
英国	2.1%

三、产生这种优越性的原因

这样,计划经济胜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便惊人地呈现出

来。产生这种优越性的原因值得我們談一談：

(1) 和資本主义經濟相反，工人国家的經濟經歷着一种**不会为危机、衰退、工业产量的突然下降所打断**的发展。它**經常保持着劳动者的充分就业和生产資料的充分利用**（虽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最适当的就业和利用）。

(2) 由于决定最重要投資問題的权力集中，因此可以**避免无益的重复劳动、設備能力过高以及浪費和非生产性开支**——即使在垄断資本主义时代，資本主义的竞争和“自由企业”也往往要造成这些浪費，虽然官僚主义的管理部分消除了这些有利条件。

(3) 生产資料的国家所有制**消除了資本主义国家中尚待收回的固定資本所有者的私人利益給技术进步造成的有力障碍**。

(4) 生产資料的国家所有制使生产可以**更为迅速地标准化**，也就是把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应用到工作母机这类产品上去，而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这些产品則处于专利权持有者的小心監視等等影响之下。

(5) 由于是計劃經濟和生产資料为国家所有，因此在分配国民收入时有以**减少某些从經濟发展观点說来是无益的浪費**（过高的分配費用、过多的奢侈品消費等等）。不过，官僚主义化的政权仍然使这些非生产性的和无用的开支維持着一种过高的水平。

此外，苏联和其他大部分工人国家已經完成的**真正的文化革命**，在經濟发展方面也發揮了很大作用。苏联今天拥有的工程师、发明家、工艺学家和技师的队伍，在人数上已大大超过美国。因此，它便得以**維持一种胜过一切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新的节奏**。

一切有才能的人一般都能受到高等教育这一点，消除了資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才能的浪費。由于在教学工作上有更多的經費并且系統地喚起和鼓励求知欲，因此便形成了一支人数更多的大学

教师的队伍。这样，无论是在质量或数量上，技术革新在苏联得到的刺激都比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了——远为有力。

在今后若干年中，没有理由指望这些方面的发展速度——或它们对最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先——会发生根本变化。诚然，以1950—55年和1955—60年相比，工业发展速度已经显著降低^①，而且连这种较低的速度苏联都不能维持——这就是不得不放弃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原因。

一方面，群众压力已经迫使官僚阶级更为经常地努力增加人民的消费量，虽然并没有实行可以同时刺激生产发展的更为民主的管理制度——如果实行了更民主的管理，就可以维持甚至加快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官僚主义管理以及特别是经济的过分中央集权，则起有降低这些发展速度的作用。后一类障碍已经部分为赫鲁晓夫的改革所克服，他的改革已经使苏联有可能再次获得第六个五年计划预定的发展速度(只有某些部门例外)。

四、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四强国

在这些条件下，将使今后十年中工人国家的经济发生变化的

① 在所述整个时期工业增长百分比如下所示：

	1950—55	1955—60 (1955年计划)
捷克斯洛伐克	70%	5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90%	55%
匈牙利	102%	48%
波兰	118%	53%
苏联	85%	65%

(资料来源：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56年欧洲经济形势研究》)

最重要的新因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作为一个一等工业国而出现。即使我们对中国的统计数字保留某种怀疑(鉴于对有关“大跃进”成果的数字的修改)，我们仍然可以接受这一事实，即中国国民收入的现行增长速度要比苏联高二至三倍。造成这种极高速度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开始时的基础要低得多，部分原因是各个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中新企业的兴建，使得这些部门的生产有可能立刻获得很高百分比的增长。

然而，此外也还有两个辅助原因：其一是苏联以及其他工人国家的援助，虽然这种援助显然并不充足，但它仍旧构成了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缺乏的相当帮助；其二是中国有可能避免一系列失败的經驗，特别是有关企业管理的极端官僚主义化和农业生产低落这些曾经妨碍过苏联工业发展的問題。中国农业得以避免长期停滞不前——而在苏联，由于强迫集体化的关系，这种现象在迅速工业化的阶段一直存在——的事实，消除了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障碍。

即使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今后会有所降低——一旦重工业的最初基础建成以后，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它很可能仍旧高于苏联，并且比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和印度及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相比，中国和它们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差距将特别显著。不管某些官僚主义的方法已经使并将继续使中国劳动群众受到多少本可避免的牺牲，中国迅速工业化的例子就像近几年中一样，将对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特别具有吸引力。

可以预料，中国的工业生产在今后十年中将大大超过日本和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因此而成为世界上的第四个工业强国。不过，它仍将低于欧洲经济集团(共同市场)、苏联和美国的工业产

量。在这种状况下，預言工人国家的总产量到 1965 年将超过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似乎很难說是现实的——如果在新兴的重要工业国家中废除了資本主义，那当然是例外。

此外，我們还不应该忘記，尽管中国在走向工业化方面获得了这样多的成就，如果按人口計算产量，这个居民超过六亿的国家仍然非常貧困。中国要想达到日本现有的工业化水平，它的鋼鉄、电力、机器和紡織品产量就需要超过日本六倍（也就是要达到苏联计划在 1970—72 年达到的水平）。看来，要达到这一目的至少还需要再过二三十年。^①

五、工人国家經濟中的特殊問題

工人国家的經濟在发展速度上快于資本主义国家，是其最基本、最主要的特征。然而，这并不是其唯一的特征。工人国家經濟发展的另一特征是不同的部門中发展节奏的不均衡这一点再加上这些国家的官僚主义蜕化或变形造成的結構上的缺陷，引起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問題，造成了經濟发展期間的种种困难和紧张，甚至引起了一系列障碍的出现。

不同經濟部門的不均衡发展首先是**工农业之間的不均衡发展**。农业在今天比以往更成为苏联經濟的致命弱点。不論是赫魯晓夫通过开垦“生荒地”来“迴避”农民的策略，或者是对农民們作出的严重让步（向集体农庄出售拖拉机和其其他农业机器），都还没有能解决这一問題。由于西伯利亚中部的农业和气象条件特殊，那里的生荒地只能每两年得到一次丰收——这便使苏联的谷物产

① 中国目前的鋼产量是一千四百万吨（公吨或长吨）；要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产量上达到日本的现有水平，中国将需要生产一亿零二百万吨鋼（一千七百万吨的六倍）。

量年年有巨大波动:

(按百万吨計算)

1937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96	82.5	88.5	108	127.8	104.8	139.4	110 ^①

在苏联,彻底解决农业落后于工业問題的两大障碍是:集体农庄庄員对逐步发展生产的兴趣不够以及对农业的投資不足(特别是肥料的使用有限)。这就使苏联农业劳动的平均生产率远低于美国——更不用提实行集約农业的西欧和中欧国家了。

赫魯晓夫的改革,特别是修改集体农庄向国家供应的产品的价格以及把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出售給集体农庄,无疑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但它們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問題,即集体农庄因此积累了巨額資金。集体农庄的收入已經从1953年的五百亿卢布增加到1956年的九百五十亿卢布和1959年的一千五百亿卢布,也就是說在六年中增长了三倍。

由于对农村的消費資料供应肯定沒有按相同的比例增长,集体农庄事实上已經积下一笔无物可购的巨大购买力。赫魯晓夫通过出售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吸收了它的一部分。某些工业生产資料也在日益容易地出售給集体农庄,因此,农庄便建立起輕工业工厂、发展起建筑材料工业,有时候甚至开始向城市居民出售产品。这样,苏联的經濟結構中就多了一种新因素:国营工厂丧失了它們对工业生产的事实上的垄断。不过,这显然是一个并没有影响重工业的純边际問題,在目前生产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不同工业部門以及工业与交通運輸体系之間发展速度的不均衡,在今天也非常显著。一般說来,在1955年以后制訂的新計劃

① 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增长,这一产量数字按人口計算竟比1937年还要低!

中，輕工業的增長速度已經非常接近于重工業，雖然還沒有完全達到它們的發展速度。但是在執行計劃時，重工業部門仍然優先獲得重視，這樣，和預定計劃相比，便推遲了紡織工業和耐用消費品工業的發展，這在蘇聯和大多數“人民民主國家”都是如此。

基本工業（電力和金屬礦開采）和製造部門之間發展的不均等，在東歐很多國家——特別在 1953—56 年期間——造成了種種危險的障礙。這些障礙已經通過在東德強迫發展褐煤以及向這一地區大量供應蘇聯的石油產品（正在鋪設的輸油管網將鼓勵大部分東歐國家以石油代替原煤的趨向）而被消除。

六、工人國家的經濟統一和消費者的壓力

全體工人國家（或者甚至是歐洲工人國家）經濟統一的問題，一直還沒有解決。經濟互助委員會並不是一個統一經濟的工具：它的任務只是處理某些部門（汽車、機器和工作母機）以及對外貿易中的專業化和勞動分工問題。它甚至都不負責統一調配全體工人國家的投資（可以參看哥穆爾卡最近在這方面表示的不滿）和全面的安排計劃。這種合作不足是由各國官僚階級（包括蘇聯官僚階級在內）各自的特殊利益造成的。

客觀力量（例如在動力資源方面進行競爭的風險）和主觀力量（消費者的壓力）的壓力在未來的年代中將達到如此程度，以致蘇聯的官僚階級將被迫走向進一步加強其全部“勢力範圍”內經濟統一的道路——而這將造成新的內部衝突，動搖在經濟方面“團結得堅如磐石”的神話。

這種已經表現在經濟互助委員會上的對工人國家經濟加強國際安排的趨向將日益增長，在布加勒斯特就這一問題達成的協議以及八十一國共產黨莫斯科會議的決議都證明了這一點。這種發

展将在新的基础上再次引起群众参加经济管理的問題，并且随之而带来它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不仅如此，消費者的这种压力还将在苏联本国和大多数其他工人国家中逐步加强。五十年代初期已经是这种情况。但是既然赫魯晓夫改革的第一陣浪潮已經發揮作用、人民的衣食得到了改善，这种压力又将大大增长。它将表现在以下三方面：质量（特别是衣服的质量，但也包括对食品质量的要求）；耐用消費品和住宅問題。

“罢买”(BUYERS' STRIKES)现象正在日益經常地发生(苏联报纸最近就承认在塑料制品方面有过这种問題)，而消費者的压力在今天对官僚专政說来是最有力的威胁，正如 1959 年哈薩克斯坦的騷动所証明的那样——在 1959 年，那里的几千个青年由于缺乏最低限度的舒适和消費品而发生騷动。

赫魯晓夫答应“赶上并超过”美国平均生活水平的宣传，将日益給他自己招来压力，刺激起人們对耐用消費品供应的大规模要求。如果这种压力——特别是想得到私人汽車——在今后十年中变得过于强烈，就会給苏联鋼鉄工业带来嶄新的問題，因为苏联和美国以及西欧正相反，其鋼鉄工业中用来生产小汽車的部分是微不足道的。

另一方面，想更多地参与企业管理的生产者的压力增长得則比較慢。但是，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工作時間的縮短(普遍实行七小时工作日制)以及文化与技术平均水平的提高，在今后将使这种压力加强。

七、几个特殊例子

欧洲的某些工人国家另有其特殊的經濟問題：

南斯拉夫：无论是就工业生产或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而言，该国在所有欧洲工人国家中都居于首位。这可以以其经济政策的独有特点来解释：由于一步步彻底实行企业自治而使官僚主义有所削弱；实行了一种既避免强迫集体化又避免使私有农民统治市场的农业政策；更为和谐地统一于世界市场之中，因而可以从世界分工中得到更多的好处。

供应给南斯拉夫劳动者的耐用消费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在以快于大多数其他工人国家的速度不断提高，不过，南斯拉夫的经济将碰到两种危险：其一是市场经济在工业部门中的过分扩张，这将引起社会不平等日益发展的危险（参照最近把房租调整到与“实际成本价格”相一致的做法，其结果是使最好的住宅产生了有利于特权阶层而牺牲工人的再分配）；其二是过分统一于世界经济之中，这会使它日益依赖（在信贷和外汇方面）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并且使它长期脱离（这是苏联官僚阶级的过失）工人国家日益加强的国际安排。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尽管这个国家的居民可能已经享有在一切欧洲工人国家中算是最高的生活水平，它和西德之间的差距仍然很显著，即使说这种差距正在一点一点地缩短。照西德经济目前相当高的发展速度看来，这种差距在短期以内多半不会完全消失，除非西德会受到一次严重经济危机的打击。

这种差距目前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甚至在社会方面都起着关键性作用：它使东德在“人民民主国家”的组织整体中成了一个真正的缺口。它是使得技术分子（工人和知识分子）不断大量外迁——这种大迁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资源的真正外流——的原因之一。

烏布利希为“解决柏林问题”施加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

由于他决心要堵住这种外流。此外，德国統一社会党领导上狹隘的教条主义和粗暴的官僚主义，特别是通过强迫全部农业集体化（即使这是一种名义上还維持相当一部分农民私有财产的“集体化”），也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形势。

捷克斯洛伐克：捷克的經濟在所有“人民民主国家”中具有最多样化和最平衡的結構。經過 1953—55 年前后的衰退，現在已經重新高涨。但是，由于这个国家中对某些产品的需求看来已經充分飽和，因此，目前正在发生——这在一个工人国家中說来还是第一次——**調节耐用消費品供求的問題**。要想以一种和諧的和进步的方式解决这些問題，就需要让生产者和消費者在企业 and 地方集体（城或区）内部都能积极得多地参加制訂計劃。

（二）工业化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濟发展

和馬克思主义以及非馬克思主义經濟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作的預料相反，战后並沒有发生一次 1929 或 1937 年类型的生产过剩的严重資本主义危机，而是出现了一段恢复阶段，接着便进入了一段經濟繁荣时期，中間只发生过几次時間相当短并且沒有两次大战間的危机那样严重的衰退。目前，西欧和日本正在繼續着这种經濟繁荣，虽然它在美国已經让位于一种近几年来来的經濟只是維持原状的局面。

八、存在这种繁荣和沒有发生严重危机的原因

工业化国家中資本主义經濟之所以呈现这种新的繁荣，并不能归之于单独一个主要因素。这种繁荣毋宁說是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国家）政策中或資本主义企业結構中各种环境的湊合和

一系列改变的結果。造成这种相对稳定和刺激这种空前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項：

(1) **國家的作用日益增长**，因而限制了經濟危机的累积过程，能够在危机的最初阶段就設法加以阻止(美国的統計資料表明，在1957年，衰退剛一开始的来势几乎和1929年大危机的最初阶段同样凶猛；1957年不同于1929年的事实是，危机在这种最初阶段就已被防止，而在1929年則听任其在三年中日益加重)。①

我們必須区别开資產階級國家以**經久方式**在資本主义經濟中所起的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它临时出面干与以**緩和危机振蕩**的可能性。

在大多数工业化的資本主义國家中，公共支出目前吸收了國民收入的15—35%。所以，國家成了投資(特別是在軍事部門以及在輔助程度上的交通運輸和動力部門)和工人及白領階層消費者(公務人員隊伍和國有化或市有化企業中的工人等)收入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國家還同時實行了各種重要的轉賬支付，從而減少了勞動者由於無產階級基本上無保障的地位招致的購買力的損失(養老金、失業救濟金、疾病或工傷事故保險等等)。誠然，這些支付中有很大的部分來自工人本身的籌集。但是，大多數工业化資本主义國家也以津貼方式提供了相當幫助。

作為整體來看，這些實際上不會受暫時危机影響的公共支出，有助於使消費者的投資和收入保證有較穩定的數量，從而起一種**經久性的反周期作用**。

此外，資產階級國家還擁有一整套在危机剛發生時便使之緩

① 和1929年危机头九个月中工业产量下降了15.9%相比，美国在1957—58年衰退的头九个月中，工业产量跌落了13.1%。和經濟大危机相同时期减少26.5%的数字相比，在1957—58年衰退期間，耐用品的訂貨減少了20.1%。

和的手段：普遍增加轉让开支(实行赤字財政)；减少信貸成本；給予私人投資和出口以津貼和紅利等等。

总起来說，資产階級国家在資本主义国家經濟生活中这种日益增长的作用意味着，**在資本主义今日正在世界範圍內經歷的政治与社会危机当中，非經濟性因素在經濟中正在起着并将繼續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意味着資产階級(作为集体來說)正在牺牲其通貨的穩定和长远利潤的未来(以及某些部門的当前利益)，以利于这个制度的当前自卫而不顧及其长远后果。

在未来的年代中，由于全世界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一步步走向不利于資本主义的变化，这种因素非但不会削弱，而且将發揮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将尤其如此。

在这里补充一点是有益的，即这一分析不仅不証实认为資本主义现在因此就得以“避免危机”的修正主义論点，相反地却証明了一条馬克思主义理論：**景气与不景气、繁荣与危机的交替是資本主义經濟与生俱来的一种痼疾**，資产階級国家唯一能够做到的，只是暫时限制住这种疾病的发展(以加重其将来的病情为代价)，而不能消除疾病本身。此外还需要指出，这种可能性本身也不是无限制的，它既不能阻止衰退的爆发，也不能——不管国家怎样日益加强干預——使现在的衰退不变得逐漸严重。

(2) **技术革新的大爆发**(基本上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下的)，結果在私营工业中造成了一种比两次大战期間高得多的固定投資率，从而帮助縮短了資本主义周期(现在，衰退每隔四至五年便爆发一次，而不像以往要隔七至十年)，并将繼續得到軍备生产(核子和电子技术)所部分刺激。这种技术革新——它在自动化的发展上表现最为突出——同时也是資本家得以在战后最初几年中对工人加强自己的工会和增加工資作出的基本答复：相对剩余价

值的增加和由于生产力的急剧增长以及通过技术失业造成的工业后备军的扩大。

在美国，技术进步的这一社会特征已经极明显地表现出来：甚至在景气时期，失业人数也始终保持在三百万以上。在英国和共同市场，这种现象出现得稍晚（特别是在共同市场，由于其发展速度甚至比生产力的这种巨大增长还要快，这种现象来得尤迟）。但是，今天正在美国发生的事看来也预示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将来发展。

(3) 劳动群众对消费品的需求已经发生一种结构变化。重心正在日益从食物和衣服转移到房屋和耐用消费品上。这种变化部分是充分就业最初阶段的延长和实际工资相对增长的结果。这也要归因于对消费信贷和广告压力的日益不加限制的利用（这也是一个以第二类消费代替第一类消费的问题，譬如若干情况下食品消费质量的某种降低）。

这样一来，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力便以一种快于纺织工业品购买力的速度不断增长，而对农产品的购买力则正在相对地（如果不说是绝对地）下降。此外，部分也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像谷物、马铃薯和猪肉这类大宗食品的绝对消费量已经开始减少。

劳动者需求的转移本来是一定时期的相对繁荣和高就业水平的结果，以后则转而给耐用消费品工业带来兴隆局面，从而成为对这种繁荣的主要支持。这可以从共同市场经济的不同部门中相差很大的发展指数上明显地看出来：

（以 1953 年为 100 的指数）

在 1959 年

小汽车生产	340
全部工业生产	158

“新”部門(耐用消費品、石油产品、塑料产品、电子仪器、自动化机器等等)的发展速度极高这一点,明确地解释了工业化资本主义經濟——特别是在西欧和日本——平均增长速度何以相当高的原因。

购买力的轉移还表现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多少是經常性的农业生产过剩的危机上**。面临着由滞銷——特别是对谷物、馬鈴薯和猪肉說来——造成的农产品价格普遍下降的趋势,为了維持一种哪怕是日益减少的收入,农民們已經通过使农业工作高度机械化、增加肥料投資以及日益改善农业技术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在正常情况下本会排挤掉最軟弱的农場,并且导致放弃比較低劣的土地。但是,一切資本家政府主要为了选票和社会目的(农民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一般都是最保守的社会阶层)而执行的人为价格補貼政策,仍然人为地維持着这些土地的耕种,限制了农村人口的外流,从而把生产力的增长化成了需求低落和多少是經久性的生产过剩局面。只有比較“高貴”的产品(优质肉类、柑橘等)还没有发生这种趋势。

(4) **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而言**,不管它們的工业发展性质如何有限,通过这一过程——即使具有其种种限制——仍然发生了資本市場日益扩大的现象,这样,資本商品便部分代替了受这种工业化威胁的消費品的出口。

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品价格上涨的同时,却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輸出的原料价格不断加以压抑。^①

① 西欧 1958 年輸向落后国家的出口总值与 1953 年相比已經增长了 50%。而同一时期原料輸出只增长 3.12%。美国在这一时期的輸出增长了 41%,而輸入的原

这种帝国主义国家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无偿取得的劳动，是有助于帝国主义国家繁荣的另一种因素，这样，它们就把一部分矛盾转嫁给了落后国家。

九、资本主义经济在今后十年中的前景

以上这四种因素经过短期和不长不短一段时期以后的情况会怎么样呢？关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前途，我们能够作出哪些结论？

(非经济性因素中的)国家干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将继继续空前加强，它将具有一种日益显著的趋势。和工人国家展开“经济竞赛”的迫切需要，将使得几个资本主义大强国不得不通过国家保证来扩大本国关键部门的生产能力，即使这种扩大并不能“得利”(考虑到目前设备能力已经非常过剩的情况)。特别是在美国的钢铁和石油工业中，已经出现这种局面。大垄断组织制订“投资计划”时比以往更少考虑短期内具体景气问题的趋势，也便利了这种干涉。

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殖民地革命和帝国主义力量对比的进展就以此为转移)，将决定日益加强的国家干涉成为“节约”类型或(牺牲劳动者来提供投资资金)通货膨胀性质的“温和”类型(由工资和利润共分发展果实)的程度——前者如德勃雷—比内政府统治下的法国，后者如从战后直到1953—54年左右的美国和英国。

技术革新的浪潮将继续推进，虽然它在美国的发展已经缓慢下来(钢铁工业等某些部门例外)。在欧洲，相对于美国而言的技

料总值比1953年还要低2%，这种现象事实上早已出现。譬如说，在1930—33年的世界经济萧条以后，比起从本世纪初到萧条时为止这段时期的平均价格来，阿根廷的价格下降了19%。按照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计算，这意味着每年平均损失利润二亿三千八百万美元。

术落后状态在今后十年的头五年中，仍然容許生产力大量增长和进行巨額投資。不过，資本主义的历史表明这些“技术爆炸”不可能无限期地延长，因为在两次“爆炸”之間必須有一个間隔，以便容許新的固定設備全部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摊还。到今后十年中的后五年，这种浪潮就将逐漸平息。随同六十年代第二次衰退的开始，它无疑将产生显著影响。

群众消費的結構变化在美国已經不再起刺激作用。与此相反，耐用消費品部門获得的重要地位目前正日益成为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因为对这类产品的需求比对非耐用消費品的需求波动得远为强烈。正是在这一部門，生产設備能力过剩的情况最为突出，甚至一个周期比一个周期更严重。

在欧洲，达到这种飽和状态无疑还要經過一段時間。但是，如果我們考虑到西欧(包括英国、瑞典和奥地利)的小汽車生产能力目前已經达到年产五百万辆，而这一能力在得到充分发展以后，到1963年将提高到年产七至八百万辆——比起1955年最高年产量才达到七百万辆的美国来，西欧的人口多得极其有限，而美国消費者的平均收入却要比他們高出250%！——考虑到这种情况，我們可以預言，在今后十年中，欧洲在耐用消費品方面也将达到美国目前的飽和状态。因此，这一因素在西欧也将逐漸失去其刺激工业相对地迅速发展中的作用。

第四种因素(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投資以及和这些地区的貿易)和对于整个帝国主义体系說来是最深刻和最持久的变化密不可分。在今后的一段不长时期，相应于帝国主义“援助”日益增多的程度，它作为帝国主义經濟刺激剂的作用，将由于輸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机器、工业装备等的增多而加强。但是，殖民地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的逐漸轉化也将相反地給予帝国主义以

沉重打击。

鉴于所有这些原因,所以今后最有可能出现的变化,从短期来看,将是西欧和日本的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得多,从未来不太长的时间和长远来看,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速度的普遍下降,并且将经常为日趋严重的衰退所打断,而这些衰退将一方面遗留下技术性失业,另一方面遗留下生产能力的过剩。**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这种下降所表现出的节奏和范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竞争加强和对工资施加压力的现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西欧和北美工人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即使它们并不是工人运动在这些地区复活的必须条件。

十、资本主义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

资本主义内部各种力量的对比在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必须放在以上所谈各种前景的范围以内来考察。

由于西欧和美国经济发展节奏的差距日益增大,由于欧洲经济集团的建立,美帝国主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时在资本主义阵营内取得的和整个战后初期(先是复兴时期,然后是所谓的“朝鲜战争繁荣时期”)一直保持的绝对统治地位又开始发生问题。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统治地位的这种相对衰落,是许多征象引起的结果。以下是几个例子:

鋼产量(百万公吨或长吨)

	1929	1946	1953	1959
美 国	57.3	61	101.3	84.7
共同市場	35.6	11.8	39.7	62.3
英 国	9.8	12.9	17.9	20.5

汽車产量(百万辆)

	1937	1950	1953	1955	1959
--	------	------	------	------	------

美 国	3.90	6.70	6.10	7.95	5.60
共同市場	0.51	0.58	0.90	1.50	3.10
英 国	0.38	0.52	0.60	0.90	1.20

出口值(十亿美元)

	1913	1928	1938	1950	1955	1957	1959
美 国	2.4	5.0	3.1	10.1	15.3	20.9	17.4
共同市場	5.1	7.3	4.8	9.5	18.2	22.4	25.2
英 国	2.7	3.5	2.3	6.0	8.0	9.3	9.8

由于共同市場目前的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比美国和英国至少要高一倍,考虑到共同市場的开始基数已經相当高,欧洲經濟集团和美国之間的生产差距将迅速縮小。在未来十年中,欧洲經濟集团在大部分耐用消費品方面有可能赶上乃至超过美国的生产能力,不过,这种进展将由于欧洲劳动者购买力的相对下降而受到部分妨碍。

同时,从上列数字中可以看出,和世界工业生产的“三巨头”(美国、苏联和共同市場)相比,英国正处于下降为第四位强国的危险中,虽然其出口值按人口平均計算仍稍高于共同市場。在今后十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乃至日本都有可能超过英国的工业产量。因此,某些資本家集团正在为迫使保守党政府让英国参加共同市場而施加压力便不难理解了。同时,我們因此也就会明白,贊成——特别是出于政治动机——建立共同市場的美帝国主义何以反对英国加入。这样一种溶合形成的工业力量将对世界市場施加巨大压力(它将购买 50% 以上的全世界出口商品),并且可能很快就追上——如果不是超过——美国本身的工业能力。

美帝国主义对資本主义内部这种力量对比变化的一个重要反应,就是日益向欧洲,首先是向英国和西德,輸出资本。这种趋势想同时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利用低于美国的欧洲工資,以便特别是

利用比較先进的技术击败其欧洲竞争者；一是在美国建立起一支工业后备軍，借以对美国工資日益施加压力^①。这种趋势将保持若干年；这样，它也有助于使西欧經濟具有一种高于美国的投資率和发展节奏。

誠然，欧洲非常严重的政治或經濟危机（一場新的柏林危机、一陣仍有可能发生的群众运动的高涨，伊比利亚半島上的革命及其国际反响、戴高乐政权的倒台等等）可能会改变这种形势，延緩西欧的資本积累，甚至会使資本向海外国家大量外流。世界革命的新跃进——例如印度、阿根廷、日本的历史规模的胜利——也会动摇西欧資產階級目前对自己的命运所表现的越来越大的信心。不过，一旦各种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这类从資本主义角度来看是灾难性的变化，战争的危險就会加大，而一陣扩大軍备生产的新浪潮也許会部分緩和資本家和私人企业的这种丧失信心。

十一、欧洲共同市場的发展可能性和局限性

代表大会以前的文件《欧洲劳工运动的形势和前景以及我們的任务》，已經大致說明欧洲共同市場的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原因。它既符合于已和欧洲小民族国家的限制长期发生冲突的一般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又符合于資本主义大垄断組織的发展邏輯——它們早就把自己的力量扩张到国境綫以外，一直在設法使这种新扩张“正常化”和合法化。

但是，相应于这种双重起源，也存在着双重动态。一方面，交換的自由和更广泛市場的建立促进了一般工业更加迅速的——虽然也是更有差別的——发展。另一方面，資本主义垄断組織的联

^① 像萊明頓·兰德、福特和通用汽車等美国公司，已經决定在欧洲全部生产它們的某些产品，然后从那里向美国再进口。

合和相互渗透則垄断了这种发展带来的利潤，加剧了落后企业部門和集团間的竞争，并且在較后阶段甚至使垄断集团內部也将发生爭夺欧洲“六国”领导权的范围深广的斗争——这将在普遍发展过程中造成突然的中断。

从共同市場提供的发展可能性上得益最大的是西德經濟。不过，法国的戴高乐政权所体现的法国雇主中进取的和有魄力的一翼，也正在設法保証自己在共同市場內部能得到大力发展。这样，在許多方面就建立了一种法德两国的共同领导，这在实践中便表现为統治着今日共同市場的巴黎—波恩政治軸心。在意大利，范范尼—馬蒂的傾向也代表資产階級中最活跃的一翼，这一部分資产階級正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共同市場的可能性为自己謀利。

只要整个欧洲經濟的高速度发展所引起的还只是瓜分利潤的問題，这种形势就将基本保持。但是，在若干“落后”的工业部門——煤炭、紡織以及明日的各种冶金和重化学产品部門——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已經在整个共同市場內出现。从这一时刻起，将首先承担損失的是成本价格最高的那些部門和国家：法国的造船业；罗亚尔区炼鋼业；意大利的鉄矿开采业等。一到为现代化提供的投資不再增长，一到市場逐漸为耐用消費品所飽和，“竞争和合理化”趋势就将凌駕于“扩展和諒解”的傾向之上。各个垄断集团內部将要进行的斗争以及这些斗争对劳动者生活水平的影响，将便利于西欧工人階級的斗争——这首先是防御性的，如果获得成功，則进而轉入进攻，最后必然会出现圍繞着欧洲問題文件中說明的过渡时期要求进行的工人运动的普遍复苏。

整个这一前景都是以下列假定为前提的，即至少是在过渡时期会維持这样一种經濟結構，其特征仍然是共同市場六国都各自維持着主要是“民族性”的私有财产。到这一过渡时期結束时，資

本的相互渗透便該位于單純的联合之上。但是，在日益严重的衰退、全世界的革命以及上述欧洲工人运动的斗争給予資本主义以新的打击下，这些前景将經常因此产生問題。

十二、几种特殊情况

美国: 在世界规模上变得日益不利于美国的政治、經濟和社会发展，使美国資產階級面临着—系列在 1960 年总统竞选中已經清楚表明的选择。

为了对付世界市場上其他資本主义国家日益加强的竞争，美国資產階級本應該日益对工資施加压力，拒絕任何新的社会改革，集中力量来提高生产力，并且利用愈来愈扩大的失业群众把这种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利潤完全归于雇主和用以加强美元的稳定性。为了保卫它的长远利益，它也本当使新的投資尽可能合理化，反对新增加任何公共开支，而在增加軍費时——从它的观点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則按相同的比例削減民用开支。

鋼鉄业巨头的态度表明，这一派資產階級正准备实行这种政策。但是，共和党政府的反应已經清楚地表明，美国資產階級的大多数負責領袖，不論是民主党或共和党，都了解这样一种借口从长远利益出发巩固資產階級政权的政策反倒会在不太长的時間內摧毁这一政权。

事实上非常显而易见的是，正当苏联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准备实行新的和大胆的社会改革(7 小时工作制，然后是 35 小时工作周)时，对工会权利进行恶毒进攻并同时冻结或降低工資，肯定会使工人立刻发生猛烈反应(如鋼鉄工人大罢工所显示的那样)，惊醒那种使得劳工运动瘫痪多年的政治昏睡和冷漠，从而为美国預备下一場严重的社会危机。

此外，以維持“預算平衡”并同時保持很高水平軍費開支為中心的政策，不僅要限制美國國內的社會開支，而且會減少對不發達國家的援助，它會使美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危險地緩慢下來，並且有使得美帝國主義在短期內把它對殖民地資產階級仍然具有的一點影響喪失干淨的危險。

艾森豪威爾政府部分地遵循了這樣一種政策；這就是它威信掃地的原因。在 1957 年的衰退以後，隨之而來的只是一種繁榮的假象，而到 1960 年，忧心忡忡的經濟學家就已經懷疑美國面臨的究竟是一種經濟的水平發展還是一次新的衰退。通過洛克菲勒之口——正如通過肯尼迪之口一樣，美國大壟斷資本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群正在號召——並且從 1961 年起將實際執行——徹底改變政策。他們將拋棄“穩定美元”的保守政策——一種不是反危機而是反周期的、使得經濟停滯不前的政策，而再次代之以一種增加公共開支（這被當做是加速經濟發展的主要刺激劑）的政策。他們將既增加軍事性的公共開支，又增加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援助，以便大規模地作下一次扭轉局勢的最後努力，改變目前正在使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在一段不再是很長的時間內陷於滅亡的世界局勢的發展。一個擁有五千億美元國民收入並且還能動用巨額儲備的國家，可以冒這樣一種危險而不用擔心立即垮台。在這樣做時，美國資產階級將有意識地犧牲長遠的穩定性以應付短期和不太長時期的需要。但是，在當前的世界局勢中，它實際上也別無其他選擇。

同時，競爭的迫切需要仍然使美國僱主不得不日益頑固地反對增加實際工資（國家在社會開支方面的增加，能夠在工人階級的某些階層中緩和這一政策造成的震蕩）。對工會運動的敵視以及打算慢慢破壞其力量的企圖將會加強。這樣一來，客觀條件就會

变得日益有利于工会中的工人先锋队在一定程度上过问政治。这些条件将会为殖民地革命对美国劳动群众中某些部分(非洲革命对黑人、古巴革命对波多黎各人和知识分子等等)发生的影响所加强。在加拿大,目前正企图以工会为基础组织工党,这如果成功的话,也将有助于为美国劳动者提供榜样。

日本: 日本经济的特征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大工业部门和一个家庭工业及手工业部门的结合——前者为国内外市场生产资本商品和耐用消费品,后者以古老原始的方法从事操作,只是由于对极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才得以存在。就日本的资本主义——麦克阿瑟的土改尽管有种种局限和不足,仍然无疑为它创造了一个更大的国内市场——说来,这两个部门的同时并存既解释了它的力量何在,又说明了它的弱点。

在高度国际景气时期,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拥有几乎是无限制的人力后备(除去从事手工业的人力以外,它还可以动员那些在农业中实际就业不足的群众)。这支潜在后备军对工资的压力,使工资即使在繁荣时期也保持很低水平。其结果是,它的积累速度便能超过在西欧或美国平常见到的任何水平。

但在另一方面,日本工业迅速发展的能力和日本人民几乎停滞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使得日本资本主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更加依赖出口。现在,它已经失去其一部分传统市场,而它打算扩大自己在世界市场中所处地位的企图则遭到了其新老竞争者(前者如印度、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是在纺织品方面;后者如英国、西德)的猛烈反对。这样一来,日本经济便比欧洲共同市场或英国更不稳定,更容易发生严重的衰退,而不得不实行大规模的结构再改变(发展强大的资本商品输出工业;纺织工业的相对衰落;煤炭工业开始衰退等等)。

这种不稳定性并不会自动地对工人运动起有利作用。在工会分裂、大工厂工人日益担心失业和原始工业中的工人缺乏觉悟的情况下，它甚至会暂时造成工人运动的相对衰落。但是，大部分被剥削群众的必然觉醒加上更大的经济不稳定，最终将会在日本形成一种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有爆炸性的局面。

(三)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发展危机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经济的一切局部的、暂时性的现象都为一种普遍现象所遮盖，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的开始被消灭，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开始改变，土改和工业化运动。

正如在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政府竭力通过直接和经常的干涉来支持经济景气一样，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正是群众在支持着结构变革过程，正是他们强迫政府实行国有化或者只是防止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稳定化。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一过程已经产生了中国、北朝鲜、北越和古巴等工人国家，并且始终不断地在扩大加深。正是这一过程使得帝国主义本国不论有什么暂时性的有利景气，最后总会爆发帝国主义危机，正是这一过程肯定地促进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当工人国家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一直在并且仍然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迅速发展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看到它们在生产力和消费水平上落后于先进国家的距离更为增大。因此，它们正在经历着一场作为殖民地革命基础的真正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这是过去十年中主要的并且在今后十年中也将无疑是主要的

事实。

不错，当我们谈到经济危机时，我们必须具体说明这是一种“特殊的”危机，是一种发展不足的危机而并非标准的生产过剩危机，虽然某些征象（某些产品的暴跌、大规模失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下降等）对这两种类型的危机说来都是共同的。然而，尽管有这种“特殊的”危机，工业生产的增长，也就是说工业化的过程依旧在进行，只不过是其节奏抵不上先进国家，完全不足以改变国家结构，特别是无力改善群众生活水平而已。

举例说，拉丁美洲的工业生产指数就从 1950 年的九十一增加到 1953 年的一百和 1958 年的一百三十六。可是，这种增加仍然比欧洲六国（更不用提日本、苏联和中国了）低得多。而且，世界上的大部分不发达地区在生产的增长上都还不及拉丁美洲；印度半岛和东南亚的情况特别是这样。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经济所表现的发展日益不足，既有其时机性的又有其结构性的原因。前者关系到在这些国家的出口中占主要地位的**输出原料的价格（有时候甚至还连同其数量）**的下降趋势。后者关系到这些国家中严重妨碍迅速工业化的封建—资本主义结构的主要后果。

十三、帝国主义体系和殖民地革命

投资于落后国家的帝国主义资本获得的利润（它们在宗主国起有重要作用），使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可能进行原始积累。和帝国主义宣传家今天所鼓吹的刚刚相反，正是世界上的落后区域部分资助了先进地带。

使落后国家的经济可以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源部分得益的一向是原料输出。然而，交易条件的不利发展甚至使这种可能性

也受到了限制^①。帝国主义国家本身在原料生产方面的发展(石油和合成汽油;合成橡胶;人造絲、尼龙和其它合成纖維等)以及像非洲这种新原料产区的开发(特别是咖啡、棉花、可可、銅、錫、鋁等),更加深了这种局势。

此外,帝国主义——特别是在朝鮮战争以后,还有意識和有組織地設法压低原料价格。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美国主要利用它自己的国内資源,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空前发展所造成的剩余农产品,以及它本国的矿藏和石油产品等。至于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宗主国内不生产的原料,它們則組織大消費者市場把自己的条件和价格强加給原料生产国。国际錫理事会^②,国际糖业协定,以及有关咖啡、棉花等协定就是这种情况。

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資产階級或小資产階級民族主义政权采取的某些反措施,是限制外国資本所得利潤的送回本国,建立不同的外汇制度、执行有利于本国工业的保护貿易主义措施,特别是提高进口工业制品的价格。但是,帝国主义通过积极干涉硬把为抵制其扩张正在关闭的大門打开。它利用殖民地国家收支差額中逼人的赤字、危机和困难,迫使它們給予外国資本以不受一切經濟和財政控制的“自由”。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伊德計劃(玻利維亞)、克兰—薩奇計劃(智利)、勃列比奇計劃(阿根廷)以及国际貨幣基金組織的直接干涉,通过强迫这些国家放弃对外汇的控制,表明帝国主义认为保持这些国家的經濟繼續向它的剝削开放是如何必要,表明它是如何需要这种剝削来保卫美元。

① 根据关税及貿易总协定发表的情报,从1953到1958年,整个非工业化地区可以用它們的出口抵偿的工业制品的比例,已經从90%下降到64%。

② 以錫为例,美国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外汇活动以低价积下巨大数量的存貨,然后,当价格趋于上涨时,使用这些存貨对市场施加压力。

当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所謂“援助”計劃来緩和如此加剧的矛盾时，它实际上并不能解决引起的任何問題。帝国主义的援助只等于它本身正在从落后国家榨取到的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要保証它們的工业化和全面經濟发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将不仅需要把本国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都化为資本以及为它們的原料取得公平价格，而且要接受这样一笔淨投資形式的援助，其数量至少要比目前所有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工人国家每年提供的“援助”总和大十倍。

“第三世界”的某些地区已經接受投資，并且經歷了一种并非不重要的工业发展：例如南非联邦、南北罗得西亚、前比属刚果、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智利以及印度和亚洲其它地区。委內瑞拉和近东产石油国家已經得到巨額矿区租借費，然而这并没有能緩和和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階級的两极分化和国内局势的爆炸性。

土地改革或为爭取土改进行的斗争，提出了让半数以上的人数过文明生活的問題。它正在动摇本国地主或占有最好土地的白殖民者（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怯尼亚、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的权力，和資本主义种植园制度发生直接冲突，并且推倒了多年以来一直把公社或部落（在热带非洲、秘魯、玻利維亞和印度）和外界隔絕的墙壁。

在这类国家中一般包括大多数农民并且占有大部分（虽然不是最肥沃的）土地的这些人口的觉醒，要求有巨額投資使他們摆脱落后状况。玻利維亞土地改革的长期停滞就証明了这一点。土改本身及其所引起的經濟发展問題，不能在資本主义制度的范围以內得到解决。它要求沒收和驅逐以前的主人，要求有以获得其所耕土地的千百万小农为基础的大規模投資計劃。因此，土地改革的发展便加剧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危机，从而为正在努力消灭全世

界資本主义的无产階級革命力量提供了客观的——甚至也是主观的(这种程度已經越来越大)——支持。

由殖民地革命推动的另一个巨大經濟进程就是工业化和普遍发展經濟。和土改一样，它植根于群众要求改变本身生活状况的深刻願望之中。而且，也和土改一样，它很快就和資本主义本身发生冲突；和以下种种問題发生矛盾：帝国主义强加給这些国家的片面的劳动分工、国内市場的狹小、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和热带非洲的内部分裂，資本的缺乏，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生产的剩余价值有很大一部分被送回帝国主义国家等等。資本主义不可能通过土改使广泛阶层的人口摆脱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状态，从而把他們包括进国内市場。

只有由国家积累資金——特别是通过沒收外国企业和本国地主的办法——才能部分解决这一問題。这样，社会生产剩余才能集中在一个工农政府手里，这个政府将利用它同时发展經濟和改善群众生活水平，其办法則是大规模地动員起潜藏于巨大数量失业或就业不足的劳动者中間的生产能力。这就是殖民地革命可作的另一抉择，它已經通过中国革命迈上这条道路，今天正在接近古巴，并且已經开始为它本身在非洲的某些地区开辟途径。

十四、封建—資本主义結構，迅速 工业化的一个阻碍

除去开始于 1952—53 年的、不利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交易条件的逆轉以外，这些国家的封建—資本主义社会結構一直是迅速工业化的主要障碍。一般讲来，特别是在黑非洲和东南亚，占人口絕大多数的农民的极端貧困——他們不是仍然过着原始生活，就是被地主、高利貸者和商人的联合吸干血液——造成了

国内市場的不够广闊，因此不足以刺激私人大工业的发展。这些地区——拉丁美洲、黑非洲和各阿拉伯国家——的分裂状态又进一步限制了国内市場。其結果是，并不总是有限的可用于积累的資金，便被专门用来从事土地投机、商业、放高利貸或送往国外。

那些生产大量石油的国家(委內瑞拉、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近十年来已經积累了几十亿美元的矿区租借費，但却并没有因此經历真正的工业化过程，其秘密就在于此。这一笔可观的資本大部分都被用于基础工程或壮观瞻的建筑(在加拉加斯、德黑兰等地)，大量进口奢侈品以及兴办只是輔助石油生产的工业(炼油厂、港口、化工厂)。在那些于同一时期主要由于战略原因而接受数十亿美元的国家，如南越、南朝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則以甚至更为巨大的规模重复着这种浪費。

即使在本地区民族資產階級相对說来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印度、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它采取主动的方面也只限于消費品部門。直接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和竞争的建設本国重工业的努力，一般都必須由国家来承担。随着重心由計劃或准备轉到实际执行，它所遇到的社会和經濟阻力也越来越大，并且常常会由于部分統治階級的节外生枝而重新成为問題(曼德列斯統治下的土耳其、弗朗迪西統治下的阿根廷等)。

在墨西哥、埃及、印度尼西亚或玻利維亞这些国家，重要的帝国主义产业已被沒收，但却还保持着資本主义的經濟經營，在这种情况下，这类国有化产业正在趋向于变成私人財產的营业領域和職員及官僚私人发财致富的泉源——这便使国有化产业亏本倒欠、丧失信用和不适于作为发展經濟的积累来源。

埃及、墨西哥、委內瑞拉的貝坦科尔特或印度的尼赫魯这些政权完成的土地改革，只是一种資本主义的土地贖买，目的仅在于緩

和农村中的矛盾，而并不打算解决使耕者有其田的根本问题或者提供发展农业生产的投资。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资产阶级本身正在为内部矛盾所动摇。弗朗迪西指望依靠帝国主义发展重工业的企图，也许已经在牺牲轻工业——它是在庇隆政府任内发展起来的——短期前途的情况下如愿以偿，这就是说它正倾向于通过加强对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剥削，即限制轻工业的国内市场来积累资本。

既领导着一场反对这些解散工业计划的经久斗争，同时又实际保卫着已经取得的工业化水平使之不受资产阶级本身破坏的，正是工人阶级。

通过地区协定克服分裂敌对的打算只是一些效果不大的措施——例如过去有关中美和大哥伦比亚的协议或者目前的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区”，它们只有助于维持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协议以前存在的地区贸易的某些特权而已。一般讲来，即使在半殖民地国家之间差别也是很大的，因此，地区协定将意味着比较发达的国家享有特权，而比较落后的国家打算工业化的企图则会受到它的妨碍。

十五、殖民地革命的經濟影响

殖民地革命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并且在今后将继续破坏它的基础。无论是在殖民地国家或宗主国本身，都直接感受到了它的影响。

在不发达国家，殖民地革命刺激起群众要求福利的愿望，从而妨碍或阻止了资本主义的财政和经济“稳定化”，损伤了利润率，使得任何长远的私人投资都越来越带有投机性和冒险性。殖民地革命通过有力地施加有利于这一地区工业化的压力，倾向于缩小现

在还对资本主义宗主国开放的市場(这些宗主国已經由于资本主义在大片地区的消灭而丧失了很多銷售地)。此外,它还給宗主国工业生产带来新的竞争对手,并且就它自发地和工人国家結成同盟的程度而言,它也威胁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場,使它們的出口品为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等所排挤。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革命减少了以向海外国家輸出作为对付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生产过剩趋势的安全活門的可能性。通过减少或消灭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輸出的資本投資的收入,它动摇了收支差額的平衡,縮小了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活动余地,并且倾向于迫使它采取一种可能有造成社会危机之虑的节约政策。

不过,殖民地革命的这些經濟影响只是在长远中才会被感受到,而且其大小完全和它使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脱离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程度相应。目前,在整个第一阶段,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把不发达国家的政权移交給民族资产阶级,来保存它在那里的必要地位。只有在同时发生把投資于該国的外国資本收归国有和对外貿易轉变基本方向的时候,政权的这种轉移才会是对帝国主义的严重打击,尽管以往十年中有过某些国有化的壮举(如伊朗的石油工业和苏伊士运河),一般讲来,卷入殖民地革命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全盘脱离世界资本主义經濟。这就是迄今限制着殖民地革命对资本主义宗主国經濟立即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在这方面,古巴的革命經驗在殖民地革命中开辟了一个新阶段。这次革命甚至在为无产阶级所领导以前,就已經第一次把投資于該国的主要外国資本收归国有,并且使古巴的对外貿易根本轉向工人国家。如果說这些发展对美国或欧洲资本主义經濟的眼前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它們却具有一种**展示出未来一般傾向**的历

史意义。相应于未来十年中若干国家的殖民地革命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领导阶段的程度，它对资本主义宗主国的经济影响将日益加大。如果“第三世界”(印度、巴西、中东)集团全部脱离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些影响就将变成灾难性的。

今天的殖民地革命以一种尖锐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危机。不过，这种危机转化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程度，完全要看它对最重要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共同市场、英国、日本——的经济起有多大破坏作用。我们根据经验可以指出，在短期以内，这种破坏作用的大小大体上要完全取决于殖民地革命超出民主资产阶级领导的程度。

十六、迄今限制着殖民地革命之经济影响的因素

过去十年中主要的矛盾现象恰恰就在于下一事实，即：尽管存在着一个把不发达地区和工业化地区联系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尽管殖民地革命有巨大进展，尽管各种力量的对比发生了不利于资本的全球性变化(这愈来愈损害投资的长远安全)，尽管有这些情况，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却仍然能享有相当迅速的工业发展。归根结底，其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有一系列暂时限制着殖民地革命对宗主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影响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大部分已经由第五届世界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和政治前景问题的提纲所指出，它们是：

(1) 帝国主义在已经开始殖民地革命的国家中仍然维持着重要地位。这既适用于资本投资，也适用于工业产品的市场。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伊拉克，在那里，尽管已经开始革命，大量红利仍然在不断流向伦敦商业中心区。英国每年仍然从它的对外投资中获得总数大约为三亿五千万英镑(九亿八千万美元)的收入。以市场

而言,在 1959 年,英国出口商品中仍旧有 53%、法国有 44%、意大利有 27%、西德有 25% 是輸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及英帝国自治領的。

(2) 在不发达地区内部丧失的市場由新市場所代替。例如英、法、荷等国在它們的前殖民地失去的市場,已經由于向其他“有联系”領地(对英国来說,特别是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和中非联邦;对法国来說,特别是黑非洲和阿尔及利亚;对荷兰来說是荷属西印度群島)或者其伙伴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輸出的繁荣而得到部分补偿。

(3) 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的貿易为工业化国家之間的貿易所代替。一般說来,自 1953 年以来,工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間的貿易一直在以一种快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間的貿易发展的速度向上增长。在这方面經常存在着两种突出现象:

其一是美国已經成为大多数殖民强国的一个重要市場,它們在那里部分找到了在別处丧失的銷售地:

卖给美国的商品在出口总额中的百分比

国家	1928	1938	1950	1959
英国	6%	4%	5%	11%
法国	6%	6%	4%	8%
意大利	11%	8%	6%	12%
荷兰	4%	3%	5%	6%
比利时	8%	7%	9%	14%

至于日本,它目前的出口商品中有 30% 是輸向美国。

其二是共同市場内部貿易发展的目前速度要比共同市場和世界其余地区間貿易的发展快得多。

(4) 原来需要进口的产品为国内的产品(及市場)所代替。这

既适用于合成工业或国内新兴的原料工业(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的石油;意大利和法国的沼气;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的铀等),也适用于以本国制合成纺织品和耐用消费品逐步代替向国外购买食物或纺织品。

(四) 今后十年世界经济的前景

根据这里和关于殖民地革命的决议中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经济趋势所作的分析,显然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目前将继续向着与世界其余地区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且无疑在整个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如此。一方面在世界上的工业化地区,产量和按人口计算的收入已经达到很高水平,或者正在非常迅速地发展(工人国家)或迅速发展(西欧和日本),另一方面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按人口计算的收入和产量却继续陷于停滞或者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开始提高得非常缓慢。

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在这种形势下,正设法根据自己拥有的资源以及它们所体现的阶级力量来对付这种情况。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前景仍将越来越多地为日益加深的帝国主义危机所支配,特别是在殖民地革命达到受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领导阶段的意义上说来是如此。

十七、在援助不发达国家方面的竞争

从纯经济观点看来,资本主义国家今天拥有的资力超过工人国家,因为它能够发动一个规模更大的援助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运动。它们不仅要富有得多,能够使它们在机器和人力方面的储备力量在这方面产生效果,并从事更丰富的资本商品的当前生产,而

且它們不像苏联，沒有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强大的盟国經常对它施加压力，这个盟国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耗用掉苏联的大部分现有資源。

工人国家的优越性在于：它們的援助虽然数量較少而且是出于政治原因給予的，一般說来却和可能改变这些国家落后结构的运动和企业有直接联系。这种援助之所以会重要和有成效得多，而在今后一些年内将越来越是这样，其原因正在于此。正如埃及和其他国家的事例已經証明的那样，古巴的事例說明，这种援助是使它可以避免帝国主义国家的报复和經濟封鎖企图的一种支持力量。

誠然，美国的共和党政府由于对美国收支差額的不利发展感到不安，有一个时候在給予不发达国家以贈款和信貸上甚至有所遏制，借口要用这种訛詐手段来迫使它在西欧的盟国——首先是西德——作更大的牺牲。但是这种政策——最后以政治上的消极和无所行动告終，并且使得美国資產階級只能在以下两者之間进行选择：在殖民地革命更为扩大的情况下，进行有計劃的軍事干涉，或者干脆投降——正在美国本国和西欧世界資本主义的領導集团中間引起越来越大的煩惱。

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政策就会改变，而且我們會看到美国給予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比以往多得多。这种援助非常可能是有选择的，要看华盛顿认为以下哪个地区最危急和最有战略性而定：拉丁美洲（首先是巴西、墨西哥、委內瑞拉、也許还有阿根廷）、印度、土耳其、伊朗，也許还有印度尼西亚。

但是，帝国主义执行这个計劃的具体可能性碰到了严重障碍，特别是就美帝国主义的情况說来是这样，因为在扩軍备战的巨大負担下，它在財政上已經日益衰弱。

此外，它还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本身遭到各种社会障碍，在半殖民地国家中，这些障碍将严重地限制这些“援助”计划的效果。

(1) 私人资本很不愿意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可以与宗主国的工业竞争的加工工业。因此为此目的给予的援助将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援助(受各该国资源的限制)，因为美国政府可以为了资产阶级的集体利益而超出这个阶级中某些部分的狭隘经济利益的范围，就如它于 1945 年以后在西欧所做的那样。

(2) 这样一个计划的规模本身不足以在短时期内改变群众的贫困与不满，也不足以制止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革命形势的高涨。只有在某些有限的情况下，并且要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它才可能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此外，提高生活水平并不能自动地对群众起涣散革命斗志的作用。

(3) 在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没有一个足够广泛的资产阶级社会阶层能够把这种援助全部用于生产方面来促成真正的经济高涨。在这方面，不仅像蒋介石、李承晚和伊本·赛义德这些过去的政权，甚至比较近的国家，如伊朗、土耳其、南越和老挝问题，都是很大的。

无论如何，“援助”计划绝不会稳定这些国家的经济形势，这是由于革命过程和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接受这种援助的资产阶级阶层的本性如何，最后它总是与群众运动相对立的。

事实上，帝国主义想和暂时领导群众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达成协议企图就要依靠牺牲进步事业来实现：他们尽管避免没收企业；他们用不充分的措施来代替土地改革，他们赞成通过过分剥削工人来积累资本，这就使得一切矛盾原封不动，依然得不到解决，而且起了把革命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分开的作用。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在今后一些年内,給予不发达国家的美援,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援助以及苏联的援助將繼續增加,美帝国主义將格外努力通过对殖民地資產階級的某些部分作重要让步以使他們依附自己。但是从这些国家目前的社会和政治情况看来,不論是在短期內还是不长不短的时期內,这种援助都不能制止殖民地的革命。

十八、工人国家与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經濟竞争

至于苏联与美国之間,以及所有工人国家与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直接竞争,假定目前的趋势大致繼續下去,可以断定說:到1970—72年,苏联的产量极不可能超过目前美国按人口計算的产量,至于像赫魯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說的那樣,工人国家的产量在1965年就将超过資本主义国家的产量,那就更不可能了。只有在美国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濟完全陷于停滞的这样一个非常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这两个預測才能成为事实。比如,苏联人士自己就承认,在1959年,工人国家的电力总产量只占世界总产量的20%,鋼鉄产量只占世界总产量的31%。这些数字表明,要实现赫魯晓夫的不是非常郑重其事的預測,在六年內需要取得多大成就。

不錯,并不是絲毫沒有这样的可能性: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苏联的产量可能赶上美国按人口計算的产量,特別是如果在有关年份(不論是在1965、1970、1971还是1972年)发生严重萧条的話。但是如果要从这中歸納出两国經濟力量的对比或人民的生活水平到時候就会相等的結論,那就是自欺欺人。

至于經濟力量的对比,必須考虑的是生产能力而不是目前的产量。至于生活水平,在目前的产量之上必須加上的是在十年或

几十年内积累的耐用消费品的总数。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今后一二十年有希望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对工人国家保持一定领先地位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但是这种领先地位会逐渐下降。因为随着衰退越来越广泛，生产能力与目前生产之间的差距在越来越多的工业部门日益加大以及殖民地革命使越来越多的国家退出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这种优越地位可能时常因为工人国家在当前产量上已经赶上资本主义国家水平而短时期中断。

必须进一步考虑到，工人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动态是得到以下超经济因素支持的：为建设第一类国家而奉行的国家政策和对群众的动员，在第二类国家中国家进行的干涉以及在第三类国家中革命进行的干预。

衡量国有化计划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就的标准不仅是它的发展速率以及即使是在官僚主义领导下目前在提高群众的消费水平方面取得的成就，而且还有这样一个事实：经验说明，的确唯有这个制度才能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即全人类的四分之三——摆脱落后状态、建立现代化的经济，并且按照群众的需要来利用它们的资源。以中国为一方，以印度与所有其他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为另一方的对照证实了这一点。这个事实成了对于群众革命运动的具体鼓舞力量。

下一个阶段工人国家与资本主义进行竞争时将不仅通过苏联和中国的五年计划以及帝国主义能够用来避免最坏的危机和维持有利景气的手段，还要通过这个或那个政权所表现的解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发展需要的能力。

必须补充一句：美国资产阶级是意识到在这场竞争中所下的决定性赌注的。它将动用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来加快美国工业的发展速率；使它的工业在技术和工艺上对苏联工业保持一定的优越

地位，并在它失去其最后一张王牌以前，迫使对方摊牌。

十九、政治結論

殖民地革命的新高涨、帝国主义制度的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对工人国家保有的经济领先地位的下降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力量与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有利于反资本主义力量而不利於资本主义力量。力量对比的这种改变将相继从社会方面发展到政治—军事方面，最后再发展到经济方面。我们的运动在1950年就首先强调了这一根本变化，它没有理由只是因为苏联官僚机构的领袖和全世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首脑也正在——已经晚了若干年——作这种估计就把它放弃。

工人国家与殖民地革命之间的联盟可能在今后几年使力量对比的这种变化飞速发展。通过动员过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人力资源，通过第一次在非资本主义基础上以世界规模利用经济资源，这个联盟具有无限发展前途。这种联合发展——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对帝国主义制度和官僚主义控制都是不利的，虽然可能出现过渡性的新官僚统治形式。

这种强大的革命发展不仅危害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的统治，并且由于它提出了在工人和被剥削群众进行监督和领导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问题作出协调而科学的解决，这就使革命先锋队的影响在今后有可能日益增长。为了在下一个阶段指导这些革命运动，非常需要一个解决这一发展阶段中经济改革和管理问题的过渡性纲领。

但是，我们的估计和赫鲁晓夫以及各国共产党机械论估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辩证的，也就是说包括今日现实中的所有矛盾

因素。我們懂得，尽管力量对比发生了这种有利于世界上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变化，美帝国主义仍然在经济上处于实际领先的地位，仍然拥有巨大的潜力，我們还懂得，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经历并且正在经历着一种表现为资产阶级的自信心有所增强（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美国资产阶级中某些部分的自信心）的新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要期望世界形势通过美国对苏联的经济领先地位的下降（甚至是丧失）而发生根本变化，那是绝对虚妄和危险的。

降低这种领先地位不会使美帝国主义丧失任何这样的武器，这种武器现在和将来都使它能够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过程中的任何决定性时刻，发动一场自杀性的防御战争。

此外，如果资本主义欧洲的经济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苏联的经济进展同样不可能自动改变那里的社会力量对比而有利于无产阶级，更不用提有利于共产党了。

由此看来，期望单单从工人国家的经济进展上就产生奇迹，所谓“和平共处”战略是以两个完全不切合实际的假说为基础的。这种战略主要表现的不是苏联社会广大阶层“不惜以任何代价实现和平”的决心（经过几十年来不断的受苦和牺牲，这种决心无疑是存在的），而是苏联官僚阶级在世界革命获得新进展的情况下所感到的恐惧。这种战略是极为保守和涣散人心的，因为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使国际工人运动（包括殖民地国家的群众在内）的作用降低到只是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以便迫使他们接受“共处”。

不错，绝对不可能也要求苏联政府使用“核战略”，要求它利用目前在核弹头导弹方面的优势来消灭这个或那个国家，或者甚至是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奉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不会是共产主义在全

世界取得胜利，而会是文明或者甚至是全人类的消灭。

問題在于懂得这样一点：只要帝国主义繼續拥有它今天仍然拥有的力量，核战争的危險將繼續存在，而且在今后二十年內，工人国家中的任何发展都无法剝夺帝国主义的这种力量。因此，問題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目前在某些国家存在的有利条件，以便那些国家的劳动人民从內部打击世界資本主义，以保証工人运动在它暂时停止的国家中恢复。这是决定性地解除帝国主义的武装并防止核战争浩劫的唯一方法。

有人說，工人政党奉行的这种政策会“刺激”帝国主义，他們忘了解释，为什么他們不同时贊成制止同样“刺激”帝国主义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經济发展。

只有在最强大的資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获得胜利，才能肯定使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对这场战争的恐惧远不会使群众人心涣散，倒可能成为使資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态度趋向激进的主要力量（如日本和英国已出现的情况那样）。把这种恐惧化为一种强大的反資本主义武器——这就是迄今为止为共产党所可耻背叛的工人政党的責任。因为对于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說来，推翻資本主义不一定預先要求存在生产过剩的严重危机；可能由于政治和社会危机而将推翻資本主义問題列入議程，有了这种危机，就可以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員，尽管在經济上并没有发生灾难性情况。

千方百计推动殖民地革命，使它对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取得新胜利，将日益損害資本主义經济的相对稳定性，从而也有助于恢复資本主义国家中的运动。

第四国际正是用这种战略——革命的、现实的和負責的战略——来对抗“和平共处”的神話，这种神話在劳动者的队伍中播下

了精神沮丧和消极的种子，并且使资本主义保有迟早会把他们拖进一场残酷核战争的力量。

4. 殖民地革命

——它们的比较、问题和前景

(一) 总論

一、殖民地革命持续高涨的原因

过去十年来，殖民地革命的不断高涨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革命工人运动的长期停滞是一个显明的对照。

战后时期殖民地革命的高涨是由一系列因素产生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则缺乏这些因素或者其剧烈程度已不如过去。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是和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财经状况的恶化同时发生的。

这些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由于大量输入美国资本以及由于战争结果引起了世界各国在恢复建设和发展工业方面的广大需要而得到了好处，使资本主义在更高的生产水平上得到了新的周期性的发展。与此相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所积聚的资本都很快地消耗净尽，并且由于先进国家所取得的绝对或相对的进展而越来越被抛落在后面了。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发展的标志是工业化，虽然其工业化的过程是急促的和不平衡的，但一般还没有中断过，这种情况对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是有利的。

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也从技术和科学的成就得到了好处，增加

了某些农产品和原料的自給而使这些产品原料的輸入价格下降，对附属国保持了有利的貿易差額，更好地防止通貨膨胀。相反的，附属国的貿易差額愈来愈恶化，并且正在同疯狂上涨的通貨膨胀进行掙扎。

由于附属国的人口增长率比生产发展得更快，因而附属国無論在絕對生产量和按人口計算的生产量方面都落后于先进国家。

根据这种发展情况，附属国有着不同的經濟結構和社会結構，并且在历史上也是发展比較晚的。一个国家要赶上先进資本主义国家现有的发展水平，必須有一个发达的經濟基础作为起点，并且必須拥有技术熟练的人力和按人口計算比例很高的投資。

现在附属国在这个竞赛中受到結構上的障碍。他們的經濟基础薄弱，国民收入比較低，并且由于他們目前收入有限以及由于他們所創造的剩余价值大部分回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腰包里去，因而未能积聚足够的資本，而属于本国寡头政治的大部分資本則被用于进行高利貸、获取商业利潤和租金方面。

在这些国家里，要从国民收入中积累 15% 到 20% 的資金以供实行大规模工业化的需要，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下，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就其中的多数国家來說，如果沒有其他資源的支援，即使这个比数也是不够的。

在那些其結構已經是資本主义的国家里，这些資金来源通常是以公共投資或私人再投資的形式出现的外國資本。即使他們找到这些資金来源——尽管它对于不能获得平均利潤的投資有保留权——，其数目要大大超过目前給予“落后”国家的每年开支的总数(包括苏联給予这些国家的数目在內)：从四十亿美元到二百亿

美元以上,如果不是更多的話^①。

資本主义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在这种情况下——然而决不低估帝国主义更广泛地“援助”所謂“落后”国家(印度、拉丁美洲、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新企图——,必須預见到在今后的年月里,这些国家同先进国家之間**絕對的和相对的**(就其含义而言)悬隔将会扩大。

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經濟和工业的发展(虽然不会不是稳步发展的)将在具有高度爆炸性的和与先进国家大不相同的条件(它不仅**有衰退、失业和通貨膨胀,而且有真正的萧条**)下来完成。

由于附属国同已开始了新的周期性发展的先进国家比較起来,在历史上发展得比較晚,以及由于附属国的发展遭到他們自身的經濟和社会結構、封建資本主义者及渗透了資本主义的部落地区的障碍,这种不同的經濟状况,說明了附属国群众革命活动力量强大和不断更新、而先进資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工人运动却在衰退的根本原因。

目前正在鼓励着殖民地革命运动高涨的另一个原因,明显地是由于帝国主义的衰退和工人国家(指社会主义陣营——譯者)力量的日益强大,以及由于战后时期殖民地革命的領導阶层一方面同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同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所建立起来的新的关系。这些拿破仑式的領導阶层主要是由那些追求本国經濟发展的分子組成的,他們由于工人国家的存在、工人国家的势力和財富以及由于他們对帝国主义的敌对态度(显然是为了加强他們的拿破仑主义的作用和进一步努力摆脱帝国主义的直接控制)而得到好

① 据联合国专家們的估計,在三十五年内,要把现在每人每年有一百美元的人口(即大約十六亿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倍,每年需要的款項将达到二百亿美元。但是其他的估計則把这个数目提高到五百亿至六百亿美元或甚至更多。

处。

殖民地革命在实现了它的基本目标——从帝国主义統治下取得形式上的独立——之后并没有結束。它繼續力求完全清除帝国主义的余殃和一切經濟及社会的桎梏，爭取經濟的迅速发展和实行工业化。这些附属国的人民群众越来越感到难以抑制的迫切要求就是要很快地达到先进工业国家的水平和弥补他們在历史上的落后状态。

正是因为这个原故，所以一般來說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能够起領導作用的殖民地革命的反帝阶段，现在正让位給提出了附属国的迫切的經濟和社会要求的更高阶段。特别是拉丁美洲許多形式上独立的国家、中东和北非的国家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錫兰等国家的情形更是如此。在古巴，不断革命的必然发展过程已使这个国家的革命突破了資本主义的界限。

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中已占居先鋒的地位，并且是它的主要力量，包括重新觉醒起来的先进国家內的革命斗争在內。由于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內革命的迟緩（这是由于上层領導的背叛和資本主义新的經濟发展相互影响的結果），殖民地革命同工人国家日益壮大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在客观上已成为世界革命的动力。

在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的資本主义国家內，由于这种联合力量的外部压力（至少部分地是由于这种压力），在一个对目前这些国家的資本主义更为不利的新的經濟危机中，重新唤起革命是极有可能的。

二、殖民地革命和帝国主义

这种不可抗拒的群众运动的力量正在不断地把殖民地革命推

向更先进的地位，帝国主义已被迫不得不采取更間接和更灵活的依賴 (DEPENDENT)形式。英、法和比利时帝国主义最近的所有例子都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趋势：許多昨日还是殖民地的領地今天已提升为自治区的地位，或是同宗主国的联系有更大的伸縮性的自治領地位；許多国家在形式上已完全独立。

帝国主义——至少是其中更开明的势力——目前正在力求通过把政权移交給当地的上层领导集团，以維持对自己有切身利益的經濟地位，它正在企图用付出这种政治和經濟权力来发展和收买当地的上层领导集团。帝国主义的这部分势力已認識到，不論是采取欧洲人直接統治的形式，或是采取不是广泛独立的、更为灵活的当地政府的形式，要想长期統治下去是不可能的。

在存在着当地上层领导——知識分子和其他阶层的人士，实际上是或可能是資产階級或小資产階級分子——的地方，帝国主义力图依靠他們，立即地或分阶段地把政权交給他們，并通过和他們一起对他們本国共同进行經濟剝削的办法来收买他們。但是帝国主义在这項事业中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当地的领导阶层沒有足够发展的力量来担負这个角色，在他們面前的是声势猛烈的群众运动，群众所要求的生活条件是資本主义沒有能力保証的。

各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定地位取决于它的力量和它所面临的具体形势。

及时地从亚洲解脫出来的英帝国主义，在成功地維持它在印度、巴基斯坦、錫兰、甚至馬來亞等国家的主要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中非洲和南非洲的特殊形势，当地的大量欧洲移民，以及数量巨大的投資岌岌可危，现在也企图在非洲采取同样的办法。但是甚至在这些地方，帝国主义现在已冷靜地看得见，終有一天爆炸性的种族歧視政策和少数欧洲人的独裁专权要被迫让位給当地大多数人

民的政权，尽管人们必须预见到这些少数人会进行激烈和长期的反抗。

法帝国主义目前已被迫要跃越几个阶段，从帝国到父子关系的“共同体”，从而进到“革新的”共同体，即诸如现在已取得“国际主权”的、在形式上多多少少是独立国家的联合体。法帝国主义现在只是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着绝望的反抗，那里居住着数量甚多的欧洲人，而且拥有撒哈拉的不可估量的财富。

比利时帝国主义在一度倾向于进行短暂的然而无能为力的反抗之后，已被迫允许刚果独立。

葡萄牙帝国主义——它知道它的殖民地如果取得独立，就会暴露(葡萄牙)独裁政权的软弱无能和断绝它的大部分经济和财政来源，而为独裁政权敲下丧钟——仍然在进行反抗，保卫它的奴隶式的统治。但是这样就更有理由说明，在目前国际斗争和非洲斗争中，它的不可避免的崩溃将会更加猛烈。

至于美帝国主义，它的殖民政策更是多种多样。除了在波多黎各之外，它都避开直接的统治，但在它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的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如中美洲、南越、南朝鲜、泰国等地)，它毫不犹豫地支持当地的残暴政权。相反地，在非洲，由于它必须同吃到直接统治苦头的老的帝国主义对手进行斗争，因此它就给自己戴上“解放者”、“自由主义者”的假面具，企图通过物质“援助”的手段来讨好正在形成中的当地资产阶级。

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上和部分战略上的重要性仍未消失(就取得原料供应和输出工业品甚至输出资本而言，不过最后一个因素的重要性同其他二者比较起来已经减少了)。而且，对于发动突然袭击有利的原子战争的战略，提出了生存的问题，从而导致(战争)基地分散在世界各地。

在这决定性的竞赛中，由于形势的压力，帝国主义必须同工人国家对抗，因而保持它在附属国的势力比过去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个竞争——假定它将“和平地”持续一个时期——包含着比过去激烈得多的夺取经济权力的竞赛，其中最重要的后备力量仍然是附属国的资源和工业化。

在今后十年内，帝国主义参加这场竞赛有以下几个不利的方面：群众对它的历史记忆犹新；由于它的结构，它没有能力给予有效的援助；内部分裂，已经重建或超过过去的势力的强国之间在最有利于积累财富的地方正在进行激烈的竞争；附属国的工业化。

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的唯一机会就是依靠正在形成中的殖民地资产阶级所可能提供的帮助。殖民地革命的下一个阶段将取决于这个阶层的形成（帝国主义正千方百计地给予帮助）和群众革命运动（他们要求根本解决他们的问题，因而要求有一个急进的领导）之间在时间方面的竞赛。

但是即使这个过渡是通过一个当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这个过渡时期在历史上也将不会是很长的，最后仍然会使帝国主义在经济上遭到破产，因为当地资产阶级所取得的任何重大发展，到头来必将减少仍然为帝国主义所垄断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三、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

在目前历史阶段，同资本主义并行的是工人国家体系，殖民地革命和这个体系建立联盟应当是非常自然的并且几乎是自动的。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利益一致是显而易见的。工人国家对这个斗争应当给予积极的和无条件的支援。

而且，在经济交流方面，工人国家可能占有优势，逐渐地代替

帝国主义所提供的“援助”，并将(附属国)目前与帝国主义联系的綫路納入它自己的軌道。工人国家可以提供低廉的經濟援助和技术援助，不强加任何政治条件，来帮助这些附属国取得真正的經濟发展。

他們可以在經濟上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貿易关系(虽然这种情况不可能是普遍的):由附属国輸出农产品和原料,而从工人国家輸入工业設備物资。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个关系的发展将十分清楚地表明工人国家在这方面所拥有的巨大潜在能力和帝国主义在一場长期的“和平竞赛”中最后将要碰到的致命危險。只是由于工人国家的政权性质遭到官僚机构的敗坏和歪曲,才使上述可能条件的利用受到了限制,并且妨碍和損害了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之間事实上的联盟。

自然,对于苏联或其他工人国家給予附属国資产階級政权的經濟援助不能提出反对,因为这种援助可以使这些附属国暫時抵住帝国主义或者更自由地发展自己。但是要反对的是把这种援助来交換殖民地資产階級的“中立”政策,而附属国内的共产党則被迫把他們的独立性的階級政策服从于工人国家外交的需要,这实际上是冒巩固資产階級政权的風險,而这些資产階級政权必然要回头来对付他們本国的工人运动,而在一个更遙远的阶段,他們必然要回头来反对工人国家。从这种观点出发,最近由尼赫魯、苏加諾、納賽尔、卡塞姆和其他从工人国家的援助得到好处的受益者所提供的例子雄辯地說明了这个問題。

然而,工人国家的援助在客观上仍然可以帮助群众的日益成熟和最后成为資本主义的客观威胁。这特別說明了某些国家如巴西和玻利維亞的資产階級的态度。古巴的情形体现了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之間的客观联盟的力量,在这里,苏联的官僚机构不得

不抛开和平共处政策而答应用火箭来捍卫(古巴的)革命。在这新的阶段中,尽管苏联官僚机构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力图阻止,殖民地革命事实上正在同工人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

必须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群众中鼓励这种联盟。第四国际将促进劳工中央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和其他群众团体同工人国家的各种组织之间的联盟,作为建立这种联盟的一个具体步骤。

四、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

依靠商业利润、地租和高利贷的收入或充当帝国主义走卒的当地买办寡头,是目前在附属国里正在没落中的阶层,它的没落有利于反映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发展过程的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这些阶层在现阶段正直接地或通过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煽动家掌握着殖民地革命的领导权。被称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阶层,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在不同的附属国里面,他们的重要性各有很大的不同。

例如在印度、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它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并且自觉地去直接掌握政权,即使这个政权随时有丧失给同垄断寡头和帝国主义有更密切联系的其他势力的危险。

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里,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要比买办寡头差一些。

在某些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常常是通过拿破仑式的政权(如苏加诺、纳赛尔、卡塞姆、恩克鲁玛等人)来行使它的权力,这些政权从历史观点来说是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在其他情况下(非洲往往有这种情况),除了部落酋长和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官吏以外,力量非常薄弱的当地上层集团可能产生

出同帝国主义密切勾結来对本国进行經濟剝削的新的买办資产階級。

在各个地方，民族資产階級取得发展的主要工具已証明是拿破仑式的政权、正是这个政权使民族資产階級有可能同时对付垄断寡头、帝国主义和群众，并且可能找到为打下基础和供給大企业資金所必需的数量可观的資本。民族資产階級还通过行使政治权力和国家的經濟职能，用扩充政府官員、滲入企业、貪污腐化等方法来部分地建立自己的干部队伍。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式的政权成为在附属国里发展資本主义的培养所。

最适合于这种拿破仑式政权的意識形态就是实行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它又簡縮为掌握权力的领导集团的专政。如果这个党通过它的綱領和意識形态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階級的和社会主义的党，那么，这种以群众組織的民主委员会或公社为基础的专政毫无疑问地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是目前有某一些人用所謂无階級的殖民地社会作为借口来为其在非洲实行拿破仑式的一党专政，发展資本主义經濟和不受群众組織的民主监督的行为辯解，都是必須加以反对的。

不錯，对于一个刚刚摆脱部族制度的社会的确不能搬用社会主义民主的多党制度(现在正是这样)，但决不可能因此而认为不需要建立这样一个单一的政党，它具有階級特性，有无产階級的思想意識和綱領，并且是以群众民主地組織起来的农民公社和城市委员会(它們管理政府并掌握权力)作为基础的。

无论如何，第四国际决不能放弃这个观念，即應該有几个工人的党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証。

决不能对民族資产階級的真正傾向抱有任何幻想。虽然民族資产階級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和

垄断寡头，不得不同无产阶级及其工会组织结成同盟，不得不主张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实行国有化和“混合经济”，但是一旦它的力量壮大之后，它必然要和先进国家的正统资产阶级一样，回过头来反对工人运动，并且通过“废除”它的“混合”经济（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和刺激本国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和在外交上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进一步靠攏帝国主义。尼赫鲁的印度就是一面镜子，它是第一批获得独立的国家之一，并且形成了本国的有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在印度已经清楚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在短期内已经走向倒退和反革命。（其他例子是：突尼斯、埃及、加纳、阿根廷、巴西。）对于殖民地的革命群众来说，潜伏着的最大危险就是受到与本国资产阶级建立民族团结的神话的哄骗，并为此而牺牲自己的组织和独立性的阶级政策。

五、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

殖民地的群众要求政治独立和经济迅速发展的普遍愿望是深切的和不可抗拒的。

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安定民心，正努力想完成这个使命。但是它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的道路来达到经济迅速发展的目标。

无论哪一个地方的民族资产阶级都证明它自己不能坚决地把帝国主义在附属国勒索的剩余价值的主要部分收归国有（经过几个阶段之后势在必行），也不能坚决地把本国封建主义者的地租收归国有，不能调动本国庞大的没有被使用的人力。没有一个地方的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或者愿意不付赔偿地没收帝国主义在农业—矿业和商业部门的企业，不付赔偿地没收封建主义者的土地而分给农民；没有一个地方的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或者愿意实行国有化

和計劃經濟并動員本國的群眾來為這個目的服務。

目前土地問題是普遍的根本性的問題。無論什么地方，土地大部分是掌握在本國地主、大殖民者或外國帝國主義公司的手中，只有一部分（其重要性根據各个地方的具體情況而有所不同）是本國農民私人耕種的土地或是集體耕種的部落保留地（例如黑人非洲）。

即使這些既不是農奴、不是佃農也不是農業工人的自由農民，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水平比較來說，大多數是貧窮的，他們要作為農民繼續生存下去還必須拚死拚活地干。這裡就產生了實行根本土地改革的極大重要性，這種土地改革必須和真正無產階級國家的有效的物資和技術援助同時并行。

土地改革的首要工作就是按照土地耕種者的自由意志來分配土地。根據具體情況，可以採取把封建主義者和大殖民者的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的方式，同時由國家援助農民合作社；或是採取集體管理土地的方式，一開頭就由公社（其規模相當於一個村或大於一個村）和大莊園的農業工人和佃農集體管理；或者採取如在最通常的情況下實行的混合制。

民族資產階級僅僅指望外國資本的主要援助來發展經濟，然而按照外國資本的數量及其條件，要期望附屬國甚至用稍微快一點的工業化速度來趕上先進國家不過是一種妄想。在這方面，中國和印度的例子的比較是有決定性的意義（不必堅持蘇聯的例子）。南斯拉夫則是另一種例子。中國的經驗是非常寶貴的，它指出了一個從生產力水平很低的基础上起家的殖民地國家爭取經濟的迅速和平衡發展的特殊道路。

把農民群眾組織起來成立公社，在有些情況下特別是在農民的地方自治傳統還比較強烈的地方，包含有許多可以有利地加以

运用的因素。公社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利用当地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量，把所有能够劳动的人都雇来进行生产，从而使国家开始了迅速和平衡的经济发展。

一般说来，对于公社的建立只能从公社可能产生官僚主义管理机构这个角度来加以批评，因为这种官僚主义管理机构有不够关心群众的生活状况和群众自愿参加这种新型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必要性的倾向。但是在官僚主义受到限制的地方（主要是由于有管理公社的群众民主组织的监督），公社在历史上将成“落后”国家争取迅速和平衡地提高生产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可以充分和精明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并成为一个更富有地方自治的社会生活的学校。

南斯拉夫的经验也是有价值的，它是一个农村小私有制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取得迅速发展的榜样，虽然它的经济性质是工人阶级的经济，它仍然对世界市场大开方便之门，同时生产者在监督和甚至管理经济方面有更密切的民主联系（工人委员会）。

“落后”国家远远不会因为外国资本的帮助而陷于或者停滞不前或者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进退两难的境地，它们有实际可能性可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采取“中国的道路”或“南斯拉夫的道路”，或是把这两种道路结合起来而去掉二者的消极因素。

但是，要取得这种可能的发展，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建立起社会主义类型的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这意味着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争取真正的解放和争取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斗争是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不可分割的。只有那些懂得如何把反帝斗争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结合起来的附属国才能够真正地从帝国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并为本国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化开辟广阔的道路。

六、殖民地革命的不断性

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統治的反帝斗争的群众，必然地要朝着超越形式上独立的范围的目标前进。

在目前殖民地革命的国际和国内关系中，它有发展成为一种不断性革命的难以扭转的趋势，它越来越把广大农民和工人群众所要求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提到最前面来，这些目标是：土地改革，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解放妇女。

在这个过程中，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冲突在一定的斗争阶段中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虽然附属国的资产阶级着手建立一种包括所有社会阶级(封建主义者和买办资产阶级除外)的事实上的统一战线来反对帝国主义的直接或间接統治，按照阶级路线来划分这个统一战线的斗争仍将不可避免地深刻化。民族资产阶级很快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同工农群众运动的急进主义扭在一起，工农群众要求实行土地改革、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及解放妇女，而这一切目标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制度是不相容的。这就迫使资产阶级回头来反对群众运动，并且公开地或不公开地实行专政制度。

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群众政党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斗争时期中所取得的威望使他们赢得群众的信任，并暂时使革命在半途中停顿下来(例如尼赫鲁、苏加诺、布尔尼巴、纳赛尔、卡赛姆、恩克鲁玛等)。跟着就会产生这样的要求：决不能把独立性的群众革命运动置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决不能“美化”民族资产阶级，决不能停止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批评和揭露，同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可能采纳的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具体措施，则视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和贫苦农民中继续取得信任的程度，给予批判性的支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排除在

特殊环境之下，就某些足以推动革命前进的明确目标同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反帝统一战线一般在非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居于支配的地位。

民族资产阶级或归根究底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小资产阶级目前在殖民地革命中所占有的显著地位，部分是由于斯大林主义政策的结果，因为这个政策把群众的独立性的革命运动置于宗主国的资产阶级或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之下。假如不根本反对这个政策，假如不停止把群众革命运动仅仅看做是资产阶级玩意儿和资产阶级与斯大林主义者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的一分力量，就有可能使殖民地革命走向更高水平的过程大大迟缓下来。

在这些附属国活动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往往不可能从外部和以完全独立的方式来反对目前由资产阶级领导或受资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民族运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有可能冒同国外的群众割裂开来和在实际上陷于无能为力的状态的危险。他们在接受在各地开办能阐明问题和指出明确前景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的任务的同时，不得不在具有群众性和革命性的当前民族运动内部继续进行他们的主要活动，并在运动内部鼓吹执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方针的势力。这个方针在有些地方是采取组织阶级政党、以工会为基础的群众性工党的过渡形式。

但是，任何专门为了无产阶级而在事实上忽视农民阶级的方针将会成为取得革命斗争胜利致命伤。除了必须实行适当的土地改革纲领，考虑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外，还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人斗争同农民斗争联结起来，并通过日常工作使革命组织在农村中扎下根。

许多附属国具有适合于组织和维持游击战争的条件，游击队可以由农民供给人力并且得到农民的帮助和保护。把农民的武装

斗争同城市工人的动员工作适当地结合起来，将能够大大加强革命斗争的力量和效果，加速附属国的帝国主义政权或买办政权的垮台。

在许多情况下，革命的领导的成熟和效力应当表现在它的首创精神、能力和敢于抓住时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以便支持和促进民族革命运动，使敌人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来重新巩固它的阵地。

根据中国以及阿尔及利亚、古巴等地的经验来重新估价农民战争的革命可能性，是处于相似条件下的每一个领导者的责任，也是必须加以融会贯通的殖民地革命的最珍贵和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在许多附属国里，一个现代的革命政党必须证明自己是农民武装斗争的真正组织者，能够把本国的革命发展过程正确地提到更高的水平，包括夺取政权在内。

(二) 殖民地革命的各种不同的 爆发中心及其特点

七、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在远东的附属国中，直接的政权目前是掌握在民族资产阶级（如印度）、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拿破仑式政府（如印尼和缅甸）或与帝国主义密切勾结的买办集团（如南越、柬埔寨、泰国、锡兰、马来亚和南朝鲜）的手中。现在我们必须和它们打交道的以上这些形式上独立的国家，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来完成包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内的革命，已经是明明白白的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其中最发达的国家印度。

印度不是沿着越来越“社会主义化”、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道路前进，不是沿着根本的土地改革和真正国家统一的道路前进，

从而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基础，而是实际上背道而驰。它特别是在私营方面发展它的“混合”经济，再次为外国资本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不论是“乡村建设计划”、“全国乡村推广计划”或维诺巴·巴维的非官方的“捐田运动”，都未能解决分配土地给农民和把他们有效地组织在合作社里的实际问题。

由于印度的古老的结构还未能根本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经济目标依然受到限制和从属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援助。这就导致本国工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依然很低，甚至落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

国家经济发展的薄弱以及它的仅仅受到轻微触动的封建资本主义结构进一步阻碍了对于地方之间的对立和风俗、语言、宗教等各种障碍的消除，它们妨碍了国家的真正统一和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和印度尼西亚、非洲的许多地区甚至拉丁美洲一样，印度也缺乏一次根本的革命，因而使资本主义以前的生活方式和野蛮主义的恶果没有得到清除，加上帝国主义的统治，情况就更加恶化了，从而阻碍了国家越过地方主义、教派主义、部族制度或帝国主义所树立起来的老朽的或人为的障碍而走向统一的过程，阻碍了经济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

随之而来的，在今后的年代里，局势的发展必将是爆炸性的，它将会促使资产阶级政权在保持了一个时期的议会制度和表面上的民主之后，转为更公开的专政。由于生产的增长和人口的增长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鸿沟以及由于中国不断取得成就所产生的革命影响，在这双重压力之下，印度的资产阶级从现在开始已看到有朝一日国大党和尼赫鲁本人在反对英帝国主义斗争时期中所树立起来的威望就要丧失殆尽了。

国大党内部已开始发生分裂，它的更为好战的封建资本主义

和亲帝国主义右派势力的崭露头角，这都是它可能发展成为类似巴基斯坦那样的公开独裁的征象。将来印度的例子也可以证明，不论哪个地方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决定要破产的。

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领袖能够拥有难得的威信(由于共产党在大战期间的失算)的另一个国家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的议会把戏已经结束而建立起了以军队为基础的公开的拿破仑式政权。这是由于印尼共产党的背叛政策而使软弱的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英雄”苏加诺得以渡过自 1945 年以来接连发生的一切严重危机，并且在现在，在它和群众和工人政党采取更坚决的反对行动之前，得以巩固它的拿破仑式的政权。

的确，即使到现在，印尼的资产阶级政权还是脆弱的，它正面临着本国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如土地改革、国家的真正统一、清除帝国主义所遗留下来的全部经济恶果、工业化等)和群众的不满，群众的生活水平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缓慢、通货膨胀和失业已降低了。

根本改变工人阶级领导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必将大大有助于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掀起新的革命斗争浪潮。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可能发生，因此，诸如印度的革命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青年党这样的组织就更应担负起制定一个具体的过渡纲领的任务，这个纲领将完全揭露资产阶级政权，并把一切革命力量导向争取建立工农政府的斗争。

保卫中国的革命和普遍推广它的一切确实有效的成就(包括关于公社的概念)，不仅是在上述这些国家中活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而且是他们手中的非常有力的武器。再者，为了对资产阶级进行有效的斗争，为了促使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内部不可

避免的思想分歧(这一句原文如此,意思不明——譯者),在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党和共产党及其他工人組織之間实行列宁主义的統一战綫政策是必要的。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是在今后年代里将要碰到的两个伟大的事件,必須从现在起就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来做好准备。

尽管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經济发展方面,在資产階級的力量比較方面,以及在农村的結構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的地方,但双方都具有如下的相同的决定性因素:在印度和印尼,群众都已經有了民族資产階級直接統治的巨大經驗,民族資产階級面临着人口的日益增长,却没有能力来解决土地問題、(国家的)真正統一的問題和工业化問題,而且正在向着独裁方面轉化。这个政策已把他們引进了死胡同,它越来越同中国的革命成就和国际局势背道而馳,結果只会导致(革命的)爆发。

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爆发革命危机,就有可能触动远东一系列其他国家爆发新的革命,这些国家目前正处在受美国帝国主义积极支持的买办集团的統治之下。

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还必須注意到,在南越,有利于革命斗争的形势已日益明朗化。南越的許多地区在现阶段存在着革命的根据地,它們还在繼續扩展,并且多少是各自为政的。它們的領導者是在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了經驗的中級干部。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参加到这个武装斗争中去。根据这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武装斗争可以为夺取政权和重新統一全国开辟道路。

錫兰由于存在着一个拥有巩固的群众基础的平等社会党,因此錫兰的革命可能成为一个例外。为了充分發揮它的作用,錫兰平等社会党必須加强它的布尔什維克結構,并通过在农民群众中开展工作、党的劳工力量的支持以及根据經济和政治的过渡性要

求的具体綱領,加强同农民群众的联系。

至于南太平洋島嶼虽然人口很少,资本主义不发达,但是其他地方的殖民地革命对它仍然发生影响。

这个地区的主要經濟特点是自給自足的农业經濟,或多或少地受到商业資本主义的破坏,商业資本主义剝削了它的一部分热带产物,主要是椰子干,在政治上,殖民主义通过部落酋长对它进行管治。

但是在这种普遍經濟落后的状况下,还有若干重要的例外。

第一,在英国殖民地斐济群島,有高度发达的糖业,經營者是农場主,但受到澳大利亚糖业垄断資本“殖民地炼糖厂”的实际控制。島上居民大部分是印第安血統,他們特別感受到世界殖民地革命的影响。在小資产階級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組織良好的工会在去年同殖民地政府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除非小資产階級的領導同殖民地政府之間达成協議,亦即除非他們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否則在 1961 年将会有新的爆发。

第二,在法国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群島,拥有一支在镍矿和加工工厂工作的实力可观的无产阶级队伍,还有一批生活水平和当地居民一样的受压迫的法国农民。人們还曾經提出过国有化的要求。当地居民具有反法斗争的传统,在最近以前还发生过这种斗争。

第三,在一些島嶼(如塔希堤、薩摩阿)正在进行着反对殖民統治的斗争。西薩摩阿将在 1961 年正式独立,虽然它实际上仍控制在酋长的手里,但总算是开了一个例子。

第四,在澳大利亚的新几内亚也有政治觉醒的征象。印度尼西亚爭取西几内亚(即西伊里安——譯者)的斗争为澳大利亚管治的远东半部提出了問題。把整个新几内亚并入印度尼西亚的問題

必須加以認真考慮。

南太平洋革命高潮的中心最大的可能是在斐濟群島。這個高潮將對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產生重大的政治影響。

第四國際必須提出南太平洋社會主義聯邦的問題，這是在地理上處於孤立地位的各个島嶼的唯一解決辦法。帝國主義將會企圖阻止這種政治上的合併，特別是力圖孤立那些可能產生革命高潮的地區。建立南太平洋社會主義聯邦的口號對於在這個地區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將起決定性的作用。

八、阿拉伯革命

中 东

在亞洲的另一端，在中東國家中，現在突出了伊拉克革命的中心點。它構成了阿拉伯革命的一個特殊部分。

在經過一整段時期的向前邁進，採取了沒收若干帝國主義的陣地、土地改革、解放婦女和建立工會及群眾性軍事組織等重大措施之後，（伊拉克）現在已有一段時期踏步不前或甚至向后退了。

和其他類似的例子一樣，伊拉克革命使一伙小資產階級出身，渴望更迅速地發展經濟，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和束縛的“民族的”軍官掌握了政權。這些人正夾在中東阿拉伯國家特有的敵對社會力量的中間，即：一方面是封建主義者和商業及高利貸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有限階層及城市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職員、公務員和知識分子），一方面是革命無產階級與農民，他們具有顯著的拿破侖主義的性質。因此，他們注定或者最後再次屈服於封建資產階級的勢力，或者在最好的情況下，成為民族工業資產階級和被他們拉過去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政策的工具。

在这方面，卡塞姆的轉變是具有特色的，他的轉變比納賽爾更快。有一整段時期，卡塞姆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不僅容忍城市和鄉村的革命運動以及自稱代表這個革命運動的組織，而且他本人也部分地依靠這個力量來對付那些企圖推翻他的買辦封建資產階級和親納賽爾集團。

卡塞姆已逐漸變成伊拉克統治集團的政策工具。伊拉克統治集團想攫取本國的巨大財富，他們同其他阿拉伯國家特別是敘利亞的統治集團共謀與支持納賽爾的埃及資產階級爭奪中東的霸權。

卡塞姆和納賽爾的對立，以及納賽爾之反對布爾吉巴，粉碎了關於超階級的阿拉伯統一的神話，並且證明歷來尋求阿拉伯民族真正統一的決不是阿拉伯資產階級，而是從事反帝鬥爭並在一定階段內同樣反對本國統治階級（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阿拉伯革命群眾。

伊拉克共產黨的背叛政策大大幫助了卡塞姆政權的相對鞏固。伊共把卡塞姆“理想化”，大大幫助卡塞姆個人威望的建立，而把革命運動的獨立政策和組織置于卡塞姆領導之下，並且沒有能夠利用這個運動來把革命推進到更高的水平。如同納賽爾和埃及共產黨的情形（埃共有一整段時期也頌揚納賽爾和他的政府）以及摩洛哥共產黨對回教國王及其政府的態度一樣，伊拉克共產黨現在正受到它所崇拜的偶像的侮辱和壓迫。

正是因為這個道理，所以有批判地支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或本國封建資產階級的進攻雖然是正確的和必要的，但是十分重要的是必須打破群眾對他們的幻想，並促進一個目的在於建立工农政府的獨立的階級政策。

以一個保證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純粹的資產階級民主綱領，

来代替把群众的基本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同过渡性要求联结起来的过渡性纲领和工农政府的前途，结果只会导致革命运动的必然失败和资产阶级独裁统治或甚至是买办封建资产阶级独裁统治的建立。因为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建立起工农政府，才能解决附属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土地改革、消除帝国主义的迫害，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才能在国有化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调动全国的没有使用的人力来从事生产。

继伊朗的摩萨德和埃及的纳赛尔的經驗教训之后，伊拉克革命的經驗教训成为到目前为止殖民地革命在中东的最突出的事情。

这个經驗同时证明，群众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领导，革命就不可能解决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和认真实行工业化。相反的，掌握政权的拿破仑主义的领导者们，致命地屈从于本国的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转过来反对群众，以便把他们的运动保留在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内，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是以外国资本的不可缺少的援助和对本国群众的非分剥削为基础的。

但是，卡塞姆的政权还是軟弱的，伊拉克群众的革命潜力虽然遭到打击，但还没有完全消失。只要群众运动明确了它对卡塞姆的资产阶级拿破仑式政权的立场，断绝了从属于卡塞姆领导之下的永久性联盟，在伊拉克开辟出建立工农政府的前景，局势还是可以扭转过来的。

更一般地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为争取成立阿拉伯东方社会主义联合共和国和馬格里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斗争，这是走向成立阿拉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一个步骤。

阿尔及利亞革命

几乎是在阿拉伯世界的另一端的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帝国主义主要的侵略军队的革命斗争已经持续进行了六年多了。

因此，阿拉伯世界正处在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这两个积极革命的温床的中间。除了他们内部的困难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帝国主义的敌视，苏联官僚机构的相对关心，以及突尼斯、摩洛哥和埃及资产阶级的态度。阿拉伯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势力已大大加强，按照它本身的力量，它会把革命保持在类似拉丁美洲半殖民地国家的水平上。

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在目前是一支不受马格里布的资产阶级或任何帝国主义驾驭的平民力量。尽管存在着已经严重分裂的封建阶级和相当重要的城乡小资产阶级，革命发展过程的深入，正在促使作为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基础的农民和无产阶级，比起上层的少数资产阶级分子和把持着民族解放阵线的机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始终起着主要的影响。

但是民族解放阵线的结构已产生了严重的危机，它的在国外成立的政治机构同革命的战斗部队之间的联系和受他们的控制都是不够的。这个因素，加上民族解放阵线的社会和政治主张仍不具体，来自法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也不够，因而使革命经常受到外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力量的压力，使民族解放阵线官僚化。

只有无产阶级的有效援助才能阻止这种演变，首先是法国无产阶级的援助，以及在民族解放阵线内部制订明确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方针，同革命的战斗基地、国内的战斗部队和居民及移居法国的无产阶级联系起来。

已经六年了，它在一场实力悬殊的反对强大的帝国主义的战

斗中牺牲了一大部分有生力量，沒有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实力援助。同时，它已能够在战斗中达到无可怀疑的成熟程度；培养干部，扩展国际宣传网，接触舆论特别是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舆论，并迫使法国帝国主义在物质上和军事上的努力严重地妨害了它多方面的利益和计划。

目前，为了应付可能同法国帝国主义进行一场新的长期斗争，除了工人阶级国家、国际无产阶级和阿拉伯及非洲人民的援助（物质的、外交的和道义上的援助）之外，它还需要把领导它的组织提高到更高的政治水平和组织水平。否则，巨大的损失，消耗和战斗的疲劳可能使它遭到失败——不是争取这种或那种形式独立的斗争的失败，而是争取能为国家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道路的那种真正独立的斗争的失败。无论如何，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平民基础已经取得了充分的经验，因而可以使革命的发展不会导致单纯的布尔吉巴式的结局。

在民族解放阵线内部存在着思想的分歧，如果不是终旧不可避免的话，它可能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布尔吉巴主义的倾向，它企图使国家的领导限制在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基础上；另一种倾向即是比较无产阶级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摩洛哥的独立党发生的事（指独立党的分裂——译者）可能在民族解放阵线重演，不同的是：布尔吉巴主义的右的倾向在开始的时候可能力量较弱，而左的倾向可能比摩洛哥（独立党）的左派更激进，并可能转变为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群众性政党。

1960年12月的群众运动标志着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特点是：（1）城市的群众已被积极动员起来；（2）示威的自发性已远远走在民族解放阵线的干部和指示的前面；（3）在战争期间形成起来的还缺乏政治经验的新的一代投入了运动，从这年青的

一代当中新的干部繁盛地成长起来；(4) 妇女大批地参加了运动，她们在斗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5) 一些新生的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它们保证了运动的事实上的领导。

由于上述这一切因素，民族解放阵线的左派在这新阶段中力量加强了，在关于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可能同戴高乐达成协议臆测中，他们已握有愈来愈大的优势（在目前客观条件下，这种协议决不可能包含有民族解放阵线投降的意思）。

阿尔及利亚革命不仅对于整个阿拉伯革命而且特别是对于整个非洲革命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在缺乏来自法国和欧洲无产阶级的有效援助的情况下，非洲革命的进展仍然较其他任何因素能够对阿尔及利亚革命以后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而且，阿尔及利亚革命是马格里布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马格里布革命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阿尔及利亚斗争的发展。在马格里布的一般范围内，摩洛哥的革命将起很重要的作用。摩洛哥拥有在数量上最重要、最集中、最有组织和最有战斗性的工人阶级，事实上，封建资产阶级是在经过同工人阶级进行一场激烈斗争之后才取得政权的（与此相反，突尼斯的资产阶级却是在平民力量的支持下取得政权）。若干因素表明，互相对立的阶级力量正在准备着一场决定性的摊牌，它甚至很可能在最近发生。

不论阿尔及利亚革命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前途如何，在革命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国际援助和没有在这个组织内部开展工作以前，决不可能满足于站在外面对这个组织进行批评。自 1960 年 12 月以后，特别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努力同在这个运动中涌现的中级干部取得联系，这些中级干部是代表第一批无产阶级领导核心的萌芽。

九、黑非洲

在最近展开的殖民地革命中，最蔚为壮观的是黑非洲的形势。

许多在殖民地直接控制下的国家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跳过几个阶段地取得自治或甚至正式独立。英、法和比利时帝国主义在群众要求从殖民地的直接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运动面前，已不得不到处退却，或者采取把政权交给当地上层集团的办法来企图分裂这个运动。只有中非洲、南非洲和葡萄牙控制下的一些地区还落在形势变化的后面。

驱使帝国主义采取这种更大的伸缩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由于大战的结果，非洲群众的觉醒以及从此以来（以苏联为首的工人阶级国家力量的增强，中国革命的胜利，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又加上资本主义经济在非洲的发展，城市化，部落制度的解体，早先自给自足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被带来了不稳定性，集中的和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诞生，甚至在有些地方也产生了想自己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分子。而且，整个非洲（特别是黑非洲拥有非常巨大的和几乎尚未开展的矿产、人力和农业），自从大战结束以来，它已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的殖民保留地了。它的战略地位也更加引起帝国主义的兴趣。最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非洲大陆的争夺，以及东方和西方的对立，增加了当地上层分子的自信心，使他们认为有可能利用这个形势来直接取得政权。

英国帝国主义以及法国、比利时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动向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就是要把人数有限的当地上层分子赶快组织起来，把政权移交给他们，联合他们，贿赂他们，以便共同对非洲进行经济剥削。在没有一个有历史渊源的阶级结构、没有资产阶级，甚至

沒有具有有机結構的小資產階級的情況下，現有的人數有限的上層分子（少數知識分子、公務員、工會幹部、小商人和商人）如果不是已經成為新的買辦階層，實際上也是潛在的新買辦階層，帝國主義正是要依靠他們，希望看到他們發展和鞏固。

但是另一方面，這些人數有限的上層分子在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仍然是十分軟弱的，面對着強大的群眾運動，同時他們也覺得有可能在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競爭和東西方之間的对立上面進行賭博，这样就以下的更為具體的意義上來說，不僅把他們推到特殊的政治地位，而且把他們推到特殊的社會地位：

在這急劇變化的非洲社會中還沒有形成起來和扎下根的這些上層分子，在現階段還不是新資產階級的萌芽，而是轉移于目前非洲社會的平民群眾和帝國主義之間的国家官僚階級的萌芽。只有在像加納或象牙海岸這樣的地方，才能找到民族資產階級政權的萌芽，這些地方由于資本主義之侵入農業，已產生了商業性的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其中也點綴着少數真正的資產階級分子）。

為今日非洲社會所特有的（這些上層分子的）這種特殊社會地位，可以轉變為具有完完全全的資產階級性質，也可以轉變為半無產階級性質，一切以群眾運動的力量以及它們同帝國主義和工人階級國家的關係為轉移。在目前，塞古·杜爾的几內亞是這種現象的最突出的例子。約莫·肯雅塔的怯尼亞以及喀麥隆、葡萄牙控制下的殖民地和其他地方都可能在明天成為類似的例子。在所有這些例子中，未來演變的根本因素在于國家和管理這個國家的階層。

如果經濟目標是對少數主要的礦產、農業和商業企業實行國有化，在部落村莊的基礎上實行農業集體化或擴大公社，和把國家

結構建立在农村和城市公社的基础上，那将是向着以国营經濟和計劃經濟为主要基础的工人階級国家发展的开始。

把外国企业收归国有可以分阶段进行，但是必須规定它們只能把一定限量的利潤运回本国，其余全部必須在当地再投資；并且須接受国家和本企业工人組成的委員會的监督。

由于黑非洲残存着部落公社的习俗，大大便利于实现农业集体化。国家为了防备不好的气候条件和提高产量而对农业提供的主要援助(科学的、技术的和物质的援助)，也将在一开始就大大促进农业集体化的趋势。在这些国家里，迅速发展經濟的最重要泉源在于充分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劳动力来从事生产，直到现在，还有很大一部分劳动力沒有被使用。

但是要把一切人力都动員起来，沒有真正的革命气候，沒有实行国营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真正的工农政府，是不可能的。当然，它的目的决不是要建設一个自給自足的“社会主义”經濟，那样的經濟只会使群众保持很低的生活水平，并使政权蜕化为官僚专政。它的目的是为了使資本主义世界市場和社会主义世界市場的一切可能方面都很广泛地得到好处，同时也有利于非洲内部之間的市場和貿易的发展。

黑非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同的特点，这是因为我們在这里与之打交道的国家，其經濟和社会水平都低于世界其他部分(拉丁美洲或亚洲)的封建資本主义結構的附属国。在黑非洲，我們与之打交道的国家一般都具有更特殊的結構，大部分仍然是由于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的入侵而陷于四分五裂的部落社会，它們的自給自足的經濟也受到了破坏，本地的商业化的小规模农业生产与資本主义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同时并存，这就造成了由于传统的民族經濟的瓦解而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都集中在城市、

矿业中心和帝国主义的种植园。

因为这种经济发展的程度并没有排除掉本国的统治阶级（因为直到最近以前，人数有限的少数欧洲人在亲自管理和指导经济的同时，把地方民政机构交给传统的酋长及其僚属去管理）。今天的黑非洲社会具有一种自然经济、单纯的市场经济和帝国主义经济并同发展的特殊形式，而完全缺乏或大部分缺乏封建经济或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环节。（只有尼日利亚北部的某些地区封建主义的农业占优势。——原注）

正因为这样，才造成了正在取得政权和管理国家的人数有限的民族阶层，在这前所未闻的同样特殊的国际和民族关系中的特殊地位。这个阶层拥有自己的力量，它没有经历过作为统治阶级的代理人所受的明显的影响或控制。这个阶层是通过管理国家来发展和取得社会重要地位，而不是由于生产的内在需要和它在生产中的地位。在第二次大战以前的历史条件下，这一阶层只会发展成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买办资产阶级。

但是在目前的特殊条件下，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强大的群众运动和工人阶级国家日益壮大的力量的影响，并且知道它可以从东西方的对立得到好处，这个阶层正在本国起着拿破仑主义者的作用，其本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还不是明确地必然朝着正统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目前非洲各国的疆界是人为的和不合理的，是适应划分势力范围的方针，它是帝国主义在上世纪末（1885年的柏林大会）所执行的分裂政策。必须把现在的这些国家重新联结成为更广大的组织，它的方向应当是成立“非洲联邦”，把北非的阿拉伯国家以南的所有黑人国家联合起来。

如果从人种起源、语言和宗教的观点来看，这些国家的人民严

格地說來并不是同一种族。但是由于几世紀來受到白人及在白人指揮下的本國僱傭者的奴隸剝削，促成他們在一個共同的部落、經濟和社會組織的基礎上有了共同的风俗、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命運，現在由於爭取從帝國主義的束縛下獲得解放的鬥爭，他們已開始具有共同的非洲民族意識。激起非洲上層分子並且越來越把先進部分投入決定性的反帝鬥爭的泛非洲主義，反映了他們急忙於尋求由這種共同的血統、共同的命運和共同的鬥爭所促成的非洲民族的團結。

姑且認為泛非洲主義也能够成為現在正在形成中的非洲資產階級的思想，來掩蓋分歧和階級鬥爭，並在一整段時期內利用群眾的革命潛力和勞動力來為其本階級的利益服務。（掌握在納賽爾和阿拉伯新興資產階級代言人手中的泛阿拉伯主義正遭遇到這樣的命運。）必須把恩克魯瑪嘴中的泛非洲主義同作為整個非洲黑人民族團結的理想泛非洲主義區別開來，非洲黑人是推動非洲群眾進行反帝鬥爭的强大革命力量。

關於把非洲國家重新聯合起來的具體步驟，究竟是採取合併還是聯盟的形式，現在這個時候要預見到或提出來為時尚早。但是可以說，這種統一的趨勢應當是受到普遍贊成、鼓勵和寫入非洲革命政黨的綱領中的。如果塞古·杜爾的几內亞往非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努力所發射的光注定要在全黑非洲擴大的話，在今後幾年內，在黑非洲須要注意的革命溫床有南非洲、安哥拉和莫三鼻給、中非洲、怯尼亞、剛果和尼日利亞。

已經在南非洲開始發生的革命在今後幾年內極有可能發展成為在大陸另一端的第二個阿爾及利亞戰爭。這個鬥爭是游擊戰和城市與礦區的無產階級革命動員相結合的鬥爭，它將會得到由（非洲）內地構成的全黑非洲的積極支持。農民後備軍和本國有利的

地理条件都是对游击战争非常有利的。而且，南非洲的工业、农业和矿业无产阶级的本国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以一个全国性的真正的革命组织为基础的南非群众的革命暴动有可能比较迅速地结束少数欧洲人的激烈反抗。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把这种不可避免的反抗考虑在内，决不能轻视它而必须根据这种考虑作好准备。

南非洲的革命不可避免地将会是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它将推翻在全非洲在经济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权（具有奴隶思想、种族主义和特殊地位的政权）。在它进行斗争的时期以及由于它的胜利结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后果，南非洲的革命将把全黑非洲的革命发展形势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目前在南非洲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非欧洲人的群众革命组织。这个组织在提出群众的全国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同时，它的目标将指向武装暴动和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没有朝着上述方向的决定性行动，没有群众参加各项动员工作，没有灵活性的策略以便即使群众采取错误步骤时也不致同群众割裂，那末，就会有很大风险，使群众的革命潜力在一整段时期内浪费在沒有前途的爆发上面，群众的实际领导权可能转移到沒有能力坚持全国性的长期斗争和不断地把斗争提到更高的水平。

如同在阿拉伯国家的情形一样——有的地方甚至也和在黑非洲国家的情形一样——，各个地方需要建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组织将须要在一整段时期内把大部分工作放在现有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和工会里面。它的总的目标将是在各地建立起以工会为基础的群众性的阶级政党。

这些政党将须要制订一个过渡性的纲领，这个纲领须适应本

国的具体情况同时也要考虑到将来把它们重新联合起来和成立非洲联邦(或黑非洲社会主义联邦合众国), 建立工会组织和全非洲性的独立自主的工会联盟, 是各地必须热烈执行的任务, 因为各地工会代表着主要的组织力量, 各地政府(还有现在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会力图使这些工会为他们服务。

十、拉丁美洲革命的新阶段

拉丁美洲不稳定的原因

拉丁美洲的革命是现阶段殖民地革命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它已越过了正式独立的阶段并且取得了关于买办寡头政治甚至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少经验。

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在所有附属国家地区中是最先进的, 在某些情况下, 例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甚至已达到接近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 虽然同今天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 它们是明显地落后的, 但它们基本上接近于战前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但是, 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帝国主义以及买办地主阶级和商业寡头对它们的控制还是很紧的, 它们在这些国家里形成一种在经济发展中充满矛盾、时断时续和不平衡的联合体。

拉丁美洲在大战期间大大加快了它的工业化过程, 自从大战结束以来, 工业化过程仍然在继续着, 尽管它是痉挛性的。在所有附属国地区中, 拉丁美洲拥有欧洲和北美洲最大的投资。

但是帝国主义也正是从这里榨取了最大部分的剩余价值, 它远远超过帝国主义的“援助”而且没有就地再投资生产。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庞大的农业、动力和矿业资源的剥削, 加上寄生的地主和商业垄断寡头的剥削, 阻碍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 并造成了这

种经济发展所表现的时断时續、危机和不平衡。

由于矿业、煤油业、农业和其他帝国主义企业所榨取的最大部分剩余价值都被运回本国；由于垄断寡头对投资的投机性变化；由于人民目前收入低，国内积累的比率非常小，因而使就地再投资生产的资本构成受到阻碍。然而目前两个因素比较起来，最后的因素在资本构成中的重要性是有限的。

在拉丁美洲输出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在大战期间和战后由于在世界市场上奇货可居而获利的情况下，本地货币资本的构成在增长，并且数量很大。这个因素连同其他因素有助于加速工业化的过程。但是自从这些输出品的价格甚至出口数量下跌以后，这种本地资本构成的来源也就减少了。

而且，拉丁美洲的老朽的封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结构，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平衡发展，大多数农民只有很少的土地或者没有土地，他们从国家方面也得不到适当的援助，工人的工资一般很低，同时也缺乏发达的下部结构（交通、动力、各种公用事业的建設等等）。因而使国内市场受到限制和互相脱节。

而且，由于它的经济往往依赖于单一农产品和矿产品或者范围极为有限的产品的输出，在发生真正的经济危机时，这些国家就感受到在世界市场上的衰退，并在慢性通货膨胀中进行痛苦的挣扎。这无助于扩大国内市场，也无助于本地资本的投资构成。

人为的疆界（这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化和帝国主义的統治及买办寡头区域性利益的遗产）也使市场不能在它的自然界限内得到充分的发展：即整个拉丁美洲，或者以南美洲为一方面，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海諸島为另一方面。

反对拉丁美洲革命的自由发展最坚决的是北美帝国主义。拉丁美洲的农业、动力和矿业资源，从墨西哥经过富饒的委内瑞拉和

巴西直到巴塔哥尼亚(阿根廷南部高地——譯注),已成为正在消耗着本国资源的經濟高度发达的美国的绝对不可缺少的后备力量。而且拉丁美洲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工业品和資本的最重要的出口,它的战略利益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也是十分重要的。

北美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逐步地取代了欧洲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势力之后,已成为主要的反动力量,它同买办垄断寡头结成同盟,阻碍了拉丁美洲自由和平衡地发展經濟和实行工业化,保持了过时的社会结构,并把这个地区割裂成为許多互相对立的小国。

北美帝国主义战后对拉丁美洲的控制不断地遭到拉丁美洲新兴力量的猛烈反抗,有时且是胜利的反抗,它的控制同样地由于帝国主义之間的重新竞争以及工人阶级国家开始的竞争而受到破坏。

不管怎么样,随着这个地区战后經濟发展和工业化的继续和加速,这些国家的社会面貌已大大改变,它們大大不同于世界上其他附属国地区,而且比較发达得多。

除了占总人口的絕大多数的农民(分益佃农、农业工人和个体貧农)和人数相当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机关工作人員、職員、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之外,已經形成了集中的和生气勃勃的工业无产阶级,特别是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以及在智利、玻利維亞、秘魯和委內瑞拉的矿业或油业中心。

而且除了正統的买办地主和商业阶级之外,还形成了新的工业民族资产阶级,他們希望争取一个比較自由的、受帝国主义和垄断寡头的阻力較小的經濟发展。在許多拉丁美洲国家中,正是这些阶级直接地或通过拿破仑式政权力图垄断和把持政权,并利用农民、工人和激进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来为

他們自身的利益开辟道路。

但是帝国主义和垄断寡头的反抗力量仍然很强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本身也害怕过分相信革命群众对他们们的支持，而不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寡头。这个政治因素和经济困难的相互作用，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以及革命群众运动的力量，是现阶段拉丁美洲国家长期不稳定和几乎是不断发生革命危机的基础。

依靠军队和警察的买办垄断寡头的独裁政权在多数情况下已证明今后是不可能的或无能为力的，而处在帝国主义与垄断寡头的反抗和群众运动的急进主义之间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又证明是非常不稳固的，因而政治危机就成为拉丁美洲特有的病症，在政治方面就反映了目前拉丁美洲革命的变化，在帝国主义发生总危机、工人阶级国家的经济 and 军事威力在增长、殖民地革命正在各国兴起的当前国际局势中，充满了矛盾、时断时续和不平衡。

拉丁美洲国家的不稳定和革命危机的延长，也表现了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迟缓（或不如说是不够成熟），未能使这个危机在最近的将来达到胜利的结局。但是客观条件对于这种迅速的成熟和建立革命无产阶级的集体领导是极为有利的。

目前拉丁美洲一般的客观革命形势明确地反映了群众革命运动的威力和领导阶级之间的极端分裂和尖锐的对立。

阿根廷无产阶级自庇隆垮台以来所进行的不停的斗争，玻利维亚自 1952 年革命以来所保持的基本革命果实，智利工人阶级政党势力的增长，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独裁政权的垮台，古巴的革命，以及现在已经在巴拉圭开始的反对独裁的斗争，这许许多多的事实雄辩地象征着群众革命运动力量的不断增长。

另一方面，阿根廷、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和其他国家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军队（它是这些国家的反动独裁政权的传统工

具)之未能有效地干預和阻止这不断发生的危机,也是标志着拉丁美洲的深刻不穩定和客观的革命形势的重要征象。

拉丁美洲革命的过渡性綱領和主要的問題

下一阶段的拉丁美洲革命可能达到的水平将取决于建立能够代替目前領導群众革命运动的資产階級或小資产階級分子的革命无产階級的集体領導,只要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傾向性的組織在群众运动中大胆和巧妙地开展活动并考虑到各国的具体情况,这个任务在目前是可能实现的。

在各个地方把在无产階級群众組織或具有革命性质的平民群众組織中的独立活动和招收成員的工作結合起来,它的任务将是制訂和提出一个走向工农政府和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綱領,这个綱領将特別包括以下几点:根本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給耕种它的农民;国家給予农民合作組織以有效的援助;在經濟基本上国有化的基础上实行經濟发展和工业化的計劃,它应考虑到世界市場特別是統一的拉丁美洲市場的資源以及来自工人階級国家的援助和同工人階級国家的貿易。

在拉丁美洲一般地必須不懈地宣传建立**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

各个地方所需要的不是爭取无产階級政权和社会主义的抽象口号,而是具体解答各个国家的重大問題,这些問題必須由以政治組織和工会組織及民兵組織和各种委員會为基础的工农政府加以解决。

土地改革必須导向把垄断寡头的土地分配給耕种的农民,只有在公社习惯根深蒂固而便于实行集体主义經營的特殊情况下才能立即实行,集体主义經營,如同种植园的情形一样,国家把它轉

变为由种植园工人合作社经营的集体主义模范种植园。伴随土地改革而来的应当是来自工人阶级国家的、有利于农民合作经营的技术和经济援助计划。

虽然银行、运输、某些主要企业和对外贸易的国有化，在开始的时候是不可缺少的权利，但是其余的国有化将根据生产继续的标准和生产的标准，在国家对企业(包括外国企业)可能管制的范围内采取措施。

正如在其他比拉丁美洲国家更不发达的附属国家一样，促进拉丁美洲按计划迅速发展经济和实现工业化的主要源泉之一是，把世界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而目前有很大一部分没有使用的人力动员起来参加生产。但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根本革命，在工农政府的统治之下，才能为这项动员工作创造必要的精神状态和具体的架子。

具体的过渡性政治纲领的制订必须与寻求走向群众性革命政党的过渡性组织道路同时进行。目前在拉丁美洲各地，这方面的目标必须是成立具有群众影响的阶级性的政治组织，它不同于垄断革命领导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急进的小资产阶级的最先进的组织。

拉丁美洲革命比其他地方的革命有一个更显著的特点就是工会运动在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包括政治作用)。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力求使工会成为反对它的敌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为了阻止这种趋势并充分利用工会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重要作用，必须有系统地宣传**建立以工会为基础的群众性工党和以工会为基础的工人政府**的思想(在存在着提出这个口号的客观条件的地方)。而且，为了加强工会运动本身的力量，必须号召为争取各国工会的统

一(每个企业一个工会和单一的工会联合会)以及为争取建立拉丁美洲劳动者的单一的革命联合中心而斗争。鼓动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始终是同鼓动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联结在一起的,这种鼓动适应目前这个时期的需要。

拉丁美洲的无地农民的巨大革命潜力已在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中美洲特别是在古巴表现出来。工农联盟是这个国家的革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依靠对农民系统地宣传根本土地改革的纲领和在农民中间进行系统的工作,就能使革命组织在农村中扎下根并培养农民干部,使农民的革命动员成为可能。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在革命激烈动荡的时期中,抓住有利的革命时机,组织农民大胆地发动争取土地的武装斗争,把这个斗争同工人的动员联结起来。然后农民游击战争将可以证明是工人斗争的强大鼓舞力量,并在一旦工人运动可能遭到部分失败或处于低潮时,使阶级敌人不能加以利用。

在拉丁美洲,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拥有比其他地方可以迅速发展的有利阵地。除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之外,现有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在群众中还没有扎下根。唯一的例外是智利,那里的社会党(它的阶级构成和影响都和拉丁美洲其他社会党完全不同)和共产党(它拥有广大的群众)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建立了统一战线(人民行动阵线)。社会党左翼的行动还有助于部分地纠正共产党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路线,在这里面托洛茨基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实行听命于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和懦怯的政策,这种政策不符合于拉丁美洲群众的革命愿望,也不符合于根本解决问题的迫切需要。

在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之下,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危机,帝国主义在国际的削弱,以及工人阶级国家的力量和威

望的不断增长，目前在若干社会党(智利、烏拉圭、阿根廷)中，重要的左傾中間势力正在发展。

相反的，共产党唯一的中心目标就是为了苏联外交的暂时利益而对美国帝国主义施加压力，把賭注专门放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間完全相对的对立上面——他們从而放弃了独立的阶级政策而实行极端机会主义的政策，把自己置于无能为力的配角地位，沒有任何威信，而且常常遭到各种以“左”的美名作掩护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出卖”。

特殊的形势

在拉丁美洲目前客观形势一般是革命的，其中**阿根廷、玻利維亞、委內瑞拉和古巴**具有更加特殊的形势。

阿根廷，工人阶级自发的斗争性，只有日本的群众可以同它相比。在这种条件下，政权经常不稳定，可是群众也未能够把国家的不断发生的危机导向革命的結局。只有建立以工会为基础的阶级政党，它們将懂得如何抓住有利的时机把群众組織起来，成立各种委员会和民兵組織，动员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把整个斗争的目标指向成立工农政府，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家从死胡同里挽救出来。

在这由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员而产生的形势中，在各个不同的关头已經出现或至少可能出现**双重政权**的因素，这些因素还可能再度出现。必須努力使这些因素采取具体的組織形式(如各种委员会、民兵、游击队)。在这种形势之下，加强十倍地宣传**建立以工会为基础的工党**的主张，将能够产生更实在的效果，把庇隆主义者的工会中的激进派扭轉到这个方向来，——它将由于相互作用而加速整个国家的革命过程。

因为从政治观点来看，由于它现在走进了死胡同，妨碍了大部

分属于革命的工会主义的活动，到头来将会或至少暂时会失去群众的积极兴趣，而使主要依靠军队的公开或隐蔽的独裁政权得到暂时的和相对的稳定。

在**玻利维亚**，我们看到革命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它表现在 ROSCA 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右翼在农民和矿工中间所遭到的残酷失败。但是由于缺少一个足够强大的革命党，这个高潮有可能再一次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左中势力（埃斯登索罗）所独占，而得到玻利维亚总工会中间派领导机构（莱钦）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左派的支持。

革命群众运动的力量使得革命的基本胜利得以保持下去，并且胜利地击退了反动派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亲帝国主义右派势力的一切进攻。由于革命党力量的薄弱，而使革命不能够以成立工农政府告终。

鉴于埃斯登索罗—莱钦的中间派联盟有可能重新取得政权和目前拉丁美洲的有利形势，群众不可避免地会重新起来。必须利用这个形势把整个矿区置于工人（委员会和民兵组织）的有效管理之下，在农民民兵组织和农会的压力之下普遍实行土地改革，并强制实行一项经济计划，它将考虑到国家的实际资源（包括劳动力在内）和工人阶级国家的援助及与工人阶级国家的交易。

玻利维亚总工会特别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在委员会和民兵组织的协助下）解决政权问题、土地改革问题和经济计划问题的口号，在这些条件下将再一次成为适时的口号。这种可能的和必要的发展的关键仍然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党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党在矿工和农民中间的力量，党应当把日常活动和领导工作的主要部分放在这方面。

在**委内瑞拉**，依靠革命群众而掌握政权的政党必会面临着来

自帝国主义和来自群众的压力，群众迫切要求根本改变和实现当初他们进行革命所要求的真正结局。这个国家以往的經驗証明，所有的政府不論它开始的时候表现多么“革命”，結果必然屈服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壓力及其在委內瑞拉的无比丰富的石油和矿产中的巨大利益。

民主行动党是一个类似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秘魯)或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玻利維亞)那样一种异常組織，以急进的小資产階級为领导，它业已分化为亲帝的反动的一派和比較能够接受急进的基层的影响的一派。如果没有建立工农民兵組織和委员会，决不可能迫使党和政府扩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把本国的石油和矿产富源收归国有，頒布多种經營和迅速发展經濟的計劃，从国家的巨大經濟資源获得利益，从而有效地捍卫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必然要发动的新的进攻。

革命馬克思主义傾向性組織在民主行动党左派內招收成員的工作应当导致主张成立以工会为基础的工党。

在古巴，古巴革命已成为整个拉丁美洲革命的最前哨，它的成就和教导是很多很重要的。

古巴的革命說明了，游击队的功效，它依靠迫切要求实行根本土地改革的貧农，同时动員城市无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包括在一定阶段內，在人民的同情与保护之下，組織人数有限的小队采取武装行动。

尽管领导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而且缺少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政党，但是在革命群众(农民、无产階級和急进的城市小資产階級)的推动之下，同时在面临着与现在已被推翻的血腥独裁政权极度妥协的买办势力的情况下，古巴的革命正在迅速有力地发展为不断的革命。

古巴革命的領導机构在清除了一整批的赤裸裸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分子之后，目前已成為一群接受群眾不同程度的革命影响的急進民主主義者，也就是說，尽管他們的社会成分和思想是非無產階級的，他們不得不超越資本主義的界限并嚴重地破壞了它的平衡状态。但是他們到現在還沒有推翻這個制度，按照它现在的樣子，沒有建立一個同群眾的民兵組織、委員會和工會聯結起來的群眾性革命政黨，要推翻這個制度是不可能的。

根据土地改革已經達到的範圍、對外國帝國主義企業實行國有化的一些措施，徹底清洗了國家機器，以及建立了民兵組織和人民法庭等方面來看，古巴革命已經大大超出資本主義的框框，但還沒有完全粉碎這個框框，而代之以建立在國有化經濟和計劃經濟基礎上的新型的国家。在目前階段，重要的還不在於完成推翻封建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和社会措施，而在於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和擴大民兵組織和人民法庭的組織，和建立作為地方政權機關的公社和委員會的組織。

在這種情形之下，可以根據在國內和國際上鞏固革命的需要，寬緩地採取實現有效的國有化和計劃經濟的經濟措施与社会措施，不致過早地挑起美國帝國主義的反應，和引起生產失去平衡。古巴革命勝利發展的關鍵在於：在國內，迅速成立具有明確的無產階級的和社会主義的綱領、并包括全國一切革命人士的群眾性革命政黨；在國外，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國家，成立捍衛古巴革命的國際組織。

古巴革命在所有這個地区的反應和影响是巨大的并且將繼續擴大。因此可以預料到美國帝國主義和拉丁美洲買辦壟斷寡頭會採取殘暴的行動，用盡一切辦法來打倒古巴革命政權或迫使它屈服和走向資本主義。

因此，古巴革命的安全，最后决定于在拉丁美洲国家有效地保卫住古巴的革命，并向美帝国主义明确表示，对古巴进行任何军事干涉，一定会在全拉丁美洲掀起一场大风暴，使古巴的革命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蔓延开来。必须迅速地在全拉丁美洲开展组织“保卫古巴革命委员会”和成立“志愿队”的运动。

(三) 殖民地革命和第四国际

十一、结论

殖民地革命的最积极的局面之一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直到昨天他们还遭受到帝国主义和买办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贫困、没有文化、消沉）已经形成不可改变和不可抗拒的运动，要争取符合于人类现有可能条件的物质、文化和社会水平。

从这个观点出发，这种要求实现最高文明愿望的革命觉醒已在人类中间产生了质的变化，例如，由于这种觉醒的结果，妇女和家庭的地位现在已经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全人类已经从这个质的变化得到了好处，这个变化是由长期生活在文明边缘的群众的革命所引起的，这个革命通过以上事实已促使总的运动朝着新的社会主义文明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农群众正在飞快地取得政治上的成熟，迅速地跳越过几个阶段。

由于有了自己的经验，得到了其他落后国家部分群众所取得的胜利的鼓舞，得到了现在正在进行的革命的胜利的鼓舞，得到了工人阶级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成就的鼓舞，殖民地群众（他们越来越可能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和我们的运动）将能够找到一条使他们的政治觉悟得到迅速进步的道路，他们的先锋队的重要阶层将

会直接接受人类最先进的理想和綱領：第四国际的理想和綱領。

可以說，殖民地革命在历史现阶段居于世界革命的先鋒地位，这决不是言过其詞。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也充分意識到，先进資本主义国家迟迟未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缺陷，它未能提高群众的思想水平，未能建立真正的群众性的革命馬克思主义政党，未能克服运动中和工人階級国家中的官僚主义，未能迅速建設立即有利于群众而不是不久将来才有利于群众的社会主义。

无論如何，这是一个背离目前历史现实和尽量利用目前历史现实的問題。现在已經明显，世界革命的过程是从外国、从殖民地和附属国以及从现有的工人階級国家向着欧洲和美国(它可能是最后的国家)的資本主义国家发展的。

第四国际，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第三国际的革命传统和原則的继承者，在这些条件之下，很自然地，只能是在革命活跃的地方，在群众和世界上最受压迫和剝削的人民进行斗争的地方，开展它的主要活动。

由于正当的历史原因，在一整段时期內，第四国际的发展是集中在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方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一直是把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看做是世界革命的第一号中心。

现在第四国际作为一个国际組織，必須根据殖民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来重新組織它的活动，在一整段时期內，把它的主要努力放在这方面。

国际的前途就在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黑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以及日本，这些地方有立即和迅速取得胜利的可能。

第四国际必須表现自己有能力在所有这些地方組織有效的力量，沒有任何宗派主义，把自己同群众革命运动联結起来，并对群

众的愿望提供有效的回答。

的确，第四国际已经在殖民地革命的许多中心起着虽然有限然而重要的作用。第四国际在理论和实践上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这一有力的行动，把阿尔及利亚革命提到最高的水平。在古巴，（第四国际）古巴支部和出席拉丁美洲青年代表大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代表团的行动使我们的运动在古巴革命内部赢得重要的虽是分散的影响。在阿根廷，（第四国际）支部在上次大选中同庇隆主义工人运动中的重要势力结合起来。

所有这一切表明，在下一段时期，第四国际有可能同重要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并且领导或与其他势力共同领导某些殖民地革命的国家或地区的革命运动。

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已极端堕落，前者听命于垂死的帝国主义；后者听命于保守的苏联官僚机构，殖民地革命的障地，已为在战略上和实践上敢作敢为，在策略上机警巧妙的第四国际的革命组织广开门户。

只有同群众和世界上最受压迫的人民的斗争密切地并且最终地结合起来，第四国际才能证明它在历史上是完全正当的，并发挥它作为领导革命的先锋队的作用。

5. 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斯大林主义危机

一、“非斯大林化”是斯大林的继承人为克服斯大林统治的后期所积聚起来的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经验主义的行动，这些矛盾在苏联本身和在“人民民主国家”已达到爆炸性的顶点。在1956—57年，危机不仅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是尖锐的，而且在资本主

义国家的共产党也是尖锐的。

赫鲁晓夫领导机构于 1957 年 7 月成功地巩固了它在苏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它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措施，并为工人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了一个重新聚合的路线，力图克服危机，以便确立一个可以受它控制的实现“非斯大林化”的范围和界限。这个重新聚合的路线就发表在各国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除外）领袖于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在莫斯科通过的宣言里。

这个文件指出了斯大林的“优点和缺点”，对过去的解释则限于讲斯大林一生后期的“个人迷信”（它尚不及赫鲁晓夫向二十大所作的报告），并且谴责了想追究苏联国内社会分化的任何企图，因为这将会不利于官僚主义政权。这个文件还重申“和平共处”的政策，亦即把共产主义运动从属于苏联外交需要的政策。

因此，（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所规定的路线仍然属于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属于世界各国共产党“一党独揽”制度（monolithic system）的范围内。不论在工人国家或各国共产党内，它形成了一个防御的路线，一个反对工人民主的屏障。

赫鲁晓夫领导机构力图在一个新的水平上稳定官僚主义政权（比起斯大林时代是自由民主的），并重新确立各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权威。

到了苏共二十一大（1959 年 1 月）的时候，这些努力在关于重新确立官僚机构的统治地位方面已获得了一定成就，并在关于工人国家政府结构和各国共产党内部关系方面引起了很大的变化。官僚主义领导机构为适应新的形势而采取的这些努力已为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发展和走向政治革命开辟了新的道路。

但是，在苏联的领导机构、官僚机构和群众之间，在官僚机构

的各个阶层之間，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平衡状态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考虑到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存在着不利于苏联官僚机构的新的力量对比的话，则在苏联领导机构和其他工人国家及共产党之間的平衡状态也是很有限的。

一切改革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官僚主义特权，向沒有給工人民主带来即使是一点点有价值的东西。这一点，苏联工人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通过把斗争提高到**政治革命**的水平的时候才能够得到。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苏联国内的整个演变，不論其范围如何广泛，从来沒有超出官僚主义制度的框框。因而这种广泛性本身就強調了实行政治革命的必要性，这个革命将把官僚机构作为一个其利益与群众利益不同的社会阶层赶下台来，并重新建立一个适应苏維埃社会巨大的經濟和文化成就的苏維埃民主。在这三、四年的一定稳定时期內，新的矛盾已經成熟起来，代替了或者盖过了一部分旧的矛盾。这些新的矛盾一般地比旧的矛盾更高一級，它們将給予官僚主义制度的危机以在苏联具体实现政治革命和建立新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形式。

二、除了共产主义世界的这些内部矛盾之外，现在还有一个使它担心的全新的事实。强大高涨的革命运动几年来第一次在世界各地发展着，革命斗争的先鋒已摆脱苏联官僚机构的控制，它們正努力寻求一个不受它控制的社会主义学說。两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前两个主要的革命运动：阿尔及利亚革命（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在这里已不再有任何发展的机会）和古巴革命（斯大林主义者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只是因为他們做了运动的尾巴并公开表明他們沒有接管这个运动的意图。在黑非洲也有同样的情形）。

于是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第一次看到莫斯科的领导地位（这个领导地位甚至在第一共产国际以及后来在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后

仍然是被承认的)受到了挑战——挑战的不再是小的先锋集团,主要的也不是思想性的,而是站在反对资本主义世界斗争最前列的革命群众运动。于是强大的革命运动暗地里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革命领导的问题。此外还加上这样的事实,即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在实际上谴责了斯大林对南斯拉夫人所采取的行动之后,并没有能够成功地使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回到莫斯科的轨道上来,从而在所谓共产主义世界中仍然留下了一个伤口。

目前共产主义世界中的主要矛盾

三、在工人国家的群众起来,殖民地革命兴起和新的世界力量对比(在群众和国家的水平上)的影响下,目前共产主义世界正在发展着新的矛盾,它已使苏联领导机构对世界的领导权和政策成为问题,从而为走向共产主义更新的新阶段作了准备。

中苏的争论,即使是按照目前所表现和发展的形式,是这些矛盾中最突出和最严重的表现,它已使共产主义运动对以下这些主要问题的政策成为问题,即:关于国际关系,关于同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关于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关于夺取政权的道路,关于在资本主义已被推翻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

中苏的争论并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想求得理论上的阐明而引起的,而是由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需要和在殖民地革命压力之下提出的问题而引起的。在很早以前,苏联共产党就已经很明显地成为官僚机构的政治工具并且是极端保守的,中国共产党尽管也具有重要的官僚主义的特征,但它对于世界革命的压力要敏感得多。因此,中共和苏共之间的对立虽然不是(工人国家之内)一个革命

的党和一个保守的党之间的对立，这个对立对于世界革命斗争具有重大的影响。

从此以后，各国共产党对下列问题观点的一致性已或明或暗地发生问题了。

(甲) 战争危险与和平共处

关于国际关系问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领导集团的路线正如在斯大林领导之下的路线一样，不论是在“和解”时期还是“冷战”时期，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即：不惜任何代价（包括牺牲世界革命运动在内）同世界资本主义达成协议，同时共产党和和平运动则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施加压力**以便取得政策上的转变，使其有利于苏联的外交主张——这就是战争结束以来各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代替推翻资产阶级政府以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是“争取和平”和同资产阶级势力达成协议。

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之间的不同只是由于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工人国家的变化。在斯大林时代，苏联还没有核武器，故而发动了斯德哥尔摩呼吁书运动。在赫鲁晓夫时代，宣传的是裁军，它是作为可以实现的结果而提出的，它仅仅是保证两个阵营之间的经济竞赛和思想斗争。

共产党及其同路人所遵循的机会主义、和平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方针，没有受到其他许多共产党特别是南斯拉夫人的挑战。由于国际条件和国内条件不同，中国正在进行不断的革命，因而中国的领导机构在国际关系的水平上对苏联的基本方针提出疑问。中国人赞成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和裁军建议。但是他们反对——而且十分正确地——莫斯科的关于资产阶级内部和平势力反

对好战势力的想法，他們也不同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实现裁軍的可能性。他們提到战争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现象，要人們不要受资产阶级领导人的和平建議的欺騙，认为在这个問題上不应当在群众中散播幻想，认为应当利用裁軍建議的被拒絕来教育群众，引导他們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于是，不用明明白白地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方針下結論，中国人十分正确地反对了莫斯科的基本观点，虽然他們自己的某些論点(如称美帝国主义是“紙老虎”，过低估計核战争对于人类的危险性)可能有缺点或者是危险的，他們后来对这些論点已多少作了一些明确的改正。

(乙) 对殖民地革命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 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

在这个問題上，苏联的领导机构仅仅是从外交上的考虑出发，而不是从反对帝国主义和阶级团结的观念出发。因而在碰到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問題时，苏联政府为了希望同戴高乐达成协议，长期以来就认为阿尔及利亚問題是“法国的任务”。相反地，中国政府承认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

苏联的领导机构努力寻求和支持那些贊成它的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路綫的民族资产阶级或其中的一部分人。它促使共产党去支持这些“同盟者”并把工农群众的斗争摆在从属的地位。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印度的克拉拉邦和伊拉克共产党对卡塞姆政府的态度。为了使这样做法名正言順，赫魯晓夫的“理論家們”只是重复斯大林关于这些国家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关于资产阶级在这些革命中的进步作用的話。

由于中国自己的經驗和由于中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資

产阶级政府的关系，中国人沒有正式地抛弃他們的党二十多年来所持的革命阶段論的基本观点，而是提出了“不断革命論”的观点以鼓励这些国家的工农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依靠而且反对资产阶级的领导。且不管中国政府有任何外交政策上的考虑，这不是一个绝对明确的和原则性的态度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的方针也是指向正确的道路。

(丙) 走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和和平道路

赫鲁晓夫从二十大开始，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一种观点，确定了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的活动是通过和平的和议会的道路夺取政权，而一笔勾销了关于摧毁资产阶级政权的问题。关于在遭到资本主义或其中一部分人的激烈反抗时，这些道路将证明是行不通的保留提法，只不过是一种文字上的装饰，因为共产党的政策的基础完全放在议会道路和和平道路上面，如同社会民主党一样，共产党仅仅是为了这个前途而组织起来的。

受到许多共产党领导热烈欢迎的这种观点，已引起党内群众的不安和反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对这个模棱两可的公式提出了与赫鲁晓夫相反的提法。他们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进行反抗，并坚持关于资产阶级议会必将成为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障碍的理由。他们还坚持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国家的必要性。

(丁) 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型”

战争刚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冷战”开始以后，当时“人民民主国家”在结构上是一模一样的，它们奴颜婢膝地抄袭苏联的模

型，各国都提出“在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极度工业化、农业强迫集体化等等）。

第一个反对这种奴颜婢膝地抄袭（它重新恢复和扩大了一切斯大林主义的错误）的是南斯拉夫人，他们走他们自己的道路。1956年，特别是在匈牙利和波兰，又出现了其他反抗行动。最后是中国人——特别是由于“公社”——他们采取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

于是有三种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型”面对面地存在着：苏联模型，中国模型和南斯拉夫模型。

这三种模型各具有根据本国发展条件所固有的特点，他们的出发点不同，甚至关于社会关系的观点也不同，因而工人国家的群众有可能来对照他们的观点和判断他们的成就。

苏联的模型受到重视是因为它的资格老，并且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已取得了成就，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尽管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实行了各种改革，它的主要特征是官僚机构在苏维埃社会中的势力，它在各个领域里的无上权威，它的极度保守性，以及在这官僚机构中占优势的个人利益的倾向。此外，它的斯大林主义的过去（特别是强迫农业集体化和可怕的清洗）仍然欠下东欧工人国家和西欧工人运动的债。

中国的模型特别是以公社的实验为其特征。尽管由于领导的观点和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而产生了官僚主义，然而公社的实验含有在集体基础上而不是在纯粹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动员群众的企图。公社的实验是为了通过这种集体的努力使整个中国社会摆脱极端落后状态。同时，它在社会方面特别是在使中国的妇女从极端卑贱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方面获得了非常巨大的进展。中国的模型对于正在摆脱殖民主义桎梏的国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

从中可以获得关于通过呼吁群众的集体参加来发展本国的宝贵教训。相反的，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却害怕中国的模型，他们从公社的例子中看到了它到头来对官僚机构的权威具有潜在的危险，因而力图诋毁它，诬蔑它和斯大林的强迫集体化是一模一样的。

南斯拉夫的模式尽管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它却是第一个企图——**在企业一级和在某种程度上在地方和行政区域一级**——依靠城乡群众的主动性和自愿，让工人在这些方面参加监督和管理，以便有意识地反对官僚主义倾向。这个政策的局限性似乎在于南斯拉夫没有全国性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保持着没有其他流派的一党制）。然而正是由于依靠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倾向才使南斯拉夫能够取得重要成就。这个实验在农业经济方面也已证明是有成果的，它试图促进农业的逐步集体化，并照顾到其技术可能条件和小农业主的自愿贡献。南斯拉夫模式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之所以受到其他工人国家和共产党的反对，特别是因为它是作为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具体创例。

（戊）工人国家的计划的配合不充分

在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已不再存在曾使苏联——南斯拉夫矛盾达到破裂点、然后又引起紧张局势特别是与波兰和匈牙利的紧张局势的那种错误行动和粗暴作法。但是，矛盾和紧张关系继续存在，并且由哥穆尔卡最近在波兰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反映出来。

经济互助委员会并不是各个工人国家的经济的全球性计划组织；它只保证某种分工。这一点的原因是，每一个工人国家的执政的官僚机构，首先是苏联官僚机构，具有首先是民族的利益，并且想要取得它们认为对它们自己在本国的地位是最有利的结果——

甚至在損害其它国家的情况下这样做。在东欧，指出这种危险的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而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領導，即波兰的領導。

各个工人国家的經濟发展将使国家計劃的占主要地位的“民族”性和这些經濟具有国际計劃的必要性之間的矛盾愈来愈尖銳。这种矛盾的发展将是使苏联对东欧国家的領導权受到怀疑的一个重要因素，結果，它也将有助于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发展。

* * *

这些新的斯大林主义矛盾断然結束了工人国家和共产党的机构的磐石般的一致性。除了南斯拉夫的情况以外，正是在整个时期沒有发生决裂情况的共产主义世界的中心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并且彼此对抗，整个說来这些矛盾开始制訂一个在国际和国内方面从革命政策，而不是苏联領導人的机会主义政策：工人的控制和管理，社会主义在农村地区的进展，工人国家之間的平等与合作关系，对殖民地群众的支持，包括反对他們自己的民族資产階級，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通过反对資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爭取和平。

但是，今天反对苏联的政策和領導的群众力量都沒有以完全前后一貫的方式提出它的反对意见，沒有在对斯大林主义的全面的基本的批評中把所有这些矛盾集合起来。相反，共产党和工人国家的各个領導之間的对抗的立場明显地糾纏和交錯在一起。因此，阿尔巴尼亚人由于中国人的一些立場和方法而支持他們，而这些立場和方法跟作为——例如——巴西人支持中国人的原因的那些立場和方法是非常不同的。因此，为了决定我們的运动的正确的干涉，必須避免任何全面的簡單化的并列，这种并列可能导致对于在斯大林主义危机中表现出来的不同趋向的錯誤估計，非常重要，在每一个情况中都要知道怎样正确地区別每一个趋向关于逼迫它的动机的特点和它所特有的傾向、方法和立場。

此外，所有这些力量都沒有正式怀疑各党的磐石般团結的概念，沒有保卫在党内抱有不同傾向的权利，更不用說在工人国家建立几个工人党的权利了。

在不同的方面，我們看到出现了工人国家的进步和“在一个国家建設社会主义”的政策之間的对立，这仍然是所有共产党的领导的方針和思想中的中心問題。在客观上，这个局势，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局势，第一次向党的领导提出了在相結合的三个方面的永远革命的問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順便解决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迅速（“飞速”）发展，在一国范围已經胜利的革命的国际扩张。

因此，斯大林主义的矛盾已达到一定程度的政治成熟性，它非常有利于更为具体地提出政治革命和使共产主义运动复兴的問題以及重新建立新的群众性的国际革命领导的問題。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場决不是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場，但是这些立場表明了它的巨大可能性，并且开辟了像托洛茨基主义在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工作方面。我們的运动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个特殊的方面的条件是：充分地了解中国的立場取得的进展，以便前进建立沒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目前的限制的、前后一貫的共产主义傾向，向全世界的共产党战斗分子以及向在共产党影响以外的其他革命力量提出一个全面的前景。

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會議

四、在作了两次嘗試（第一次在莫斯科，然后在布加勒斯特）而沒有取得任何持久的結果以后，俄国人和中国人在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的时候在莫斯科举行的會議上努力寻求一个折衷办法，以

結束他們的爭端。由于所爭論的闡明影响到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他們不得不让一切忠于斯大林主义的党的領導参加他們的努力。

八十一个党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會議已經由于它开得很长——三个多礼拜——而証明与斯大林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在斯大林时期，一致意见是由于追随他們“天才”而自动地达成的。磐石般的一致已为討論所代替。但是这并不是民主在这些党内复活的一个迹象：討論是在渴望避免像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所做的那样向战斗分子和工人透露他們的困难和分歧的領導人之間秘密进行的。

除了會議开得长以外，它所发表的文件表示了寻求一个可能是持久的折衷協議的决心。

一般地說，看来已在苏联官僚机构的主要立場上达成協議：这个文件是以通过“和平共处”和裁軍爭取和平为中心的，中国人反对了这些意见，但不是清楚而直率地反对。文件重复了苏联的公式，但是关于每一个立場，都提出了各个政治主张、保留意见和考虑，并把中国人所保卫的立場考虑在內。它特別不再是資本主义分裂为贩卖战争派和爱好和平派的問題，并且用与戴維营心情毫无关系的、有利于北京报纸的字眼有力地強調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

中国在“不断革命”方面退却了：我們现在看到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民族民主国家”——一个沒有階級性的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定义不是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性质，而取决于它的政策在显著改变着的性质，在这个公式的背后，我們事实上再次发现旧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論：在資本主义社会和无产階級专政正当中的革命，一个既不是資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工人国家的社会阶段，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社会。

作为补偿，中国人在他们肯定最关心的问题上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让步，这个问题就是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这些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既反对（但是非常不均衡地）帝国主义又反对工农群众——受到谴责。文件在这一点上远不是正确的，但是它包含着中国人在他们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可以有效地加以利用的公式，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仍然依靠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里，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寻求改善群众的情况，而是从这些国家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取得更大的一份。从殖民地革命目前在世界革命中所占的地位来看，很明显，这不仅是向中国人所作的重要的让步，而且还是在世界政策规模上在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方面的左倾步骤——不管它可能是多么胆怯的和矛盾的。实际上，对中国人所作的这个让步可能由于它所牵涉的后果而证明是非常重要的。

文件或多或少重复了二十大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所说的话，俄国人对这些话作一种解释，中国人作了另一种解释。在这一点上没有新的发展；没有任何东西会阻止在一有机会时就重新进行讨论，像在过去那样。

关于公社问题——作为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形式，中国人给予公社以占压倒优势的地位——文件的沉默表明分歧继续存在。中国人所获得的东西最多不过是：这是一个考虑到各国的民族特点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正确”运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的问题。这是不够的，如果人们记住这一点的话：对中国人来说，公社制度是要普遍实行的。

决议以一种不同的和不平等的方式谴责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后者被称为是次要的和没有具体指名道姓的危险。相反，南斯拉夫被猛烈攻击为修正主义者，更有甚者，错误地指责他们宣称

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对社会主义陣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破坏工作”。这些无节制的攻击証明官僚主义者面对着在莫斯科會議上派有代表的党和国家的矛盾，多么害怕南斯拉夫的态度——不管它看来可能是多么有限的。

在波兰人提出的关于在工人国家之間进行更密切的规划这个問題上，他們得到了滿足。

文件似乎表明，在“指导党”这个問題上沒有任何改变：苏联共产党保持它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先鋒队等等的称号。当中国人想要反对苏联领导人的政策时，他們从来不把这个提法放在心上。

可以指出，在宣布举行會議和宣布与会者名单的官方公报中，苏联共产党不再列在第一位，而是按照字母次序列在土耳其和烏拉圭之間。在像目前这个世界那么等級化和官僚化的世界里，这个小的迹象可能具有象征性价值。

會議通过的文件表明，事实上分歧并未消除，而是“一項同意保持分歧的協議”，如果這項協議是十分謹慎的話。在會議期間，中国人虽然处于少数，但是得到了若干共产党领导的支持。而且，其他的领导起了調解的作用。

国际局势以及使中苏发生分歧的总的条件还不会使这种分歧緩和，反而会促进这种分歧，并且会使其比过去更为尖銳。因此，我們在指导我們的运动时必须看到这种前景，就是在共产党世界內可能重新发生冲突，重新发生分歧，出现愈来愈重要的預示紧张局势和危机的迹象，而在现在不可能确切地断定其动向，其确切的形式以及从而再次引起危机的政党。

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會議表明，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在工人国家內生产力量的加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並沒有停

止促使产生斯大林主义危机，在官僚政权的范围内通过官僚领导之间的协议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这些只会损害局势本身所提出的要求，即恢复工人民主和恢复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共产国际。

苏联社会的问题和矛盾

五、在斯大林死后苏联领导表现的朝提高生活水平方向努力的总的趋势得到了保持和发展。苏联领导必须考虑在斯大林时期遭到粗暴压制的主张平等的趋势，它必须把很低的工资提高，虽然不平等的差别仍然是很大的。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使最基本的要求消除或者减少了，但是产生了新的要求。劳动者越来越感觉到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力量和他們自己仍然很低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巨大矛盾(請看在討論苏联人造卫星时发表的各种谈话)。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坚决地许诺要超过美国水平的原由，这也是他争取“和解”的原因，以便把大量军事开支中的一部分移用来满足群众的需要。

购买者对消费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严格，以前对质量是忽视的，因为只对重工业、军事需要及与此有关的物品“空间导弹等等”注意质量。

必须指出，在哈萨克斯坦出现的运动中，工人们十分重视社会性质的需求：托儿所、戏院、电影院、运动場等等。

在企业生活方面，当局采取了各种从本身看可以被认为是开明的措施(企业中某些工会组织有了权力，把某些机构的管理权交给了企业或工会)。不管工人在时间仍然未定的将来如何利用这些措施，总的来说所以采取这些措施首先需要改善管理，因为目

前的管理仍然是官僚形式的。这些措施是同在整个经济中、在计划中采取的分散措施一致的，因为旧的高度集中的形式同高度发展的和广泛的机构是不相称的。

官僚主义所以成为无数批评的对象是由于它的领导的形式和方法，而不是——至少不是公开地——把它当为一种社会现象。为数众多、遍及许多城市中心的苏联工人阶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要求实行企业民主化，这种要求通常会形成一种桥梁，通过它提出更为一般的政治性的要求，目的是要在这个工人国家内恢复苏维埃民主。

由于农业经济仍然是苏联经济的薄弱环节，领导方面试图刺激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来改善农民的处境，同时又以利用“处女地获得生产来对他们施加压力。用这两种办法取得了平平的成就，而且只要农民是和官僚主义的当局打交道，情况就只能是这样。

知识分子即使收入已经仍然是一个有很大特权的社会阶层，但是一直要以它表明自己顺从当局的意旨为条件。在艺术和文学作品方面，经过一个时期的解冻以后，赫鲁晓夫的领导一方面摆出自由主义的样子而且放弃斯大林特有的某种荒谬的作法，一方面加紧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它担心，可能会通过这些知识分子而对官僚主义政权提出政治性的批评。“党的文学”、“党的艺术”这样一些观念仍然保持下来，虽然范围比斯大林时代放宽了一些。重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抗拒恢复控制。此外，除了官方的文学和艺术产品以外，还存在以半秘密的方式流传的不是顺从正统的产品。

在青年、特别是大学青年中，新的潮流、绝对不是顺从正统的新倾向已经成熟起来。正是从他们身上将产生为真正“回到列宁时代”而斗争的革命力量。这些倾向的存在已经以各种形式并在

各种情况下表现出来,但在目前尚处于相当于萌芽的阶段(为重新发掘俄国革命的真正历史而进行的研究以及反对干涉匈牙利的情緒)。

各級官僚政治、特別是最高几級的官僚政治的最駭人听闻的、和过分的特权受到了一些限制,同时也保持某种稳定,一种能够在明天还存在下去的保証,这是斯大林时代所沒有的。不会再有大規模的清洗。“在哪行精通哪行”成为越来越正式的問題。最重要的考虑是一个人在他的职位上的“效率”如何,否則就会有降級的危險。

目前的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整个官僚政治都能在政策方面有发言权。只有少数地位很高的人員与党中央委员会进行的討論是有关联的。不过同主席团(前政治局)比較起来,这个組織恢复了它已完全失去的某些权利;就是由于中央委员会,赫魯晓夫才得以制止使他在主席团处于少数的“反党”傾向。包括最高苏維埃在內的国家机构只是执行中央委员会决定的工具而已。

社会关系緩和的新情况使党的机构——在政治上把苏联社会凝聚在一起的唯一因素,同社会各阶层比以往更加隔絕了。然而由于这个机构,更具体地說来,就是中央委员会是國內唯一真正的政治机构,苏联社会的巨大的政治危机大概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在那里表现出来。目前的中央委员会,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以外,全都是一些新人物,他們没有什么政治的經歷,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真正的从属关系。

苏联领导人对党报上反对中国人鼓吹的观念所进行斗争的重視和坚持,以及在全党各組織就这个問題提出的警告,使得人們认为,在苏联共产党內部存在同意中国人的观点的潮流,或者在“和平共处”政策及其結果方面轉向同一方向便說这是前斯大林主义

分子、拥护旧的所謂“反党”傾向的党羽的問題，这种說法是沒有任何根据的。看来倒不如說，这是新的阶层所表示的意见，从而証明自从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經发生一种变革：第一个工人国家內发生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新阶段正在臻于成熟。官僚主义的绝对統治賴以建立的基础是群众在政治上的原子化，现在替代这种状况的是群众中間某种提出要求和先鋒中建立一些研究和討論中心的傾向。苏联經濟的跳跃式的发展使得行政机构无法保持稳定，并且正在迫使它作出調整；它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就使自己受到批評。

苏联报纸不断公开批評行政中的問題。苏联社会的动力經常冲击官僚主义保守主义。殖民地的革命正对苏联社会发生强烈的影响。

資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情况

六、在这些党中間，1956—1957年的危机在各地許多地方都以引人注目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进而撤換领导人或重要人員。后来开始出现一場傾向性的斗争。然后，总的來說，党的领导恢复了它們对共产党組織的控制。但是自从1956—1957年危机以来，可以看到各地的共产党，比較重要或不那么重要的共产党內的危机加深，即使这种危机的各个方面不再是引人注目的。

在共产党是群众的党的那些地方，党同劳动群众的关系都沒有因为进行了同“个人迷信”有关的討論而大大恶化。但是始終存在一种危机，表现为领导的权力削弱，这些党內比較重要的阶层对于领导奉行的政策表示怀疑，以及到目前为止在基层組織中間一

些自发的反对的表示，他們在国内的某些情况助长这种反对的时候，就作出这种表示。

至于那些在群众中間影响微弱的較小的共产党，1956—1957年危机在各地的表现几乎都是党员退党和党明显地丧失影响。然而从那时以后可以看到相反的发展。例如在像英国和澳大利亚那样，由于工人阶级中間和同工党的关系发生的某些剧烈的变化，某些共产党可以得到新党员并收复他們失去的地盘。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像在丹麦那样，党以前一个主要領袖拉森建立了一个中間党社会人民党而在选举中主要是以牺牲丹麦共产党为手段而获胜。

从现在起，若干因素会使斯大林主义的国际危机和每个共产党內的危机加深，这些危机就是，提出莫斯科政策所未能解决的问题的资本主义危机，由于事态进展和群众活动而引起的群众运动，中苏爭端以及更为普通的斗争——官僚政治的内部斗争。

这些因素现在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殖民地革命的发展使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消失了。最明显的例子是阿尔及利亚，在那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为了使自已成为法国共产党的工具及其甚至在阿尔及利亚問題上的“民族”政策的工具，几乎取消了自己的存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共产党都受到了它們自己国内的群众运动的压力，虽然程度有所差别，同时它們受到了来自莫斯科或北京的压力。这种情况使这些党内产生了分歧的潮流，反对意见的趋势（印度、巴西）和有时造成分裂（伊拉克）。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大党，受它們贊同克里姆林宮政策的態度，受它們自己的政策的右翼和机会主义性质的影响要大得多。在这些党内可能会发生新的广泛的危机，其原因

不是由于它們受到了新的重大危机特别是苏联本身的危机的刺激，就是由于工人阶级运动及其对这些党的中下层干部产生的影响有了新的增长，而这些干部只有在群众的压力使他們有实际的可能采取一项富有战斗性的政策，左翼反对派的政策的情况下才会决心表示反对意见。

由于中苏分歧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的结果，我們将会越来越多地面临政策随国籍的不同而异的政党，因此在每一种情况下需要有适当的方针。在莫斯科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的党内，必須对右翼和机会主义的政策进行斗争，办法是确立根据左翼反对派政策制定的行动纲领与之对抗。在特别受北京影响的党内的或党的趋势内，我們将会看到一种新型的中間偏左主义，如果我們不对其采取正确的态度，在某个时期内这种中間偏左主义可能会妨碍我們自己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必須以这些党已經取得的进展作为起点，提出奉行这种方针的激进分子和潮流必須进行不断的理論和政治斗争，这就是說，必須超出已經到达的境地而进入革命馬克思主义的境地。

无论如何，我們必須从这一总的考虑出发，即共产党世界的矛盾将会繼續发展、国内和国际問題将会在其中起作用、所有的共产党不管它們目前的政策如何，将会成为第四国际的革命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越来越有利的地盘。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共产党内，可以看到不断发展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各种不同现象：

具有最富斯大林主义色彩的领导和最强大的工具的法国共产党装出看法一致这种十分虛伪的外表。在它的党员和干部中間充滿了严重的不安。领导知道存在着反对派，他們“正在等待他們的时刻”（多列士語）。法国政治局势的恶化或者国际斯大林主义中

产生新的公开危机的表现将不会不在这个党内引起重大的危机。

意大利共产党一贯遵循右翼政策(在需要时会左倾)，而对内部政治生活采取一定的自由主义。

印度共产党从没有停止过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喀拉拉邦的失败以及中苏纠纷不能不使它的分歧加深。

巴西共产党在过去曾经历过好几次很严重的危机，现在再一次为一场巨大的联系斗争所分裂，在这场斗争中，由于巴西的政局所造成的分歧意见和中苏争端搅起的问题联结在一起。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过去也经历过好几次严重的危机，它在最近一个时期经历了一些突然的变动(不超越支持苏加诺这一政策的总限度)，大概可以把这些变动解释为是反映了党的领导人物之间的分歧。

即使中苏争执的以公开危机形式出现的明显可见的影响目前只限于巴西共产党以及少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这一争执——中苏两方的领导都没有能解决它——最后会不可避免地使存在于各国共产党内的各种矛盾滋长起来，并倾向于孕育出巨大的危机来。首先是因为这一争执引起有关各国共产党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总政策的种种问题。其次是因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有着重大影响。

第四国际与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新阶段

七、现在正在成熟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新阶段证实了前几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根本分析和几次大会的主要展望。这使得我们的运动更迫切地需要利用这一新阶段，来——在斯大林主义人士中，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内都是接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

工人积极分子的最丰富的后备——推进我们的思想，来加速在工人的国家中成立第四国际的分部，成立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从而为在工人的国家中进行政治革命和恢复对群众运动的国际领导作准备。

(甲)在苏联和工人国家中。第四国际的 1938 年纲领和第五次世界大会的提纲中拟定的大部分项目仍然留在确定工人国家的行动纲领的议程上。

反对社会不平等，因为已经消失的只有少数十分昭彰的弊端。在这方面，“恢复列宁准则”空前地要求把薪金限制于一个熟练工人工资的水平。

反对政治压迫，这种压迫并未随着抑制秘密警察的无限权力而消失。在苏联，并不是所有的团体和机关都是不受国家权力控制的自由机构。恢复工人民主仍然是政治革命的主要任务：恢复基本自由（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工会组织独立自主，在苏联组织多党的权利。没有这些权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苏维埃和真正的苏维埃民主。

没有苏维埃民主，就不可能改组苏联的经济，把它置于生产者有效管理下。

恢复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共产国际的历史的真实面貌，不错从科学的诚实态度方面说是一项当务之急，而且从政治上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必要，以便让苏联的群众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重新见到真正与十月革命初年列宁主义政策连结在一起的方针。

中苏对于苏维埃政权有必要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谈判并为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而努力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中苏的争执使 1938 年纲领上的要求具有迫切的当前意义，1938 年的纲领要求采取一种革命的国际政策，要求无条件地支持工人运动和殖民地

群众的运动，反对任何想实行秘密外交以牺牲任何国家的群众利益而求得同帝国主义达成全球协议的企图。

(乙)在群众性的共产党内。第三次世界大会所确定的工作方针已为下列两件事证明是正确的，一是斯大林主义危机在现有组织中出现时所表现的形式(而不是由这些组织中的大规模分裂来证明)，一是 1956—57 的危机年头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即倾向于把自己组织起来在各共产党内进行派系斗争的反对集团的形成。走向在共产党内形成和组织派系的道路，完全不同于社会民主党内的道路，因为它们需要以进行长时期的秘密、非法工作为前提条件。

不同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之间的愈来愈明显的矛盾表现，不能不有助于任何一个共产党内派系的形成，因为每一个党员首先是或者说应当是一个共产党人，然后才是法国的、意大利的、苏联的、中国的、南斯拉夫的，等等。在这个问题上，首要的要求之一是，把争论中的问题以文件形式完全地老老实实地编出来交给党员，办法是甚至把对立领导的全文也予以公布。这是党员们能够自己进行讨论，自己作出判断，而不是由于对纪律滥加解释而遵循他们本国领导的见解的第一个条件。

这样一种观念必然导致成立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国际组织的必要，必然澄清建立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思想。自第三国际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关系的演变的特点是苏联官僚制度的一连串失败(组织共产党情报局、双边关系和现在较多或较少几个党的领导人偶尔举行的会议)。所有这些失败都证明，官僚主义越来越有必要同时也越来越难于回避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国际新领导机构的客观需要。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以其自己的方式不自觉地承认了组织一个以

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世界党的必要，在目前，在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中，只有第四国际代表着这样一个党，不仅在理論上是，而且在实际上也是。

老老实实把情况提供出来，在党员群众中进行民主討論，举行国际會議討論分歧意見——这些东西就是各共产党內的普遍要求，同时，我們提出我們关于把群众性共产党中的左派力量大规模地联合起来的主要立場。这样一种綱領的总方針由于国际局势的重大問題和由于已在苏中之間发生的分歧意見而变得越来越具体了：通过剝夺資本主义的政权从而解除其武装来爭取和平；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和帮助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者創建独立的工农組織来实行具体的阶级行动；譴責走和平和議會道路的思想，回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主张的观念上去；在資本主义国家中，根据一次过渡綱領并依靠一切工人組織法或統一战綫的策略来夺取权利。

* * *

結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的局势发展越来越証实托洛茨基主义的論断，那就是斯大林主义，即共产主义运动从属于苏联官僚制度这种现象是与任何伟大的革命发展不相容的。南斯拉夫的革命很快就和斯大林主义决裂了。接着，在苏联和在东欧其他的工人国家中，在群众的眼前要求上产生了一連串的矛盾，这些矛盾引起了爆发（波兰和匈牙利的十月事变）。尽管赫魯晓夫领导想方設法，想用一种以苏联經濟和技术的巨大进展为基础的、缺乏活力的“改良主义”来緩和这种危机，但是新的矛盾却仍在成熟，特别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发展。

在那时以前，伴随着每一个这种危机而来的是包含在第四国际总綱領中的有限要求，或者是朝着这个方向的要求。目前，斯大

林主义国际危机的新阶段提出了一大堆問題，这些問題是世界革命問題和国际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問題，在这些問題背后，还有新的群众性的国际领导問題。正在成熟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新阶段因此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組織——第四国际的进展。

附录一：

第四国际簡介

密歇尔·巴布洛

它是什么組織

它的目的是什么

第四国际是由列昂·托洛茨基及其战友在 1938 年 9 月創立的組織。

它的历史实际上是和十月革命的命运的历史、苏联的历史以及第三国际的历史分不开的。

1917 年，俄罗斯工人和农民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維克党的领导下，取得政权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

但是这一胜利是在非常困难的和对于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繁荣发展不利的情况下取得的：俄国当时是一个在經濟和文化上都十分落后的国家，农民占人口絕大多数；在 1918 至 1921 年間，这个国家深受內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之苦；革命处于孤立状态，因为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并没有别的无产阶级成功地战胜它的阶级敌人从而也取得政权。

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設是在很不利的国内外环境中进行的，这种环境从一开始就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演变。

那时的落后而孤立的俄国在經濟和文化上的种种困难，甚至在列宁在世时就已經使工人国家发生了**官僚政治的变形**：各級苏維埃、各級工会和布尔什維克党本身都有变为从属于国家政治和

經濟机构并有为其吞沒的趋势，这些国家机构开始逃避群众的直接控制并排除群众参与管理。

除了工人阶级的各种組織屈从于国家的影响的这种**官僚主义化**之外，在列宁治下还有一个不同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阶层在萌芽发展，这个阶层和无产阶级的經濟水平和社会地位相比是享有特权的，而且越来越有势力：这是一个**官僚阶层**。

列宁在他在世的最后几年，已逐渐注意到这种危险，他是第一个力图 and 这种现象进行斗争的人。特别从 1921 年开始，党内和国内的**民主問題**和反对**官僚主义化**的斗争使布尔什維克党产生了派別，这些派別归根結底反映了在发展中的苏維埃社会中新的社会力量的冲突。

现在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根源就产生在 1923 年左右那段时期，当时托洛茨基接替列宁领导布尔什維克党内为争取无产阶级民主、反对初露苗头的**官僚主义化**和新发生的**斯大林主义**的斗争。那一时期的文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托洛茨基的《新方針》^①，乃是无产阶级民主和革命政党内民主制度的真正的宪章。

早在 1923 年前即已开始的布尔什維克党内反对官僚主义化的斗争，接着很快就发展到全国，并越出国外发展到整个第三国际，这一斗争在直到 1928 年为止的一整段时期内都在继续进行，也就是直到托洛茨基在 1927 年被斯大林开除出党并在 1928 年被逐出国外，在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島上避难为止。1923 至 1928 年的年代是布尔什維克党内左派反对派形成的时期。

历史将使人們回忆起，左派反对派在党内以及在某种程度上

① 1923 年 12 月在《真理报》連續发表的一組文章。

也是在第三国际内继续进行斗争，对于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存在下去的思想和实践水平是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的。因为这表明，斯大林主义远不是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自然的和好像是有机地延续；斯大林主义为了得到发展和成功，不得不在多少年中继续不断地和布尔什维克党中整个一个派别进行斗争，这一派包括有党的最优秀分子，布尔什维克的精华部分，他们在列宁领导下曾缔造十月革命并且创立和领导了第三国际。

斯大林主义只是在实际上毁坏了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 and 组织结构才达到强施其统治的目的。

从 1923 至 1928 年，俄国左派反对派围绕下列一些思想和政治问题进行斗争并形成成为一个派别，这些问题的巨大重要性无论怎样也不会估计过高的：

反对党和国家官僚主义化，争取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反对斯大林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1924 年秋天初次形成），争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① 反对新经济政策的难以控制的发

① 托洛茨基及其战友忠于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国际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完全胜利。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其生产按人口计算将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更多、更好和更便宜的制度，在一国范围内建成是难以设想的，不论它有多么富足。资本主义只有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才取得了发展。社会主义是一种生产力远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为高的制度，就更要求有一个国际的，实际是世界规模的基础。

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不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国内取得胜利和在单独一国内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们所不同意的是社会主义在一国内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的理论，他们并且反对一种“民族社会主义”的自给自足经济的方针。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仅限于术语方面。实际上它决定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整个策略。斯大林主义使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动从属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第四国际却正相反，认为保卫苏联和完成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的方法，是通过争取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来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展，爭取計劃經濟；^① 反对第三国际在英国 1926 年大罢工^② 和在中国 1925—1927 年大革命^③ 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爭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执行列宁主义的政策。

我們可以看到所有这些綱目都在左派反对派的最著名的文件即它的 1926 年政綱中得到充分闡明，政綱的签署人中有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是預定提交 1927 年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

流亡使列昂·托洛茨基得以在第三国际和一般的国际革命运动的更大范围内传播俄国左派反对派的思想。

于是开始了我們现在可称之为第四国际的史前时期的一个新阶段，**国际左派反对派**的形成阶段，在各大洲很多国家中建立了許多小組和进行接触。这一阶段从 1928 年持續到 1933 年，到希特勒登台为止。

在这一阶段中，国际左派反对派为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民主改革而进行斗争。它希望許多事件的压力和广大群众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将足以促使共产党产生“回到列宁”的运动。

在德国，从 1928 至 1933 年，无产阶级——組成社会党与共产党两个大党——与法西斯主义之間展开了决定性的斗争。

国际左派反对派意識到这一斗争的历史重要性，号召两党自

① 不管斯大林神話怎么說，历史的事实是，計劃經濟的概念是托洛茨基早在 1923 年就已提出来的。从 1925 年开始，俄国左派反对派就有条不紊地为草拟一个加速国家有系統的工业化的計劃而战斗，来反对斯大林—布哈林的以在当时鼓励富农发财为基础的路綫。

② 在这次大罢工中，斯大林从上面与英国工会的改良主义官僚組成一条統一战綫，这使这些官僚得以背叛——沒有进行有組織的抵抗，并对英国共产党也沒有带来任何好处——英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

③ 当时斯大林支持蔣介石并命令共产党 屈从于国民党——一个由蔣領導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

下而上的統一戰綫采取战斗的政策，目的在夺取政权。可是共产党却正相反，它听从克里姆林的指揮，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政策，坚持分裂工人运动，并使有关希特勒所代表的危险和与之斗争的最好办法的看法更加混乱。我們在这著名的“第三阶段”中是不偏不倚的。①

国际左派反对派，在一系列至今仍不失其正确性的重要文件中，闡明了法西斯的性质、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性质和統一戰綫等問題。它竭尽全力在德国共产党內和第三国际內唤起和激发良好的反应，以避免造成希特勒获胜的灾禍。然而，德国共产党連同第三国际与克里姆林宫，对于这些呼吁仍完全置若罔聞。

希特勒在 1933 年的胜利不仅决定了德国共产党的命运（它一直沒有从这次灾难中恢复过来），并且也决定了整个第三国际的命运。鉴于在历史紧要关头的經驗，这些組織已无能力作出良好的反应，說明它們本身已无可救药地官僚主义化了。国际左派反对派得出結論，从此以后需要为建立新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和一个新的共产国际而努力。

于是，开始了第四国际史前时期的另一个新阶段，時間是从 1933 年至 1938 年；在这一阶段中发动了組成一个新的国际即第四国际的运动。

的确，那个阶段是不利于把广大群众团結在一个新的国际所提出的思想、政綱和組織的周围的。德国法西斯的胜利的后果波

① 在这一阶段，斯大林曾提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論，把社会民主党視同法西斯主义，还提出了“来自下层的統一戰綫”的政策。这二者就使得实际上不可能与社会民主党人組成任何統一戰綫，同时还在工人思想認識中縮小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

在这种“过左政策”造成不幸之后，斯大林接着又在 1934 年轉向“人民陣綫”这一相反的政策，即从上面与改良主义的官僚和所謂“自由”资产阶级，如法国和西班牙的急进派建立联盟。

及整个工人运动，一項新的世界大战的远景正出现在地平綫上。

而且，凡是群众轉向革命攻势以堵塞或打倒法西斯主义的地方，如 1934 至 1939 年的西班牙，1936 至 1938 年的法国，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領袖們都在“人民陣綫”中与資产階級政党合作，使运动遭到失敗或受挫折。总的来讲，1933 至 1938 年期間突出显示了国际革命运动的普遍衰落和接二連三的失敗。

那么国际左派反对派为什么还要坚持宣传和組織一个新的国际呢？

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因为国际工人运动的这种演变証明：傳統的領導的不可挽回的全面破产，从而迫切需要一个新型的領導。而为了这一目的，一旦其必要性得到历史的証明，就必须着手发动。现在需要开始认真地为未来作好准备，把所有确信国际左派反对派綱領正确的革命馬克思主义者組織在单一的世界政党内，这一綱領不是人为的，而是国际左派反对派敢于在苏联和全世界的階級斗争烈火中鍛造出来的。

我們是在这样的时刻开始組成一个新的国际的：由于历史事件一再証明而使我們确信旧的領導的破产，并且我們自己已精心制訂出一个不同于工人运动中任何国际流派的完整的綱領。

而且，我們还确信，把我們团結在一个国际組織中的这一綱領的确是当代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綱領，与社会党的和听命于克里姆林宮的各国共产党的政治行径是根本不同的。

至于說到广大群众尚沒有跟随我們这一点，我們不认为这足以推延宣布一个既成的事实：即我們作为一个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国际組織的存在。

为了使群众拥护我們，我們必須向他們举起十分鮮明的旗帜，必須为他們提出范例，而不是去等待那种好像是自发产生的新領

导。

当然，只要我們的群众基础仍这样有限，我們并不妄想能够指导階級的行动。我們今天仍然只是明天的群众性共产国际的胚胎。当初在 1938 年 9 月通过決議不顾一切地宣告第四国际誕生时我們也是这样想的，当时正处于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反动的高潮时刻，并且已經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

第四国际成立大会所提出的主要政治文件称为《过渡綱領》，主要是由列昂·托洛茨基亲自起草的。

这一綱領清楚地說明一个事实，即第四国际作为一个組織是从当今的国际工人运动内部产生的，它全心希望使自身进一步与整个运动合成一体，而不是要成为一个宗派或是一般的宣传小組。《过渡綱領》的目的实际是要坚决领导群众的革命行动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

《过渡綱領》是打算在对于社会主义來說资本主义客观条件已經成熟，和受了传统的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人影响的群众的落后政治觉悟之間架起一座桥梁。

《过渡綱領》包括有整整一系列辯証地互相联系的口号，这些口号从群众的最迫切的經濟和政治要求出发，但目的在于把斗争提高到夺取政权、爭取建立工农政府（无产阶级专政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水平。

这些口号远不是武断和“知識分子式”的，而是实际上对那无产阶级連續不断地进行斗争的资本主义客观条件作了透彻分析的结果。而且，这些口号还考虑到当代的国际工人运动的經驗，甚至（在方式上）工人的心理状态。

《过渡綱領》的概念是彻底革命的和辯証的，根本不同于社会党与共产党的綱領。

这些党有一个最高总綱領，設想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一个最低綱領，坚持基本的經濟和政治要求，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結構內进行改革。但是在这两个綱領之間**沒有桥梁**，缺乏以一連串辯証地相互联系的过渡性要求来連接最低綱領与最高綱領的中間环节。

其实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实际行动中**已經把他們的最高綱領擱到希腊历卡伦茲日了^①，只是在“重大場合”，为了把群众煽动吸引到他們这边来，才重新提一下。他們**在实践中**只采用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結構內行动的最低綱領。而我們知道这是什么緣故。

因为事实上，社会党尽管还拥有一个人阶级层的基层，却是由服务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机构领导的；而共产党則是由听命于克里姆林宮的官僚机构领导的，即政治上听命于苏联的居于統治地位的社会阶层——苏維埃官僚阶层——的领导。由于这个原因，各国共产党所关注的，不是首先促进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把他們的法碼加在本国民族资产阶级一边，使后者能采取一种有利于克里姆林宮的外交政策的对外政策。

《过渡綱領》則正相反，它反映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的思想 and 經驗，虽然是从工人阶级的最基本的要求出发，但真正的目的却在于促进工人阶级去进行最大可能的革命活动。

我必須說，《过渡綱領》中有些口号，諸如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活的工資計算法、与失业作斗争的活的工时計算法、工人监督、工厂委员会、工人监督下的国有化、工人民兵队等等，在 1938 年看来似乎与群众的想法离得很远。但是因为这些口号無論如何是符合

^① 这是一种幽默的說法，原文为 the Greek Kalends, Kalends 为古羅馬历的初一，古代希腊历中沒有 Kalends 这个名称，所以說“希腊历卡伦茲日”意思就是“永远不会有的那天”。——譯者

資本主义客观情况的，一向通过亲身的經歷接受教育的群众，也善于时时刻刻在他們的斗争中把这些口号变成他們自己的口号。二十年后，过渡性綱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惊人的适合时宜的特点和富有青春活力。这对于那激发起綱領的概念的精神來說特別真切，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綱領，能指引一个先鋒队真正下决心去动員群众进行斗争，不是为了改良，而是为了进行反对資本主义政权和制度的革命。

必須采取一个过渡綱領，和 1938 年的过渡綱領一样，目的在于有效地促进这样一个斗争。

在第四国际成立約一年之后，如我們所預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从思想观点來說，第四国际对于这样一个事件比之任何其他工人組織有較好的准备。特别是自从希特勒登台后，我們的运动曾数次強調指出这一走向战争的必然趋势。我們說过，那一次战争基本上是又一次帝国主义之間的战争，凡尔赛条約的胜利者和失敗者之間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这一次，假定說与战争是怎样开始的无关的話，也会在一定时刻把苏联卷入战争。但是这并不会把帝国主义之間的战争变成一次“正义”战争，也就是說，这不应导使革命运动去支持帝国主义最后的同盟国苏联。

根据 1934 年我們的組織的国际書記处拟出的“战争与苏联”提綱，革命者的責任是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內坚持“革命的失敗主义”，不管这个国家是苏联的敌人还是盟友，只有苏联自己进行的战争应认为是“正义的”战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从根本上指导我們的路綫。

列昂·托洛茨基曾比任何人都先預见到有簽訂德苏协定的可能性，这一协定事实上是在 1939 年 8 月簽訂了。但是，不管我們

怎样指責这一协定，因为以当时签订协定的外界状况来说，它使无产阶级迷失方向，虽然如此，我们并不改变对苏联这个变了质的工人国家的基本态度：它对帝国主义的或本国的反动无条件防守，也就是说，这是与克里姆林宫的政治领导人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政策无关的。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严格地采取这一态度。

1940年8月，在群众支持方面很薄弱的我们年轻的国际，受到了一个比处于孤立状态（这是预见到的）更可怕得多的打击：列昂·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几年前他逃亡到那里）被一个苏联共产党的人员刺杀了。我们从此丧失了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智者和革命斗争中最坚强最值得视为模范的人物。

战争日益激烈，并且因苏联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复杂，这对我们组织产生了强大的压力。我们必须同时在两方面战斗，既要反对民主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中被爱国热潮引起的群众的错误想法，又要反对帝国主义的镇压和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和镇压。

要和“民主的”或是法西斯的帝国主义对抗，就必须坚持“革命的失败主义”的路线，也就是不论这个国家的军事效果如何，必须坚持反对战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宣传的路线。

为对抗克里姆林宫（反法西斯的“民主国家”的新盟友）的政策，必须把两种政策结合起来，既要保卫作为一个工人国家的苏联，又要无情地批判克里姆林宫向那些同罗斯福、丘吉尔和戴高乐结盟的所谓“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宣传的机会主义的、沙文主义的和阶级合作的政策，还要进行革命宣传，争取在首次出现的适当时机推翻苏联的苏维埃官僚阶层的政治制度。第四国际所执行的这样一种政策并未有助于将群众团结在它的旗帜周围的工作或从双方的镇压下救出群众。但是我们认为，这一政策是忠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类比的范围内，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具体条

件下的相当于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执行的政策。

第四国际为执行这一政策，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特别是在被纳粹占领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和受蒋介石独裁政权统治的中国。我们被纳粹枪杀或在集中营中消灭的牺牲者数以百计，特别是在法国、德国、波兰、希腊、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地方。

我们在战时丧失了我们在运动中的大批领导干部和在本国享有声誉的具有悠久历史的革命战士，如我们的法国组织的总书记马瑟尔·希克同志死于德国集中营，比利时的勒索瓦勒同志和雷昂同志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意大利的布拉斯哥同志在“解放”的时候牺牲于斯大林的镇压下，希腊的鲍利奥博洛斯同志于1943年在希腊遭法西斯枪决，牺牲的还有德国魏德林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

纳粹在欧洲大陆所敢于举行的唯一的一些公开审判是在荷兰和奥地利举行的，审判的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亲托洛茨基主义的战士。由于这些审判的结果，有几个人被枪决了。在美国、英国、锡兰和印度这些站在“民主”一边的国家，只有托洛茨基主义的领袖们被监禁，因为他们始终一贯地进行反对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在人类最黑暗的这一段时期中，几位托洛茨基主义战士的态度是真正英雄主义的态度，据最客观的观察者的报道，他们在各方面都和他们的俄国同志们（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一样可敬。

我要举出几个例子来。

德国同志魏德林是在欧洲沦陷时期中唯一出版的一份期刊物的主编，这份刊物鼓吹一种与德国工人一视同仁地实行国际友爱团结的政策。这份刊物的名称是《工人和士兵》，在法国、比利时等地的德国士兵中发行。有一天，巴黎的盖世太保逮捕了一个法国女同志，接着又拘捕了另外三个同志，其中之一即魏德林同志，

他当时正秘密地住在巴黎。这四个同志的遭遇属于当时最离奇的遭遇之一。

这些同志之一被拘后解送巴黎盖世太保中央总部，他跳越三层楼的窗户逃跑了。另两位女同志送往德国的集中营。其中之一侥幸活下来，现在住在英国，和一位英国同志结了婚。还有一位，在1944年冬在德国有过一次不祥之兆的逃跑后，又被捕获，受刑后发疯了；在流放中死去。至于第四位同志，即魏德林同志，在他的伙伴逃跑后的第二天，被解到巴黎的波瓦·德·文森枪毙了。

但是他并没有死。他被当作死人留在森林里，有人发现他还活着，就把他送到了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医院。我们接到他从那里寄来的信，就决定并安排了试图营救他出来。但在那最后关头，医院里的一个人员预先通知了盖世太保，盖世太保得以在我们可能干预之前就把他迁送到自己的总部去。于是它们第二次杀死了魏德林同志，这一次是最后一次。

我再举一个前希腊共产党书记、希腊同志鲍利奥博洛斯的例子。他在1943年被法西斯匪徒枪毙之前，对执行死刑的士兵用他们的语言发表了讲话，在士兵之中引起了一场真正的兵变。士兵们拒绝对他和他的同伴们开枪，于是军官们不得不用自己的手枪来枪毙他们。

最后，我要举另一个例子，我想这几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这就是数周前才死去的比利时工人同志、以矿工为职业的加洛阿同志的例子。这个同志被送到著名的布痕瓦尔德死亡集中营。有一天，党卫军士兵一边笑一边带来一大群人到集合起来的犯人们面前，这群人是犹太人，他们是行走着的骷髅，奄奄一息，污秽不堪，身上长满虱子。

党卫军士兵已准备好要用毒气熏死这些人，他们说，除非这些

犯人中(他們自己已极度虛弱)有人有这种耐心和勇气来替这些悲惨的人們一个个地洗淨，才能免这些犹太人一死。犯人中各种宗教信仰和各种政治观点的人都有。但是沒有人願干这件工作。

等了一会，好，有一个人。加洛阿同志，这位卑微的矿工，他在日常生活中从沒有因任何功績而使自己与众不同，走出了行列，平靜地向党卫軍要求，如果他把他們身上洗淨就免这些长滿蝨子的犹太人一死。这正是他日日夜夜所干的活，极其簡單，但又需极大的頑強和克己精神。

我沒有机会在加洛阿同志逝世之前向他致敬，但我要在这里代表我們的全体国际組織向他表示崇敬的悼念。

斯大林为了要撫慰“民主”陣营中他的帝国主义同盟国而在1943年解散了第三国际。第四国际于是在1944年2月大战高潮时，在被占領的法国举行了一次国际會議，聚集了欧洲几方面的代表，在当时极其违法的情况下，會議好不容易才进行了六天。

第四国际成功地經受了战时意識形态和組織方面的考驗，并因之表现得更坚强了。

1946年，它召集了一次新的国际會議，會議除了有欧洲大陆的各个党派以外，英国和美国的同志們也参加了。

1948年举行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所有各大洲的代表都出席了。大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各种发展所造成的国际关系拟了一张对照表，并采納了新的規章，重申該組織的特点为受民主集中制原則所支配的一个世界党。

从此，第四国际每三年定期举行世界大会一次：第三次大会在1951年；第四次大会在1954年；第五次大会在1957年。这几次大会之所以重要不但是因为与会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反映了第四国际組織上的进展，而且还因为由这几次大会拟定的文件所表明

的第四国际的理論和政治工作的日益深化。

1951年举行的第三次世界大会，在第四国际战后历史上是占重要的地位的。在对国际形势重新做出估計时，大会肯定：在帝国主义和所有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間——工人国家、殖民地革命、資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运动等——全球力量的对比关系几乎是**不可抗拒和不可变更地**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变化。从在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仍然表现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所作的这个估計来看，其中就充滿了整整一系列革命的内容，包括苏联官僚阶层突发的危机在內。第三次世界大会，基于堅定的理論和政治考虑，更进一步在大型的群众組織——社会民主党的組織或是斯大林主义的組織內部开始了所謂**打进去**的政策。

1954年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大会拟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論及曾經决定斯大林主义兴起的条件和从那时起开始改变的将招致斯大林主义衰落和垮台的条件；并且还論及打进去的政策。

最后，第五次世界大会就共产国际对国际形势的估价和瞻望，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发展以及建立新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政党的策略等方面已达到的認識，进行了綜合，并加深了認識。

* * *

现在第四国际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的主张是什么呢！这是个什么样的組織呢？目的何在呢？

首要的是我們是一个国际組織，一个唯一的世界党，它是民主集中的方法和各大洲的約三十个国家中的民族的党进行工作的。

国际的总的政策是先由其在所有各国中的党彻底的民主討論后，再由世界大会多数表决决定的。我們的組織按照形势和政治急迫性把最广泛的民主討論和堅決的行动一致，辯証地結合在一

起。

以馬克思恩格斯의思想和以列宁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組織的思想为基础的国际組織的概念，后来由于第二国际和以后的第三国际的痛苦經驗而不为人所信了。有些人就此制造一种假理論：认为建立一种民族至上的只和其他民族組織保持“兄弟般联系”的組織是再好不过的。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主张是把国际具体地看成一些个别国家組織的算术上的集合体，它們只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合作。因之，他們說，他們要避免受到官僚主义机构的控制，而要多多考虑民族的特点了。

而如果說第二国际的收場不好的話，那并不是因为它作为一个国际，即作为一个以革命的馬克思主义为基础和以民主集中制来管理的唯一的世界党在起作用；而是因为实际上它已墮落成为一些个别的民族組織的集合体了，这些民族組織都受它們自己的官僚机构所統治。

至于第三国际，它的变质只是由于它受一个单一的政党——苏联共产党的官僚机构的控制。

实际上关于民族独立的爭論經常涉及民族的官僚机构的存在問題，这种机构是很不喜欢有一种国际的民主的控制加之于它的。至于說到民族独立有利于保存民族特点的話，那就必須強調指出：在我們这一帝国主义时代中，如果不把一个特定的民族情况拿来和正确分析过的背景参照来看，同时又对国际形势不了解，就不可能彻底了解一个特定的民族情况的特点。特殊只是和一般比較來說才有的。

每一个国家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們，在成为一个民主国际組織的主要部分之后，由于这样一些傾向在国际的(主要就其世界观、政策及其組織結構來說是国际的)組織內部保持着一种互不偏

祖的态度，可以依靠真正从国际范围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方针的办法，以及依靠纠正可能发生的民族、甚至民族主义的性质的偏差的办法，来得到好处。

国际的思想和组织在政策、组织和斗争中表现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最难达到的团结，它是在各国的民族范围内和民族歧视和压迫进行斗争而达到的。但是，我们相信这种思想和组织仍要保持最高水平，以达到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因此，我们是一个民主国际组织，其目的在于通过宣传其思想和在真正的群众运动中生根的战斗者的行动为手段来促进建立一个拥有各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众性国际。

而面对着资本主义以及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时的政策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兴起的资本主义大大地受了震动；资本主义和工人国家、殖民地革命、大城市革命运动等所有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全球力量对比，还没有停止向资本主义不利的方向发展；从理论上讲，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之下，资本主义只有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或不经一战就投降二者之间作出抉择；鉴于美帝国主义的力量虽已削弱但仍远不可忽视，不经一战就投降实际上仍然是不可能的；革命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削弱帝国主义以及必要时更迅速地缴他们的械以遏制一场原子战争不可避免的毁灭，其最好的办法是去推动革命斗争，在各地攫取政权，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特别是在近年来所经历的确实的经济繁荣，从长时期来看，并不能抵销失去的殖民地，殖民地革命不可抗拒的潮流使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地获得了自由；这种经济繁荣也不能抵销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经济力量的逐渐加强。更重要的是，

这种繁荣远不能意味着资本主义有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只是一种机遇的巧合并且即将告終了。

资本主义还决沒有摆脱它的周期性危机。如果危机在目前只不过是采取了“衰退”的形式，还不像 1929—1933 年的真正的危机那样，那是因为受垄断资本家和国防经济大幅度的扩张所控制的国家插手其间起了較大的作用，美国尤其是如此。但是，在资本主义和工人国家二者之间的经济竞争中，后者已获得不可抗拒和不会倒退的有规律的进展。资本主义开始有比以前还要大得多的经济困难，资本主义的安乐阶段已属于过去了。

特别是在战后头十年，最使资本主义削弱的是接着 1949 年中国革命胜利而来的殖民地革命的惊人的胜利。这种稳步的、不可抗拒的和不会倒退的使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瓦解的趋势，从长时期来看，是在一条灾难性的道路上动摇了资本主义的均势，并且在这种意义上讲，已经决定了它的历史命运了。殖民地革命实际上只是标志着我们这个世纪的更为普遍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方面。以在我们运动中使用这个名词的意义来说，它实际上有不断革命的意思。

即使殖民地革命目前是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它们力图限制革命的范围，将其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和改革的范围内——即摆脱帝国主义而独立、国家统一、土地改革；而就连这些任务也证明是那些领导不能有效地解决的，并且，在一定的阶段，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和他們国内的群众起冲突，群众要求的是更深刻的社会革命。

从这个观点看来，这些领导在历史上讲是过渡的，并将为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先鋒所代替；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才是唯一能完成民主任务和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任务的。

我們的运动**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那就是不管它的政治领导的阶级本质如何。因此，譬如我們无条件地支持納賽尔反对帝国主义，尽管納賽尔代表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新兴的工业民族资产阶级的核心，并且还在国内镇压工人运动。同时，很自然，埃及的托洛茨基分子远还没有放弃反对納賽尔的革命宣传，事实上正在努力创造一个和納賽尔主义无关的独立的革命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政党将为在埃及建立一个工农政府而斗争，并成为将来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合共和国的先鋒。

我們的运动承认殖民地群众一般地起着先鋒队作用，并且号召城市无产阶级积极支援殖民地革命，以便消除存在于殖民地群众革命自发性的程度和城市无产阶级相对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两者之间的危险的距离，特别是在有关殖民地革命的问题方面。

在这个问题上，把全部錯誤都归諸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够的——虽則事实上，它們应对此負主要責任；也有必要向城市无产阶级直接呼吁：要它注意自己是落后于殖民地群众，并提醒它别忘了自身对殖民地的兄弟的責任。

我們时代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已采取了不同于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和不同于列宁的路綫。现在很清楚：在俄罗斯这样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所开始的革命，就好像是从周围向中心发展的。革命在到达資本主义的欧洲之前，首先要把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卷进去，并且将会以贏得对世界資本主义中最大和最重要、也是看来很可能是最后垮台的美国資本主义的胜利而告完成。

另一个削弱資本主义的因素是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逐渐和日益加速增强的經濟和文化上的力量。这种加强也反映在軍事实力和潜在力量方面。

这些国家的经济经常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较高的比率进展（几乎是一倍），并且是稳步前进——没有经历过由于“衰退”或危机所造成暴跌——这一事实，具有历史重要性：在形成政治上的发展方面，它将越来越加重要。这一事实还进一步证明：作为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结构特点的**统计和计划经济**具有历史的优越性。

从真正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标准的观点来判断，不论它们的政治制度可能是如何地变质或不像话，还是可以证明我们称呼这些国家为**工人国家**是正确的。因为统计和计划经济决不是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有机发展的结果，而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遭到革命性毁灭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历史在下述方面还没有提供任何证明，即向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国家——特别是在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无须统计和计划经济。那就是说在我们当代的革命具体现实中，统计和计划经济既表现为革命的结果，又表现出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期就远比资本主义更能发展社会生产力。

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的运动对历史性地战胜帝国主义和当地反动派而得以实行统计和计划经济是无条件地加以保卫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运动革命地反对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政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并没有被民主地组织在苏维埃、工会和政党中的无产阶级所掌握，而是掌握在社会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手中。

我们的运动反对这种官僚警察制度，争取如列宁在世时企图建立的真正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我们的运动反对当权的官僚阶层，从事于宣传由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群众进行革命来推翻官僚制度。我们认为：如果资本主义、殖民地和附属国等国家的客观条件对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有决定性作用，那末，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现存的客观条件，对**政治上的革命斗争**高

潮也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政治上的革命不是以在这些国家内推翻社会制度为目的，而是以推翻政治制度为目的。

这就是 1956 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意义，它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政治革命的开端，其目的不在于恢复资本主义，而在于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我们认为显然将从苏联（苏维埃官僚制度的堡垒）开始，在所有这些国家内以各种形式和道路进行政治革命。

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包括的并不只是民主苏维埃、甚至和工人国家无关的自由工会以及承认在其内部有权形成思想派别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还包括有权组织一些党派，只要它们尊重工人国家宪法上的义务。这最后提到的权力，对我们说来是社会主义民主大厦的柱石，因为，实际上，它决定苏维埃、工会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本质。

我们的运动认为使得斯大林主义得以产生和巩固的历史条件目前已大大地改变了，并且事实上，目前正在发生导致斯大林主义垮台的无可挽回的危机。从这种观点看来，譬如尽管赫鲁晓夫改变论调、后退、甚至再加上他犯的罪过，他都不能成为第二个斯大林。但是，斯大林主义不可避免的垮台，（将是我們当代革命进程完成的表现），不会以简单的“进化”“改良”的道路出现，而是要在一定的时期由群众不可避免地掀起革命浪潮才行。

一般说来，我们对发展的看法仍然有深刻的革命性，并且是乐观的。我们的运动，对于和解、“和平共处”的“新道路”以及和平演变很不相信，我们认为阶级斗争将会发生，但是，在力量对比方面，越来越有利于反对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官僚机构的革命。所有的问题都将通过斗争——包括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和革命——来解决。

确实，我們对这两种辯証的統一的形式——革命—战争的互相貫通有清楚的認識。在这种辯証的統一形式中，革命的每一次重要进展都是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反革命战争的斗争而取得。而政治革命則仍然是反对苏維埃官僚机构和由其支配的警察和军队等机器的斗争的起决定作用的方式。

为了大胆的面向我們时代的特点——高涨中的斗争，即在反动和保守力量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之間的一場你死我活的斗争，必須要建立常設的、国际性的、适当的組織；这一組織将最高度地綜合国际工人运动的智慧、特点和战斗力、它的传统、它的經驗：具有符合我們这一世紀中叶的要求的高水准布尔什維克品质的真正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和在所有人类历史中最珍奇的动力。这就是我們运动的目的。

为了要更快地达到目的，我們决定不但是依靠我們独立的活动机关这唯一的办法进行工作；还要在广大群众的組織之中，不管按国家來說这些組織是社会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进行耐心的和长期的工作。我們对这些組織沒有存幻想，我們也不是去在那里改造它們。我們只认为这些組織是工作的范畴，因为工人阶级真正积极的一部分是組織在这些組織之中的。

我們这一时代的工人阶级并不是像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沒有任何經驗和容易接受革命宣传的工人阶级。它在一定的工会和政治团体中有自己的机构。我們忠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为共产党人所规定的任务，我們决定分享这个阶级的具体經驗，从运用这經驗开始工作。在阶级的政治上的成熟方面，不幸的是无法跳过几个阶段来創立一个群众性政党：只有当这一阶级凭着它本身现有的組織經驗和重要的、一再出现的历史事件的經驗，而他自身摆脱了旧的精神状态，它才能试图进行一次思想上

和組織上的重新編隊。

我們的運動相信：通過它目前在每一個國家的真正群眾運動中公開地出現並參與其事的策略，它對階級的自發革命的重新編隊，提供了積極的貢獻。因此，我們感覺到：我們現在在做所有客觀條件允許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先鋒去做的事，因之，是在盡我們最大的力量，為人類社會主義的未來做好準備。

(1958年8月)

附录二：

对莫斯科會議的綱領的 革命性的批判

列維奧·麦丹

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一个會議。显然，这个會議旨在阻止斯大林逝世以后和苏共二十大以后所出現的离心傾向，并制訂一个代替斯大林时期的新的理論体系。1960年11月的會議具有类似的目的：1959—1960年的爭論，特别是苏联同中国之間的爭論，确实使1957年重建起来的团結遭到了威胁。

要对这样一个富于变革的时期作出有效的概括性結論，这是一項艰巨的任务。这项任务对于那些用經驗主义的方法行事的人几乎是完成不了的。这些人冒着眼看他們由于形势所迫而勉强进行的一些建設处于朝不保夕的危險。但是，在莫斯科完成了一件最不平凡的工作。这次會議，無論从代表团的数量，从它所付出的劳动的时间，从它的討論的广度和尖銳程度，以及从它最后通过的文件所使用的語气來說，都远远地超过了1957年的會議。后来的各种評論，尤其是某些領導人的評論，都肯定了这次會議正式通过的文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①

正像在会前几个月中苏的爭論中那样，在莫斯科會議上也提出了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全部或者几乎是全部重大問題，或者說得

^① 赫魯晓夫在他对苏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說这是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思想的宝庫，这个決議……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

更广泛一点，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性阶段的各种重大问题。因此，对于会议所选中的解决办法，应当不仅仅看作是（或主要不是）过去的总结，而且应当从它给了国际反对资本主义阵线中的各个阶层在进行短期或长期的斗争时带来了前景这个角度加以评价。

我们要请读者们原谅，我们将大体上遵循前一篇文章的梗概来分析这些问题，虽则这未免有重复的毛病，但是，这种做法将便于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和平共处、战争和革命

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特别是决议的第一章，鲜明地反映了过去几年来的重大事件。因此，这种概括的估计比 1957 年的文件更为明确，尽管它还不如中国人过去几个月来在各种文章和演讲中常见的若干提法那样明确。事实上，不应忘记，尽管美帝国主义遭到很多失败，他们还有许多可怕的箭可以射出^①。

同 1957 年比较，有一个着重点显然是不同的。美帝国主义被称为全世界的头号敌人（“最大的国际剥削者”，“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宪兵”等等）。而三年前仅限于说“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和“美国某些侵略集团”。自从首脑会议失败以后，在这个有限时期内所出现的形势，对于使用某些激进的语句，特别是中国人所要求的那样，例如对艾森豪威尔的作用的争论，再也没有多少反对的意见了。

更有意义的是，这种论断的重要性已被一些正式的评论家们特别加以强调。

^① 赫鲁晓夫在对苏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坚持这一观点：“帝国主义仍然拥有可由它支配的巨大实力，仍然握有强大的军事机器。”

“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与世界大战相联系而产生的，而是在两个体系的竞赛和斗争中……而产生的。”^①

乍看起来，这种论断似乎是再明白不过的真理，是可以立即被接受的。但是，这种论断是同另一种论断相联系的。即：

“帝国主义者所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事实，绝不意味着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一定要通过世界大战，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存在着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年代。”（1960年莫斯科声明第五章）

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以争论的方式提出的前述论断，这种论断实质上否定了中国人提出的某些论点。虽然，提出战争是革命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样一种“理论”是荒谬的。但是不应忘记：第一，在上面引用的决议第一段（它同第二段是矛盾的）似乎认为，归根结底，战争所造成的变乱是产生帝国主义当前危机的根源，而这种变乱是从中国的革命开始的，这个革命是最近十五年来产生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基本因素；第二，问题是，不应满足于一般化的论述，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现阶段是否存在各种发展的趋势，因而战争和革命必然会交织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战争——革命的进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决议除了有它明显的正确方面以外，它的论断是含糊不清的。因为，归根到底，它掩盖了最近几年来所发生的、以突然的分裂、尖锐的冲突，几乎是从未间断过的各种局部战争，以及不断出现的全面战争的新的危险为标志的历史进程的真正革命内容。

因此，我们就接触到“共处”和到底战争是否不可避免的争论

^① 这一段及下一段引文均译自1960年12月6日《团结报》意大利文版。

問題。

1957年會議实际上是重新提出了二十大的論点。新決議要解决的是更为广泛得多的問題，它不但要重申一般的看法，而且特別要解答自从国际工人运动內部出现了爭論以后，尤其是中国人表明了立場以后，所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和保留意见。

我們已經看到，关于战争将会引起革命的論断已經遭到駁斥。中国人在許多演讲和文章中所表达的关于帝国主义本性并没有改变的中心思想再次遭到申斥（确实，怎能否定这样一个基本的真理呢？），但立即加上新的因素，因而这样說：尽管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但从今以后，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如所周知，这种看法的主要論据是：世界上新的力量对比的出现，能够有效地防止帝国主义者由于他們的制度的邏輯所驅使而发动的全面冲突。

由于中国沒有直截了当地否定战争可以避免的論点和共处的論点，他們现在可以在这个問題上装得若无其事。但是，他們却不能掩飾他們的退却。正如我們在前一篇文章所強調指出的，这种分歧主要是在：強調了某些論点而不是強調其他的論点；使用一种調子而不是使用另一种的調子。因此，完全用不着怀疑，八十一个党的文件——特别是在这一点上——基本上代表了赫魯晓夫的看法而不是中国人的看法。

这种估計已进一步为其他各种因素所証实。因此，在关于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后果問題上，決議一方面重申“帝国主义国家如果发动战争，人民将会消灭資本主义，并把它埋葬掉”，^①但是，另一方面却特別強調这样一場冲突所具有的灾难性，強調首要的任务是要通过斗争来避免这场冲突；并且沒有对中国當場提出的任何

① 无論如何，这种讲法（第三章）看来是突然加上去的，并且是用假定的提法，而且并不怎样坚持，这样做必定是为了避免摔“修正主义的”跤。

論据作出让步^①。同时，在关于裁軍問題上，基本上也是苏联的看法，认为裁軍是可能的看法比中国的看法占优势。中国的看法认为，归根到底，裁軍运动不过是一种宣传的策略^②。最后，还有一种讲法，根据这种讲法，为了要消灭战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完全胜利”不再是必要的了。这也就暗含地駁斥了中国人的論点：反动势力即使处于被孤立的境地，他們仍然不会降服。^③

但是八十一个党會議不能忽視国际工人运动中提出的、反对共处理論的某些基本論点——这些基本論点已部分地反映在中国的观点中——的論战力量，以及，对共处的內容，特别是在有关否认共处的“調和”性质方面，作出一系列詳細說明，如同某些共产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決議里所做的那样。

“和平共处的路綫是动員群众开展积极行动反对和平敌人的路綫。

各国之間的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間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調和。相反，它要求工人阶级、所有共产党为爭取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而加强斗争。”（1960年莫斯科声明第三章）

要制訂一种公式，使它在紙面上能解决各种矛盾，調和对立的想法，往往是可能的。但是事物的实际发展如何，却尚待証明。因为，共处的思想，它本身可以成为陈旧的真理的一种說明，或者不

① 参看列維奧·麦丹：《中苏爭論反映出来的我們时代的問題和前景》（1960年《第四国际》秋季号，第11—20頁）一文中的看法。

② 参看，比如，1960年6月7日的声明。从报告的内容看来，赫魯晓夫坚持实现裁軍的可能性（同上，第12頁）。

③ 参看中国共产党《紅旗》杂志，1960年4月号中的一篇文章。

过是一种可以随便充塞内容的空洞的辞藻，要不然，它本身就具有某种逻辑，这种逻辑以某种方式通过国内或国际的政治斗争具体表现出来。

现在，让我们先把宁愿通过和平而不愿通过新的大战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撇开不谈。这是一个无聊的，但又是经常不断地被提出来的问题，特别是在针对革命运动而发生争论的时候。^① 抽象地说，没有人竟会疯狂到“宁愿”用新的大战的道路来代替和平的道路。但是，让我们无数次重申，这不是一个表示愿望的问题，而是分析各种客观趋势，根据最有希望的前途予以决定的问题。从这一点看来，莫斯科会议坚持一般化的提法，提出折衷主义的办法，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作不同的解释（达成一致这是有必要的），总之，一面说战争是会爆发的，同时说帝国主义将会分崩离析而没有力量发动这样一次战争，可以说他们的这种说法是对的。^②

但是，所缺乏的正是具体的分析，根据这样一种分析来确定（用一般政治分析中所难于避免的那种大体上的准确性），在最近的将来，什么因素必然会占上风，因此，什么是最有希望的前景，而工人运动应为此作好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运动在上届大会通过的文件中采取了更为严肃的立场、而不满足于臆想出来的诡辩理论。尽管帝国主义遭到了削弱，尽管它在核导弹武器的某些方面处于劣势，但是它仍然具有必要的力量来挑起一次全面的冲突。由于它的制度本身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而使它遭到经常不断的压力而不得不这样做。恰恰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危机，从其总的

① 参看反对托洛茨基同我们的运动的论战（1960年秋季号《第四国际》第18页及脚注25）中有引文；并参看《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0年10月第10期雷曼在社论中的老式斯大林主义的攻击。

② 参看我们在1960—1961年冬季号刊登的文件。

趋向來說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冲突的危險特別加深。因为美国領袖們深知，時間對他們是不利的，作为一个統治階級，他們絕不会不使用最后垂死掙扎的手段就甘心情願地退出历史舞台。

另一方面，赫魯曉夫和他的追隨者們堅持列寧的共處原理，但是，除了少数引語以外，列寧某些看法的意義却被遺忘了。列寧的論點實質上并不像一些在不利的條件下參加革命戰爭的某些極端分子所看的那麼簡單化。它重申這個基本的真理，即不能從熱戰的角度來設想國際資產階級同第一個工人國家之間的鬥爭，而會有不發生戰爭的“共處”時期，工人國家必須尽可能地利用這種“共處”的時期。

托洛茨基對共處持有類似的看法。^①

显而易见，在八十一个黨會議上并不是这样解釋的，在这次會議所通過的文件中，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似乎把共處當作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总的概念。而這種概念有其本身內在的邏輯性及其相應的實際的含意。

這些含意之一是，如果戰爭甚至在不推翻資本主義的情況下就能避免的話，那末，反對戰爭的鬥爭就可以在更為廣泛的基礎上開展起來，甚至可以包括資產階級的某些階層。在這裡，我們就碰到斯大林主義政策和斯大林主義以後的官僚領導集團的政策之間的新傳統矛盾的問題。同時，我們也碰到這兩者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運動之間的最大分歧之一。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矛盾呢，因為要不是認真地爭取同資產階級的某些階層結成聯盟，就是要以階級鬥爭的形式來進行反對戰

^① 在1922年布爾什維克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談到“一段相當長時期的和平共處和同資產階級國家進行事務性的合作”。（參看伊薩克·多依歇：《沒有武裝的預言》，第31頁）

爭的斗争。前一种做法对不断发展的群众斗争不能不是严重的限制，經常为此付出代价，特别是在西欧的某些国家。后一种做法則会使拟議中的联盟不能为那些被爭取参加这个联盟的人所接受。这是同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最大分歧之一，因为革命的馬克思主义一直认为，要真正避免一次新的全面战争，其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推翻(資本主义)制度，即使不必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一系列有决定性的国家內这样做。

赫魯晓夫在八十一个党代表会议以后所作的报告中更加明确地闡述了他对共处概念的最本质的看法，他說：

“苏联在同美国經濟竞赛中的胜利，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对資本主义体系的胜利，将是历史上根本的轉折点，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将发生更加革命化的影响。那时即使最怀疑的人也会明白：只有社会主义能为人的幸福生活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因而他們将做出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选择。在同資本主义的經濟竞赛中赢得时间，是现在的主要任务。”^①

这些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也許不过是从來沒有人像他那样明白地說出来罢了。自然，赫魯晓夫对殖民地人民和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并不是无知的。但是对他來說，这几十年来在同資本主义所进行的历史性的斗争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现在是将来也是苏联經濟的发展，以及在“和平”竞赛中苏联的生产能力超过美国的生产能力。这个公式的邏輯的結論是：要尽可能爭取同国际資產阶级的某些阶层合作，希望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資產阶级长期合作并且接受对革命运动采取某些控制的必要性，只要这样做会被认为是有利于达到总的战略目标的

① 参看《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1961年1月第1期。

話。^①

中国人爭論的目的，归根到底就在于反对这种战略的某些具体做法。但是，他們的弱点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們声称在总的方面接受(共处)这个概念，但是，又不肯接受这个概念必然具有的含意。

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既沒有无視也沒有低估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的經济发展在客观和主观意义上作为一个革命的因素的重要性。但是在集体主义制度的历史的潜在优越性变成經济上在一切方面占压倒优势以前，同时尽管社会主义建設的范例愈来愈具有吸引力，却仍然不是一个很充分的因素，就在这个时候，需要进行在世界范围内打倒資本主义的具有决定性的战斗。决定性的因素将是世界許多地区的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資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以及更先进的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反对資本主义的斗争。只有在上述的最后一种斗争取得胜利，而且还要取决于在国际资产阶级武装力量最优良的堡垒中所取得胜利的程度，才能确保不受核战争浩劫的悲惨的威胁。这种威胁今天仍然籠罩着那些已經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坚持这种主张，并为其具体实现而进行斗争。还有另一种理由，即世界各地革命斗争的开展将会調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无穷尽的力量，从而能把任何官僚主义的污垢从根鏟掉。毫無疑問，基于同样的理由——从相反的利害观点考虑——官僚主义者“宁願”并企图把“共处”的看法和概念强加于人，其实，这个概念絕不是阶级斗争“根本”的形式，它实质上只不过是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把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

① 赫魯晓夫路綫的根本意义，已刊登在1960年秋《第四国际》內上述文章中。

胜利这一旧理論作一种极端的引伸。基于同样一些基本的理由，三十年前，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沒有接受后一种理論，今天，他們也絕不接受前一种理論。

殖民地革命和“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

最近几年来的混乱现象，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混乱现象，以及中国对赫魯晓夫路綫某些方面所进行的批評，使得八十一个党的會議比 1957 年那次會議更加重視殖民地革命的問題。1957 年的決議只是一些仓促提出的綜合材料，而去年 11 月八十一个党的會議的決議中却有整整一章，不仅对这种形势作了概略的分析，而且还闡明了群众斗争的前景和各个共产党的行动。^①

我們自然可以同意會議文件中的一系列論述。除了本章开头部分的概括性总論外，我們也不否认，“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殖民主义奴役制度的瓦解，就其历史意义說来，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同样，文件比过去更及时地譴責了现代殖民主义；现代殖民主义是老殖民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用以使已經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仍旧处于它們的剝削和霸权之下的工具。^②

但是，一当文件提出现阶段殖民地革命动力的問題及其发展的趋向与前途时，分歧就变得明显了。

在对现代殖民主义所进行的譴責中，认为帝国主义者力图“收买資产階級中的一部分人”这种說法，肯定是錯誤的。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腐朽的退化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现象。虽然，殖民地資产階級的某些阶层在力求以“积极的中立主义”来保障自己，但

① 参看 1957 年決議第 1 章及 1960 年決議第 4 章。

② 在文件的其他部分，基本調子却是宣传性的，而有时候甚至是煽动性的。

另一些人却預见到一种同宗主国的有产階級結成联盟的新形式，可以作为巩固那条反抗群众运动的压力的陣綫的办法，那怕这种巩固只是暫时的。

如果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決議起草人在語言上的疏忽，那就錯了；实际上，它已經是根据下述分析而提出的总路綫的一个反映，这种分析认为民族資产階級具有积极作用，认为它即使在现阶段也是一种领导力量。

是的，文件宣称民族陣綫必須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它还明确地提出了民族資产階級具有两面性的这种观点。但是，尽管文件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它之所以提出上述观点，显然是前几个月那許許多多爭論的結果，而其目的則是，再一次为各种各样的解释及今后在中途可能提出的改变大开方便之門——它却肯定了“一切爱国民族力量的伟大作用”（其中包括資产階級，至少是包括它的某些阶层），肯定了資产階級仍然能够具有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这种进步性。^①

关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所进行的革命的性质，文件称之为“民族的、反帝的、民主革命”以及“反帝、反封建革命”；資产階級仍然具有领导作用的这种可能性便从这里产生了。然而首先一个关键問題恰恰就是：从民族資产階級的結構、成分及其社会經济关系来看，民族資产階級抑或它的某些阶层，难道能够始終一貫地进行文件本身所說的那种包括根本的土地改革和“清除帝国主义統治的經济根源”等等在內的革命嗎？虽然民族資产階級存在着上述弱点，但八十一个党的會議仍然承认这种可能性，而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則視之作为一种抽象的、与现实不符的公式。从尼赫魯的

^① 決議把“殖民地和附属国”同已“从殖民枷鎖下获得解放”的国家加以区分，而明显地限制了民族資产階級在第二范畴內可能發揮的作用。

印度到納賽尔的埃及，还有伊拉克，即使不把巴西或委內瑞拉計算在內的話，經驗迄今已有了很多，而且重要。在帝国主义极端脆弱的国际形势下，虽然某些民族資產階級已經能够在爭取形式上的政治独立和实行某些重要的反帝措施的斗争中站在前列，但革命的进程却半途而废（就算还没有公开地倒退），这正是因为民族資產階級还没有真正能够解决諸如土地改革、工业化以及消灭帝国主义的經濟基础等等重要任务。

八十一个党會議并没有能够完全漠視从那些經驗中作出的判断，事实上，在決議中的确有这样一些段落，这些段落归根到底是決議中主要的新东西。他們承认，取得独立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銳化，民族資產階級越来越倾向于同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妥协”，而“人民群众确信，消灭长期落后状态和改善他們生活条件的最好道路，就是非資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此后，这种趋势又将向着什么样的社会經濟形式发展，并在什么力量的领导下发展呢？

他們的回答是，“在现代的历史情况下，正在形成有利于在許多国家中建立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也就是說，这种国家一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軍事集团，反对现代殖民主义，爭取进行土地改革和保証“人民有广泛的权利和民主自由。”

于是，这里我們就面临一种新的生命，一种社会政治形式，它既不属于資本主义类型，又不——或者还没有——属于无产階級社会主义类型。关于领导力量，文件談得就更模糊不清了。因为，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一样，資產階級墮落的傾向受到了譴責，并談到工人階級和农民群众的“絕對重要的作用”（？）而上述資產階級或它的某些阶层所能繼續起的作用却一点也没有被明显地排斥，对无产階級领导的需要也未清楚地指出。古巴的情况将有助于表

明，在爭取建立“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的斗争中，絲毫也不排斥同資產階級結成联盟。^①

迴避这个真正的重大問題，便足以暴露八十一个党會議这一“发现”的本质。沒有作絲毫的努力来表明，爭取实现“民族民主”的可能性来自非洲或拉丁美洲社会的客观趋向；^② 他們只限于提出目标和制定公式，而这种公式的錯誤性质就不言而喻了。虽然事实上可能产生一段非常短暫的过渡时期——如果不是以星期或日来計算的話，最多也不过以月来計算，——在这期間，国家的社会性质还未固定下来，那里不存在这样一种发展，即它既不再属于資本主义性质，而又未变为集体化的或社会主义的。^③ 一个相反的假設事实上可能意味着对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的根本标准加以修正，不仅如此，它将必然地同现实相矛盾。

这一事实已經提到过了，即已获得独立而无产階級领导尚未建立起来的国家，已經不能解决那些对于它們的解放与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問題，当然更談不上已經踏上“非資本主义型式”的道路了。不用回顧越南与朝鮮的情况了，新近的、大家議論紛紛的古巴的例子，就已从相反的观点，用有力的論据，駁斥了八十一个党會議的那套站不住脚的理論。

很自然，決議热烈地为古巴欢呼，但几乎是奇怪地迴避了卡斯特罗式革命——它被說成一次“完全是人民的”革命——的特点問

① 我們自然是指布拉斯·罗加及其同事在1960年夏代表大会上的解释。

② 关于文件有意含糊其詞与躲躲閃閃的特点，从下述事实可以找到新的例証，即“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之假說只是以“許多国家”的名义提出，而沒有加以任何具体的說明，甚至連一个例子也沒有举出来。

③ 參看在弗拉霍維奇关于八十一个党的會議的报告中，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对“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这一公式所作的大体上正确的批評。（《倒退一步》，南斯拉夫出版社，貝尔格莱德，1961年第71—72頁）

題：这些共产党的“賢人”們真的沒有怎么动脑筋！^①但是，姑且不談那种轉移人們視綫的宣传，如果真有一个国家足以作为“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的典范的話，那就是古巴。在古巴，卡斯特罗领导集团“为政治独立和經濟独立不断地进行斗争”，实行土地改革，清除帝国主义統治的根基。我們立刻同意，在古巴我們面临着“非資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但它是什么呢？——也許不是合乎八十一一个党會議的公式的那种无产階級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是一种历史性的新形式？我們运动的领导为去年十月那些决定性的措施所直接作出的清楚的回答是：——至今，无产階級运动中的各种傾向也以或多或少的正确性作出了这一回答，尽管是为了各种不同的目的——在古巴，不仅是帝国主义的統治，就連統治階級的霸权也一起被推翻了，集体主义式的关系已經确立了。換言之，古巴的革命已不間断地由反帝的民主革命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建成了已經开始从事社会主义建設的工人国家。^②

现在，真相已經大白，他們是企图以可笑的遁辞来完全掩盖古巴的真实情况，并費尽心思去构思出一条公式来挽回自己的面子。^③这不仅仅是关于社会学的观点的正确性的問題，这里关系到战略路綫和总的看法問題。

① 在上述报告中，赫魯晓夫沒有怎么特別提到“人民”取得了政权。（決議第13頁）

② 參看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古巴情况的決議，《第四国际》1960—1961年冬季号，第48—50頁，及本期有关文章。

③ 在莫斯科，关于古巴宣布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消息是被尽可能的掩盖起来。事后为了辯解，就拉出了一些公式，在这方面，作为一个例子，可參閱5月3日《团结报》的社論和后来埃斯卡兰特在5月間較晚一些时候在《团结报》上所发表的一些声明。

显然，自此之后，布拉斯·罗加談到了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建設社会主义。很可能，經過数月的推迟，面对着一些无法找到遁辞的事实，共产党正在准备来一个轉变。

像拉丁美洲所有的共产党一样，古巴人民社会党一直不断地重复着一种令人作呕的說法，說什么这种革命不应该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应该是“民族的、土地解放的、爱国和民主的，并且是反帝和反封建的革命”；还說什么有必要同“关心解决这种革命任务的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工作”。^① 这条路綫已經証明是破产了的，这里无需再加以說明：卡斯特罗派的领导已經远远超过了罗加和他的同志們的目标，幸好当时在山里搞革命运动时他們不是处于领导地位，否則古巴将仍然处于巴蒂斯塔的統治下，或者按最好的設想，代替他的也不过是弗朗迪西或貝坦科尔特之流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理論方面，卡斯特罗向《团结报》的記者发表談話时，已經宣布了在整个拉丁美洲要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合作的这种理論的死亡^②。

因此，八十一个党會議的文件提出的程式，已为在發展中的嶄新的革命所有力地粉碎了，它忽略了对正处于沸騰状态的非洲大陸的真正特殊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从这里可能出现不亚于在拉丁美洲所显露出来的那种嶄新的发展——并頑固地坚持它的陈旧的机会主义的主张，或者逃避在殖民地革命的領導力量的性質問題上采取明确的立場，繼續无视在新阶段中把这一革命不断地发展，即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一关键問題。但是，所有这些都包含着深刻的邏輯性：这恰恰就是赫魯晓夫提出問題的一般方法的邏輯所在，是他关于“共处”和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

① 这是布拉斯·罗加在去年夏天人民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理論。讓我們再提另一件事情，也是在去年夏天，人民社会党和7月26日运动的右翼的官僚分子攻击参加哈瓦那青年大会的第四国际拉丁美洲部分的代表是“挑衅者”，“罪名”是他們提出了反帝和反资本主义的方案，这些方案在几个月后被卡斯特罗执行了。

② 见1961年2月1日《团结报》。

的邏輯。

如果將赫魯曉夫路線——這一文章已經談過這一路線——作為基點，從邏輯上隨之而來的將是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進行合作，和尼赫魯、納賽爾、蘇加諾之流進行合作——這種合作不只限於國家之間的關係上，而且要擴展到各共產黨的政策上。這是一條陳舊的路線，在古巴，這一路線沒有妨礙革命取得勝利，這是因為布拉斯·羅加的黨在革命中只是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但是這一路線已經在伊拉克和印度尼西亞造成了損害，它過去妨礙了，目前仍然妨礙着像印度和阿根廷這些國家群眾運動的不斷成熟。儘管對這一條路線作了本文所提到的一些修正和保留，它仍然作為制訂八十一個黨會議的文件的根據，唯一比較新的東西——“獨立的民族民主國家”——也僅僅是一種主觀的想法而已，從最好的方面設想，它可能作為一種宣傳手段，但歸根結底，它相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出現的“進步的民主”，或者是歐洲中部某些共產黨所設想要建立的，將促進進步的民主並對壟斷資本加以控制的國家。這一提法和其它提法的最基本的東西都具備着相同的概念、相同的總的觀點。

先進資本主義的舊矛盾和新矛盾

八十一個黨會議的文件在分析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形勢和解決所謂通向社會主義的民族道路時，比起 1957 年會議的文件，並沒有顯著的修改或補充。

正如那一次的分析一樣，這次的分析仍然是一般化，和經常使用宣傳的口吻，雖然不斷地重復那些昭然若揭的真理，但卻遠未能使人能夠掌握住某些現象中的帶有本質性的具體因素。至少，一些參加莫斯科會議的黨，在過去數年中已經根據相同的論證制訂

出远为透彻的文件^①。

我們可以列举一些例子。在第一章中，为了企图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形势完全加以否定，并将之描繪成一幅几乎是灾难性的图画，因而不光強調了真正显示这一制度的将要崩潰的一些现象，而且像下面的表述也加了进去：

尽管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有一定的增长，但是，资本主义的矛盾無論在本国或国际范围内，都在不断地尖銳化。……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质日益加深。

我們可以同意：归根結底，资本主义的矛盾正在尖銳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不可能合理化的，我們上一届的代表大会也得出了这样的結論。但是，在得出这一結論之前，必須对这些年来的一切现象，特别是对那些相对地說是新的现象进行分析（这些现象甚至使馬克思主义理論家都感到惊异），并必須准确地指出他們的特定的局限性和特定的矛盾。当由于殖民主义的崩潰和帝国主义的世界性危机而被大大削弱了的西欧出现了生产扩展的阶段，生产經常以不断的、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时，只提出“在某些国家”，“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有一定的增长”，并匆忙地加上“却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不断的尖銳化这一事实”，“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质日益加深”，这倒是逃避事实的輕而易举的办法。这样的論断已被降低到像宣讀口头禅一样，这簡直是将战后时期最“嶄新的”现象（再說一遍，这也是最令人惊异的现象）輕輕放过，而沒有作出任何努力来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

文件的其它一些章节提到了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一可資討論的

^① 例如，意大利共产党的某些文件就是这样。在草拟这一文件（指八十一个党會議的文件。——譯者）的这部分时，曾經受到了意共这些文件的影响。

問題：

在个别国家中，工人阶级只是依靠顽强的斗争才使自己的一些切身要求得到满足，而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生活水平依然低于战前水平。……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包括某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经济不发达的、群众生活特别贫困的地区，这样的地区甚至还在扩大。（第一章）

并继续说：

对工人的剥削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贫困化的进程正在加剧……。

这里也存在着将甚么东西都塞进同一个口袋的倾向，一方面给人以正在趋向贫困化的印象，但是却不对这一趋势加以明确的断定，并小心翼翼地不提出一些具体例子，不说出正在发生上述现象的是那些国家或者是那一种类型的国家^①。

但是，竟然想出这样一种解决的办法，它一方面参考了苏联经济学文件的传统的分析方法^②，另一方面允许多列士和法国总工会继续持有他们关于贫困化的理论而不致发生矛盾，并且允许陶里亚蒂和意大利总工会反对他们。

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形势的特点过分简单化和不加批判地沉迷于关于群众贫困化的某些公式，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比乍看起来更为严重。因为，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并不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当中，引起崩溃的最富于爆炸性的因素依然是群众的匮乏和贫困。这样，在最近这些年头特别是在某些西欧国家中（例如意大利和比

① 文件所述的先进国家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指那些国家并不都是明确的。

② 在苏联，绝对贫困化的理论很流行，见1954年底出版的《经济手册》。

利时)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趋势,是一种阶级冲突再次加剧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是产生于和过去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出现当前的运动不是由于贫困,而是由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特定的矛盾、由于“繁荣”和正在不断扩展的新的需要(这似乎只是同不断发展的技术有关)以及由于劳动者要求冲破阶级异己的锁链,并成为生产过程中自觉的因素,这种日益增长的愿望——但文件却完全忽略了这一趋势。当然,关于这一趋势将发展到什么程度(它只是在现在才具体化起来),以及关于它在发展中可能出现的节奏,是有些东西可以讨论的;但是一个忽略了这一趋势的文件,对了解工人运动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必须以之作为行动依据的条件,与其说是一个帮助,毋宁说是一个障碍。

关于共产党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西欧的战略路线、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道路等问题,八十一个党会议的文件只是再次重复了 1957 年的提法。主要的着重点是放在反对垄断资本和争取更进步的民主的斗争上,这一方面,个别党的代表大会和欧洲党的代表大会已经详细作了规定。尽管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加深,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正在加剧,而工人国家所显露出来的吸引力正日益扩大——文件对于所有这些明显的因素并不是没有觉察到——而共产党的领袖还没有将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的任务向工人阶级提出来。他们的战略目标仍然是争取一种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垄断资本的权力将被打倒——通过对主要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和民主化——但资本主义的政权却保留下来。关于说明所有这一切怎样才能实现这一艰巨的任务,让陶里亚蒂之流的精明的策略家来担当吧!让他来说明如何在不用破坏现政权结构的情况下,亦即是不用推翻整个资产阶级,不用建立起无产阶级作为当政的阶级,就可以对现政权的主要神经中枢施加打

击。^①

我們不会坚持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问题：決議原原本本地重复了 1957 年的理論，这是二十大所制訂出来的理論的忠实的回声，我們的运动已經反复地批判了这种理論。在这里，我們只要提一下如下的事情就够了：当世界上已經談論到各种情况，并发生了各种事件时，決議仍然停留在一般化的阶段上，它沒有试图提出一些有助于指导实际斗争所必需的假設或者事例。一些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党，如意大利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却对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采取了同样的观点这一事实本身，就应该使人看到采納这种观点的真正根源，而就連那些最热衷于議會道路的人也必須承认，法国的戴高乐主义正是对他們的理論的一种否定，并且，不应该将这种經驗不声不响地放过去。

显然，如果对这样一个关键性的問題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則决不会只是对它进行一些詭辯就草草了事，而是应该对所提出的各种假設給予一种更加正确的回答。特别是关于行动的目的問題，并不在于去猜想资产階級究竟接不接受民主方法这种不測事件，而是根据以往的經驗和客观的趋势，作出它可能选择这条或那条道路的預測。对于革命的馬克思主义來說，毋庸置疑，第二条道路远远背离了更加可能出现的前景，应该依据这种前景来制定切实的方針；各国共产党虽然抽象地提出了不排斥实行革命的摧毁这种設想，但却根据一种“和平的”、“民主的”和“議会的”道路来进行指导，实质上，这就是一种从内部实行轉变、用旧的形式来套新的

^① 这样的公式本质上是机会主义的，但如果根据列宁主义的方法作为一种过渡的形式来想像，它还被当为是有意义的东西。这样的解释已經被明确地加以排斥。根据提出这一路綫的人的意图，“进步的民主”的阶段，被想像为可以客观地出現的。

內容的做法。^①

不用說，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和其他支持他們批評議會道路的人已經完全退却了；文件的這一部分沒有反映出去年的爭論。^②

第五章也談到了工會團結和克服工人隊伍中的政治分裂的問題。工會團結，尤其是在某些國家內（如法國、意大利和比利時），無疑是一個迫切的問題，同時，無產階級政治上的團結也可能出現一種明顯的進展。但是，在若干典型的西歐國家（首先是英國和德國，也包括各個小國）內，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組織上分裂的問題，——實際上，工人階級的絕大多數都追隨一個單獨的政黨——社會民主黨的領導經常處於絕對的優勢。這種情況繼續發生的原因何在呢？採取什麼途徑、通過什麼樣的中間階段以及運用什麼策略手段，才有可能扭轉這種形勢，從而使新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領導能夠占上風呢？這便是已提出的若干真正的問題；除了一般地號召團結——儘管這種作法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之外，還必須就這些問題提出答案。

但是，在八十個黨的決議中卻找不出這樣的答案來。

領導國和領導黨不存在了嗎？

甚至關於“社會主義體系的加強和勝利”那一章，也沒有提出什麼新的、值得重視的東西，這一章又一次談到了蘇聯及其他工人

① 在上回提到的報告中，赫魯曉夫談到了“拿議會的形式來為人民服務，並將新的內容灌輸到這一形式中”。（同上，第16頁）显而易见，這是要拋棄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所談到的必須完全摧毀舊的形式，並建立起新的，一種在歷史上嶄新的形式的列寧主義的觀點。

② 隆哥在他向意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報告中談到了一些共產黨的代表對和平道路的观点採取保留的態度，他們說明，由於在他們的國家中，目前（原文如此）不存在任何民主生活方式，因此對和平道路的观点“難於理解”（見1960年12月19日《團結報》）。

国家的性质的当前特征；在 1957 年已經談过的关于工人国家之間具有平等地位的濫調；以及显示經濟发展的老一套征象。有重大意义的是提到了“国际分工制度不断趋于完善”，这是符合当前的新阶段的，因为各成員国之間已經处于一种新的关系之中。显然，现在各方面的事情比 1957 年时大大的发展了，而 1957 年时所用的公式只能結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除此之外，文件几乎沒有明显地反映出近年来在苏联、中国及人民民主国家中已經提出和还在繼續提出的那些爭論得最厉害而实际上也是最迫切的問題。應該对农业問題、集体化的方式、速度以及如何刺激增加生产等問題加以考虑。文件提到了——但是，这不完全是談农业方面的問題——“关于物质利益的列宁主义原則”（为了避免任何困难，在同一节中，紧接着又提出“要尽量加强精神刺激”），也有一小段談到了在人民民主国家中，“农民自願从小私有财产过渡到大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农庄”。而对于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間的那些显著的分歧，对于中国公社的巨大的和議論紛紛的試驗所产生的无数困难和矛盾，以及对于在会后数个星期就在苏联明显地出現的危急局势，決議也只字不提。

但是，显得更空泛的是，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內在辯証关系，在文件中几乎是完全消失了，而在 1956—57 年間这种关系曾經以指責和爭論的明显的形式表露出来。只是在两三个地方暗中提到斯大林主义时期出现了退化现象，并暗示已經达到了消除这种现象的目标。“人民內部矛盾”似乎已被忘記了。^①

^① 文件中关于“不論建立何种形式，无产階級专政（声明原文此处有“永远”两字。——譯者）意味着扩大民主”这种說法至少是过于馬虎了，特別是在 1956 年已經对此譴責过。

更重要的是談到有关反資本主义的战斗队伍的內部关系，有关各个工人国家之間和各个共产党之間的关系的那些段落。文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的強調远远超过了 1957 年，并且指出了殖民地革命的发展的特殊作用。同时，任何有关使人相信领导国家这种理論的表现都被仔細地消除了，虽然苏联和苏共的先鋒作用仍然得到了承认。^①

赫魯晓夫特別坚持这一点，并且认为不可能“由任何一个中心来领导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因此，官僚主义的领导者們并不打算恢复斯大林主义时期的共产国际——或者是声名狼藉的共产党情报局——的那种組織形式。但是，文件却清楚地表现出这样一种傾向，即以举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會議来作为商討問題和互相启发的一种正当的形式；并且，要建立起对所有与会党都具有約束力的紀律原則。^②

我們当然不会贊成重新建立列宁主义式的共产国际。而更糟糕的是，从會議的筹备阶段、到會議的进程、以及会后公布消息的做法，都清楚地表明他們仍然打算采用的老办法。根本的問題和重大的分歧只是在“上层”进行討論，不仅不征求下层黨員的意见，甚至还不老实地告訴他們各种不同的观点，而只是要他們接受既定事实的結論。^③ 这完全照搬那些最正规的官僚主义传统。

① 1957 年的決議仍然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同上，第 182 頁），但是最近的決議——对苏联采取了更为一般化的提法，（如“最强大的堡垒”等等）——只說苏联共产党“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先鋒队”。似乎这是苏联共产党自己提出来的修改，据了解，好像中国对此提出了非議，坚持要用过去的提法。

② 赫魯晓夫认为必須特別強調最后一章中的这一部分：“每一个党的全部活动都必須严謹地和忠实地符合于會議的各种決議。”（同上，第 19 頁）

③ 他們花很大的力气企图否认資产階級報紙所发表的意见分歧，會議参加者之一，意大利的阿利卡塔激烈反对那些可能需要“帶有毀謗性議論”的人。（1960 年 12 月《再生》杂志第 12 期第 932 頁），我們所要的不是帶有毀謗性的議論，而只是要文件的

同时，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所进行的猛烈攻击以及这种攻击所采用的形式，足以表明出席会议的那些官僚主义分子所关心的是什么以及他们所抱的是什么的另一个迹象。像过去一样，不在这里提出有充分理由的批评，也不对南斯拉夫联盟的真正主张进行考察：他们光是一味地戴帽子和贴标签，甚至采用了含糊的带威胁性的词句。而八十一个党中有些党一回国，就赶忙变本加厉地散布纯粹是斯大林主义式诡辩权术。^①

第四国际并没有掩饰它认为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内外政策所应当进行的批评。但是，八十一个党却着重谴责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当中最正确的事情：谴责他们坚决地维护某些让工人参加工厂管理的试验，谴责他们在最近的纲领中所提出的对过渡阶段的矛盾所作的某些大胆的分析。正是因为这班官僚主义分子企图把某些非常重要的论断继续当作清规戒律，所以他们甚至不愿讨论这个纲领，而宁愿莫名其妙地中伤它，或者用一大堆诡辩的名词把它埋葬掉。^②

文件也对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的倾向进行了比较一般的批

抄本和发言等等，就是说要忠实的公正的消息。与此相反，他们却小心翼翼地限制这些东西的发表，例如，就连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章也不让发表。

① 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所使用的辞句比较起来，八十一个党的决议的措辞是十分温和的。而且，中国人在莫斯科会议前后都曾经猛烈地掀起反南斯拉夫运动，因此，毫无疑问，他们在起草决议的这个部分时施加了影响。奇怪的是，与此相反，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中甚至没有提到南斯拉夫人。隆哥在他向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匆匆地提了一下这个问题，他提醒说，谴责并不排斥“聚会、会见和联合行动”。

② 特别是在已经提到的弗拉霍维奇的报告中，已经提出了南斯拉夫对决议的答复。有些批评是一针见血的：例如，对他们采取秘密外交的方法来讨论工人运动中的问题所进行的批评，对逃避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问题所进行的批评，以及对决议的性质所进行的批评；当然，除了谴责他们对南斯拉夫联盟的态度而外，还允许对决议进行各种不同的解释。在战争、共处等国际问题上，众所周知的南斯拉夫观点又被重提了；这种观点是和我们运动的观点根本不同的。

評。但是，在這方面沒有任何新東西。這些都是目前一再重復的那套老公式，而且所開的藥方是：如果每個領導都宣布自己忠實於代表會議的那些理論，那麼，它就始終能夠使運動朝着一定的方向發展。

暫時的解決辦法

在八十個黨舉行代表會議以前，發生了大家都知道的爭論。從若干與會者的報告和正式文件本身所承認的某些事情可以看出，這次會議出現了激烈的和長時間討論的場面。^①

幾乎在一切根本的問題上都出現了不同的主張，而“中國的”路線儘管顯然居於少數，但也得到若干代表團的支持。^②

但是到最後，不僅決議被一致通過，而且這種努力成功了：使各個黨在隨後幾個月里採取更加一致的態度，而不要時而產生刺耳的分歧和暴露前一個時期的那些爭論。在某些問題上，顯然進行了妥協；在另一些問題上，解決的辦法包括採取或重復有充分伸縮性的公式；而在其他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人實行了退却（或者暫時接受了多數人所制定的紀律）。

正如我們已經提到過的，在闡明會議的結果和運用文件的方針當中，有不同的側重點：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和意大利共產黨採取截然相反的立場，比如說，前者是斯大林式的保守主義的第一個前

① 例如，可以參看已經提到的隆哥在意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上的報告，以及法國共產黨領袖們所提供的各種材料（他們提到中國和阿爾巴尼亞對法共的攻擊，等等）。我們注意到，12月1日的公報談到“各自的意見和主張”，同時，決議的最末一句指出，“各國共產黨……的進一步團結，是聯合工人階級的一切力量的最重要的條件”等等。

② 除了阿爾巴尼亞以外，澳大利亞也支持中國人，而印尼人在世界工聯北京理事會上所表現的親華立場也是眾所周知的。日本人、印度支那人和朝鮮人（以及中美洲的若干共產黨）對中國人也頗有好感。

哨，而后者目前却成为赫魯晓夫主义的先鋒。^①

中国人方面已不再采取 1959 年和 1960 年时那种好辯的态度了，而強調已經恢复了的团結、尤其是同苏联共产党之間的团結；他們不再提出自己在共处問題上所抱的保留态度，并且避免提到领导国。^② 甚至对某些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資產階級所进行的批評，就算沒有完全取消，也是大大地减弱了：的确，自从中国人同印尼达成協議以来，现在一直同苏加諾保持着一种新的好关系。^③

但是，尽管如此，分歧并未消除。他們除了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进行宗派主义的議論之外（在这个問題上，中国人仅次于阿尔巴尼亚人），毫无疑問，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群众的革命斗争的貢獻，毛澤东比赫魯晓夫有更高的評价。分歧几乎經常表现在着重点的不同上，而不是表现在立場的截然不同，但是，只要讀一讀有关的文章、发言稿和文件，事情就明白了。

在会后这段時間中，对世界局势的估計，存在不同的看法更加明显了。中国人对国际力量的对比进行了更加乐观的判断，而今年春天所发生的那些事件——从加加林的飞行到对古巴所进行的可耻的討伐——自然使他們更加强这种看法。^④ 这种分析的实际含义是清楚的：中国人认为，苏联及其他工人国家应当利用这种比較有利的条件，在若干关键性問題上以更大的勇气行事。^⑤ 但是，

① 陶里亚蒂在 1961 年 4 月第四期《再生》杂志第 361 頁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地批評了阿尔巴尼亚领导集团所采取的方法。

② “以苏联为首”这种慣用的辞句已經完全见不到了。

③ 这就証实了甚至在这个問題上，中国人的某些立場的經驗主义和随机应变的本性。（但另一方面，在同尼赫魯的关系問題上的爭論仍然繼續存在。）

④ 《人民日报》在五一节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說帝国主义陣营“奄奄一息”。

⑤ 根据英国的报刊透露，对于目前时代的描述似乎是会上爭論的主题之一，中国人贊成这样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包括目前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期”这样一种观点，而苏联人却喜欢目前流行的那种观点（参看決議第一章）。从赫魯晓夫对決議中的

又一次在对美国领导集团的看法上,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分歧:中国人对肯尼迪从来抱持松懈或“等待”的态度,他们目前直截了当地把肯尼迪描写得比艾森豪威尔还要坏。^①

但是,不会由于出现了这种新的分歧,八十一个党为团结所作的努力就注定不会持久。局部的分歧可能因时局而变得尖锐或消失,而折衷的方案则会助长阴谋活动和宣传性的捏造。更重要的是如下事实:莫斯科决议对于我们目前经历的这个历史时期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丝毫未提出答案,而实质上是在逃避或者歪曲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存在的,需要加以切实的解决,而不论可能采取什么方案或策略手段,它们都会不断地一再抬头。八十一个党的团结迟早终会因各种事件而遭到破坏和分裂,分歧必然会再度出现。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1961年春、夏季合刊)

那个定义加以强调这一点,就可以间接地证实这种争论;那个定义虽然也很平凡,但是它在反对另外一个不同的定义中却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参看决议第三页)。

① 在这里,成问题的是毛泽东在4月28日所发表的讲话,从那以后,中国报刊便经常重复这番话(例如,可以参看《人民日报》所载的上述文章,以及该报所载的另一篇文章[1961年5月9日新华社电讯稿])。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一、第四国际和苏联

二、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三、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告全世界被剥削群众书（1948年5月11日）

四、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宣言（1951年8月-9月）

五、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

六、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文件：（1957年10月）

1．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

2．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垮台（决议）

七、第四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文件（1961年1月）

1．宣言

2．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3．世界经济的趋势和前景

4．殖民地革命

5．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斯大林主义危机

附录：

一、密歇尔·巴布洛：第四国际简介（1958年8月）

二、列维奥·麦丹：对莫斯科会议的纲领的革命性的批判

附录页